

宋慶齡

■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 编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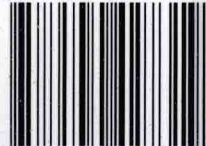


我希望有一天我所有的劳动和牺牲将得到报答，那就是看到中国从暴君和君主制度下解放出来，作为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而站立起来。

—— 宋庆龄

上架建议： 励志类

ISBN 978-7-5444-2731-9



9 787544 427319 >

易文网: www.ewen.cc

定 价: 38.00元



宋慶齡

上海市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 編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庆龄 /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著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5444-2731-9

I. ①宋… II. ①上… III. ①宋庆龄 (1893~1981)
--生平事迹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21443号

宋庆龄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 编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易文网: 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政编码: 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16 插页2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本

ISBN 978-7-5444-2731-9/K.0032 定价: 38.00元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编委会主任 陈兆丰

副主任 秦 量 赵福祥 马玉成

编 委 黄亚平（常务） 邹 镭 孙娟娟 陆柳莺

陈亚玲 刘国友 辛永康 朱玖琳 宋时娟

学术顾问 盛永华 张 磊

主 编 陈兆丰

策 划 秦 量

执行编辑 朱玖琳 张洁明 傅 强

撰 稿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灵敏 王 晴 王 伟 王宁宁 王家骅 朱佳妮

朱玖琳 刘金驰 李纯涛 吴惟力 何 沫 余 菁

陆柳莺 陈亚玲 陈中育 张洁明 郑 璞 郑培燕

宗 勤 宫洁菁 秦 琰 夏义坤 徐建华 高 杨

蒋慈华 傅 强



序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历史长河中，自1840年以来的近现代史，无疑是最为波澜壮阔的。这是一段共和政体取代两千年封建专制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抵御列强、血洗屈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也是新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审视这翻天覆地的一百六十多年，正贯穿着轰轰烈烈的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三个历史阶段。其中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起搏击，有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的血洒疆场，万古流芳。而孙中山、宋庆龄犹如茫茫夜空中的双子星座，在中华大地上焕发着特别璀璨的光芒。孙中山、宋庆龄既是生活伴侣，又是革命同志。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倡导者，在民主革命的道路上，愈挫愈奋，百折不挠，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宋庆龄作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一生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追逐着历史的脚步不断前进，为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呕心沥血、死而后已。

孙中山先生以“爱国若命”的博大胸怀和深邃广阔的世界眼光，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竖起“民族、民主、民生”三民主义的伟大旗帜，倡导“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开辟了近代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伟大事业，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政体，为中国人民迈向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建立了不朽功勋。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忠诚追随者，也是孙中山先生未竟事业的忠诚

继承者。她意志坚强，信念坚定，不避艰难险恶，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竭尽所能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她将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了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孙中山、宋庆龄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影响，将历久弥深。他们无愧为中国人民和海外同胞共同敬仰、永远缅怀的民族英雄、历史伟人。

毛泽东说过：“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人从来就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合作者和继承者。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完成了他未竟的事业，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这与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振兴中华”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是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学习孙中山、宋庆龄，就要继承和弘扬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对教育文化事业关注较多，同时对孙中山宋庆龄文管委的工作也有所了解。兆丰同志担任孙中山宋庆龄文管委领导工作后，十分重视对孙中山、宋庆龄的文物和史料研究。他主编的《孙中山》、《宋庆龄》是由其创意和主导，孙宋文管委系统的工作人员共同创作完成的。这两本书凝聚了大家多年研究的心血和劳动。读后掩卷，我感到其有科学性与可读性兼具、思想性与教育性并存的特点。读者可从真实的历史故事中了解孙中山、宋庆龄的革命实践、光辉思想和崇高品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通过阅读，在充分感受孙中山、宋庆龄伟大人格魅力的同时，亦会对中华民族一个多世纪以来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从中受到丰富、生动的爱国主义情感教育。





目录

Contents

1. 传奇的父亲	/ 1
2. 快乐的童年	/ 7
3. “忘记了祖国人生就失去意义”	/ 14
4. 接近革命运动的中心	/ 24
5. 嫁给革命	/ 30
6. 当“学徒”的日子	/ 36
7. “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	/ 46
8. “国民党需要新鲜的血液”	/ 53
9. “投身我丈夫毕生的事业”	/ 60
10. “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	/ 64
11. 访问列宁故乡	/ 71
12. 旅居德国	/ 78
13. 怒斥戴季陶	/ 85
14. “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	/ 93

目
录

15. 断壁残垣前的留影	/ 98
16. 子弹何所惧	/ 105
17. 一次成功的秘密会议	/ 114
18. 救国入狱	/ 120
19. 毛泽东来信	/ 127
20. 一方特殊的白手绢	/ 133
21. 姐妹携手	/ 139
22. 爱国的“一碗饭”	/ 145
23. 赈灾国际足球义赛	/ 151
24. 三毛乐园会	/ 157
25. “延安的朋友们都惦念着您”	/ 163
26. 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 170
27. 在天安门城楼上	/ 176
28. 把新中国介绍给世界人民	/ 181
29. 掌上明珠	/ 188
30. 10万卢布的汇款单	/ 194
31. “最最好的姐姐”	/ 200
32. 大江南北的足迹	/ 208
33. “我的钱够用了”	/ 215
34. “不要伤害无辜”	/ 222
35. 金色的余晖	/ 230
36. 大地的女儿	/ 241
跋	/ 248

传奇的父亲

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是宋氏家族的奠基人。当我们研究宋庆龄的家世时才发现，她的父亲也极具传奇色彩。这不仅因为他养育的六个孩子——宋蔼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长大后均成为世界名人，更因为他半个世纪身兼数“职”的生活道路非同寻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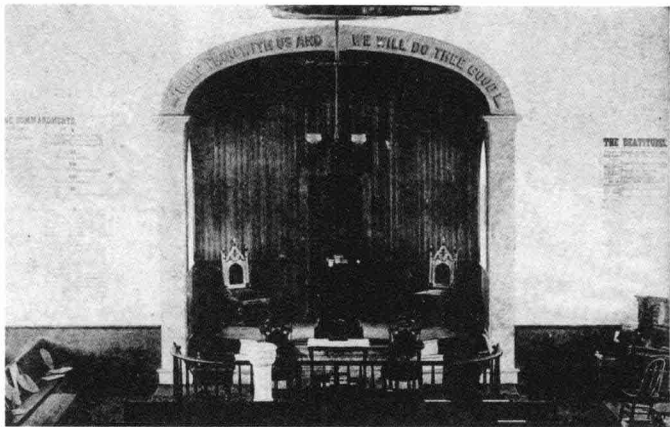
漂泊海外的少年打工仔

19世纪60年代，宋耀如生于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原名韩教准，字嘉树，号耀如。那时的中国，因为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不但失去了大国风范，还沦为西方列强竞相瓜分的对象。百姓因为生活艰辛而频频举义，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许多无以为生的贫苦人民、躲避清廷迫害的义士及其亲属纷纷到海外谋生。海南岛远离朝廷，岛民很早就有出洋的风气，此时更是投入到这股海外谋生的浪潮中。

宋耀如就是这股浪潮中的一小滴。他是一个农家子，本姓韩，家中仅有一小块能种四斗种子的沙土地，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14岁时，他不得不随同哥哥一起漂洋过海去投靠南洋爪哇岛上的一个亲戚，开始了他的学徒生涯。不久他被另一个没有子女的宋姓亲戚收养，并随养父改姓宋。养父在美国的海港城市波士顿开了一家出售中国丝绸和茶叶的铺子。于是，离家三年后的宋耀如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二次远航——从爪哇到波士顿。



■ 海南宋氏祖居



■ 1880年11月7日,宋耀如在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第五街监理公会教堂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

经历了充满暗礁
汹涌的漫长航程后,
宋耀如终于来到了波
士顿。对于年轻的美国而言,波士顿具有相对古老的文化底蕴,特别是它的教育事业首屈一指,拥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享誉世界的知名学府群。各地的

好青年纷至沓来。其中有两位来自中国的年轻的留学生牛尚周、温秉忠,他们是宋耀如养父茶丝铺的常客。他们的书卷气和远大理想影响并激发了同龄人宋耀如求学的志向。可养父一心想将宋耀如拴在铺子里。在他看来,这个少年有安静、刻苦、友善的品质,是茶丝铺理想的继承人。但见过世面的宋耀如一心想闯一闯新的世界。

瞒着养父,19岁的宋耀如偷偷溜上了停泊在波士顿港口的一艘缉私船。船长喜欢并理解这个孩子渴望了解外面世界的心情,不但没把他交给警察,还给他安排了一份水手的工作。

后来船长南调至威尔明顿港口服务,宋耀如也随之前往。船长是一个基督徒,他的虔诚感染了宋耀如。在20岁那年,宋耀如接受了洗礼,并取名“查理·琼斯·宋”,朋友们亲切地称他“查理”。在此期间他还在城里的印刷厂打了一段时间的零工,不久,宋耀如便迎来了他新的人生道路。

神学院的中国留学生

在威尔明顿,宋耀如的志向是上学。他在教堂的主日学校里结识了“卡尔将军”——一位受人尊敬的退伍军人和富裕的烟草商。主日学校是教堂在周日礼拜前一个多小时开设的宗教文化班。虔诚的基督徒卡尔将军对宋耀如十分友善,向他提供资助,并送他进入杜克大学学习神学。

这位善良的老人后来与他保持着终身的友谊。

在这期间,宋耀如曾经向他的父亲写了离家六年后的第一封信,表达了他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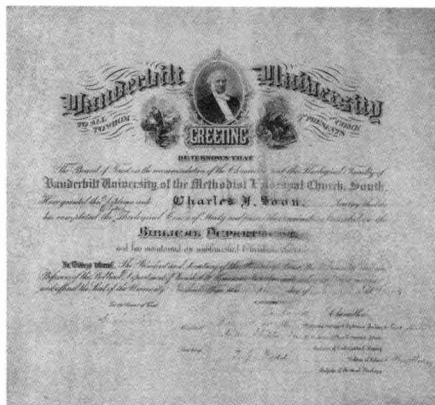
救世主基督后的喜悦和急于接受教育后回到中国的那份迫切心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宋耀如对宗教的虔诚和回国传教的热情与日俱增。

在卡尔将军的资助下,宋耀如于1882年转入田纳西州的范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学习。他对这所成就他大学之梦的校园充满了感情。在他看来,这里充满了友好、助人为乐的气氛,以至30余年后他将次子子良也送来这里深造。虽然有卡尔将军可以依靠,但勤劳善良的宋耀如坚持在假期中靠勤工俭学为生,有时挨家挨户地卖书,有时编织吊床出售。这对种过地,当过学徒、水手和印刷工人的他来说,实在不算什么。他从来没有鄙视过劳动,也不认为会因此而低人一等。在大学同学的眼中,他是一个虽然矮小但讨人喜欢的中国人,勤勉,脑子灵活,充满了机智和幽默,懂得如何友善地对待别人。

宋耀如以他特有的坚强和适应力,于1885年完成了学业。其间他与来自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室友伯克(中文名为步惠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他在生活中的许多重大决断都与这位好友联系在一起。



■ 在范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读书时的宋耀如



■ 范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颁发给宋耀如的毕业证

“海归”的专职传教士

学成后的宋耀如原本想再攻医学,以便成为教会医生回国。他认为神学可以让他向他的同胞介绍耶稣基督的救助,以拯救他们的灵魂,而医学则可以帮助苦难的中国人解除肉体的痛苦。但是校长不希望他做医生,也不愿意他过分美国化。作为监理公会负责中国教会工作的美国主教,校长坚持要把宋耀如尽快送回中国去传教。



■ 1886年，宋耀如由美回国途经日本时留影

回国后，宋耀如成了美国监理公会上海布道团的一名中国传教士。他的足迹遍布上海周边的昆山、七宝、太仓等地。可是这段专职传教士的经历并没有给他留下多少美好回忆。布道团团长艾伦从一开始就给这个年轻人下了这样的断言：“没有学贯中西的渊博，至多是一个失去了民族特征的中国人。”这对宋耀如的传教志向和赤诚之心无疑是沉重一击。另一方面上海当地居民的冷淡也让他尴尬，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习俗上他与他们都有太大的差异。这使得这位大人眼中的“小矮子”和小孩眼中的“洋鬼子”一时

无所适从。此时，他遇到了牛尚周，促使他向另一个人生角色转变。

名门之婿

此时的牛尚周已娶了明代著名科学家、礼部尚书徐光启的后裔为妻，而他尚有两个小姨待嫁闺中，其中的倪珪贞小姐有着当时女子罕见的“大脚”，但精通数学及钢琴。牛尚周知道，虽然中国传统推崇不识字的小脚女子，但是在西方接受教育的宋耀如是绝不会喜欢这类女性的，他的这位“另类”小姨无疑和他的这位传教士知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果然他的提议得到宋耀如的积极回应，而信奉基督教的倪家也欣然接受了这门婚事，他们举行了基督教婚礼。值得一提的是，宋耀如的另一位留美知己温秉忠也在牛尚周的撮合下成了他的连襟。

婚后，因为共同的信仰，倪珪贞很快就融入丈夫巡回传教的生活中。她十分珍惜与那些乡间女子的友谊，教她们游泳、使用肥



■ 初婚时的宋耀如和倪珪贞

皂、煮沸牛奶等有益于健康的生活习惯。但布道团带给宋耀如的精神和物质压力并没有减轻,微薄的薪水让他很难维持他想要的健康生活方式。他多次抗议都无济于事。美国人就像对待“印第安土著人”一样把宋当成了中国的“土著人”。随着孩子的降生,宋耀如最终决定退出布道团,向人生的另一个角色挑战。

实业家和革命“隐君子”

退出布道团后,宋耀如在上海定居下来。依靠为美国圣经协会经销《圣经》,宋耀如很快让自己的家庭摆脱了贫困。在做生意方面,他的确很顺当。当时,他被安徽在沪的富有的孙氏家族相中,出任他们在上海开办的阜丰面粉公司经理。这是一家大型面粉公司,机器由宋耀如从美国购置,他因此成为上海第一个代办外国机器的商人,并且还学会了安装机器。他还投资烟厂、纱厂,并进口机器。不出几年,便成了上海滩一名成功的实业家。

不久,宋耀如凭着他之前在美国印刷厂的学徒经历和中国式的聪慧头脑开办了自己的第一个企业——家庭印刷厂。他开始印刷《圣经》,这些上帝的福音被书商和传教士们广为传播。

这时候,宋耀如已经与孙中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冒着被满门抄斩的危险,秘密地用自己的印刷厂为孙中山的革命党印刷宣传革命的小册子,被孙尊为革命的“隐君子”。



■ 1913年3月初,孙中山偕宋耀如(前排左四)、戴季陶(二排左四)、何天炯(二排左五)、马君武(二排左六)等与日本朝野人士合影



■ 1913年3月11日,孙中山与宋耀如(前排左一)、戴季陶(前排右一)等在日本大阪参观《每日新闻》社

在以后多年中,流亡海外的孙中山每次秘密来上海都要住在宋家,甚至在宋家与同志密商革命。宋耀如不但帮助孙中山印刷革命小册子,还资助其革命事业。他第一个建议孙中山发起革命党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他为了革命举家逃亡日本为孙中山探路;他在日本偕同长女蔼龄、次女庆龄一起协助孙中山工作。

父亲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影响了宋庆龄不平凡的一生。

2 快乐的童年

1893年1月27日,宋庆龄生于上海。作为宋家第二个孩子,她的出生给宋耀如夫妇带来了极大的喜悦。

优越的生活条件

在旧中国,大多数家庭并不视生女为喜。但是,有过在西方生活和受教育经历的宋耀如却不是这样。他是个慈祥的父亲。他不仅不嫌弃女儿,而且把女儿视若掌上明珠。他觉得儿子、女儿都是仁慈的主赐予的宝贝,且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使



■ 虹口东有恒路宋宅原址——今虹口区东余杭路526弄23—31号、530号一带



他对女儿更加关爱。继宋庆龄之后，宋家又添了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当孩子们相继来临时，宋耀如通过经营实业使家庭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裕。他尽自己所能给孩子们创造最好的生活条件，让他们受到最好的教育。

此时的上海已是全国最大的外贸、商业、金融和制造业中心，人口众多，从一个小县城摇身一变成了繁华的大都市。宋耀如没有选择住在市中心，而是独辟蹊径，在虹口美租界的一块绿色田野上建造了一栋中西合璧的楼房。房子坐北朝南，周围没有其他任何建筑，全是枣椰树和其他上海稀有的树木。一条清



澈的小溪从房前潺潺流过，一堵围墙将小溪和房子隔开。房子虽然地处偏僻但是非常大，里面的设施应有尽有。主楼分两层，楼上楼下各有大房四间，楼下分别是书房、餐厅、中式客厅和西式客厅。中式客厅配有红木桌及立式小凳，西式客厅里配有当时国内少有的钢琴和沙发。楼上分别是父母、男孩、女孩及仆人的卧室。卧室里的床是精美、舒适且带有弹簧垫的美国式沙发床。房子内还设有盥洗室和浴室。浴室里装有精美的苏州澡盆，盆的外表有一圈黄色的龙雕，里层是绿色的釉质材料。盆内



■ 少年时代的宋庆龄

装有冷水龙头，热水在楼下烧好，然后提上楼来用。

宋家的生活条件在当时堪称优裕。在家庭这片乐土上，宋庆龄和她的兄弟姐妹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以至多年后宋庆龄在致美国友人的信中这样描述她家的生活状况：“我们这里的生活和你们那儿的一模一样。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是欧洲式的，甚至连屋中的摆设也是欧洲式的……我们家里有许多卧室、浴室和盥洗室。”

特殊的家庭教育

父亲虽然为孩子们提供了如此优越的生活条件，但他并不希望将孩子培养成纨绔子弟。他在自家屋后开辟了菜园，种上各种蔬菜，自己常常在园中劳作。这是一般有钱人不屑于做的事情，但是他把这个当作最好的休息，也给孩子们做了榜样。

因为父亲的开明，小庆龄还和她的兄弟姐妹们一样享受到了普通中国孩子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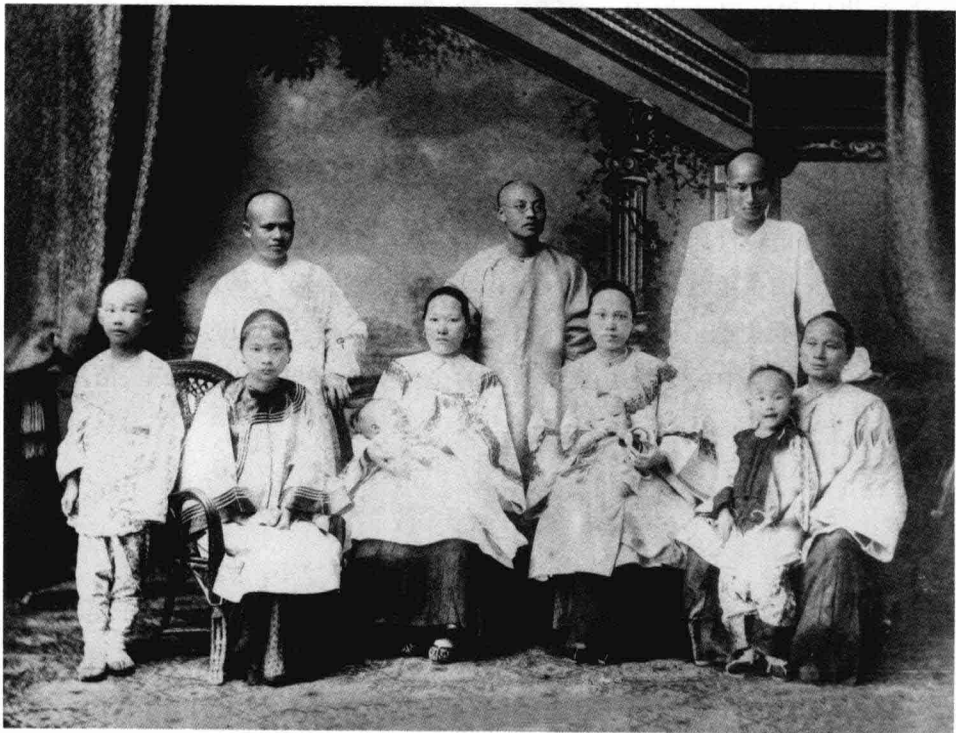


不能享受的个性自由发展。她和宋家的其他孩子一起,经常故意不走大门,而是偷偷爬上不高的院墙,猛地跳下去,一溜烟地跑到外面村子里玩。他们在农民的稻田里抓小鱼、捉青蛙,踩倒了成片的庄稼;还爬到农家庭院附近的果树上摘未熟的青果。父亲非但没有制止孩子们的行为,还拿出一笔钱来补偿村民,让他们别干扰他的孩子们。为了安全起见,他还把墙修低了。小庆龄经常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在田间小道上追逐嬉闹,采花捕虫,一任她脑后的小辫随风舞动。

晚间,小庆龄最开心的就是和大家一起围坐在父亲的身边,听父亲讲他传奇而又坎坷的经历,美国各地的风土人情。从父亲的一个个故事中,小庆龄仿佛看到了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在异国他乡努力奋斗的身影。父亲的勇气和毅力使庆龄深深感动,她为父亲的成功而喜悦。

因为父亲的缘故,童年的庆龄就已经知道中国有革命运动。孩子们知道,父亲在家里地下室的印刷厂里偷偷地印刷宣传革命的秘密小册子。父母一再叮嘱切不可向任何人提及此事。

不知不觉中,父亲博爱平等的观念和革命的思想渐渐融入庆龄幼小的心田,对她日后崇高品质和伟大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父亲还给孩子们提供了另一种当时普通中国孩子连想也无法想到的晚间享受。他会用他那非常动听的男中音唱歌给孩子们听,有宗教歌曲,也有民歌和通俗歌曲,都是他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时学来的。孩子们跟着父亲合唱,母亲则在边上弹琴伴奏。小庆龄对音乐的爱好就此萌芽。直到80岁高龄,她还不时会在卧室里照着父亲留下的歌谱,一边弹琴一边哼唱她小时候跟爸爸学的歌曲。

相对于父亲的“慈”,宋庆龄从母亲倪珪贞身上体会到的则是“严”。母亲对孩子们采用的是斯巴达克式的严格教育,她强迫孩子们进行宗教训练,用宗教



■ 晚年倪珪贞

戒规严格约束孩子们,禁止他们跳舞或从事其他不体面的娱乐活动。尤其是宗教训练,母亲的要求对幼小的孩子来说几近苛刻。倪珪贞不仅每日举行家庭祈祷,送他们去主日学校接受宗教文化教育,还要求他们去教堂听冗长的讲道。其他的孩子受不了,但小庆龄却坚持下来了。当小庆龄跟随母亲去教堂听道,目睹牧师把坐在前排座位上的衣衫褴褛的妇人轰走时,小庆龄感觉愤愤不平。面对如此敏感而容易受伤的幼小心灵,母亲倪珪贞对小庆龄付出了更多的关爱。倪珪贞经常外出施舍财物给穷人,小庆龄在母亲不求任何回报的善行中体悟基督教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博大的爱。

倪珪贞非常赞同丈夫对女儿们的经常训诫——“身为女人不应妨碍自己成为祖国有成就、有作为的公民”。但同时,她也没有忽视女儿们作为女性所应该受到的教育。所以,她在家中教女儿们弹奏钢琴和阅读,还向女儿们传授美式烹饪的奇特花样。刺绣是当时每个女孩都要掌握的技能。尽管倪珪贞自己不喜欢针线活,却渴望女儿们精通这项技能,于是她请了个受过教育且能断文识字的寡妇来教女儿们。调皮的大姐没能坚持下来,庆龄却慢慢喜欢上了刺绣,直到晚年,她还会不时地绣些小品作为消遣,也作为修身养性的好方法。

就读教会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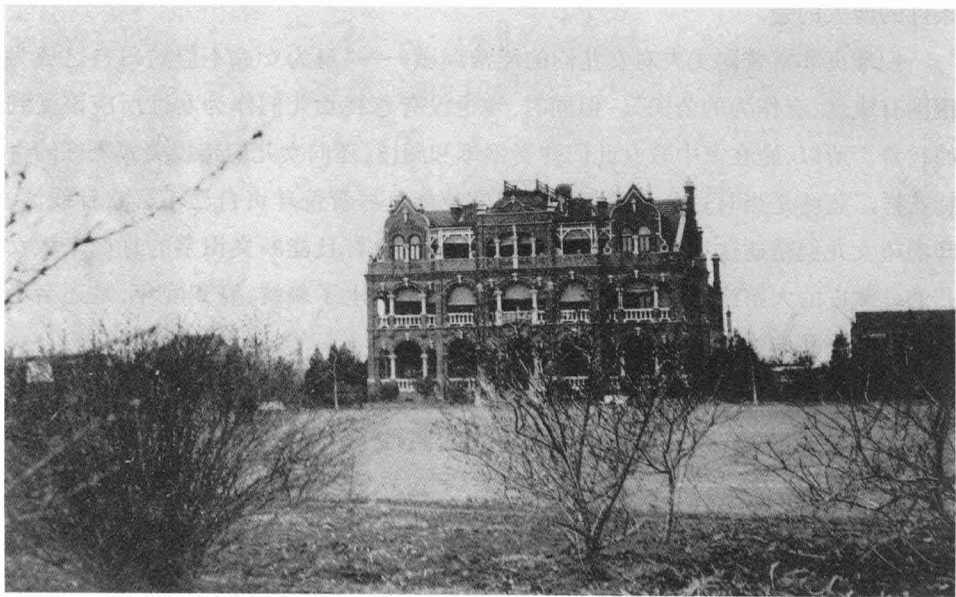
庆龄没有像大姐蔼龄那样五岁就被送到中西女塾去读书。可能是因为她性格娴静,外表柔弱,父母不忍心让这样一朵娇弱的小花过早地去上寄宿制学校,于是为她请了家庭教师,在家中教她读书。转眼间,庆龄九岁了,该上学了。于是她同五



岁的妹妹美龄一起,也被送到了中西女塾读书。中西女塾是一所贵族化的寄宿制学校,由宋耀如所在的基督教监理公会创办,学制十年,课程分英文、算学、格致(物理)和圣道四种,大多由美国教师用英文教授,其中圣道和英文是历年必修课,另外还设有西洋音乐等选修课,以教授钢琴为主,兼授声乐和弦学等。庆龄在中西女塾读书时,被同学们亲昵地称为“小辫子”。“小辫子”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随着年龄的增长,思考问题也更深入。每星期三晚上,学校都要请一些校外有名望的人士来主持宗教讨论会。有时宋耀如夫妇也来主持,但更多时候是由李牧师主持。在这些讨论会上,庆龄经常会大胆地提出问题,以至有次讨论会结束后,美龄愤怒地质问庆龄:“你为什么向李牧师提问题,难道你不忠实于信仰?”总要问个为什么,这是庆龄始终保持的一个特点。

在中西女塾读书期间,有一年在学校组织的期末演出中,庆龄被邀请扮演一个公主,后来被加冕为王后。演出十分精彩,最后王子将一顶王冠戴在庆龄头上,说:“我给王后加冕。”此时,观看演出的家长们纷纷向宋耀如表示祝贺,戏称他为“国王的岳父”,宋耀如开心地笑了。

除了学校的正规学习,暑假期间,宋庆龄还和姐妹们一起接受父亲额外安排的学习任务。每天上午,她们一同去一位英国女教师的家,学习英语和拉丁文。宋庆龄在学习英文方面有着出众的天赋,拉丁文也让她觉得非常新奇。下午,三姐妹跟随一位老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这位老先生在宋耀如刚回中国时教过他中文。



宋耀如虽然喜欢许多美国的东西,但是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失去民族性,坚持让孩子们受一些中国传统教育。

中午本该是三姐妹休息的时候,但她们常常趁母亲睡着后,悄悄溜到花园里玩耍。她们最爱玩的游戏是“抢壁角”和“拉黄包车”。有一天,姐姐蔼龄扮黄包车夫,庆龄扮乘客。正玩得起劲,蔼龄一下用力过猛,以致力量失去控制,庆龄被重重地抛了出去,身上磕破了,愈合后留下了一道疤痕,也留下了童年的美好回忆。

在这个快乐的大家庭里,宋庆龄由一个不懂事的幼儿渐渐长成一名亭亭玉立的少女。1907年夏天,宋庆龄结束了在中西女塾的学业,携妹妹美龄与家人依依惜别,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开始了她的留学生活。



“忘记了祖国 人生就失去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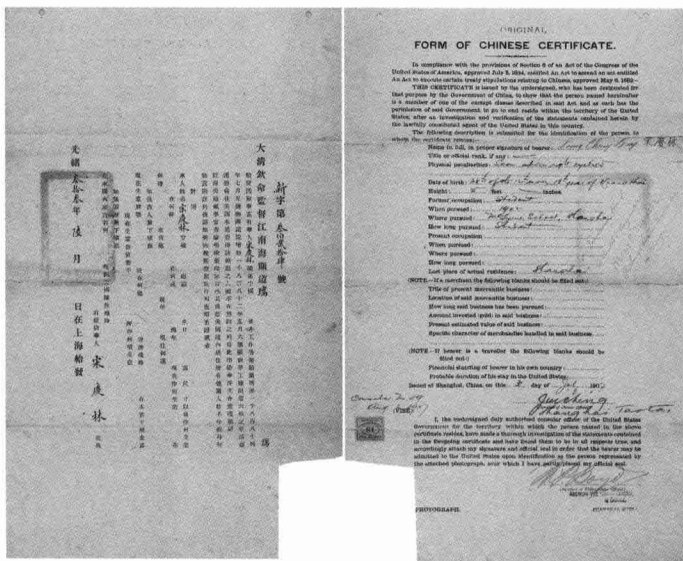
为了把女儿培养成为祖国“有成就、有作为的公民”，宋耀如先是把宋蔼龄送到美国留学，之后又着手安排宋庆龄的留学事宜。1907年春，宋庆龄参加了清政府第一次为派遣女生赴美留学而举行的择优录取考试，并获得了公费留学资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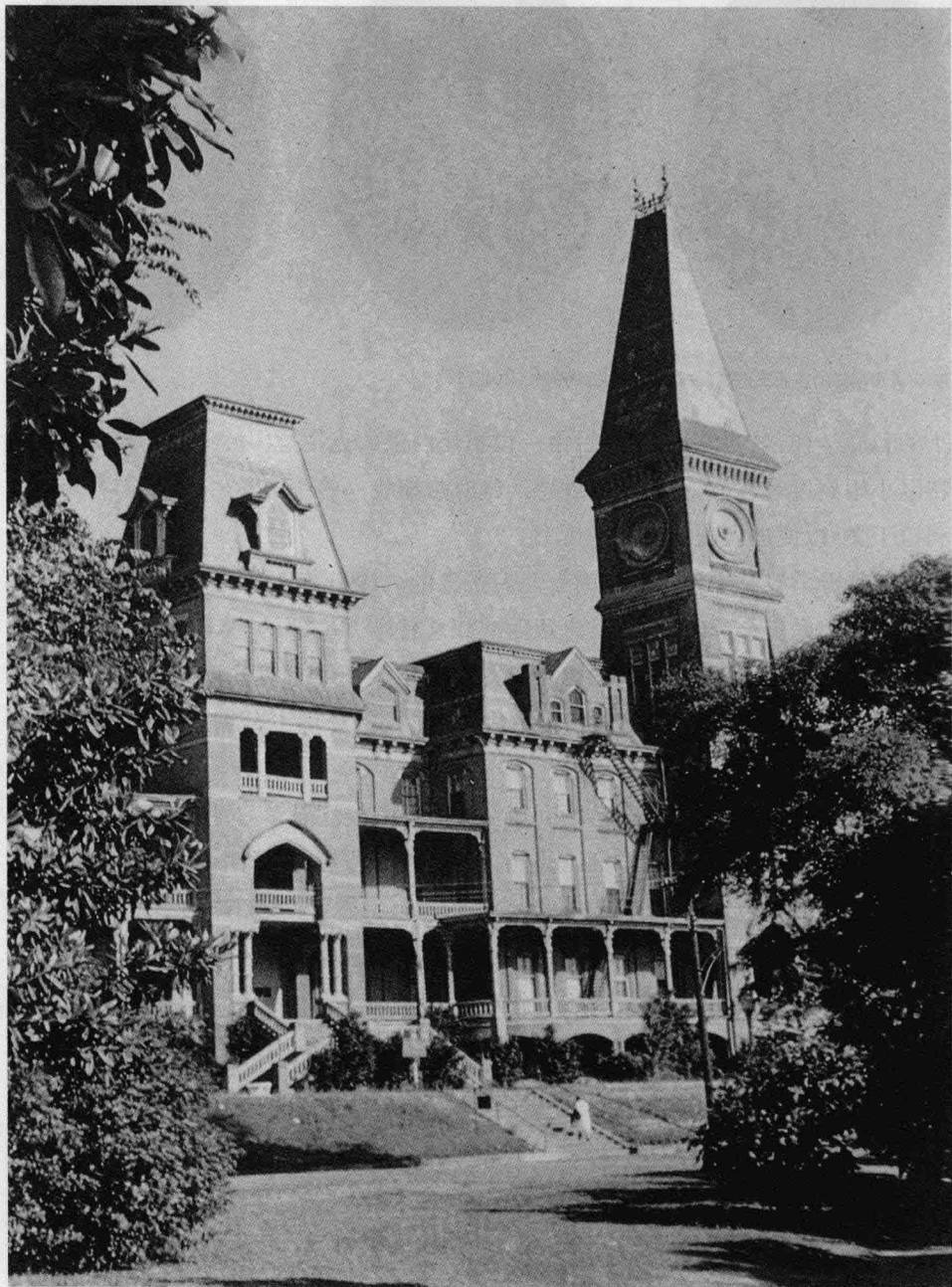
初到波特温

8月28日，宋庆龄和其他11名男生、3名女生一起到达美国。负责护送他们来美的恰好是她的姨丈温秉忠。正因为这样的契机，刚刚10岁的宋美龄虽然不是公费生却也跟着姐姐一起来到了美国。

宋庆龄等4名女生原定应该在位于美国北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威尔士利女子大学就读，但因为外文程度不够，学校暂不接受，其余3人留在了该校附设的预

备学堂补习，宋庆龄则在温姨丈的护送下，带着妹妹来到了美国的新泽西州萨密特镇。镇上的郁金香街有一幢尖顶、砖木结构的白色两层楼房。房子是用褐色杉木柱子支撑起来的，十分漂亮，房子的周围绿树成阴，环境幽雅。这幢房子是一所规模很





■ 宋庆龄珍藏的韦斯里安女子学院照片



■ 在美留学时的宋氏三姐妹(左起:宋庆龄、宋蔼龄、宋美龄)

小的私立学校,名叫波特温学校,由一位祖籍白俄的克拉拉·波特温小姐负责。波特温小姐到过东方,对中国颇有好感。她时常招收一些中国学生,为他们补习法文和拉丁文,以便进入美国的大学读书。

波特温学校是宋耀如亲自为女儿们挑选的。1906年1月,宋耀如在美国为孙中山募集革命资金的时候,温秉忠跟随两江总督端方率领的清政府“宪政考察团”抵达美国,参观了美国的各种学校。早有送女出国留学打算的宋耀如便借机和温秉忠一起亲自考察了波特温学校。宋耀如对学校的环境十分满意,他与波特温小姐商定送他的两个女儿来此学习。

由于父亲早有准备,宋庆龄顺利地在波特温学校注册学习,所修科目中包括法文和拉丁文这两门大学入学考试必考的科目。学校对面的镇图书馆馆长路易斯·莫里斯先生惊讶地发现,这个严肃的姑娘贪婪地阅读成年人阅读的小说、传记和历史类书籍,这些书远远地超出了她那个年龄普通姑娘的眼界。

在波特温读书期间,宋庆龄还曾在新泽西州和美国南部做过家庭教师。这样的社会实践让她有机会接触美国人民,了解美国文化,尽快地适应美国生活。美国南方人民非常热情好客,宋庆龄常常在许多有教养的人家中做客,这些家庭文雅与快乐的气氛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出众的文学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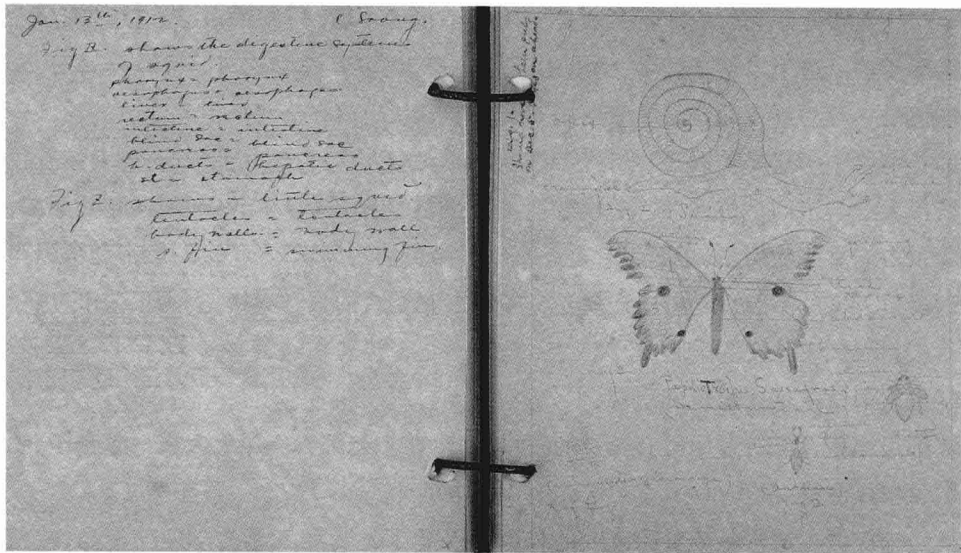
1908年,宋庆龄考入位于美国南部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9月5日,她和妹妹美龄一起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注册入学,姐姐蔼龄也在这里读书。

梅肯市是距离首府亚特兰大不到 130 公里的小城，树木浓密，街道缓坡起伏，温馨宁静。这里以樱花闻名，幽静的小城布满 30 多万株樱花树。樱花盛开时，全城就是一片粉红色的花海。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就坐落在梅肯那世界闻名的粉红色的花海之中。这是美国第一所经特许创办的女子大学，自创立那天起，妇女始有权获得大学学历的学位证书。学校规模不大，但在美国南方却十分著名，究其原因，除了古老悠久的历史，还因为它是一所收费昂贵的贵族学校，学生一般都是美国南部富裕人家的小姐。学校主建筑是一幢维多利亚式的教学大楼，充满了艺术气息，双层斜坡式尖顶使它显得气势恢宏，华美的红砖楼房在花海的映衬下十分美丽。学生宿舍就在这幢建筑的顶楼，十分宽敞舒适，两到四名学生住一室，学习室、会客室都很漂亮、舒适，餐厅里有长长的餐桌，师生在一起用餐。课后大家一起弹琴、唱歌、跳舞、演剧、散步……

宋庆龄在这样一个美丽宜人的校园中开始了她为期五年的学业。于是，威斯里安的校园继四年前出现了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宋蔼龄的身影之后，又多了她两个妹妹的足迹。大姐的老练、二姐的严肃、小妹的调皮让威斯里安的人们领略了中国姑娘三种不同的风格。



■ 1913 年，宋庆龄（右八）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同学合影



■ 宋庆龄留学时的动物学笔记本

和波特温时期一样,大家对宋庆龄的刻苦用功是一致公认的。校友们在半个多世纪后回忆起她时仍说:“她非常用功,从不漏掉任何一门功课的作业,总看见她在学习。”宋庆龄才思敏捷,英语的造诣很深,老师曾评价她说:“在英文课上,她写的文章最好。”

宋庆龄不仅学习认真,还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并承担许多社会工作。她是学校网球俱乐部的成员,曾任校刊《威斯里安》文学编辑、舞蹈戏剧社社员、哈里斯文学社通讯干事等。在校期间,她曾在《威斯里安》校刊上先后发表多篇文章。在《四个小点》这篇小小说中,她讲述了古代一个名叫杨韦林的男孩的故事。杨韦林虽然贫穷,但勤劳善良,刻苦读书,深受大家喜欢。在进京赶考途中,善良的小韦林救助了一只雨中挣扎的小蚂蚁,后来小蚂蚁以死相报,用身体填补了小韦林在科举试卷中漏写的四个小点,使他应试成功。在小品文《阿妈》中,宋庆龄以朴实而略带幽默的文笔,描述了已在宋家工作了20年的老保姆“魏妈”的故事,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朴实善良的魏妈的深厚感情。这些文章流畅的文笔显示出宋庆龄扎实的文学功底,也透露出她内心的善良。

爱好广泛的宋庆龄,不仅在文学和艺术方面学有专长,并且对哲学和历史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她还是像在波特温时期那样,广泛地阅读此类严肃的成人读物。当然,这时候她已经长成妙龄少女了。虽然比较严肃和沉默,但她温柔娴静的性格依然赢得了很多异乡姑娘的友谊,并长期地保持了这种友谊。朋友们不称呼她的本名“罗莎蒙德”,而是亲昵地称她为“苏西”。



■ 1913年,宋庆龄与宋子文、宋美龄在美国波士顿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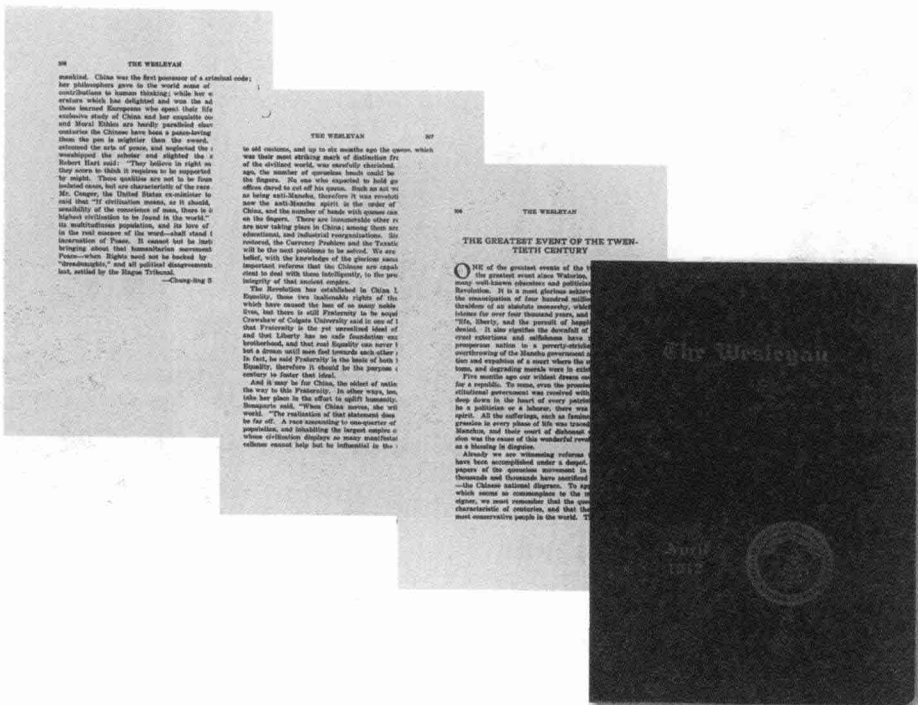


宋慶齡

“20 世纪最伟大的事件”

宋庆龄在海外之所以刻苦学习,是因为她认为自己身为中国留学生,肩上承担的是特殊的历史使命。1911年,她在校刊《威斯里安》上发表《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一文,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归国留学生在政治、文化和社会改革方面对中国具有巨大的影响。归国留学生充任官职可以改变政府由御用文人、朝廷亲信以及靠政治交易青云直上的人把持的现状,可以改进统治者和地方行政官员的道德标准;归国留学生有能力用自己的语言对中国人表达西方的思想,将西洋教育智体并重的思想传入中国学校,并在中国普及新学;归国留学生对中国的社会改革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他们倡导设立戒烟会、青年会,剪割辫子、革除缠足风气,提倡婚姻自由,在中国掀起了席卷全国的社会改革运动。留学生有能力解决当今中国的问题。所以她的学习目的非常明确,不是去享受人生,看西洋景,而是要苦学成才,报效祖国。

在美国学习时,宋庆龄一刻也没有忘记灾难深重的祖国。美国科学技术的发达、



国家的富有和民主制度,更反衬出中国的落后和清政府的腐败。她要努力学习,把美国先进的思想、文化、技术带回祖国去以解决国内存在的重大问题,促进社会改革,以改变现状,使中国强大起来,不再成为西方列强瓜分的对象。据说,在一次历史课的讨论中,有同学嘲笑中国将被淘汰,宋庆龄立即用流利的英语驳斥对方。当同学问她为什么总是那么关心国家的事情,而不是无忧无虑地玩乐时,她说:“我不能忘记中国,也不能忘记孙中山先生说过的话。如果忘记了,人生就失去其意义。”虽然她在美国受到了系统教育,也受到了西方民主传统的熏陶,她也看到了美国的富有和强大,并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但她并没有因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感到耻辱,并且保持着民族的自尊和爱国的热情。这一点是最难能可贵的,这样的特质使得她在以后为祖国和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始终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

一天下课后,宋庆龄收到父亲寄来的一封信和一个包裹。自到美国留学后,父亲经常给她写长信,寄剪报,让她了解国内的形势,了解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在信中,父亲告诉她,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了武昌起义,革命首先在武汉取得了胜利。接着,各地纷纷举行起义,到11月下旬,全国24个省已有14个宣布脱离清政府,其他各省也正在进行反清斗争,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顿时陷入土崩瓦解的局面。长期流亡海外的孙中山于12月5日回国抵达上海。29日,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筹组中央临时政府,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由上海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打开父亲寄来的包裹,展露在眼前的是一面崭新的国旗——美丽的红、黄、蓝、白、黑相间的共和国五色旗。

清朝帝制终于被推翻了!共和国终于诞生了!得知这一切,妹妹美龄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反应,因为她还年幼,小小的威斯里安就是她的整个天地,所以她对这一切并不感兴趣。但是宋庆龄就不一样了,同寝室的同学们惊讶地看到,一向文静的她变得又兴奋、又快活,只见她突然跳起来,一把从墙上扯下代表清王朝的龙旗,扔在地上,用脚踩了又踩,并高呼拥护共和的口号:“把龙旗拽下来!把共和国五色旗挂起来!”

这是一个多么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华大地上诞生了第一个共和国,世界上四万万的人口摆脱了封建专制帝制的统治。她要把这一喜讯传播给更多的人。宋庆

■ 辛亥革命

1911年(农历辛亥年)爆发的推翻清朝封建专制帝制的民主革命。1911年10月10



日,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在中国同盟会的影响和推动下,在武昌成功发动了武装起义。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结束了清朝的专制统治和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4月,孙中山被迫解职,临时政府北迁北京,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



■ 1913年，宋庆龄与宋子文在美国留影

交握，一旁的弟弟则略显瘦弱，宋庆龄戏谑地在弟弟的形象上标上“弱势群体”的字样，而在自己的形象上标上“妇女参政论者”字样。虽是开玩笑，但也表现了宋庆龄的妇女观。

宋庆龄从小生长在基督教家庭，深受基督教博爱、平等思想的影响。在威斯里安的几年中，她也受到了美国女权运动的影响。在一次营火晚会上，她用中国话发表了一通演讲，题目是《给妇女选举权》。虽然在场的美国女孩子一个字也听不懂，但庆龄的表情和语调是如此生动传神，以至于使她们似乎都明白了她的意思。

对美国女权运动的关注，也使得追求民主、自由的宋庆龄开始关心和思考女权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她认为基督教传入中国为中国妇女摆脱封建枷锁创造

龄以其卓越的政治远见，写下了一篇高度评价这场革命的文章——《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发表在《威斯里安》1912年4月号上，讴歌辛亥革命“是滑铁卢以来最伟大的事件，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文章抒发了她对“四万万人民从极端君主制奴役下解放了出来”的欣喜之情，她认为革命的胜利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

“妇女参政论者”

1913年，宋庆龄在美国读书期间，曾和1912年也来美留学的弟弟宋子文有一张合影。照片上宋庆龄非常自信地双臂



■ 威斯里安女子学院颁发给宋庆龄的毕业证

了条件；妇女要获得与男人平等的权利，不能等待别人的恩赐，而必须靠自己的工作和斗争去争取；女留学生必须而且也能够担负起引导中国妇女解放自己的重任。她的这些观点在她发表在校刊上的论文《现代中国女性》和《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中均有所体现。她在论述了占人类人口半数的妇女地位的重要性，谴责缠足和童养媳等封建恶习的同时，也指出“摇动摇篮的手”同样可以治理国家，并强调中国的女留学生比西方国家的女大学生承担着更多的义务。她对中国妇女的前途充满信心，相信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



■ 宋庆龄毕业照

里，中国将会成为世界上具有最高教育水准的国家之一，妇女和男子将获得同等地位。

在这样的使命感驱使下，宋庆龄后来终其一生都在为争取妇女解放而努力。

1913年5月，宋庆龄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威斯里安女子学院1913年年鉴登载了宋庆龄的毕业照，毕业照旁题写道：“从她的两眼和额头流溢出内心的光彩。”她的一个同班同学在“毕业预言”中写道：“我很快就得去中华民国，并把我自己置于医学专家宋庆龄的看护之下。”这是因为早就立志救济世人的宋庆龄曾一度想当医生。这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吧，宋耀如年轻时也想成为一名教会医生。

背负着中国女留学生的重大历史使命，宋庆龄准备学成归国，报效祖国。



4 接近革命运动的中心

1913年8月24日,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高丽”号正航行在浩瀚的太平洋上。在一个摆着鲜花,堆满报纸、杂志和水果的舒适华丽的船舱中,年轻美丽的宋庆龄正在埋头给她的老师哈泽德夫人写信。还有五天就要在横滨见到六年不曾相见的父亲了,她的心中充满了喜悦和期待。但是,宋庆龄并不知道,这艘船带她靠近的不单单是她朝思暮想的亲人,离她越来越近的,还有她未来的命运。从美国启程回国时,宋庆龄受人之托携带一封给孙中山的信。

踌躇满志 学成归来

宋庆龄在美国读了六年书,在这六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形势急剧变化。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建立,标志着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骑在人民



■ 1912年4月6日,孙中山偕孙毓(二排左)、孙婉(二排中)、宋蔼龄(二排右)与哈同(前座右)等在哈同花园合影

头上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皇帝,中国开始走向共和的道路。这使得宋庆龄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和期望。

1913年5月,宋庆龄在美国学成毕业。遵照父亲的旨意,她准备回来报效祖国,为中国通向博爱之路而努力。然而,就在她归国前

夕,历史车轮巨大的惯性似乎又要将中国拉回老路。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派人暗杀了革命功臣宋教仁,继而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准备绞杀革命党势力。孙中山为了捍卫共和,愤然举起“二次革命”的旗帜。

宋耀如此刻正是孙中山特别倚重的人,是孙中山的经济支柱之一。“二次革命”期间,孙中山在上海九江路有一处戒备森严的秘密办公室,宋耀如负责总管该处,其长女葛龄也在该处为孙中山工作,宋家的私人车夫则在此作保镖,充当第一道门卫。“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神户与宋耀如商量之后,才决定以后的去向,不久便移居东京。在东京,宋耀如带着宋葛龄几乎每日往返于孙中山的住处,有时就住在孙宅,参与孙中山同头山满、犬养毅、萱野长知、寺尾亨、岛田经一等日本军政要人的会谈,为孙中山处理英文函电。

“二次革命”爆发时宋庆龄已经启程归国,宋耀如连忙发出急电,嘱咐宋庆龄推迟归国行期到日本。宋庆龄及时退掉了船票,却没来得及将行李取回。她给船上的事务长发电报,请他把行李卸在檀香山。8月初,宋庆龄带着给孙中山的信和给父亲的六箱加利福尼亚水果,启程赴日本了。

忧国忧民 帮助中山

1913年8月29日,宋庆龄终于在横滨见到了久别的父亲。第二天她就在父亲的带领下,从横滨来到东京,与孙中山见面。

从父亲与孙中山的交谈中,宋庆龄得悉中华民国正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袁世凯阴谋推翻新生的共和国,并得到一些国家的舆论和经济支持,民众之声受到压制,革命事业似乎无望,孙中山的某些追随者在绝望中把革命事业看作失败的事业而放弃了。宋庆龄绝对不能容忍袁世凯把民国倒退到君主国的历史大倒退行为,决心为革命事业而工作。

于是,宋庆龄在初到日本不久,就开始同父亲和姐姐一起去孙中山处,协助父亲为孙中山工作。

1914年1月,宋庆龄陪母亲倪珪贞回国治病。宋耀如因为宋葛龄即将结婚,而自己又身患肝病,不能长时间坐在日本矮桌边从事书写,便在3月份发急电将宋庆龄召回。因为肩负孙中山秘书职,宋庆龄在3月至4月间,除3月23日外均同宋葛龄一起,赴孙中山处工作,并同姐姐一起照顾患肠胃病的孙中山。

■ 宋教仁
(1882—19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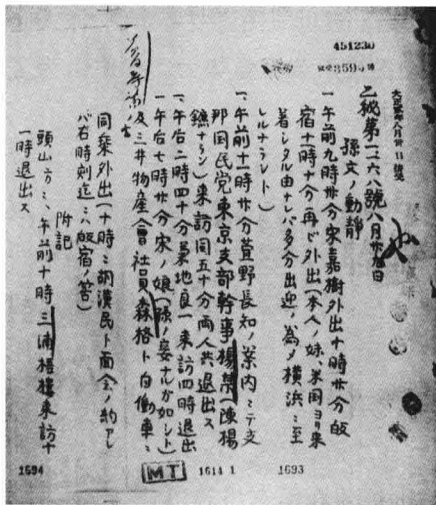
字邂初,钝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905年在日本协助孙中山创建中国同盟会,不久回国,积极从事推



翻封建帝制的民主革命活动。1912年初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临时政府北迁后,任农林总长,不久辞职。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被选为理事,并代理理事长。1913年初,在长沙、武汉、上海、南京等地先后发表竞选演说,主张成立责任内阁,制定民主宪法,反对袁世凯专权。3月20日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刺杀身亡。



宋慶齡



■ 日本外务省档案《孙文动静》中，记录8月30日晚宋耀如带领宋庆龄、宋蔼龄到孙中山寓所的情况

5月至8月间，宋庆龄与宋蔼龄轮流为孙中山工作。在此期间，孙中山于7月8日在东京筑地精养轩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为筹备这次大会，宋氏姐妹尽了不小力。

1914年8月，宋家从东京移居横滨。9月，宋蔼龄与孔祥熙在横滨结婚，宋庆龄正式接替姐姐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以后，宋庆龄几乎每天由父亲陪同，从横滨往东京为孙中山工作。那时，宋耀如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孙中山为党筹集革命经费，而宋庆龄则负责密电码保管和外文复信。当时，中华革命党人在东南亚发行的报刊刊

载了中华革命党首领揭露袁世凯迫害国民党的种种罪行。美国政府应袁政府要求，禁止这些报刊在美发行，并拘禁记者。此案辩护律师要求美国驻日大使馆调查目前在东京之中华革命党首领们在新闻报刊上所揭露事实是否属实。为回答美大使馆的询问，孙中山准备用书面材料，逐条列举袁世凯的罪状及其迫害国民党的毒辣手段。宋庆龄同父亲一起，参与了书面材料的起草工作。同时参与这一工作的还有廖仲恺。

不知不觉 爱神来临

在为孙中山工作的这些日子里，对宋庆龄来说，孙中山不再只是父亲的挚友、中国革命的领袖，而是一位深受她崇拜的博学多才的英雄和导师。宋庆龄在孙中山的引导下，学会了从事秘密工作的技巧，懂得了如何把密信写成密码、如何把密码译成明文、如何用隐形墨水书写。孙中山向她讲述中国的形势和世界的格局，让她认识了英勇的法国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等。

对孙中山来说，宋庆龄也不仅仅是老朋友的女儿、自己的英文秘书，而是一个能给他带来青春与活力的有志青年。他们不仅一起工作，还一起到青山、上野、热海等日本风景胜地游览。她的美丽与温柔使他在处于一生中最低点的时候得到了安慰。他的心在不知不觉中完全被她占据，她使他看到了爱神的来临。



■ 1914年9月20日，宋庆龄与家人在日本横滨留影（前排左起：宋子安、宋庆龄、倪珪贞、宋蔼龄；后排左起：宋子良、宋耀如、孔祥熙）



■ 1914年11月17日,孙中山与日本友人梅屋庄吉夫妇合影

爱神的来临是悄悄的,在宋庆龄还全不知晓的情况下,孙中山默默地爱上了她。

1914年11月,宋庆龄与新婚的宋蔼龄夫妇一起第二次回上海。一方面,孙中山为两个英文秘书同时回沪、无人为其掌管英文通信事宜而烦恼,曾数次给宋庆龄写信,并给宋蔼龄发电报;另一方面,孙中山不愿意让宋庆龄就此离去。他给正在上海学习中文的宋庆龄送去了很多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和有关当代政治方面的英文书,还对她未来的工作给了很多鼓励。在孙中山的努力下,宋庆龄对孙中山派来的使者朱卓文表示“极愿效力党事,且急盼党事之成”。

1915年3月,宋庆龄再回日本,为孙中山工作。但三个月后,她又离开了孙中山。她对孙中山说,为了使自己能够了解中国的真正事实和形势,更好地为革命事

业而工作,她决定再赴美国攻读新闻学。

宋庆龄的这次离去,让孙中山有点手足无措。他不知道这一别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与她再会。他开始无精打采起来,好像一直在考虑什么,整天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连吃饭也没什么食欲。他的变化让细心的日本友人梅屋庄吉的夫人德子察觉了,在她的追问下,孙中山坦言:“我忘不了宋庆龄的事,遇见她,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爱情,体会到了相思的痛苦以及恋爱的那份喜悦。”虽然有所预料但依然感到震惊的德子夫人对孙中山说:“宋庆龄小姐的年龄与您的子女年纪差不多,如果您要与宋庆龄结婚的话,那可是要折寿的呀。”对此,孙中山毫不在乎,他坚



■ 1915年4月4日,宋耀如在东京留影

定地回答:“不要紧,如果我能与宋庆龄小姐结婚的话,哪怕我结婚后第二天就死去,我也不会觉得后悔。”

此时,宋耀如病重从日本回沪,宋庆龄为了照料父亲暂时放弃了留美计划,继续在上海学习中文。不知从何时起,宋庆龄已被孙中山的关心所打动,并在不知不觉中被他吸引。在孙中山的急切召唤下,1915年10月24日,宋庆龄在朱卓文及其女儿慕菲雅的陪同下,又一次回到了孙中山的身边。



5

嫁给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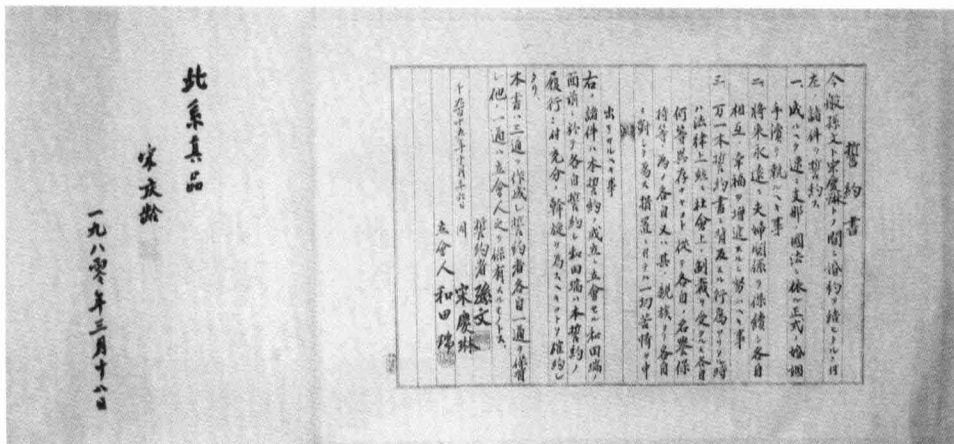
1915年10月25日,被宋庆龄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这一天,她与孙中山在东京著名律师和田瑞家举行了一场简单而朴素的婚礼。

一场没有亲人祝福的婚礼

这是一场没有亲人祝福的婚礼,参加婚礼的只有少数几个亲近的朋友,其中有廖仲恺、何香凝、廖梦醒、廖承志一家人。在和田瑞律师的主持下,孙中山和宋庆龄庄重地签下了誓约书,并委托和田瑞到东京市政厅办理结婚登记。

誓约书约定:两人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礼;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违约者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为了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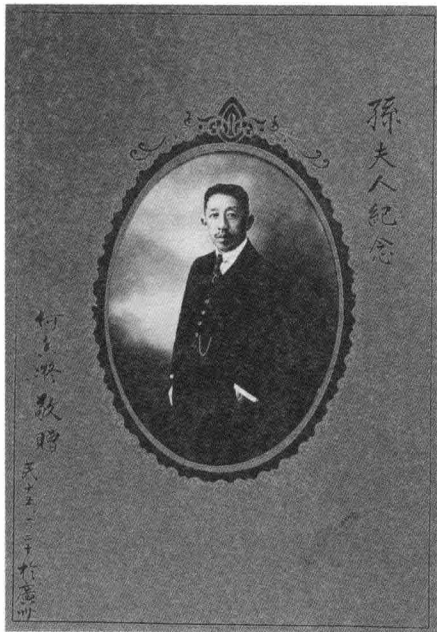
誓约书的规定是严厉的,甚至几近残酷,但是这是两个人为守护这场来之不易的婚姻而作的相互约束和相互保证。为了表示吉利,他们签署了10月26日这一双数日期。多年以后,当这份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本侵略军从寓所掠去的誓约书再





■ 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婚纪念照

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婚纪念照。宋庆龄身穿深色长袍，头戴宽边帽，孙中山身穿深色西装，手持手杖。



■ 何香凝赠宋庆龄的廖仲恺肖像照

现在宋庆龄面前时，宋庆龄难抑激动地在它的一侧写下了“此系真品”四个字。

虽然新人双方都没有亲人在场，但朋友们的祝福依然给这场略显冷清的婚礼带来了欢乐。他们按照日本风俗喝小糯米团赤豆汤、唱婚礼歌。当11岁的小梦醒开口向新娘要她戴的珠串时，宋庆龄欣然答应等她长大了就给。15年后，宋庆龄实践了这个诺言。

婚礼后，孙中山和宋庆龄又到梅屋庄吉家举行了婚宴，招待日本方面的要人和朋友犬养毅、头山满、内田良平、古岛一雄、小川平吉、杉山茂丸、寺尾亨、宫崎滔天、萱野长知、佐佐木安五郎等。在宴会上，梅屋庄吉夫妇充当证婚人，孙中山同宋庆龄互

相敬酒并喝完以后，犬养毅唱起了祝福的民谣。然后，由头山满作证，孙中山同梅屋庄吉，宋庆龄同梅屋夫人德子结为义兄弟及义姐妹。大家举杯庆贺，纷纷道喜。

在这难忘而激动的时刻，宋庆龄心中充满了幸福和甜蜜，同时也有些许伤感。因为，在她人生的重要时刻，没有自己的父母亲友在场。她的婚事还没有得到父母的认可。此时此刻，她思绪万千，离家之前那揪心撕肺的一幕又在面前闪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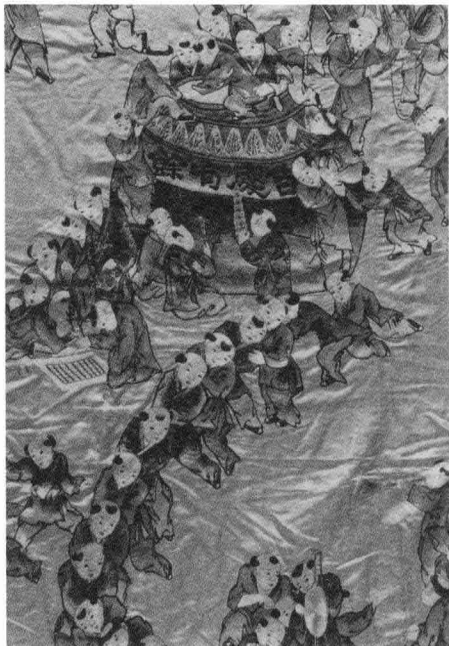
宋家的惊天炸雷

那一天，母亲刚刚从山西太谷回到上海。

正是在这一天，宋庆龄在家中接待了受孙中山派遣来沪的朱卓文及其女儿慕菲雅。朱卓文给她看了孙中山从海外给他发来的急电，电报请朱卓文与宋庆龄当面密谈，并迫切要求宋庆龄和朱氏父女即去东京。朱卓文告诉宋庆龄，孙中山已与卢慕贞协议离婚，他是见证人之一，并给宋庆龄看了他随身带来的孙、卢离婚协议法律证件，上有卢慕贞按的大红指印。

卢慕贞是孙中山的原配夫人，两人有着持续30年的婚姻关系。他们是奉父母之命结婚的，当时都不到20岁，婚前没有见过面，婚后也聚少离多。双方的思想境

界和观念意识完全不一样。对孙中山而言,革命活动赋予他生命以意义和动力,艰难险阻无所畏惧。对卢慕贞来说,这样去冒险犯难是很难理解和完全不必要的,而且会使全家人都遭殃。1915年3月,孙中山派朱卓文到澳门去争取卢慕贞同意离婚,并写信告诉卢慕贞他打算同谁结婚以及为什么会有这个打算。卢夫人表示理解,说她不会中文,更不会英文,缠过足,连走路都不利索,所以不能像宋庆龄那样帮助孙中山。她知道孙中山已经找到一个比自己更适合于他生活和工作的伴侣,表示很欣慰。起初她认为没有必要离婚,丈夫可以纳妾。但对具有现代观念的孙中山来说,纳妾是他要努力在中国消除的最令人厌恶的陋习



■ 宋庆龄父母补送给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婚礼物——百子图被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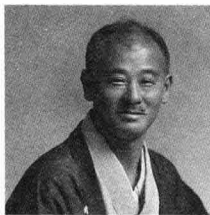
之一。对受过美国教育的宋庆龄来说,当然更是如此。后来朱卓文把卢慕贞带到日本,孙中山和她交谈了几天,离婚的事情很融洽地解决了。双方签署了一份由东京著名律师和田瑞草拟的文件。

朱卓文带给宋庆龄看的正是这份离婚协议书,它向宋庆龄证明了孙中山确实已是自由之身。被孙中山的急切呼唤所感动,宋庆龄决定同意与他结婚。朱卓文走后,宋庆龄随即向父母宣布孙中山的电文内容,提出要跟孙中山结婚。这一消息对宋庆龄的父母来说无异于惊天炸雷。就算孙中山已经离婚,但他与庆龄整整相差了27岁,更何况他所从事的事业极其危险,连庆龄的基本生活需要

■ 梅屋庄吉
(1868—1934)

日本长崎市人。家境富裕,崇尚维新。1895年1月在香港结识孙中山,引为知己。此后对孙领导的革命事业尽可能予以支持和资助。

1904年后从事电影制作。1911年武昌起义消息传出,立即派遣摄影师携器材奔赴武汉,记录辛亥革命的实况。1915年与夫人一起促成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事。孙中山去世后,集巨资为孙铸造四尊铜像,运到中国,分别竖立于南京、广州、澳门。1934年11月23日在日本病逝。



都无法保障。宋耀如是孙中山的朋友,但他更是宋庆龄的父亲,他和妻子一样强烈反对庆龄与孙中山结婚。一向温馨宁静的宋家爆发了一场从未有过的争执,宋耀如大发雷霆,夫人则在一边哭泣。宋耀如警告宋庆龄,她必须和城中一富家子弟结婚,激动中,宋庆龄昏了过去。等她醒来,发现自己已被反锁在楼上自己的卧室中,



她伤心地哭了。

宋庆龄一向温顺听话,但这一次她做出了父母怎么也不会想到的惊人举动。当晚,她给父母写了一张字条告别,告诉他们自己已下定决心,要帮助孙中山并同他结婚。留下告别字条后,她从窗户里爬了出去,在女佣的帮助下逃出家门,与朱卓文父女一起乘船赴日。

“我拒绝离开我的丈夫”

宋庆龄的父母看到女儿留下的告别字条,心急如焚,不顾年老体弱,立即紧随宋庆龄,搭乘下一班轮船赶到日本,想劝说宋庆龄离开孙中山,跟他们回去。

在日本,夫妇俩虽然疲惫至极,但他们仍然不顾病体,固执地劝说宋庆龄跟随他们回国。看到父亲在生气,母亲在伤心地流泪,宋庆龄也伤心地哭了。尽管如此,宋庆龄仍然拒绝离开自己的丈夫。虽然女儿如此坚定,但宋耀如还是不愿放弃。他跑去请日本政府帮忙,说宋庆龄还未成年,是被迫成亲的。当然,日本政府

不能干预。悲伤的夫妇俩在一切努力失败之后,没有在日本多呆一天,第三天就回国了。半个世纪以后,宋庆龄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仍然十分痛苦,往事似乎就发生在昨天。她说:“尽管我非常可怜我的父母——我也伤心地哭了——但我拒绝离开我的丈夫。”

这件婚事对二老的打击很大,宋耀如回国后就大病了一场。但是他们仍然爱着女儿,仁慈的老人并没有因此与女儿断绝关系,而且不久就承认了这桩婚事,并补送了宋庆龄一份丰厚的嫁妆。其中有一套欧式藤木家具、一条绣着百子图的被面和一套宋庆龄母亲结婚



■ 宋庆龄父母补送给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婚礼物——宋母成亲时穿的锦缎袍裙



■ 上海宋庆龄故居卧室，室内摆放的藤木家具是宋庆龄父母补送给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婚礼物

时穿的锦缎袍裙。这份嫁妆被宋庆龄视为最珍贵的纪念物，一直珍藏在身边。

婚后，宋庆龄依然为孙中山工作。他们的结合，最初似乎只是建立起一个新家庭，只是一件私事。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这个家庭，对孙中山、宋庆龄两人的革命生涯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们的结合对推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有着积极的作用。

宋庆龄嫁给了孙中山，从此“嫁给”了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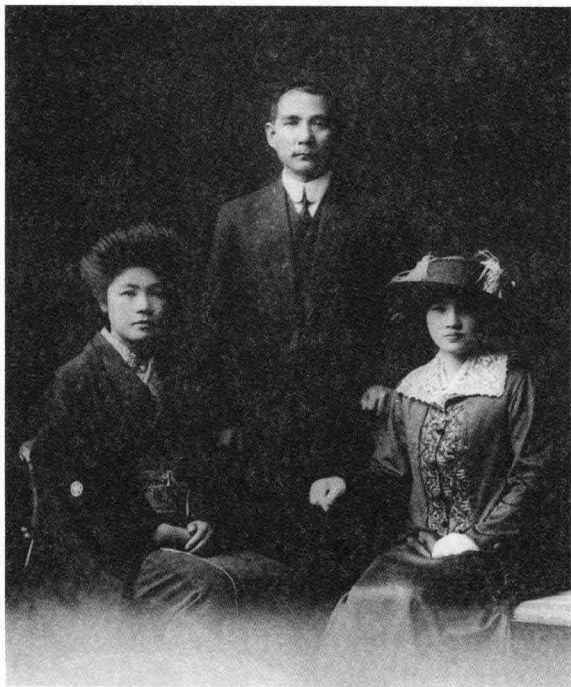
当“学徒”的日子

嫁给孙中山就意味着嫁给革命，宋庆龄在以后陪伴孙中山的日子里，始终忠贞不渝地追随他的革命事业，夫唱妇随，琴瑟相和。

旅居东京

他们的结合来之不易，婚前有着太多的阻力。但从宋庆龄婚后给美国友人阿莉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婚姻生活还是非常温馨甜蜜的。她在信中说：“告诉我我很担心、很幸福也很高兴，我勇敢地克服了惧怕和疑虑而决定结婚了。当然我

感到安定下来，感受到家的气氛。”



■ 1916年4月24日，孙中山、宋庆龄在日本东京与梅屋庄吉夫人德子合影

婚后的宋庆龄不光是在享受家庭生活，更多的是投入到了孙中山领导的反对袁世凯复辟、捍卫共和的斗争中去。当时他们的处境非常险恶，日本政府的密探时刻严密监视着他们，每天的进出都有详细的记录。但是宋庆龄没有感到害怕，她选择这场婚姻的目的就是为了献身革命。她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作为孙中山的助手，她每天都很忙碌，要帮助孙中山处

理英文信件,还要负责所有的电报并将它们译成中文。为了更好地为孙中山工作,这个时期,宋庆龄也在努力学习法文,她的法文水平提高得很快,不久就能阅读法文报纸了,后来还能轻松地边看边译。她不辞劳苦,尽其所能帮助丈夫,希望“付出的劳动和牺牲将得到报答,那就是把中国从暴君和君主制度下解放出来,作为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而站立起来”。在丈夫的影响下,宋庆龄很快成了一名热情的“小革命者”。

在为孙中山工作的过程中,宋庆龄结识了孙中山的许多亲密朋友,如廖仲恺夫妇、朱执信、胡汉民、邓仲元。他们还常常会晤来自世界各国的革命者。尽管不是同一国家的革命者,但他们之间互相支持,不时给予对方经济上的帮助,还在一起探讨世界形势和各国为了争取独立自由而进行的斗争。

繁忙的工作之余,孙中山喜欢博览群书。他的起居室里有很多藏书,墙上则挂满了各种彩色地图。晚饭之后,孙中山最爱做的一件事是把各种大地图铺在地上,然后弯下腰蹲在地上用彩笔勾画河道、港口、铁路等。在组织反袁斗争的同时,他仍时刻不忘规划中国近代化的蓝图。夫妻俩经常外出散步,闲谈交流。宋庆龄很幽默,孙中山常常被她俏皮的言语逗得开心不已,一天的疲惫也一扫而光。宋庆龄



■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4月9日,孙中山、宋庆龄等在日本友人田中昂寓所集会,庆祝帝制取消



■ 1916年6月,孙中山和宋庆龄租住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63号

也常常为孙中山读一些马克思的著作和其他政治学、社会学书籍。有时她也会朗读一些轻松的文章,如当时英语和日语报刊上的短文以及詹姆斯·康德黎爵士及其夫人从伦敦寄来的读物等。

孙中山深刻了解祖国且学识渊博,宋庆龄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她把这段初婚时期称作“当学徒”的日子,将丈夫看成导师,对他的感情就像一个忠实的学生崇拜导师那样。她曾写信对同学说:“结婚对我来说,好比迈进了一所没有‘考试’来麻烦我的学校。”

回国反袁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演出了一场复辟封建帝制的闹剧,他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公愤,革命党人纷纷宣布起义。孙中山在日本发表了第一次讨袁宣言,并分别致函各国华侨,为反袁斗争募款。袁世凯迫于形势,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下令撤销帝制,仍任大总统。为此,孙中山、宋庆龄等曾在日本友人田中昂寓所集会,庆祝取消帝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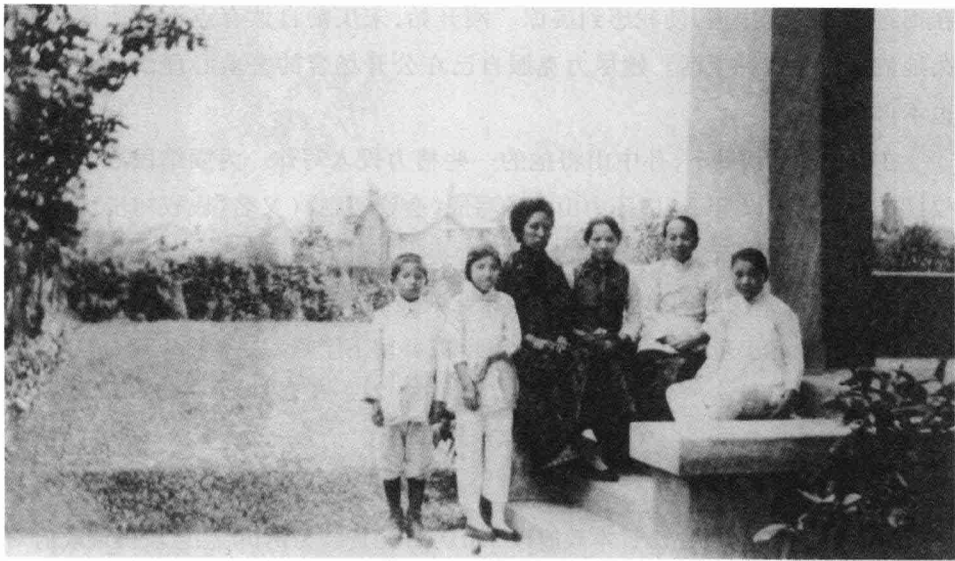
随着国内讨袁斗争渐入高潮,孙中山决定马上回国,遂于4月27日乘“近江丸”返沪。因为宋庆龄负责所有的密电码,孙中山离不开她的帮助,所以不久就召她回沪协助工作。

上海此时的形势非常严峻。宋庆龄抵达上海的前一日,堪当孙中山左膀右臂的陈其美在上海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4号日本友人山田纯三郎宅被袁世凯派遣的刺客暗杀身亡,而孙中山此前一直在此隐居。宋庆龄于5月19日清晨抵达上海,孙中山不顾危险,亲自到码头迎接。他带着宋庆龄秘密住进上海法租界洋泾浜(今延安东路)55号。因为风声很紧,他们不能随便外出,也不能探望同志,来往信件使用的也是化名。只有在晚上,宋庆龄才穿着西式服装出去办事和联络。

■ 陈其美
(1878—1916)

字英士,浙江湖州人。1906年留学日本并加入中国同盟会。1908年回国,在上海、杭州等地联络会党,从事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武装斗争。武昌起义后,立即在上海响应,发动起义。上海光复后,任沪军都督。“二次革命”时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失败后赴日本,坚决支持孙中山另组中华革命党,被推为总务部部长。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回国参加讨袁,主持上海党务,并任淞沪长官司令。1916年5月18日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身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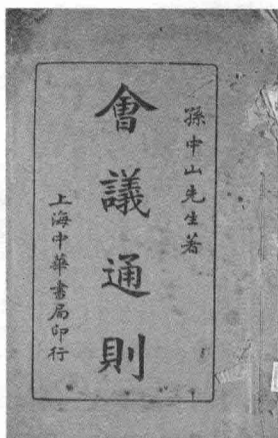


■ 1917年6月,宋庆龄在上海环龙路寓所与何香凝(左三)、廖梦醒(左二)、廖承志(左一)等合影

形势如此险恶,宋庆龄非常明白自己的处境,但为了国家的未来,她甘愿冒极大的风险为孙中山工作,除承担译电、联络外,还处理大量文书工作。而孙中山的安全也时时刻刻揪动着她的心。当时经常有密探跟踪孙中山,他表现得无所畏惧。可这让宋庆龄非常担心,只要他不在身边,她就觉得十分不安。但宋庆龄并没有阻拦丈夫外出,她写信给梅屋夫人说:“有一些事情他必须亲自处理,因为只有他才能在这艰难的年代拯救中国,使之免遭灭亡。因此,为了国家的利益和得救,我必须冒许多危险。”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一命呜呼。黎元洪当了总统,但实权却落入时任国务总理的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手中。时局虽毫无起色,但袁世凯的恐怖统治总算结束了,政治上的紧张气氛稍有缓和。

身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不得不频繁地在公开场合露面。宋庆龄是一个十分害怕抛头露面的人。当她被迫公开露面的时候,国人的劣根性深深地伤害了她。报纸上时常有关于她的不实报道出现,一些恶意的谣言更是被添油加醋地到处传播,这给宋庆龄造成了很多困扰。宋庆龄气愤地写信告诉美国友人:“中国与欧洲人不同,他们并不是把美名和荣誉给予当之无愧的人,而是强加于弱者的身上……一些虚构的关于我



■ 孙中山著《会议通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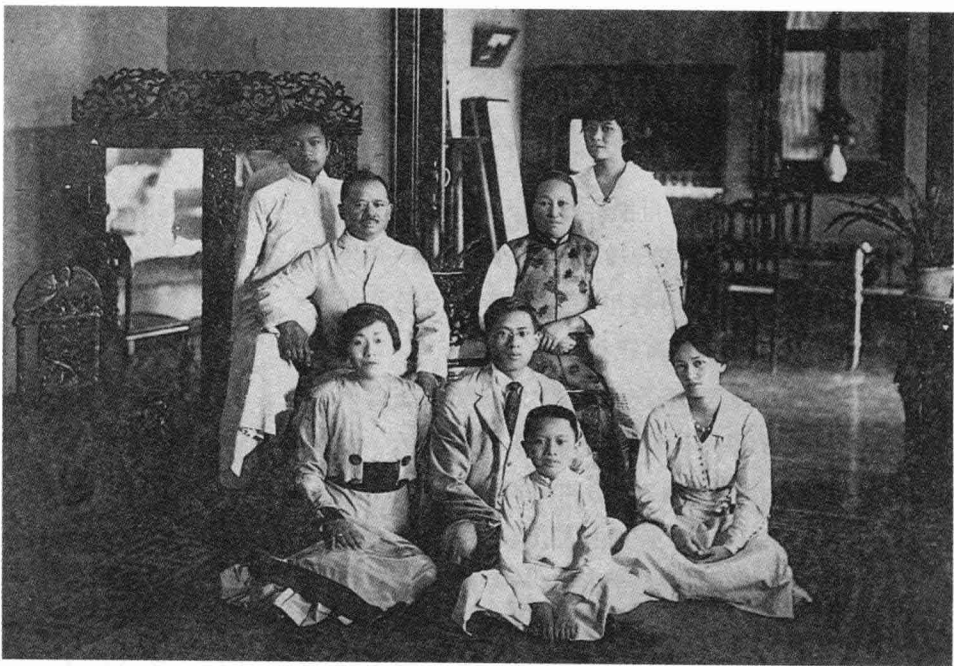
在梅肯时的情况报道,使我感到震惊。”刚开始,宋庆龄自然有点不知所措,但不久她就适应了这种生活。她尽力克服自己在公开场合的害羞心理,对那些谣言也不再在意。

在宋庆龄的协助下,孙中山将他的一些精力投入写作。为固结民心,发达民权,引导民众,1917年2月,孙中山在沪写成《会议通则》(又名《民权初步》),系统解释了为实现民权而集会的手续及方法,并提供若干演习示范。

这年夏天,宋庆龄的弟弟宋子文和妹妹宋美龄从美国学成归来。分离了十余年的宋家成员终于迎来了一次难得的大团圆,并留下了唯一一张全家照。

南下护法

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政府以500万日元贷款为诱饵,怂恿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对此,孙中山表示强烈的反对和谴责。宋庆龄在为孙中山回复梅屋庄吉的信中明确表达了这一立场:“至于我国的政局,我想你知道,很多自私而又野心勃勃的人正竭力要把中国投入欧洲大战。这样做,对我们一点好处也没有。许多人为了钱、微不足道的一笔钱,竟然甘心牺牲国家的生命,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



■ 1917年,宋庆龄全家在上海合影(前排:宋子安;二排左起:宋蔼龄、宋子文、宋庆龄;后排左起:宋子良、宋耀如、倪珪贞、宋美龄)

段祺瑞的主张同样遭到了总统黎元洪和绝大多数国会议员的反对，国会没有通过参战议案。段祺瑞无视国会意见，断然对德宣战。为此，黎元洪下令撤销了他的总理职务。段祺瑞恼羞成怒，赴天津策动北洋军阀进攻北京。黎元洪情急之下请安徽督军张勋到北京调停。但是前清大臣张勋率领他的“辫子军”入京后，却演出了一场解散国会、拥立溥仪复辟帝制的闹剧。这场闹剧正可以被段祺瑞利用，他出面镇压了张勋复辟，继而再任总理，迫使黎元洪辞职，改由秉其旨意的直系军阀头领冯国璋担任代理



■ 1918年3月，孙中山、宋庆龄在广州大元帅府合影

大总统，并拒绝恢复国会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面对《临时约法》一再被践踏、“假共和”取代“真共和”的危机，孙中山决定南下广东建立护法基地。他经常与北洋海军总长程璧光等会谈，动员他们率部参加护法斗争。而宋庆龄则与何香凝（廖仲恺夫人）一起，对舰队军官的夫人们做了许多政治鼓动工作，通过她们去影响这些军官。何香凝常在家宴请、聚会，宋庆龄就和她一起招待客人，这些聚会成了宣讲护法斗争大义、争取各方支持的场所。后来，上海的一支海军分遣队共七艘军舰宣布起义，拥孙反段，这件事的成功离不开宋庆龄的功劳。

1917年7月6日，孙中山离开上海赴广州，正式开始第一次护法运动。南下的还有100多名国会议员很快在广州举行“非常会议”，决议成立护法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9月，宋庆龄也来到了广州。

护法军政府从成立之日起就存在着弱点，过于依赖桂、滇系军阀，而他们所以需要孙中山和国会留在广州并不是为了国家前途，只是为了扩充地盘，获得更大的利益。孙中山困难重重，不得不于1918年5月4日辞去大元帅职。他愤怒地指责所有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



寓居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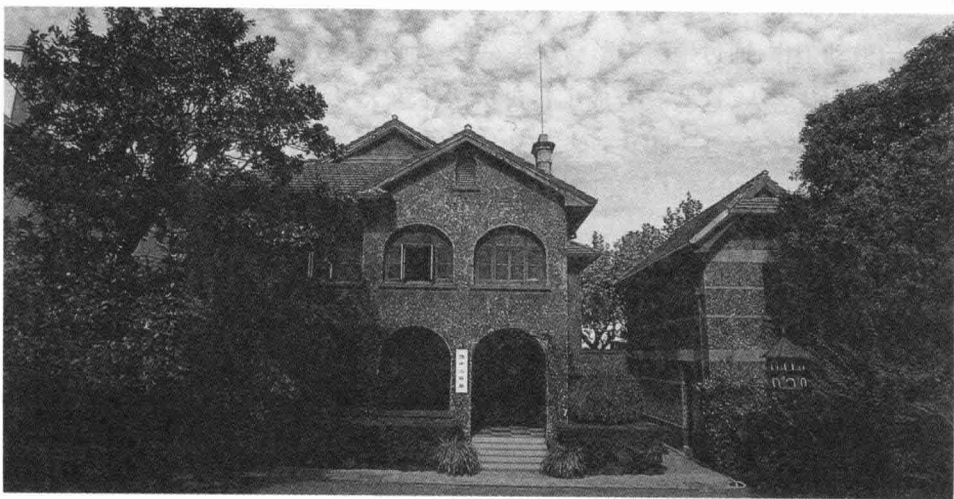
孙中山辞职后不久即乘轮船经日本回沪，此前，宋庆龄因守护病危的父亲已先期抵沪。就在孙中山辞职的前一日——1918年5月3日，宋耀如因肝癌在上海逝世。孙中山在回上海的途中也不忘臂佩黑纱，为亡友兼岳丈志丧。得知丈夫即将回沪，宋庆龄亲与法国领事交涉，为孙中山取得定居法租界的许可。

6月26日，孙中山抵沪后，偕宋庆龄入住上海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

这座房子是由孙中山的加拿大籍华裔副官黄惠龙募集资金，购买后赠与奔走革命多年而居无定所的孙中山的，孙中山夫妇终于有了唯一一处属于自己的住宅。住所布置简洁而高雅，书房和藏书室占去了大部分空间，体现出主人的性格和爱好。屋前有一块小小的草坪，夫妇俩经常在这里招待宾客、散步锻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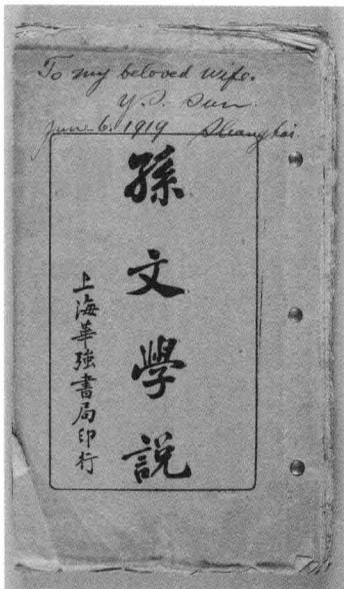
生活安定以后，孙中山开始总结前段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从事著书，以开民智”，探索今后的发展道路。宋庆龄以极大的热情帮助孙中山著述，她大量搜集和整理各种资料，翻译外国资料信息，同时也为孙中山处理大量函电。在孙中山写作的时候，宋庆龄就在边上为他打字。在她的帮助下，孙中山写成了《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为了表示对宋庆龄的感谢，孙中山在书籍出版后即题赠妻子和岳母。以后，《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与在1917年完成的《民权初步》合编为《建国方略》出版。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没有规律的生活严重损害了孙中山的肠胃功能，他经常会感到腹痛。宋庆龄就给他准备一些有营养而又易于消化的食品。一段时间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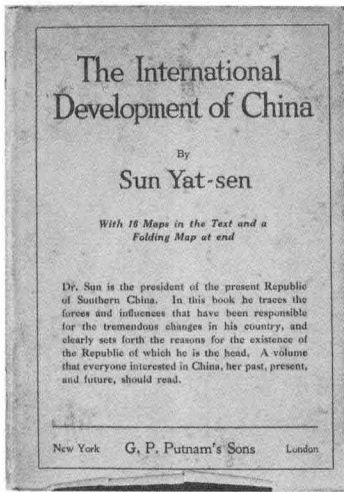




■ 1920年,宋庆龄在上海留影



■ 孙中山题赠宋庆龄的《孙文学说》



■ 孙中山著《实业计划》英文版

孙中山的身体情况有了好转。

孙中山工作时间一长，宋庆龄就会把他从书桌旁拉出来散步、玩球或打门球。不管发生什么事，宋庆龄总能使孙中山高兴和愉快。他们常彼此说笑。一起打门球时，他随意把球打出去，她就在旁边又笑又喊，说他只想赢球，什么招儿都使出来了，她喊道：“小心这个布尔什维克！”晚上，他们经常一起看书读报聊天，还常常在家里放电影。在孙中山遭受挫折时，是宋庆龄分担了他的压力，给予他安慰，带给他欢乐，帮助他从失败中走出来。所以尽管这一时期孙中山生活清贫，但是他仍然觉得“我感觉非常良好。我过去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这是最近两年的事”。

二次护法

1920年8月，在孙中山的督责下，粤军陈炯明部由福建回师广东，驱逐了桂系军阀。11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及一些政界老友离开上海，奔赴广州，开始了第二次护法运动。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宋庆龄同他一起检阅了十万广州市民的庆祝游行队伍，还乘车到马路上游行。晚间，他们一起观赏了广州人喜爱的提灯会，各色精致彩灯竞放光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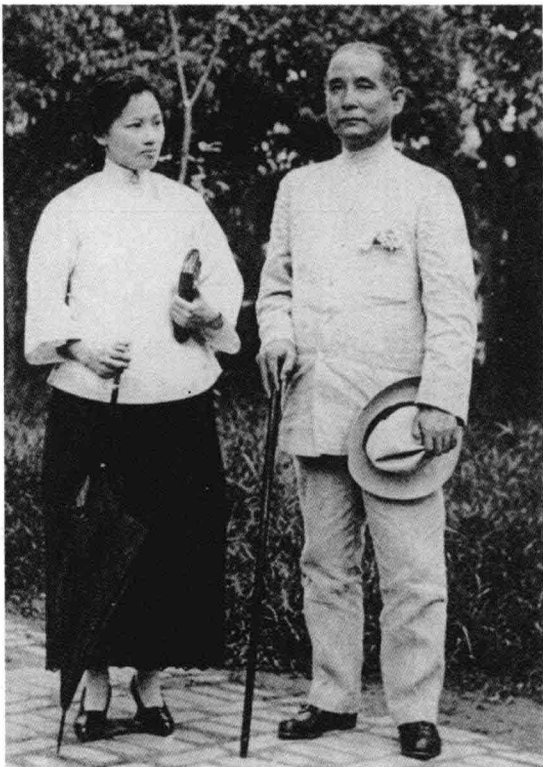
6月，孙中山挥师驱逐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势力，粤桂战争爆发。这时候，宋庆龄在广州发动妇女，组织了“女界出征军人慰劳会”，任会长，何香凝任总干事，主要通过募捐、义演、卖物募集物资款项，慰劳前线战士。7月，慰劳会在广州东园举办了一场大型筹款义卖活动。宋庆龄以会长身份出席，开幕前孙中山前来祝贺，还捐出自己的书、扇作为卖品。义卖持续了七天，购者踊跃，非常成功，共筹款三万余元。8月4日，宋庆龄、何香凝等携带了三百床蚊帐及汗衫、人丹、食品、香烟等物到广州各医院慰问伤兵。所有伤兵皆欢欣鼓舞，

非常感激。一名断足伤兵看到宋庆龄，欲强撑起表示感谢，宋庆龄看见了，忙过去轻按他肩头，令其躺下，鼓励他和伤痛作斗争。

12月，为统一中国，孙中山在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宋庆龄亲率红十字会成员抵达桂林，从事救护伤兵的工作。

不久，由于陈炯明和湖南军阀赵恒惕的阻挠，孙中山的北伐计划受挫，不得不回师广州，并将北伐大本营设于粤北韶关。1922年5月6日，孙中山离开广州，前往韶关督师。宋庆龄则率领红十字会员多人从行。在韶关的时候，除了照顾孙中山的生活，孙中山视察队伍和观察地形，宋庆龄均陪伴其左右，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她对孙中山所从事统一大业的全力支持。

此时，宋庆龄已有身孕。然而，一场劫难正在等待着孙中山和宋庆龄。



■ 1921年7月，孙中山、宋庆龄在广州合影



7 “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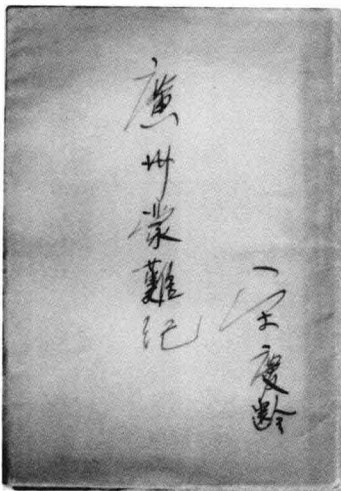
1922年6月16日，宋庆龄和孙中山共同经历了一场几乎置他们于死地的打击，而施加这个打击的恶魔却是追随孙中山多年的“革命将领”陈炯明。

厄运悄悄降临

陈炯明早年加入同盟会，自1917年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后，一度是孙中山依靠的军事力量。正因为此，他先后被孙中山委以重任，官至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又任命他为陆军部总长兼内务部总长。

孙中山高举北伐大旗，粤军却没有给予必要的支援。粤军司令陈炯明不赞成北伐，他要求“联省自治”，并提出“广东是广东人的广东”这样的口号，妄图独霸这个南方富庶省份，实行地方割据。当孙中山在桂林建立北伐大本营急需后援时，陈炯明拒绝提供军饷和武器。不仅如此，他还和湖南军阀赵恒惕相勾结，指使赵拒绝北伐军过境湖南，破坏了孙中山从广西出发经湖南挥师北进的计划。

孙中山被迫改变计划，回师广东，改道从江西北伐，并设大本营于粤北韶关。同时，孙中山撤销了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内务总长的职务。陈炯明就此怀恨在心，退守惠州的他纵容部下率军进驻广州，断绝广州交通，并在市内肆意抢掠。为了稳定广州，争取陈炯明转变，孙中山于6月1日返回广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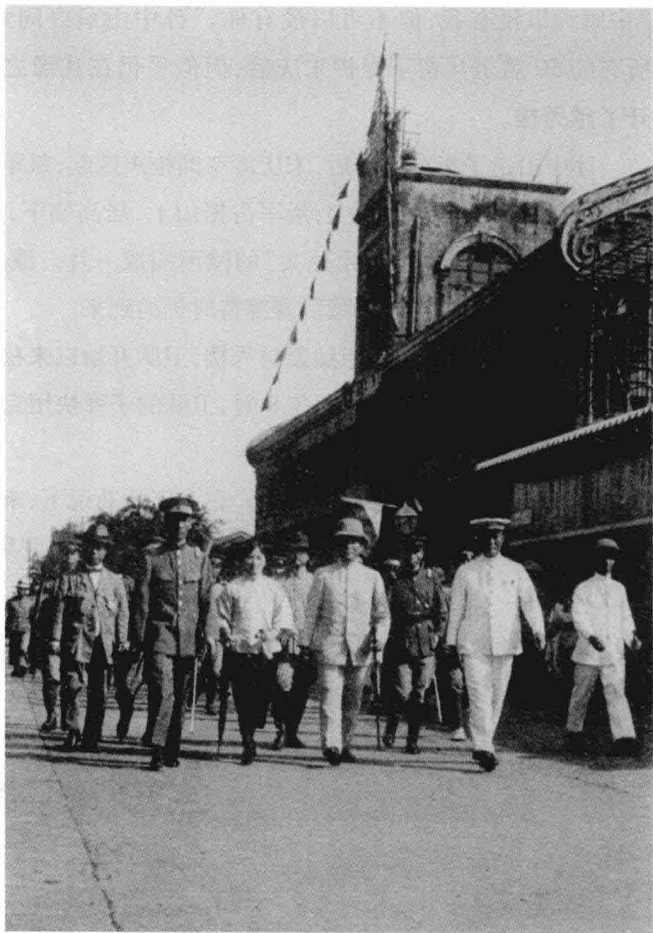
■ 宋庆龄亲笔书写的《广州蒙难记》封面

回到广州后，孙中山即令陆军退回原防。从表

面上看,陈炯明似乎确实正在撤往他的总部所在地惠州,且口口声声仍是“服从”政府,与孙中山夫妇也时有往来,甚至在兵变前一星期,还来电祝贺孙中山在北伐前线的屡次胜利。所以,孙中山毫不怀疑他有异志。

虽然不断有陈炯明要发动兵变的消息传来,但是孙中山和宋庆龄总是不相信。就在厄运降临的前两天,姐姐宋蔼龄还带着女儿小洛士文来到孙中山和宋庆龄居住的越秀山上的越秀楼,看望她亲爱的正怀有身孕的妹妹。小洛士文刚

刚七岁,宋庆龄非常喜欢这个以自己的教名命名的孩子,当姐姐准备带着孩子回上海时,她执拗地恳求姐姐:“把孩子留下,我会照顾好她的!”姐姐差点儿就被说动了,但她幸亏没有真的把孩子留下。



■ 1922年5月6日,孙中山赴广东韶关督师北伐,宋庆龄率红十字会会员随行

撤离越秀楼

6月16日凌晨2时,正在酣梦中的宋庆龄突然被孙中山唤醒。他急切地告诉她,陈炯明已经叛变,即将攻打总统府,并催她赶紧穿上衣服一起撤离。此刻的宋庆龄顿感事态危急,瞬间意识到倘若随丈夫一同撤离会有诸多不便,贻误了时机,会造成危险,拖累丈夫。于是,她毅然请求孙中山先行,自己留下掩护。但孙中山实在不忍留下妻子一人独对危险。焦急的宋庆龄一再恳求丈夫先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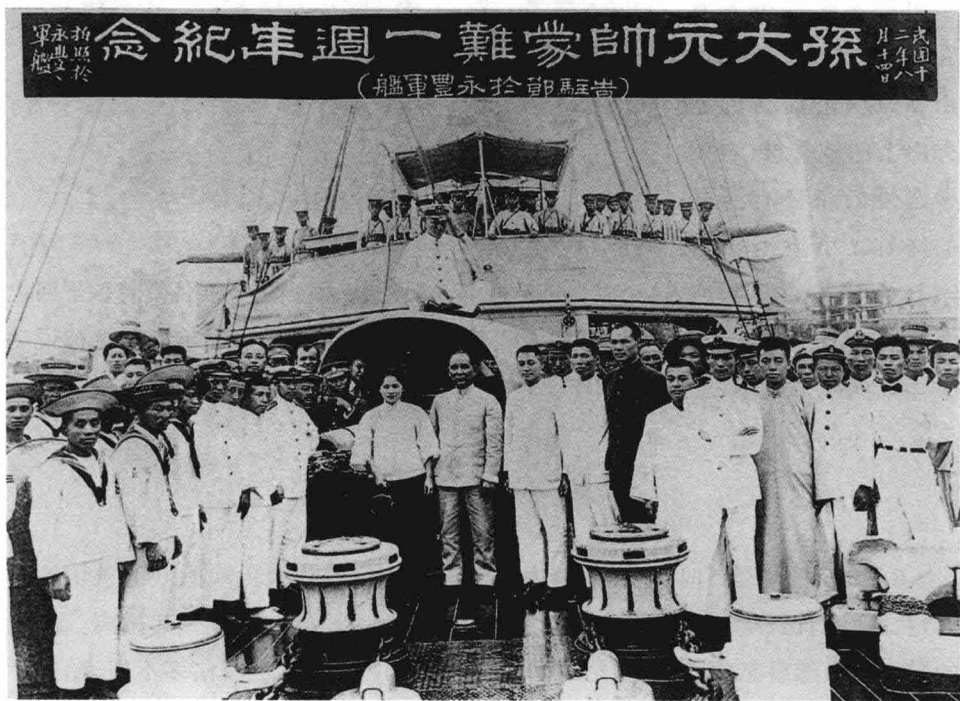
“中国可以没有我，但不可以没有你。”孙中山最终同意宋庆龄的主张。他命令所有的50名卫兵留下保护宋庆龄，但似乎仍在犹豫之中，部下见状强挽着他离开了越秀楼。

孙中山走了半小时以后，宋庆龄忽闻枪声四起，叛军果真来攻打越秀楼了。越秀楼位于越秀山的半山腰上，叛军占据山上，居高临下，向住所左右夹击。随着四起的枪声，“杀死孙文，杀死孙文”的喊声响成一片。漆黑中，卫兵们看不清叛军，难以还击，只好保持寂静，蹲伏着等待时机的到来。

黎明时分，叛军用野炮猛轰越秀楼，卫队开始以来福枪和机关枪予以还击。炮声中，寓所的澡房被击毁。上午8时，卫队的子弹快用完了，于是决定暂停射击，把剩下的子弹留到最后时刻使用。

此种情势，再留下已毫无意义。在大家的劝说下，宋庆龄由卫士队队长姚观顺和侍卫副官马湘、黄惠龙掩护，撤离越秀楼。其余的卫兵则为宋庆龄坚守阵地，防止敌人追击。

但是，撤退之路已被敌人堵死了。越秀楼通往外界的唯一途径是一条直通总统府的桥梁式凌空小道，蜿蜒长达一里。此刻，这一里长的小道正处在敌人居高临



■ 1923年8月14日，孙中山、宋庆龄重登永丰舰（后命名为中山舰），欢迎刚从厦门返抵广州的永丰舰，慰问官兵，并纪念广州蒙难一周年

下的枪弹扫射之下。宋庆龄一行四人,带着些许零碎物品,冒险循着这危机四伏的凌空小道匍匐而行。敌人发现目标后,立即集中火力向他们射击,子弹两次从宋庆龄的鬓角旁呼啸而过。突然,面前的一段小道的夹板被击毁了,宋庆龄他们失去了掩护,她勇敢地随大家一起挺身飞奔向前。此时,姚队长不幸中弹,马湘和黄惠龙只好架着他继续疾走。

几小时以后,他们才走完这条一里多长的小道,进入总统府的后院。不久只见火光一闪,轰声大作,他们刚过的小道的一段被完全炸毁了。

逃出叛军占领区

宋庆龄他们把姚队长抬进了总统府内的一个屋子,为他简单地包扎伤腿。她实在不忍看队长痛苦的样子。坚强的姚队长安慰她说:“将来总有我们胜利的一天!”

很快,宋庆龄就意识到他们躲入的并不是避风港。总统府周围炮火四起,由于邻近都是民房,府内的卫兵无法还击。从早上8时到下午4时,子弹不停地从四面八方飞来,一路置身于枪林弹雨中的宋庆龄等人,一时间仿佛要葬身于炮火连天的地狱之中。一次,当宋庆龄离开一个房间仅仅几分钟之后,房顶中弹了,整个天花板坍塌下来。此刻,宋庆龄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毫不畏惧,随时作好了牺牲的准备。

下午4时,叛军忽然直接出现在宋庆龄等人的面前。原来,总统府的两扇大门被击毁了,叛军们一哄而入。他们拿着手枪、刺刀指向了宋庆龄等



■ 1924年元旦,孙中山向平定陈炯明叛乱的有功将士授勋,宋庆龄亲自为他们佩戴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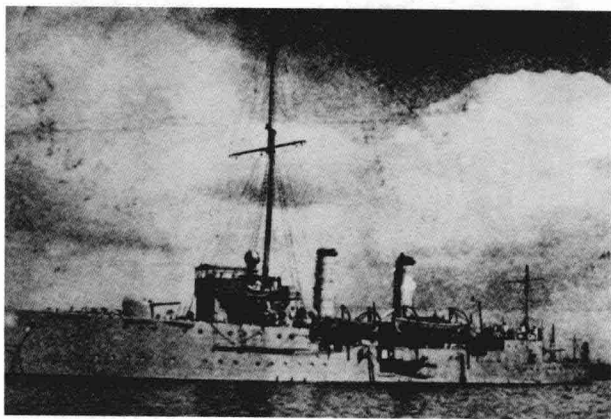
人,幸而宋庆龄头戴卫兵的草帽,身穿孙中山的雨衣,叛军根本就没有认出她来。他们抢去宋庆龄等人手中的包裹,用刺刀挑开哄抢,宋庆龄等人乘机逃出了总统府。

为了躲避四处进击的叛军,宋庆龄一行东奔西跑地穿梭在曲折的小巷中,由于奔波劳累,加之担惊受怕,宋庆龄再也坚持不住了,任凭马湘和黄惠龙一边一个架着她跑。宋庆龄打算如果自己实在熬不过去了,就请求他们给自己一枪。突然,前面小巷跑出一伙乱兵,向宋庆龄他们射击,逃生之路再次被阻断了。此时,他们只得悄悄地躺在沿街的死尸中装死。急于抢掠的叛军居然没有发现。他们赶紧爬起来继续奔跑,不多时,逃到了一座农舍,屋主怕受连累,急着赶他们出去。宋庆龄昏厥了过去,屋主方暂且作罢。马湘和黄惠龙马上给她浇冷水,并且拼命地给她扇风,她才逐渐苏醒过来。

枪声沉寂之后,宋庆龄扮成了一个农妇,手提装着菜叶的篮子,离开了农舍。

死别重逢

不知在触目惊心的街上走了多久,宋庆龄在马湘的护卫下来到长洲要塞司令马伯麟在广州市内同福里的家中。马伯麟以前是孙中山的侍卫,此时他正在长洲要塞率领海军陆战队与孙中山所率军舰相互呼应,与叛军对抗。正因为马伯麟的特殊身份,所以马家在早些时候就已经被陈炯明的部队搜查过。但经历了一整天拼死逃亡的宋庆龄再也无力前行了。此时,恰好马伯麟的勤务兵奉马之命回来烧毁文件,马湘连忙问他孙中山是否去过长洲要塞,他连声说:“看见,看见。”早已精疲力尽的宋庆龄得知丈夫已安全脱险多么高兴啊!



■ 永丰舰

留宿马家的这一夜,宋庆龄通宵未眠,倾听着屋外彻夜不息的枪炮声,还未完全脱离险境的她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丈夫的安危。此时,孙中山已率领海军舰队集中黄埔,准备进兵广州戡乱。次日,他驻节永丰舰,指挥各舰向叛军发炮

總統夫人之粵變紀實

▲本報新聞

同行人有范伯夫有徐之有趙德輝人及無庸而前。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 伍廷芳長途逃往之始末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 伍廷芳長途逃往之始末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 伍廷芳長途逃往之始末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 伍廷芳長途逃往之始末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 伍廷芳長途逃往之始末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 伍廷芳長途逃往之始末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 伍廷芳長途逃往之始末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 伍廷芳長途逃往之始末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 伍廷芳長途逃往之始末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 伍廷芳長途逃往之始末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廣州工人同盟罷工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風潮商人斥宋慶元洪漢電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昨日由粵來滬之議員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旅滬議員致孫總統電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章大鈞解脫粵遊散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其後復出。以兩日。即上船。

■ 上海《民國日報》全文發表宋慶齡撰写的《粵變紀實》

射击。闻战舰开火的声音，宋庆龄确知孙中山已安然无恙了，悬着的一颗心才完全放松下来。当她听到马伯麟家邻居正在探听他们的情况，还说陈炯明的走狗正在四处搜查他们时，宋庆龄等只得离开马家。果然，宋庆龄等人走后不久，马家再次遭到搜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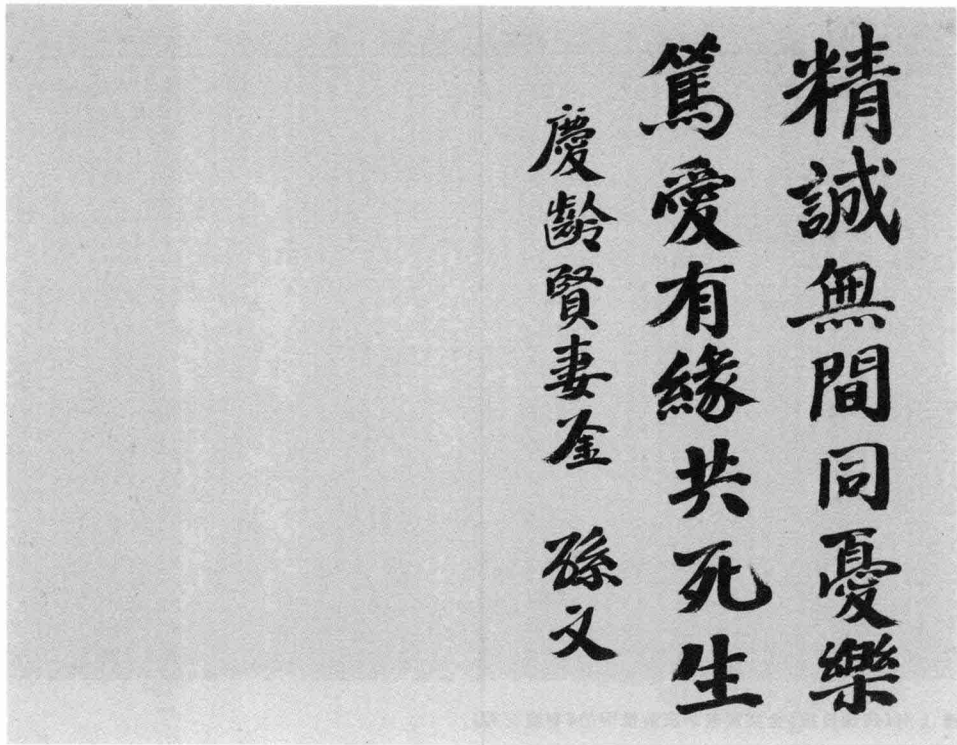
后来，经过多方联系，他们来到了沙面，登上了一位朋友安排的一艘小汽艇。河面上，几条船满载着抢掠的物品和少女，被陈炯明的军队运往别的地方。有两位相貌与宋庆龄相似的妇人被捕监禁。几经周折，宋庆龄最终来到了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家。

第二天，伍廷芳的儿子伍朝樞乘小电船来看望宋庆龄，并带来了关于孙中山的一些消息。此时，早先走散的黄惠龙和孙中山的外籍顾问那文也找到了钟家。宋庆龄急切地要求他们带她去见孙中山，于是大家连午饭也没吃，就乘坐电船前往永丰军舰。

那天晚上，经历九死一生的宋庆龄终于在永丰舰上见到了孙中山，两人真如死别重逢。这对患难夫妻私下互相倾诉了整整一个小时。再次离别时，宋庆龄要求马湘和黄惠龙回到永丰舰上，帮助孙中山痛击叛军。

不久，宋庆龄再次回到岭南大学，取道香港，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



■ 孙中山为宋庆龄题写的册页

广州蒙难带给宋庆龄的是难以弥合的伤痛，她在逃亡途中不幸流产，且永远地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对孙中山而言，这次蒙难也是他此生所遭受的最惨痛的失败。

“疾风然后知劲草，盘根错节然后辨利器。”历次的失败促使孙中山寻找新的救国道路……

8 “国民党需要新鲜的血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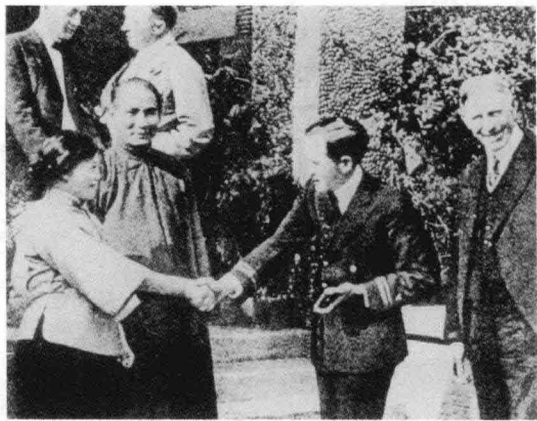
第二次护法战争失败了。1922年的夏、秋，宋庆龄和孙中山相继由广州回到上海，回到他们位于莫利爱路的家。家中的一切依旧，犹如一个静谧的港湾，抚慰伤者疲惫的身心。然而，他们回家并不是躲进安逸的世界，宋庆龄以她的温柔、智慧和激情再一次帮助孙中山走出困境，帮助他完成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

协助孙中山寻找新的革命道路

自参加革命以来，宋庆龄追随孙中山南征北战，历尽艰辛。她曾在一次次的斗争中与孙中山分享胜利的喜悦，也屡尝失败的痛苦。中国革命的道路究竟在哪里呢？

孙中山遭受失败的日子，正是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无产阶级觉醒的年代。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的炮声，使在民主革命道路上屡战屡败、苦苦寻求新出路的孙中山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宋庆龄与孙中山一样，真诚地欢迎、同情和向往这场革命。不久，她帮助孙中山起草致列宁的贺电，对俄国革命党所进行的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

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孙中山看到了新的前景和新的希望。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存在严重局限性，许多党员或腐化堕落，或斗志消沉，无法有效地进行革命。他从中国共产



■ 1922年9月，孙中山与宋庆龄在寓所接见美国新闻记者希尔等人，重申在中国实现共和统一的主张



党人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中，发现了新的力量源泉，这是在革命斗争中可以依靠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

就在孙中山的革命遭受挫折、进行新的探索的时候，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列宁关于殖民地附属国民主革命的学说，以及苏俄1919年和1920年所发表的两次对华宣言，使孙中山受到极大的鼓舞，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大希望”。

从1920年秋天开始，孙中山就与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代表有了接触，先后在上海、广州、桂林等地与共产国际代表商谈有关中国革命的问题和与苏俄联盟的问题。作为孙中山的秘书，宋庆龄参加了一部分会谈，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1921年12月，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来到桂林与正从北伐前线回来的孙中山会谈，宋庆龄参加了他们的会谈。马林建议把国民党改组为紧密联系工农群众的政党，并创办军官学校，培养自己的革命武装，孙中山表示赞同。马林曾在印度尼西亚促成民族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合作，因而他主张在中国也实行这样的合作。他多次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汇报他在中国的工作情况，充分肯定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建议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进行中国革命。1922年初，列宁在远东各国共产党及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抱病接见参加会议的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代表，表达了对中国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此后，孙中山又在广州与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进行了十几次会谈。8月，马林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再次来到中国，说服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在此期间，孙中山与马林又进行了会谈，就国共合作及与苏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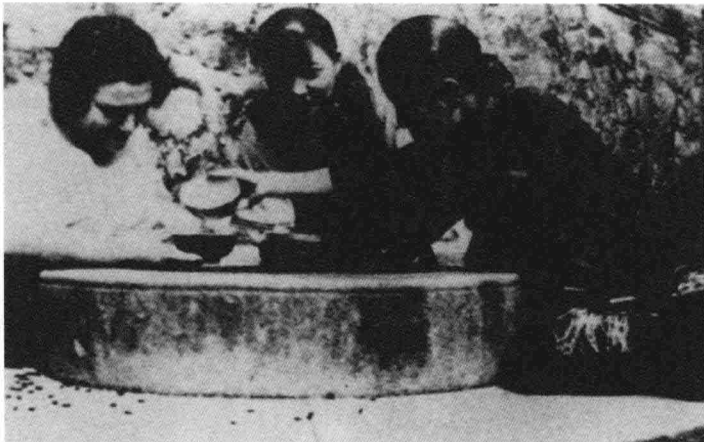




■ 1920年10月,孙中山、宋庆龄在上海合影

孙中山宋庆龄合影 摄于上海南京路孙中山故居 宋庆龄故居

张新



■ 1924年，宋庆龄、宋美龄与鲍罗廷夫人在广州寓所品茶

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早在1922年8月就与孙中山有过接触。虽然他比孙中山年轻20多岁，但他渊博的学问和对中国革命的卓越见识使孙中山对他十分钦佩，两人“畅谈不厌，几乎忘食”。此后，李大钊经常到莫利爱路寓所作客，就国共合作等问题与孙中山会晤。在莫利爱路寓所，李大钊由孙中山主盟，成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第一位共产党人。作为孙中山的秘书，宋庆龄参与了这些会晤的全过程。她十分欢迎李大钊到他们家，对李大钊也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之后，她还想了解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在北京的李大钊应她的要求选寄了一本布哈林写的《历史唯物主义》英文本给她。

在与李大钊会晤后不久，孙中山立即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召开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改组会议，解释联俄联共政策。1923年元旦，《中国国民党宣言》发表，强调今后革命必须依靠民众。

1923年1月，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在寓所会见了苏俄全权代表越飞。他们接连举行了多次会谈，进一步商讨改组国民党与建立军队，以及苏联及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等问题。在会谈之前，宋庆龄帮助孙中山起草致越飞的函电，为他们之间的通信往来做了大量的工作。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孙中山与苏俄联盟，接受苏俄诚挚的援助。

联盟等问题进行了会谈。

孙中山回到上海后不久，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林伯渠来到莫利爱路寓所，与孙中山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等种种问题。

李大钊是中国

■ 林伯渠
(1885—1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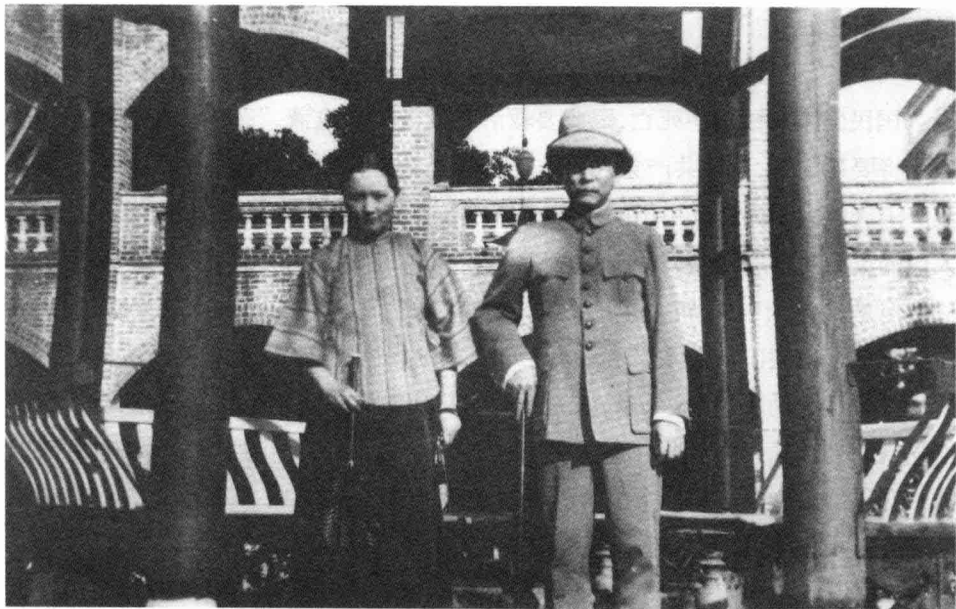
名祖涵，号伯渠，湖南临澧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中华革命党，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参与改组国民党，历任中国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去苏联学习。1932年回国，主持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财政工作。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任边区政府主席，1945年在七大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其后多次担任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建国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1960年5月29日在北京病逝。



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1923年春,宋庆龄来到广州。之前,孙中山已返回广州重建革命政权。孙中山在组织武力讨伐叛逆的同时,加速了改组国民党的步伐。不久,苏联派出帮助孙中山和广州政府的顾问,其中鲍罗廷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苏联驻广州革命政府代表。鲍罗廷青年时代即参加革命活动,曾奉命到美、德、英等国从事国际联络工作。他以一个职业革命家的政治成熟性和敏捷的工作技能赢得了孙中山的信任,很快孙中山任命他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帮助国民党改组。宋庆龄真诚感谢苏联顾问对中国革命的帮助,与他们关系融洽,十分友好。她与鲍罗廷夫妇成为至好的朋友,英语成为他们交流的第一语言。宋庆龄经常去鲍罗廷家,鲍氏夫妇向她介绍俄国和国际革命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大大开阔了她的视野。而宋庆龄也向鲍罗廷夫人介绍中国妇女运动,讲述中国妇女许多有趣的情况,还介绍她认识了社会各阶层的一大批妇女代表。

在孙中山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时,宋庆龄深知他所面临的困难,因为在革命工作中,每当孙中山要向前跨一步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企图把他拉回来。这一次,国民党右派一开始就对国民党改组进行阻挠和破坏,但孙中山对此十分坚



■ 1923年4月15日,孙中山、宋庆龄在广州合影



■ 1923年8月9日,宋庆龄在广州参加我国自行组装的第一架飞机“洛士文”号试飞仪式后,在“洛士文”号飞机上留影(“洛士文”是宋庆龄英文名字 Rosamonde 的中文译名)

定,且对国共合作充满信心。他经常对宋庆龄说:“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官发财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清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

一天,宋庆龄与孙中山讨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必要时,孙中山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孙中山把国民党比作一个将要死的人,而把共产党人比作是使国民党起死回生以推进国民革命的新血液。宋庆龄完全同意孙中山的看法,他们坚信,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是保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唯一道路。

但是,当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时,国民党右派不满意他倾向社会主义和刷新三民主义的做法。他们十分厌恶他的三大政策,特别是“扶助农工”这一条,认为是对他们利益的威胁。于是,他们造谣污蔑共产党,妄图破坏国共合作。在一次国民党改组会议上,孙中山严厉驳斥了种种反对国共合作的谬论。遭到孙中山的严厉斥责后,他们中的某些人便去找宋庆龄,想通过她去影响孙中山,但立即遭到了宋庆龄义正词严的拒绝。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在大会上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全国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工农运动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1924年夏天,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出席广州市农民联欢大会。那是国民党农民党员在广东大学大礼堂举行的一次联欢会,近郊2000多名农民党员前来参加会议,许多人打着赤脚,走了好多里路赶到广州。他们衣衫褴褛,有的还带着箩筐和扁担。这些农民朴实而积极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打动了宋庆龄。孙中山也深受感动,回到家,他动情地对宋庆龄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



■ 1923年12月,孙中山、宋庆龄在广州大元帅府合影

孙中山和宋庆龄已经看到了中国革命成功的前景。然而路途漫漫,在中国革命的征途中,等待着他们的又将是怎样的考验呢?



9 “投身我丈夫毕生的事业”

1925年,32岁的宋庆龄已经跟随孙中山在探寻救国的坎坷道路上走过了十个年头。经过无数的动荡与坎坷,她与孙中山之间的感情愈加深厚;经过无数成功与挫折,她的性格愈加坚强。但就在这一年,她永远地失去了她的丈夫和导师——孙中山。

犯难北上

1924年10月,正当孙中山想趁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之机,在广东重整旗鼓,准备再次北伐时,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的直系军阀将领冯玉祥与皖系段祺瑞和奉系张作霖联手在北京发动政变。



10月22日午夜,屯兵古北口的冯玉祥突然回师北京,一举推翻了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权,第二次直奉战争迅速结束。11月5日,冯玉祥又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紫禁城,民国后又延续了13年的小朝廷至此宣告结束。

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解决一切政治善后问题”,“共商国是”。孙中山认为这是召开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谋求中国和平统一的契机,于是不顾疾病缠身,决定犯难北上。宋庆龄陪同孙中山一起登上了北上的永丰舰。

11月24日,孙中山、宋庆龄抵达日本神户。11月28日,孙中山在神户高等女子

学校发表演说。在孙中山演讲之前,宋庆龄用英语发表了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演说。这是她第一次以孙中山夫人的身份发表政治演说,也是一次贯彻孙中山和统一精神的演说。在演说中,她呼吁东方和西方的妇女,为改造世界而联合起来,要求普遍裁军,废除歧视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

痛失导师和伴侣

11月30日,宋庆龄陪同孙中山结束在日本神户的访问,乘船回国赴天津。由于旅途劳顿,孙中山的病情加剧了。

12月4日,他们到达天津。宋庆龄怎么也不会想到,永别即将来临。但是,从这天宋庆龄与孙中山登岸前在船上的留影看,孙中山满脸的病痛。这张照片同时也记录下了宋庆龄当时深深的忧郁。

12月27日,医生诊断结果显示孙中山所患非胃病而为肝病。

12月31日,他们乘火车到达北京,孙中山已是病体不支,无法公开演讲。

1月26日,孙中山在协和医院手术,手术结果认为孙中山系患肝癌,病情危殆。

2月16日,进行放射治疗,现代医学的最后手段显示没有效果,改用中药治疗。

打击一个接着一个,宋庆龄几乎难以承受,但她还要为丈夫分担国忧。丈夫无法外出会见重要客人,她便代表丈夫去见,宣传丈夫的政治主张。明知丈夫危在旦夕,她还要为稳定政治局势,强忍悲痛,不断地对外表示孙中山病体无恙。

在孙中山病危期间,她日夜看护左右。孙中山遗嘱的签字因为她的过分伤心而一再推迟,她无法面对孙中山即将离去的现实,眼见最后一刻即将来临,她强忍悲痛,泪流满面地托着孙中山的手腕在三封遗嘱上颤抖着签下了名字。



■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宋庆龄抵达天津时在“北岭丸”号船上合影



■ 1925年3月19日，宋庆龄等孙中山亲属在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守灵（左侧右起：宋庆龄、孙治平、孔令仪、孙治强、宋美龄、宋蔼龄；右侧左起：戴恩赛、孙科、宋子文、孔祥熙）

在家事遗嘱中，孙中山为爱妻留下了他仅有的一幢房子和房子里的书籍、衣物。

对于国事和家事，孙中山有太多的嘱托要留下。他不停地找人谈话，留下他的政治嘱托。

3月12日晨，孙中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才59岁，与宋庆龄结婚还不满十年。

孙中山的离去使宋庆龄备感哀伤，从此以后，每逢孙中山的忌辰，她总是尽可能地避免参加任何公众的纪念活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默念沉思。但是，宋庆龄没有被悲痛压倒，也没有像当时有些人所希望的那样，因此消沉，悄然退居幕后。她牢记孙中山临终“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言，决心：“试求忘掉我自己，投身我丈夫毕生的事业，就是实现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

宋庆龄化悲痛为力量，很快振作起革命精神，勇敢地投入到为实现孙中山未竟事业而进行的伟大斗争中。



■ 孙中山丧礼期间的宋庆龄



10 “志先生之志， 行先生之行”

哀痛欲绝的宋庆龄在丧礼完毕后回到上海，回到她与孙中山共同生活了近十年的家。在这里，痛失导师与伴侣的她治疗心中的创伤，梳理自己的思想，遵照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教导踏上了征程。

捍卫孙中山旗帜的第一次战斗

宋庆龄回到上海后的第二个月，距孙中山去世仅十周，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震撼了这个沿海大城市和全国各地。1925年5月30日，上海英国巡捕在租界内开枪屠杀为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而进行示威游行的群众，





■ 1925年春，宋庆龄在上海留影



■ 1925年4月21日,在杨杏佛(右一)陪同下,宋庆龄偕亲友在南京紫金山勘察孙中山墓址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6月9日,宋庆龄就“五卅惨案”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发表了重要谈话,第一次以坚决捍卫孙中山遗训的革命战士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谈话中,宋庆龄痛斥英日强权,并欣慰地指出:在学生和工人们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精神处处可见。她高瞻远瞩地提出这次运动的最终目的在于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号召广大人民团结起来,“为民族争独立,为人权争保障”。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国内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日益高涨。革命思想日趋成熟的宋庆龄也高举着孙中山的旗帜,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之中。6月5日,她出席了上海妇女反帝统一战线组织——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成立大会,对妇女反帝斗争表示全力支持。6月10日,她又赴大同学校演讲,讲述“五卅惨案”的有关情况,宣传反对帝国主义。6月30日,她抱病赶赴北京,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北京各界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雪耻大会”。

宋庆龄还委托杨杏佛,于6月10日在上海创办《民族日报》,旗帜鲜明地报道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并积极宣传孙中山的反帝思想。她还亲自在报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英帝国主义的残暴,号召国人挺身以战强权,“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但是,《民族日报》旗帜鲜明的反帝立场使国内外反动势力极为恐惧和嫉恨,出版

16天后被租界和华界当局勒令停刊。

省港大罢工期间,成千上万聚集在广州的罢工工人要吃要住。宋庆龄在上海投身于为罢工工人募款的工作,大声疾呼:“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不能延误救济工作。”她的呼吁通过函件、电报传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华人社会。光是海外华侨委托她汇往广州的捐款就达10万美元以上,这使省港罢工能坚持较长时间,直至斗争胜利。

步入政坛

国民革命正在走向胜利。但是,孙中山逝世后,策划于幕后的反苏、反共、反工农的阴谋活动逐渐走到幕前: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以林森、邹鲁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公开打起反对三大政策的旗帜。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宋庆龄特地从上海赶往广州参加会议。在此前夕,她曾向记者发表谈话,坚决反对不久前召开的“西山会议”,认为“西山会议派”是“一小撮反对国民党政策的叛乱分子”,他们不能贯彻和执行孙中山的思想。但她对革命的前景十分乐观,希望“西山会议派”以团结为主改变态度,与共产党合作北伐,使中国“将在孙中山创立的这个党的领导



■ 1927年3月10日,宋庆龄在武汉与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部分委员合影

10

「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



■ 1926年1月20日，宋庆龄在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与广州各界妇女欢迎代表合影

下重新统一起来，并在国家独立和自由的基础上得到迅速的发展”。第二天，她在国民党二大上发表演说时再次强调：“先生的主义成功不成功，全仗诸君的努力。如果诸位能大家合作，则先生的主义一定是能够成功的，能够实现的。”

在这次会议上，宋庆龄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

1926年11月，国民革命军消灭了长江以南的军阀势力，在全国掀起革命高潮，武汉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宋庆龄积极投入大革命洪流，与孙科、徐谦、宋子文、陈友仁、鲍罗廷等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不久，国民政府从广州迁都武汉。

领导妇女参加国民革命

在武汉，宋庆龄一度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引导妇女参与国民革命、培养妇女干部上来。1927年2月，宋庆龄在武汉创办了一个妇女政治训练班。训练内容既有理论课程，也有革命实践，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课程包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国际形势等。宋庆龄有时也去讲课，还担负大部分行政工作。技术课程有宣传工作、战地救护等。学员毕业后被派到北伐前线、医院和农村，把学到的东西用于实践。

在一次有关妇女训练班的采访谈话中，宋庆龄一开始就表达了很高的希望，乐观地说：“我们的祖母比美国妇女落后 500 年，但我们的女儿可以比美国妇女先进 50 年。”她接着把妇女解放事业同孙中山的遗志联系起来：“孙中山不仅为中国政治经济之革命家，并为妇女界之革命家，所至之地，无不提倡阶级自由、男女平等。”并宣传国民党起草的新宪法对妇女所作的伟大保证：“保证妇女享有与男子同样的权利。”她向记者表示：“余所倡办之妇女政治训练班，其目的即在根据现在之背景，国民党之主义，着手训练政治领袖。”

宋庆龄在妇女运动中的态度不只是从女权的角度出发，而且是从阶级的观点出发的。她对训练班的学员们说：“我们一方面反对男人压迫女人，另一方面也反对有钱的女人压迫穷苦的女人。”对于那些被卖给有钱人家太太做婢女或童养媳的穷苦女孩子，她竭力声援和帮助她们；凡到妇联来求救的，她总是根据新的法律使她们得到解脱并送她们去上学，这些妇女后来有的成为了积极的革命工作者。

在领导妇女运动的同时，宋庆龄也将很大的精力投入到伤员救护工作中。在武汉，她被任命为卫生部长并成为北伐军红十字会首任会长。1927 年 5 月，在河南省内发生激战时，她建立起伤兵医院并参加工作。为了筹集资金，她举办了各种义卖会和晚会，并且把不支持北伐的个人和组织也动员起来参与人道主义的工作，如伤兵救护等。在她的带动和领导下，武汉的妇女积极地投入到北伐救护工作中。

“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当国民政府从广州迁都武汉后，驻扎在南昌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自恃已经军权在握，在南昌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与武汉政府对抗，公开进行分裂活动。

在国民革命的十字路口，在统一战线即将分裂的紧急关头，宋庆龄以孙中山夫人的特殊身份，以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的忠诚继承者的地位，集合国民党左派领袖，与共产党人通力合作，为挽救统一战线和国民革命作出了最后的努力。

在 1927 年 3 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重申必须贯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坚决地与分共势力进行斗争。

■ 西山会议

1925 年 11 月 23 日至 1926 年 1 月 4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邹鲁、林森、居正，中央监察委员谢持、张继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堂前以“中国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名义召开会议。会议主旨是反对国共合作，反对“三大政策”。这是国民党右派自成体系企图分立中央，分裂统一战线的一次非法会议。





宋慶齡



■ 宋庆龄宣言传单

这次会议之后，蒋介石于4月12日悍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以屠刀对付原先的盟友，用武力分裂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宋庆龄领导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对蒋介石的背叛行为进行讨伐。4月15日，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宋庆龄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共产党人一起，严厉谴责和声讨蒋介石的叛变，并作出惩治的决议：“蒋中正戮杀民众，背叛党国，罪恶昭彰，着即开除党籍，并免去本兼各职，交全体将士各级党部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依法惩治。”

然而在这关键时刻，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汪精卫也举起了反共的旗帜，与蒋介石走到了一起。7月14日，汪精卫请宋庆龄出席在他寓所举行的“分共”策划会议，遭到了宋庆龄的断然拒绝。宋庆龄为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再次遭到无耻的背叛而痛心疾首，她派陈友仁到会申明自己坚决反对“分共”的立场，陈友仁在会上庄严宣布：“孙夫人反对分共。因为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总理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够发展成为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至此，宋庆龄已经完全看清蒋介石和汪精卫是一丘之貉，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已经没有调和的余地，于是在汪精卫“分共”前夕，她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毅然公开发表《孙宋庆龄对时局宣言》，郑重宣布：“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思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宋庆龄决然与抛弃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右派决裂，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坚定地与人民大众站在同一战线上迎接新的斗争。

访问列宁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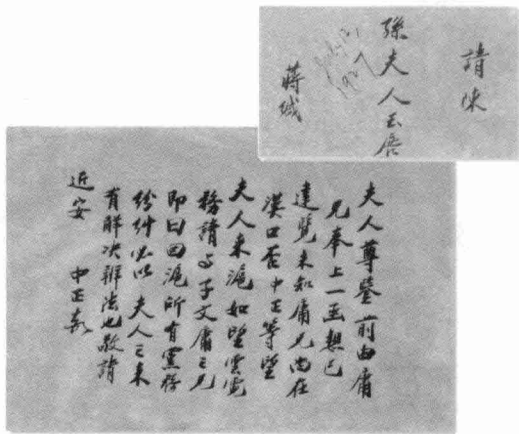
1927年8月下旬的一天深夜,宋庆龄在美国女记者雷娜·普罗梅的陪同下,悄悄地离开了位于莫利爱路29号的寓所。在离家不远的法国公园附近,她们登上了一辆苏联驻沪总领事馆事先安排好的小汽车,向漂浮着垃圾污物的黄浦江畔驶去。凌晨3点多,她们到达了码头。岸边停靠着十几艘挂着五颜六色外国国旗的军舰,晨曦中她们悄悄登上了一条小舢板,顺流而下。

绝不妥协

宋庆龄这是去向哪里呢?事情还要从一个月前她从武汉回到上海说起。

1927年7月15日,继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之后,一直以左派面目出现的汪精卫也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在武汉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7月17日,宋庆龄愤然离开了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武汉,回到了上海。

在上海,宋庆龄在家中闭门不出,谢绝所有来访者。蒋介石得知宋庆龄来上海后,妄图拉拢她加入南京政府。7月25日,蒋介石派何应钦到上海拜见宋庆龄,遭到拒绝。于是,蒋介石暗中散布谣言说,宋庆龄正打算加入南京国民政府。对此,宋庆龄坚决加以驳斥,她在7月30日接受合众社记者古尔德采访时,尖锐地指出:“在国民党现行政策不改变前,我绝不参加任何行动。如果革命事业不纳入中山主义轨道,我绝不担任任何党务。”蒋介石对宋庆龄的行动又气又恼,却又无可奈何,只得派特务严密监视她的住宅。



■ 1927年7月,蒋介石致宋庆龄函



8月1日,宋庆龄又接到了汪精卫的来信,汪在信中大肆诬蔑中国共产党,还要宋庆龄共同谴责共产党员的“反复无信”。宋庆龄同样未予理睬。

对于宋庆龄这样坚决的态度,她的家人既担心又无可奈何。他们不断敦促宋庆龄不要再说任何有利于已“被摧毁”的共产党的话,更不要那样不客气地反对蒋介石。但是,宋庆龄没有妥协。经过反复考虑之后,她决定去苏联。这也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他在去世之前曾委托宋庆龄替他访问莫斯科。

为保密起见,宋庆龄将出国手续交给美国人雷娜·普罗梅去办。普罗梅是英文报纸《人民论坛报》的主编,宋庆龄的朋友。她悄悄来到上海苏联总领事馆为宋庆龄安排这次旅行。一同赴苏的还有曾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和他的两个女儿,以及曾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长的吴之椿和普罗梅本人。由于一时没有去苏联的轮船,他们只好耐心等待。8月中旬,雷娜·普罗梅得知有一艘带客房的苏联货轮即将从上海启碇赴海参崴,经过周密计划,宋庆龄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

访问红都

在陈友仁和苏联驻沪总领事馆的帮助下,宋庆龄在吴淞口登上了一艘苏联



货轮。

就在这一天——1927年8月22日，上海《申报》刊登了宋庆龄《赴莫斯科前的声明》。她说：“国民党冒牌领袖们所领导的反动势力危害了三大政策，因此，国民党内部的革命一翼必须使苏联深深地相信……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因此，我要亲自到莫斯科说明这一点。”

宋庆龄虽然离开了上海，但她用这篇义正词严的声明帮助人民进一步看清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给了蒋介石重重的一击。

1927年9月6日，莫斯科的雅罗斯拉夫火车站人流如潮，一派欢迎贵宾的隆重气氛。站台上站满了工人、集体农庄庄员、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和工会、妇女团体、共青团的代表以及中国侨民的代表。人群中举着用中文写的“欢迎革命的领袖宋庆龄”的巨大横幅，军乐队穿着笔挺的制服站在人群的前面。

列车徐徐进站，人群中顿时爆发出“乌拉！乌拉”的热烈欢呼声。在《国际歌》的雄壮乐曲声中，宋庆龄端庄的身影出现在车厢门口。她微笑着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连日来政治风云的变幻和旅途的劳顿让她消瘦了许多，但她终于实现了孙中山先生托付的访问苏联的遗愿，心情十分愉快。微笑中她的脸颊现出深深的酒窝，脸庞虽然清瘦，眼睛却非常明亮，仍显得满



■ 1927年9月7日，宋庆龄抵达莫斯科火车站，受到苏联政府代表及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



■ 宋庆龄在莫斯科与儿童在一起

面春风,精神焕发。在莫斯科车站,宋庆龄发表声明,重申了她此行的目的和背景。“我这次访问苏联,是为了向苏联人民致谢,感谢他们给予中国革命的帮助……”“目前有人背叛了革命,有人开小差,还有人完全歪曲了国民革命运动的真义。”“我今天访苏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全世界知道,那些盘踞在长江流域的人,虽然自命为中国国民党的发言人,但他们并不能代表革命的国民党,也不能代表中国的革命群众。”

宋庆龄在莫斯科受到了国宾待遇。在车站迎接她的有外交部长季维诺夫等官员,苏联政府请她在过去俄国糖业巨子的宅第——“糖宫”下榻;为照料她的生活起居,苏方专门安排了教育人民委员柯伦泰夫人担任接待组组长。

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宋庆龄进行了广泛的参观考察。她应邀访问了莫斯科中山大学,这是国外第一所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大学。她发表演讲勉励学生牢记自己是孙中山的信徒,牢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她希望大家能成为继承孙中山遗志,高举孙中山三大政策旗帜的革命栋梁。宋庆龄深刻精辟的演说不时为同学们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宋庆龄还在柯伦泰夫人的陪同下,参观了红场和克里姆林宫,瞻仰了列宁陵墓。1927年11月7日,作为苏联政府的国宾,宋庆龄还应邀参加了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并登上贵宾席检阅了游行队伍。那天,莫斯科大雪纷飞、寒



■ 1927年,宋庆龄在苏联留影



■ 1927年10月，宋庆龄在高加索同邓演达（右二）、王人达（右一）、鲍罗廷（左一）合影

气逼人，宋庆龄只穿了薄底皮鞋，双脚冻得疼痛。但是宋庆龄被群众队伍表现出来的革命热情深深感染，她在观礼台上站了五个多小时，直到整个游行结束。

在频繁的政治活动之余，在莫斯科期间，宋庆龄与苏联十月革命的元勋、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加里宁及其夫人结下了真挚的友谊。她经常去位于莫斯科郊区阿尔汉格尔斯克村的加里宁夫妇的乡村别墅，和他们一起度过愉快的假期。在这里，她参加欢乐的滑雪运动，她常常和加里宁夫人一起裹着毛毯乘着马拉雪橇在别墅附近的原野上奔驰，这样的时光和苏联人民的友谊给宋庆龄留下了终身难忘的美好记忆。

继续前行

宋庆龄在莫斯科期间留下的并非都是美好的记忆。她也遭遇了人生中难以想象的一连串打击：1927年10月间，她忽然得知外界谣传她已与陈友仁在莫斯科结婚，气得当场昏厥，不久便病倒了；11月21日，从上海陪同她到莫斯科，在患难中与她朝夕相处的挚友雷娜·普罗梅因脑炎在莫斯科病逝，使大病初愈的她万分悲伤；12月1日，妹妹宋美龄与背叛孙中山革命原则的蒋介石结婚了，这是她无法接受的。

然而宋庆龄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她坚持捍卫孙中山三民主义三大政策旗帜，与国民党左派邓演达、陈友仁一起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于

1927年11月1日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三人名义，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宣言》。在宣言中，宋庆龄指出蒋介石、汪精卫已经成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不久，宋庆龄又痛斥了蒋介石断绝与苏联政府的外交关系的做法，认为这无异于自杀行为。为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宋庆龄日以继夜地工作。她陆续撰写了《中国目前的形势》等一系列文章，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革命的现状，分析中国革命的形势，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在莫斯科逗留的半年让宋庆龄目睹了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的勃勃生机。

但是，当斯大林建议她和她的同志们回国与蒋介石合作时，她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待了。她请母亲给她寄一点钱来，然后就到欧洲去了。



■ 1927年，宋庆龄在莫斯科与加里宁夫人合影



12

旅居德国

1928年5月，宋庆龄从莫斯科来到了柏林。

柏林给宋庆龄带来了从未有过的自在感觉。这里不仅环境清爽整洁，气候怡人，而且生活费较低，这里的人们对外国人也非常友好。不过，最为重要的是，宋庆龄认为，她可以从德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学到许多适合于中国建设的東西。

在柏林，宋庆龄一待就是四年。经常来陪伴她的是她的秘书章克。章克受邓演达和陈友仁委派，特地从莫斯科来到柏林，照顾宋庆龄的日常生活，并帮她查找资料及安排对外联络等。

受人监视的侨民生活

在德国，宋庆龄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侨民，过着并不富裕的平常人生活。虽然她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但住的并不是花园洋房，而是位于里城堡大街7号寓所的单元房。寓所虽然简单，但环境倒也闹中取静。打开窗户，就可看到开阔的草坪，成群的鸽子在那里咕咕踱步；楼前矗立着成排的枫树，夏天郁郁葱葱，秋天则一片枫红。寓所的不远处就是著名的商业区——柯夫斯坦姆大街。

宋庆龄的饮食也极为简朴。在当地有一种叫做“格但克”的快餐客饭，实际上就

是一马克一份的“盖浇饭”，一盘大米饭上浇点蔬菜和猪排、牛排而已。这是宋庆龄常用的午餐。她还学会做一种德式土豆煎饼，经常自得其乐地享受这一民间小吃。多年之后，她回到了抗战中的重庆，还保持着这个饮食习惯，不时用平底铁锅来做土豆煎饼。



■ 1928年的柏林火车站



■ 1928年,宋庆龄在德国留影



在德国,她的身份是保密的,处事极为低调。房东太太只知道她叫林太太,亲朋好友给她写信也不直接寄到寓所,而是寄到临时租用的一个邮政信箱,收信人一般也只署名林太太,有时写成林泰。

旅居柏林时,最令宋庆龄高兴的事情还是三弟宋子安的到来。宋庆龄刚到柏林不久,宋子安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便专程来柏林探望亲爱的二姐。他每天陪二姐聊天、散步,这无疑让长期孤身在外的宋庆龄感到无比的快乐。姐弟俩结伴游览了柏林的众多名胜古迹。位于市中心的蒂尔公园是柏林最大的公园,他们多次去那里看树、赏花、听鸟、观景。此外波茨坦皇宫也使他们领略了腓特烈大帝时代的风采。弟弟在回国之前,又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陪着他亲爱的二姐到欧洲各国旅行。他们先到了法国巴黎,宋庆龄要去那儿的美国医院治病。接着他们又去了瑞士湖间镇那可爱的阿尔卑斯山区,还去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从布拉格回到柏林后,姐弟俩暂居柯夫斯坦姆大街上著名的动物园饭店。不久,宋子安回国,宋庆龄便移居柏林夏洛登堡区维兰特大街18号科恩赖希博士夫人家中。

由于德国当局十分关注宋庆龄和共产党人的来往,所以宋庆龄平凡的侨民生活仍然受到了柏林警察的密切监视。早在审批宋庆龄入境签证时,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就向德国外交部提出要对她进行秘密监视的报告,报告中认为宋庆龄在中国的国民运动中站在共产党一边,在苏联又和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对她



在德国的行动应该作“不引人注目的监视”。根据这一建议,德国警察总署指示柏林警察局具体执行监视任务,每天跟踪宋庆龄的行动,上报监视结果。这些监视报告的内容几乎让人哭笑不得,往往记录了“许多中国来访者”、“每天出外散步两次”等琐碎的事情。但德国当局并未因此对宋庆龄平静的生活放松警惕,依然小心翼翼地加强盯梢。这些“情报”在政治上毫无价值,但它们却记录了宋庆龄在柏林时的行踪。

严格划分政治接触的界限

初到柏林,宋庆龄就立下一个原则:不与德国官方、中国驻德大使馆发生关系;不会见到柏林来的国民党高级政要。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想会见她,她也婉言拒绝,实在推不掉就请也在柏林的邓演达代为会见。汪精卫曾多次想来拜访她,她都避而不见。孙科在宋庆龄抵达柏林后不到一个月也来到柏林,宋庆龄得知他要来拜访的消息,立即搬到其他住处。她对章克解释了拒绝会见国民党政要的理由:“他们不代表真正的中国。真正的中国是工农,这些人站在杀害工农的人一边,他们没有资格要求见我。”

由于当时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政府,宋庆龄也拒绝会见来访的美国人司徒雷登。她还拒绝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重金邀请,不愿去美国演讲。关于宋庆龄赴美演讲的事,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认为:“让宋庆龄去美国一至两个月作关于中国和苏联的报告和演讲是合适的。”但是宋庆龄不这么认为,她向章克解释说:“如果我去,就会落入一个有利于蒋介石和支持蒋介石的美国政策的陷阱。我的谈话或者沉默会被认为是接受蒋介石政权的合法性。”

在德国,中国共产党的成员受当时极端的“左倾”思想影响拒绝见她,甚至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建议“宋庆龄希望会见的那些同志不要拒绝会见她”时,他们仍然发表过激言论,妄断宋庆龄、邓演达这样的左派,与蒋介石之流一样,是中国劳动群众无往不胜的革命过程中的失败者。为此,他们不邀请身为国际反帝大同盟的发起人之一的宋庆龄参加在柏林举行的会议,与会的中国共产党人黄平在饭店遇到宋庆龄时,也不和她打招呼,视若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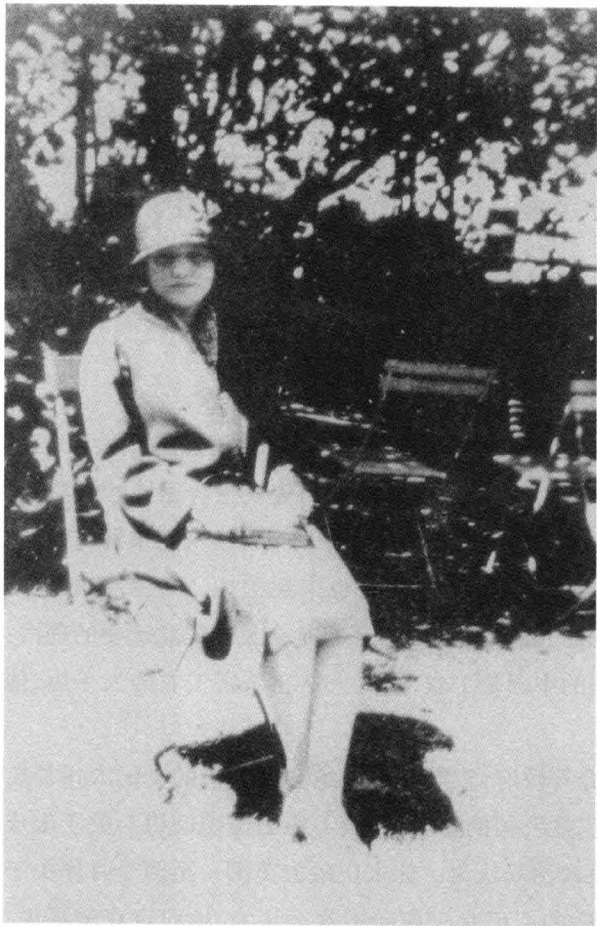
与中国共产党相比,德国共产党对待宋庆龄的态度反而显得客观公正。在柏林,宋庆龄与共产国

■ 司徒雷登
(1876—1962)

生于中国杭州,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在美国大学毕业后,1904年返华,开始在中国传教。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教务长。

1946年7月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支持蒋介石政权。1949年8月离华回国。著有《启示录注释》、《传教士和大使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回忆录》等书。





■ 1929年,宋庆龄在德国柏林留影

多中国留学生都有接触,部分女性留学生甚至曾借宿在她的住处或接受她的经济资助。

际和德国共产党的领袖之一克拉拉·蔡特金等人来往十分密切。当时在柏林有个进步组织——“国际保卫革命者委员会”,她参加了这个组织举行的集会,并由此结识了更多的德国知名人士,互相交流保障世界和平、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经验。在交往中,这些进步人士也被宋庆龄的民主思想、高尚情操和富有魅力的仪态所倾倒,称赞她是民主中国的卓越代表,是一位伟大的民主斗士和人道主义者。

当时,德国聚集了许多中国人,除了很多流亡海外的国民党党员和共产党党员外,还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像孙中山一样,宋庆龄也十分重视青年的力量,她与许

认真思考革命救国之路

宋庆龄旅居德国,虽然过着隐居生活,但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思考却没有停止过。当时也在柏林的邓演达是她最重要的研讨伙伴。在柏林,宋庆龄和邓演达继续探讨如何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在一起商谈革命工作,研究中国的土地问题。邓演达为宋庆龄分析世界大势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解释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他们一致认为三民主义的实现与民族解放,各阶级的公民权与自由权,与为提高全国生活水准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他们还到柏林一些大的图书

馆收集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各国土地问题的资料。邓演达主张,要真正重振中国革命,必须制订出一个以土地和农民问题为中心的纲领。这一观点十分契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深得宋庆龄赞同。他们与远在异地的陈友仁共同探讨的结果是:此后的革命工作,仍应注重农民问题,解决土地问题,以建立革命力量。政治、军事工作,都应当建立在这种力量上面。

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并把这一信心传递给其他同志。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叶挺将军来到了柏林,宋庆龄和邓演达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和他讨论分析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国内革命的形势发展,大家越来越坚信中国革命虽然遭受了严重挫折,但终将取得胜利。

在柏林的流亡者们十分希望宋庆龄和邓演达能够把他们重新组织起来,宋庆龄和邓演达也非常想把这些仍然忠于三大政策的成员集合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去完成他们的任务。如何组织他们也是宋庆龄和邓演达经常探讨的主题之一。

宋庆龄停留巴黎时期,邓演达通过书信来往与宋庆龄讨论了他在10月份发表的《我们对现在中国时局的宣言》。邓演达在《宣言》中明确指出:“我们目前的口号不是反蒋讨蒋,而是整个地推翻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统治,不但是要反对南京而且要反对一切其他挂名反对南京的军阀政客。我们的目的是要建设一个民族的平民的统治,去实行孙总理的未完的工作。”宋庆龄非常赞同他在《宣言》中所表示的对南京及改组派的态度,并告诉他,也在巴黎的汪精卫屡次派人找她,要和她接头,但被她坚决地拒绝了。



■ 宋庆龄在欧洲



■ 邓演达
(1895—1931)

字择生，广东惠阳县（今惠州市）人。1921年起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参与筹建黄埔军校，后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四一二”事变后，与宋庆龄等联名通电讨蒋。1927年11月，在莫斯科与宋庆龄、陈友仁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后旅居德国。1930年回国，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当选为总干事，积极从事反对蒋介石专制统治。1931年11月29日在南京被蒋介石秘密杀害。



1929年12月，因为国内南北各派军阀势力矛盾日益激化，邓演达认为这是回国组织革命的绝好时机，所以特地从伦敦乘飞机赶往柏林，与宋庆龄商谈回国进行革命斗争的实际办法。邓演达抱着为革命必死的决心，向宋庆龄辞别。他坚定地宋庆龄说：“我们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尖锐的且又残酷的。因为我过去毫不犹豫地向着腐恶斗争，譬如顽强的封建势力、机会主义，以及反动行为，因而在军政两方面全树了不少的仇敌。但他们不能阻挠我追随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这次或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聚会。”历史的发展被不幸地言中了，这一别真的成为了永诀，回国后的邓演达后来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了。

就在邓演达回国后不久，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带着儿子廖承志来到柏林看望宋庆龄。他们在一起热情地谈论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前途。一次，何香凝谈到兴头上，就挥毫作了一幅《菊石图》送给宋庆龄，并题诗相赠：

“惟菊与石，品质高洁；惟石与菊，天生硬骨。悠悠清泉，娟娟皓月；惟菊与石，品质高洁。”

13 怒斥戴季陶

1929年6月，宋庆龄参加完孙中山奉安大典后，因为过分悲伤和劳累，回到上海莫利爱路寓所养病。8月10日这天，戴季陶带着蒋介石的使命，登门拜访……

对于蒋介石交付戴氏的使命，宋庆龄是非常清楚的。正是因为她太了解蒋介石了，所以她在回国参加奉安大典之前就已经和邓演达等人商量好了一切应对措施。

“是宋家为中国而存，不是中国为宋家而存”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蒋介石处心积虑，在国民党错综复杂的派系斗争中，几经周折，终于夺得了党的最高权力，成了继孙中山之后国民党新的领袖。但是他的形象远不够“正统”，他一直在寻找机会，树立自己“正统”的形象。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临了，就是1929年孙中山的奉安大典。蒋介石想借亲自主持总理奉安大典这个空前的仪式，树立自己继中山先生之后的“正统”的形象，同时想借此机会，让宋庆龄回国并把她拉拢过去，至少是封住她的口。

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宋庆龄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宋庆龄敏锐地意识到这是蒋介石的阴谋。但是，孙中山的奉安大典她是一定要参加的。她秘密询问杨杏佛奉安大典的明确日期，在得知国民政府决定1929年3月12日为孙中山奉安日后，她在1928年底来到了莫斯科。她对柏林警察局报告她离开柏林的目的时假称将去海德堡旅行。宋庆龄原准备1929年2月中旬从莫斯科出发经西伯利亚回国，就在她即将启程之际，杨杏佛来电，告知她奉

■ 戴季陶
(1890—1949)

原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原籍浙江湖州。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鼓吹革命。



1912年任孙中山秘书。“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积极参与中华革命党的组建和革命方略的制定。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历任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山大学校长等职。孙中山逝世后，积极参加“西山会议派”活动，形成集反共理论之大成的所谓“戴季陶主义”。后任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长达20年之久。1949年2月11日在广州自杀身亡。

13

怒斥戴季陶



■ 宋庆龄与二弟宋子良

的声明。宋庆龄严正地回答二弟：“是宋家为中国而存，不是中国为宋家而存。”

安大典延期到6月1日举行，宋庆龄随即重返柏林。

1929年5月6日，宋庆龄乘火车从柏林启程经苏联西伯利亚回国，行前发表声明指出：“我参加葬礼显然不表明也不意味着，我不直接参加国民党工作的决定有所改变或推翻，只要国民党的领导继续违背孙博士的三大政策，即积极的反帝政策，联合苏联和工农的政策。”5月15日，宋庆龄进入中国境内，在前往哈尔滨途中，她再次对英亚电讯社记者发表了上述声明。

当宋庆龄乘坐的专车抵达沈阳，二弟宋子良见到她后，劝她不要公开发表反政府的

“总理！我在此地，你往哪里去了？”

宋庆龄此行一路都在邓演达选定的黄琪翔的陪同下，黄以秘书的身份为她挡住了许多她不愿进行的接触。5月17日，旅途劳顿的宋庆龄抵达沈阳，在张学良官邸与这位少帅进行了一次长谈。

5月18日下午6时许，宋庆龄抵达北平，一下火车便驱车直奔香山。香山碧云寺是孙中山停枢处。宋庆龄下车时，悲伤得几乎不能走路，在左右的搀扶下，拾级而上，直奔灵堂。至灵前，宋庆龄

■ 黄琪翔
(1898—1970)

广东梅县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追随孙中山先后参加两广平叛和北伐战争。1930年参加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任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1933年参加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失败后赴德国。抗日战争时期历任第六战区和国民政府远征军副司令长官等职。1948年潜赴香港，与南京政府脱离关系。1949年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70年12月10日在北京病逝。



大哭失声。她先行三鞠躬,并献上从沈阳带来的花圈,花圈上款书“中山先生灵右”,下款书“妻宋庆龄鞠躬”。看见她泣不成声地手指灵柩,大家明白她是想再见丈夫一面,于是卫士掀开覆棺的国旗,扶宋庆龄登上石龛。宋庆龄凄婉地呼唤自己的丈夫和导师:“总理!我在此地,你往哪里去了?”透过玻璃棺盖,面对曾经共同生活了十年的丈夫的遗容,宋庆龄更是悲不自胜,她扶棺大哭近半小时,泪珠直淌在玻璃棺盖上。在左右的再三劝慰下,宋庆龄又三鞠躬,才不舍而去。第二天一早,她再赴碧云寺拜谒。

5月22日,宋庆龄三至碧云寺,参加孙中山遗体改敛铜棺仪式,并在灵前主持家祭。再睹孙中山遗体,宋庆龄又大哭不止。26日,宋庆龄四至碧云寺,主持家祭后,护送孙中山灵柩奉移南下。她随灵车一路经天津、济南、徐州、蚌埠,于28日抵达南京。

31日,这是宋庆龄与自己的丈夫、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作最后诀别的日子。这一天是孙中山灵柩封棺日,透过还未撤换的玻璃棺盖,宋庆龄率领众人与孙中山遗体作最后告别后,用铜顶盖封上孙中山灵柩。

6月1日,奉安大典正式举行。就在这一天,她在柏林发表的声明通过上海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摘要刊登,在国内流传开来。

奉安大典一结束,宋庆龄连夜乘专车返回上海,不在蒋介石政府所在地南



■ 奉安当日,宋庆龄、宋美龄、蒋介石、宋子文等在送葬队伍中



京多停留一刻。6月9日,宋美龄按蒋介石的授意专程前来上海,邀请宋庆龄赴南京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被宋庆龄婉拒,宋美龄只得返回南京。

“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

回上海后,宋庆龄拒绝与蒋介石政府接触,住在她和孙中山一起生活过的莫利爱路29号,深居简出,养病看书,除了和家人相聚外,很少会客。

但宋庆龄并没有沉默下去。两个月后,宋庆龄又对蒋介石政府发出猛烈的一击。8月1日是国际反战日,宋庆龄在这一天打电报给“国际反帝大同盟”,再一次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的倒行逆施。电报指出:“反动的南京政府正在勾结帝国主义分子势力,残酷镇压中国人民大众。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企图挑起对俄国的战争。但是中国人民大众,不因受镇压而气馁,不为谎言宣传所蒙骗,他们只是将站在革命一边进行斗争。恐怖行动只能唤起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加强我们战胜目前残忍的反动派的决心。”

这封电报针对的是不久前刚发生的“中东路事件”。宋庆龄显然认为,“中东路事件”标志着南京政府已堕落成为英美帝国主义的工具体,使中国成为反苏的前沿阵地,这违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宋庆龄的电报遭到了官方封锁。在街上,有人把电报印成传单,但散发传单的人都被抓了起来。

这封电报犹如一把利剑,直刺蒋介石政府的要害,蒋介石十分恼怒。于是,奉

蒋介石之命的戴季陶偕夫人在8月10日这一天出现在宋庆龄的面前。

一阵寒暄之后,戴夫人殷勤地劝说宋庆龄到南京:“陵园真是美丽,您的住宅里一切设备都布置好了,我们都愿意您到那里去,您也可以就近向政府提建议。”宋庆龄颇为反感地回复她:“我对政客的生活不适合,况且我在上海都没有言论的自由,难道到南京可以希望得到吗?”

■ 中东路事件

中东路是沙皇俄国从清政府手中取得特权后,在中国东北修筑的铁路,曾经是沙俄和日本争夺中国东北的重要工具,也是英美势力急欲染指的地方。1924年中苏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规定中东路为纯商业性企业,由两国在均等原则上共管,直到中国政府赎回为止;但实权仍掌握在苏方手里。1929年7月,张学良决计收回中东路主权,将中东路电报电话收回,将苏联职员遣送回国。于是,苏军与东北军发生武装冲突,国民政府对苏宣战。





■ 20 世纪 20 年代的宋庆龄

叶晓荣著 时代出版社 1981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32 开本 128 页 1.20 元

宋庆龄 (1893-1981) 女 广东文昌人 孙中山夫人 1913 年随孙中山到上海 1917 年随孙中山到广州 1924 年随孙中山到南京 1925 年随孙中山到香港 1926 年随孙中山到桂林 1927 年随孙中山到武汉 1928 年随孙中山到南京 1929 年随孙中山到香港 1930 年随孙中山到上海 1931 年随孙中山到南京 1932 年随孙中山到上海 1933 年随孙中山到南京 1934 年随孙中山到上海 1935 年随孙中山到南京 1936 年随孙中山到上海 1937 年随孙中山到南京 1938 年随孙中山到上海 1939 年随孙中山到南京 1940 年随孙中山到上海 1941 年随孙中山到南京 1942 年随孙中山到上海 1943 年随孙中山到南京 1944 年随孙中山到上海 1945 年随孙中山到南京 1946 年随孙中山到上海 1947 年随孙中山到南京 1948 年随孙中山到上海 1949 年随孙中山到南京 1950 年随孙中山到上海 1951 年随孙中山到南京 1952 年随孙中山到上海 1953 年随孙中山到南京 1954 年随孙中山到上海 1955 年随孙中山到南京 1956 年随孙中山到上海 1957 年随孙中山到南京 1958 年随孙中山到上海 1959 年随孙中山到南京 1960 年随孙中山到上海 1961 年随孙中山到南京 1962 年随孙中山到上海 1963 年随孙中山到南京 1964 年随孙中山到上海 1965 年随孙中山到南京 1966 年随孙中山到上海 1967 年随孙中山到南京 1968 年随孙中山到上海 1969 年随孙中山到南京 1970 年随孙中山到上海 1971 年随孙中山到南京 1972 年随孙中山到上海 1973 年随孙中山到南京 1974 年随孙中山到上海 1975 年随孙中山到南京 1976 年随孙中山到上海 1977 年随孙中山到南京 1978 年随孙中山到上海 1979 年随孙中山到南京 1980 年随孙中山到上海 1981 年随孙中山到南京



■ 1929年6月9日,宋庆龄在上海与家人合影

听宋庆龄说及言论自由,戴季陶耐不住性子了。他摸索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想递给宋庆龄,但是宋庆龄已经看清楚了。她没有伸手去接,而是冷冷地对戴说:“那好像就是那份我拍给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的、南京政府不许发表的电报。”

“这真是从您这里发出去的吗?”戴季陶故作惊讶地反问。

“我有权可以证明,一字一句都是我自己写的。”宋庆龄正色而言。

“你应该遵守党的纪律。而且这件事尤其不好的地方,是拍电报给外国人啊!这无异丢政府和民族——你自己的民族——的脸啊!”戴季陶收起了他进门来一直堆着的笑容,改用教训的口吻批评宋庆龄。

闻听此言,一向温文尔雅的宋庆龄变得异常愤怒,她痛斥戴季陶道:“遵守党纪,虽然,谢谢你们把我的名字列上你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实我并不属于你们的贵党。你竟有这种勇气告诉我,说我是没有权利说话。你们是把当作招牌去欺骗公众吗?”她凛然表示:“我是代表被压迫的中国民众说话。”“我的电报正是维护中国人的光荣的表示。”她继而反诘戴季陶:“你们投降日本和外国帝国主义,侮辱革命的苏俄,才证明你们是一伙走狗,给国家与人民带来了耻辱。你们的爪牙杨虎,在法国巡捕房控告我装置秘密无线电,布置外国特务来对付我,这不是丢脸吗?你们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多少污点,民众将有一日要和你们算账的!”

戴季陶转而劝说宋庆龄与蒋介石合作,并自圆其说地向宋庆龄解释:孙先生不是一个寻常人,他的理想超前了几世纪,他的三民主义需要几百年才能完成。

宋庆龄驳斥道:“很明显地,你现在所引据的都是你们篡改过了的三民主义。孙先生自己曾声言过,假如党员能确守主义,革命是能够在二三十年之内成功的。”“我要警告你,不要把孙先生当作一个偶像,当作另一个孔夫子和圣人,这是对孙先生的名声的侮辱,因为他的思想与行动始终是一个革命家。”

戴季陶一听沉不住气了,他以南京中山大道为例,想说明政府各部门的种种“进步”。

宋庆龄针锋相对道:“我除了看见你们妄肆屠杀数百万将来可以代替腐败官僚的革命青年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穷苦绝望的人民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军阀争权夺利的战争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对饥饿的民众的勒索以外,没有什么了。事实上,你们什么都没有做,只进行了反革命活动。”

……

又经过一番唇枪舌剑之后,戴季陶不再拐弯抹角,他直言此行的目的:“孙夫人,我希望你不要发表宣言。”

宋庆龄随即大义凛然地宣布:“戴君,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



■ 宋庆龄与戴季陶谈话记录的中文稿

13

怒斥戴季陶



宋慶齡



天津《大公報》发表《孙夫人与戴传贤谈话笔记》

者监禁我。”

无奈之下，戴季陶只好起身告辞，还说日后再见。宋庆龄毫不留情地请他以后不必再来，因为“我们之间的鸿沟太深了”。

想让宋庆龄不说话是绝对办不到的。宋庆龄亲笔记录了她与戴季陶的谈话全文，并提供给燕京大学出版的英文刊物《明日之中国》全文刊登，随后上海的一份小报及天津的《大公报》将此文予以译载。

当国内民众从报纸上得悉孙夫人宋庆龄对国民党不再抱有任何希望时，宋庆龄已再次出走海外，再次回国已是两年以后的夏季。

“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

1931年7月，宋庆龄的母亲在青岛病逝，宋庆龄立即从柏林启程归国，在共产党员胡兰畦的陪同下，于8月13日抵达上海。胡兰畦代宋庆龄向各界表示，宋庆龄回国的目的是“专为奔丧”。但是面对国内复杂的政治态势，宋庆龄无可避免地卷入了汹涌的政治漩涡。

在目睹蒋介石政府接二连三地向爱国民主力量举起屠刀后，1931年12月20日，宋庆龄通过上海各报愤然宣布——“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

立场坚定

宋庆龄归国前不久，蒋介石刚刚陷入他的又一次政治危机。他虽然在中原大战中获得了胜利，但国民党各个派系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权力斗争并没有停止，他需要一位“和事佬”。正好，宋庆龄回来了。二姐在国外待了那么久，再大的气也总该消了吧？于是他放出了试探性的气球：

“宋女士回国以后，目击党内各同志因故分离，痛心万分，兼之全国遍地匪患水灾，尤为疾首，遂于蒋总司令日前来沪执紼时会晤详谈一切，现宋女士拟出面斡旋京粤两局，以期一致对内对外。”

但是，蒋介石通过国民党报纸放出的“气球”刚刚升空，宋庆龄就将它戳破了。8月23日，她致函《申报》、《大公报》，郑重声明：“庆龄此次因母丧回国，暂拟留沪休养，外传和平运动，绝未参与。”

宋庆龄拒绝为蒋介石“解难”，但同时，她却向另一个人伸出了援手。

此人公开的名字叫牛兰，公开的身份

■ 中原大战

1930年5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和李宗仁之间爆发战争。因战争主要在地处中原的河南省及其邻近地区进行，故又称“中原大战”。战争历时七个月，双方投入兵力逾百万，战线绵延数千里，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战争。1930年11月，蒋介石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暂时统一了国民党各军事集团。





■ 1932年，宋庆龄、杨杏佛（左一）与为牛兰夫妇辩护的瑞士律师琼·文森特夫妇合影

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实际上，他的真实名字叫保罗·鲁埃格，真实身份是共产国际情报人员，负责协助中国及东亚各国开展工人运动和群众革命运动，他的夫人是他的主要助手。1931年6月15日，他和夫人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英国巡捕逮捕；8月9日，租界当局将牛兰夫妇交予国民党法院；14日，由上海警备司令部移解南京。

牛兰夫妇被捕后，宋庆龄接连接到了西奥多·德莱塞、克拉拉·蔡特金、珂勒惠支、罗曼·罗兰等来自美国、德国、法国的近百名作家、艺术家及其他领域国际知名人士的电报，恳请她营救牛兰夫妇。

在海外的几年，宋庆龄正在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同情者、支持者转化为参与者，因此，营救从事国际工人运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成了她义不容辞的义务。

全力营救邓演达

1931年宋庆龄回国后不久，8月17日，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宋庆龄的亲密战友邓演达因叛徒告密在上海被捕，即被押解南京。

宋庆龄在海外期间，邓演达是她最亲密的同志。不过，在宋庆龄回国参加奉安大典以后，因为地理上的交错，他们只见过一次面。1929年12月，邓演达特地从伦敦赶到德国与宋庆龄商量他回国进行革命斗争的问题。

此时的邓演达在对中国革命前途问题的理解上已经与宋庆龄不尽相同，但宋庆龄赞成他“不但是要反对南京而且要反对一切其他挂名反对南京的军阀政客”的立场。告别时，宋庆龄绝对没有想到这是他们的最后一别。



■ 1930年2月，邓演达在保加利亚留影

一经闻听邓演达被捕，宋庆龄便竭尽全力地投入营救工作。9月5日，宋庆龄到南京拜谒中山陵，并与蒋介石夫妇在陵园晤谈。他们晤谈的内容历史没有留下记录，但是从不久以后她给杨杏佛的信中可以推测，宋庆龄极有可能在那次晤谈中向蒋介石提出释放邓演达和牛兰的要求。宋庆龄告诉杨杏佛：“由于我对邓和牛兰夫妇案的关注，已收到许多卑鄙的信件。”自从踏上捍卫孙中山旗帜的道路后，宋庆龄已见多了这种卑劣无耻的手段，但是正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所赞誉的那样，宋庆龄就如一头冲决网罗的雄狮，在雄狮面前，宵小之徒的无耻行径是不可能得逞的。宋庆龄凛然表示：“这些信并不能阻止我为争取释放他们而努力。”

尽管孙夫人已经当面提出释放邓演达的要求，但蒋介石对威胁到他的人向来是狠下毒手的。1931年11月29日，邓演达被蒋介石令人秘密杀害。12月14日，宋庆龄从何应钦的部下处得到消息后，立即赴南京见蒋介石。一见到蒋，宋庆龄就说：“现在国难当头，你与邓演达的矛盾，我来给你作调解。你把邓演达叫来，我们三人当面谈谈。”蒋默然不语。宋又追问：“如果你觉得在这里谈不方便，就派人陪我去见邓演达，我先同他谈谈，然后再三人一起谈。”蒋仍默然。最后，宋表示一定要见邓演达，蒋才不得不说：“你已经见不到他了。”宋闻后悲愤难耐，一手把茶几掀翻，蒋急急逃上楼去。



《宋庆龄之宣言》

邓演达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被蒋介石秘密杀害的。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洲铁路路轨,并将三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

“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对中国,乃至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迫于形势,蒋介石主动派员与粤方政府谈判,宁粤双方实现统一,蒋介石则于12月15日宣布下野。蒋介石在下野前夕杀了邓演达;在下野还未“还乡”之际,又镇压了爱国学生。12月17日,来自北平、上海、江苏、安徽等地的抗日救国赴京示威团学生和南京学生共3万多人在南京举行总示威,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砸毁悬于大门口的党徽,并捣毁了国民党《中央日报》社。南京卫戍司令部派出大批军警,在珍珠桥附近,用枪弹、刺刀、棍棒对示威学生进行血腥镇压,使30多名学生被杀,100多人受伤,60多人被捕。上海东亚体专女生救护队30余人手执红十字旗前往救护,被军警开枪阻止。18日凌晨,大批军警又包围了学生住地,把学生捆绑起来,武装押回原地。

蒋介石此举自然引发了全国民众的愤怒。12月19日,宋庆龄为抗议国民党政府的罪行,拟就了一篇义正词严的宣言。《申报》总经理、上海日报公会会长史量才收到宋庆龄派人交来的宣言后,连夜召集各成员日报的负责人开会,决定第二天各报同时见报。由于宣言措辞十分激烈,上海绝大多数小报怕担风险没有发表

宣言,就连一些大报也没有发表。

通过上海家喻户晓的《申报》及史量才拥有股权的《新闻报》,《宋庆龄之宣言》还是得以全文发表。虽然慑于当局的压力,报纸对宣言的版面安排及标题设计都未作强化处理,但是宣言本身的内容足以震动各界人士及各派政治力量。

宋庆龄在宣言开篇便道:“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



■ 柳条湖事件发生后,日方“发现”的所谓“中国肇事者”的枪支军帽等物

宋慶齡之宣言

宋慶齡昨發表個人宣言云：中國國民黨早喪失其革命集團之地位，至今已成爲不可掩蔽之事實，亡國國民黨者，非其黨外之敵人，而爲其黨內之領袖。自十四年孫先生病逝北平，國民黨革命，驟失導師，幾致中斷，所幸當時在粵同志，恪遵孫先生遺教，以民衆爲革命之基礎，北伐武力，卒能於最短期間，底定長江流域，乃自十六年寧漢分立，因蔣介石個人之獨裁，與軍閥官僚之爭長，黨與民衆，日益背道而馳，藉反共之名，行反動之實，陰險險毒，貪污欺騙，無所不用其極，在中央則各據要津，營私固位，在地方則魚肉鄉里，作威作福，投機殘餘軍閥，可一躍而爲黨國中堅，忠實革命人材，必設法置之死地，最近如堅苦卓絕忠勇奮發之鄧演達，終遭慘殺，即其一例，五年以來，內戰政爭，循環不已，黨既分崩離析，遂不惜各自乞憐帝國主義，利用腐化勢力，舉北洋軍閥官僚所不敢爲者，一一彈壓爲之，而美其名曰黨治，使黨蒙不白之冤，遭全國人民之厭惡唾罵，其實三民主義，何嘗一日見諸實行，最近寧粵對峙，互暴其短，自炫所長，「政治公開」，「民主集權」，「革命外交」，種種名詞，非不動聽，而究其實際，兩者皆依鎮軍閥，給獨裁國主義，背叛民衆，同爲革命之罪人，自日本侵略滿洲發生，南方迫於國難民意，不得不暫停同室之戈，進行其所謂和平統一，奔走會議，時逾三月，爭論

■ 1931年12月20日，《申報》發表《宋慶齡之宣言》

不复存在了。”在痛斥国民党政府背叛革命、屠杀人民、镇压抗日爱国力量之后，宋庆龄明确表示：“唯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

这一宣言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不仅意味着宋庆龄对国民党已经彻底失望，也是宋庆龄第一次公开表示中国应该在代表工农阶级利益的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真正实行社会主义。

《宋庆龄之宣言》标志着宋庆龄政治思想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15

断壁残垣前的留影

宋庆龄极端痛恨国民党政府积极“安内”、消极“攘外”的政策，当上海也遭遇日寇狂妄喧嚣的炮火时，她毅然走上前线，在断壁残垣前为爱国官兵留下了抗日到底的决心。

“上海的战事是不可避免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消极政策下，日本侵略军乘机节节进逼，东北三省相继沦陷，3000多万东北同胞沦落敌手，惨遭涂炭。但是，在他们的野心计划中，侵占东北只是他们的第一步。从1931年11月起，他们又先后对天津、青岛、汉口、福州、重庆、上海等地发动军事进攻。



1932年1月中旬，日本帝国主义部署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压制抗日运动和军事侵略的阴谋，派遣军舰30余艘和陆战队数千人登陆，通过驻华军唆使所谓“居留民”集会游行，捣毁了虹口北四川路的一些中国商店。1月20日，闸北区发生五名日僧与三友实业社工人殴打冲突事件，日寇借机唆使日本暴徒焚烧三友实业社，并提出道歉、赔款、惩凶、取消抗日运动等无理要求，扩大事态。

1月26日，日方向上海市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在48小时内（即1月28日下

午6时前)答复他们的无理要求。1月28日,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在谈判席上顺从日方旨意,答应停止反日宣传,停止抵制日货,取缔抗日团体,并着十九路军立即撤出上海。

吴铁城无非是奉国民政府令而已。然而“息事”真的能“宁人”吗?1月27日晚,宋庆龄在寓所与史量才、杨杏佛交谈至深夜。她说:“日本人得寸进尺,气焰很盛,看来上海的战事是不可避免的。”并说:“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抗战情绪很高,蔡廷锴、蒋光鼐等将领的态度都很坚决,应当给他们以支持,作他们的后盾。”史量

才表示:“万一战事发生,我当追随夫人,尽瘁国是,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到底。”

正如宋庆龄所料,1月28日深夜,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上海的侵略,兵分三路向闸北发起了进攻。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下,在蔡廷锴等爱国将领的领导下,不顾蒋介石要他们撤出上海的命令,奋起作战,反击日军的进攻,“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了。

“不到前线来看望你们,我心里总是不踏实”

淞沪抗战爆发后,宋庆龄便公开表示:“对于抗日战事,当然主张积极抵抗到底。”她立刻行动起来,不仅积极组织力量帮助十九路军抗战,还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到前线慰问。1月30日上午,寒风凛冽,天上下着鹅毛大雪,宋庆龄在何香凝的陪同下,来到真如前线慰问。在简陋的临时指挥部里,她们向蔡廷锴详细了解了战斗情况,热情赞扬十九路军违命抗战,鼓励他们为中华民族抗战到底。宋庆龄还向阵地上的官兵发表演说:“你们抗战的枪声一打响,海内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口气!亿万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宋庆龄全力支持十九路军的坚定立场,给广大官兵以巨大的鼓舞,个个摩拳擦掌,发誓要抵抗到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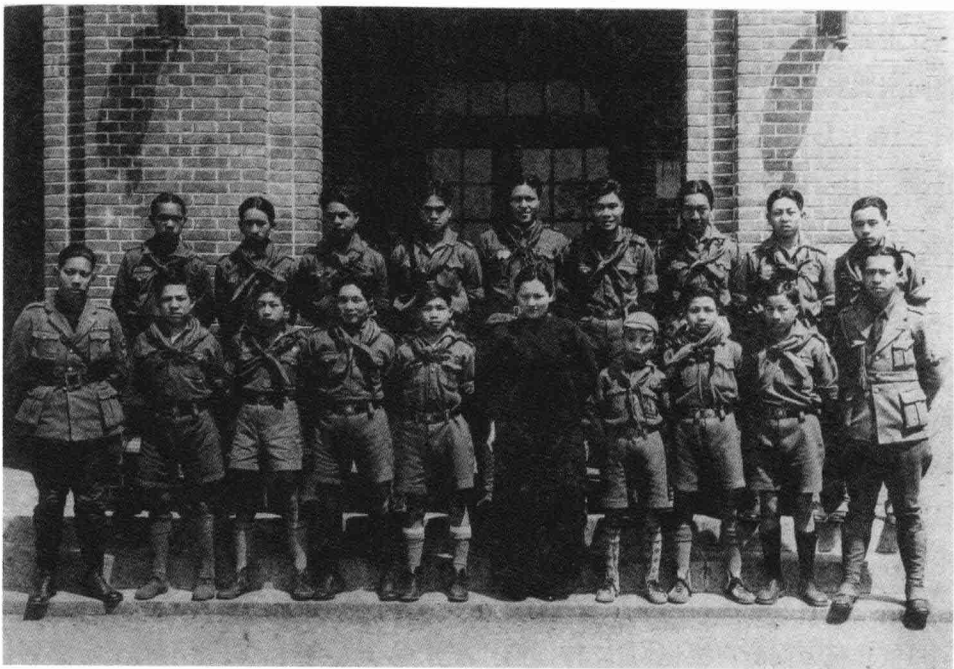


■ 1932年1月30日,宋庆龄在真如前线慰问时与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合影



由于十九路军违命抗战,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派兵增援,甚至还拒绝拨发军饷和物资,官兵生活给养很差。在前线慰问的宋庆龄亲眼目睹士兵们穿着单薄的军装在冰天雪地里战斗,许多人甚至还穿着短裤,用扁担挑着自己的装备。回到市区后宋庆龄与何香凝立即发动募捐活动,呼吁社会各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上海人民掀起了一股捐献热潮。知道十九路军将士没有衣服御寒后,短短五天时间,3万多套全新棉衣,2000多条棉被,就送到了前方将士手中。当得知前线急需交通工具时,不到半天,上海全市大大小小车辆,不论是汽车还是脚踏车全部出动,解决了前方运输工具不足的困难。上海商会自愿在战争期间每天提供十九路军2.5万银元。上海地方维持会两周内就送去军米达7010石,还有许多副食品和生活用品。此外,世界各地的华侨也纷纷打电报送来捐款,或者认捐食物和弹药。总之,现款、金银、日用品、药物、器材等从四面八方源源而来。

当宋庆龄携带大批慰劳品再一次到真如犒军时,正是那年的大年初一。真如前线的战斗似乎刚刚结束,空气中还弥漫着硝烟的味道,地面上弹痕累累,放眼望去,到处是炮火肆虐后的残垣断壁,一片狼藉。对于她的到来,官兵们都非常激动,几个战士还向她献上了缴获的战利品——一枚日军投下的没有爆炸的炮弹。宋庆龄捧着这枚炮弹,站在真如街头的断壁残垣前,表示自己同前线将士共存亡的决





■ 1932年3月5日，宋庆龄（二排左十四）在国民伤兵医院门前与该院全体职员合影

心。随行人员拍下了她不惧强暴、誓死抗战到底的珍贵镜头。

几天后，宋庆龄又冒着枪林弹雨来到吴淞前线，慰问正在交战中的翁照垣旅。当翁旅长劝说她以后不要再到吴淞前线来时，宋庆龄说：“不到前线来看望你们，我心里总是不踏实。现在看到你们了，我放心了。”

日本在战前曾狂妄叫嚣48小时可消灭十九路军，三日可封锁中国，但是英勇的十九路军却奋战了一月有余。宋庆龄高度赞扬他们明知众寡悬殊，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不愧为“军队之模范”，“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她痛斥国民党政府：“每以强弱成败，自文其不抵抗之过。不知唯真绝顶聪明之人，乃能从死中求生，险里求安。”

由于十九路军兵力损失很大，伤员很多，急需得到及时的治疗和护理。宋庆龄与何香凝、杨杏佛、黎照寰等商议，筹办一所具有一定规模和医疗力量的伤兵医院。他们挑选了交通大学最好的校舍执信西斋作伤兵医院。

在宋庆龄的感召下，国民伤兵医院汇集了一大批中西名医和护理人员，他们在医院各展所长，努力工作，并且不收分文报酬；《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和先施、永安、新新等各大百货公司的工商实业家也都慷慨解囊，捐钱捐物；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率领承华社全体艺员义务演出三场夜戏，将所得收入捐赠伤兵医院。由于社会



各界的大力支持,没几天工夫,一所设有300个床位、医疗器械设备完善的国民伤兵医院办成了。

宋庆龄不仅担任医院的理事,而且亲自长时间地在医院工作,经常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她深入病房巡视慰问,向伤病员嘘寒问暖,并亲手给伤病员送水喂药。为了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她捐赠了一批图书,购置了唱机和唱片,并针对伤病员大多是广东人的情况,特地选购了《小桃红》等广东乐曲送去,用家乡音乐来安抚伤病员肉体上的伤痛,激发他们的爱国热忱。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广大伤病员深受鼓舞,有的感动得热泪盈眶,纷纷发誓要早日重返前线,继续为国杀敌,再作贡献。

“亿万同胞声援你们”

“亿万同胞声援你们!”正如宋庆龄所激励的那样,十九路军将士在前线浴血杀敌,后方的上海人民也没有放弃战斗。沪西17家日商纱厂的4万名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大罢工。罢工工人抗日热情十分高涨,他们组成慰劳队、救护队、运输队、义勇军等,奔赴前线协同十九路军运输枪支弹药、修筑工事、抢救伤员,成为淞沪抗战中一支强大的后援力量。罢工工人还组织100

多个抗日宣传队、募捐队,向广大市民进行宣传和募捐活动。

宋庆龄坚决支持罢工工人的抗日斗争。当她得知工人们因坚持罢工,吃饭、住房都存在困难的消息后,就千方百计为罢工工人筹集了2万元经费,并冲破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与中共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她邀请“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党团书记到自己的寓所做客,亲手将这张2万元的支票交给了他,请党组织把钱转交给沪西罢工委员会,用以支援反日罢工的斗争,并嘱咐转达她对反日罢工工人的支持和敬意。





■ 1932年2月6日,宋庆龄在真如前线断垣边手持未爆炸的敌弹留影,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



■ 高尔基
(1868—1936)

原名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出身木匠家庭，曾流浪俄国各地，阅历丰富。1892年开始发表作品。1906年发表长篇小说《母亲》，被认为是他的第一部革命现实主义作品。其他重要作品有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等。1934年当选为苏联作家协会主席。



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组织为了更好地发动全市工人的抗日救国运动，并声援沪西工人反日大罢工，又成立了上海各业工人反日救国联合会。联合会成立后，立刻在全市各大报纸上刊登支持沪西工人反日罢工募捐的启事，呼吁社会各界支援。宋庆龄看到启事后，自己又带头捐助了1500多块大洋。之后，她还多次筹款，订购了沪西一家米号的粮食，作为专门发放给罢工工人的救济粮。在宋庆龄的带动下，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解囊赞助，甚至在前线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官兵也从民众捐助的慰劳金中提取部分款项支援反日罢工工人。沪西罢工委员会把社会各界的捐款和救济粮按月发给工人，并在石灰窑一带盖了一些简易草棚供无家可归的工人居住。

宋庆龄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不仅积极动员上海人民投入抗日救国斗争，而且努力争取国际声援。淞沪抗战爆发后，她就以国际反帝大同盟名义向全世界的进步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发出呼吁，呼吁他们主持正义，支持中国人民抗战。这个呼吁得到了热烈响应，国际反帝大同盟总部发表了一个极长的宣言，痛斥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号召各国反帝组织以各种方式支援中国人民。在来自国外的声援中，最令人瞩目的是苏联伟大的文学家高尔基。他在接到宋庆龄的电报后，立即在《消息报》上发表了《响应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呼吁》的文章，有力地喊出：“不准干涉中国！”

轰轰烈烈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坚持了33天，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扬眉吐气的一章。宋庆龄当年在前线巡视慰问时，手捧十九路军战士献给她的敌军炮弹，站在战区断垣残壁前的留影，也将永远载入中华民族反击侵略者的史册。

10 子弹何所惧

1933年6月16日,宋庆龄像往常一样在家里接待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6月的上海已有了些许暑气,但杨杏佛怀揣的却是冰冷的寒意。未及坐定,他便从包里拿出一叠信件,这是他近几个星期以来收到的恐吓信,信中还夹着子弹。这些恐吓信中,有几封把宋庆龄的名字也列入了恐吓名单。宋庆龄轻蔑地朝这些信件看了一眼,平静地告诉杨杏佛,自己也接到过许多类似的恐吓信,只是信中的话语更加下流。是啊,对于宋庆龄来说,敌人的威胁和恐吓已见得多了,这些小小的子弹算得了什么!

革命大旗护英华

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国民党政府一步步地建立起法西斯的独裁统治。中华大地监狱密布,特务横行。面对日趋严重的白色恐怖,宋庆龄开始酝酿联合全国进步力量建立营救组织,专门保护、营救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争取公民的基本权利。1932年11月,在营救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期间,宋庆龄向报界发表声明,准备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资格,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处理政治犯事件。12月,宋庆龄与蔡元培、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下简称“同盟”)。同盟以唤起民众努力于民权之保障为宗旨,以争取释放政治犯,给予政治犯法律援助,支援为争取结社、集会、言论、出版自由等民主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为目的。同盟选举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分别担任正副主席和总干事。

12月18日,同盟在《申报》发表宣言,正式宣

■ 杨杏佛
(1894—1933)

名铨,字杏佛,江西清江(今樟树)人。1911年加入同盟会。次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不久赴美国留学,参与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1924年任孙中山秘书,孙中山逝世后任孙中山治丧筹备处总干事。1927年任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大学院改为中央研究院后,任总干事。1932年底与宋庆龄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总干事,积极协助宋庆龄为营救政治犯、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1933年6月18日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身亡。





告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向社会公布同盟的宗旨和目的。

12月30日下午，蔡元培在上海华安大厦主持召开记者招待会，争取新闻界对同盟的支持。宋庆龄因病未能到会，她请蔡元培代为宣读为招待会发表的书面讲话，希望新闻界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肩站在一起，共负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使命。当时，有30多名中外记者参加了招待会，其中就有以后担任同盟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中国论坛》记者伊罗生和《生活》周刊记者邹韬奋。不久，上海、北平相继成立了同盟的分会。

就在同盟筹备期间，传来了北京大学教授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等因宣讲马克思主义和抗日救亡思想，被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的消息。宋庆龄闻知后，立即与蔡元培、杨杏佛等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致蒋介石、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的代电，谴责当局“摧残法治，蹂躏民权”，并要求他们释放爱国师生。在许德珩等被捕前后，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会同警探拘捕了大批教授、学生。此后，宋庆龄又以同盟的名义，数次致电北平当局，要求释放被捕的师生。由于宋庆龄领导的营救工作和北平各校被捕师生后援会的斗争，大部分被捕师生陆续获释，营救取得了胜利。

1933年3月24日和2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陈赓、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局书记罗登贤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等因叛徒出卖，相继遭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拘捕。

宋庆龄得知陈赓、罗登贤、廖承志等人被捕后，立即主持召开了同盟中央临时执委会议，讨论营救方案，并与蔡元培一起出面委托上海著名律师吴凯声等为被捕者辩护，同盟并发表宣言以唤起国人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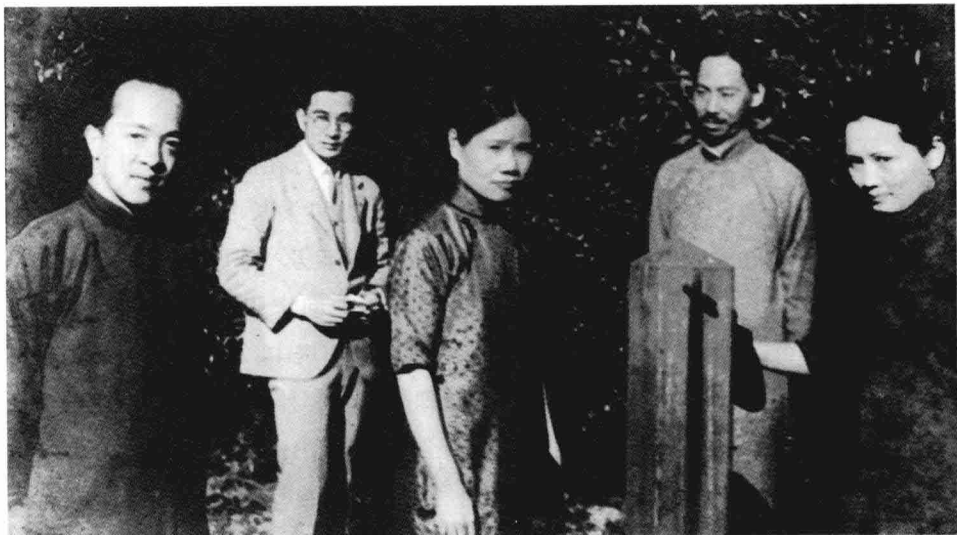
3月31日，上海第二特区法院举行两场公审，“审判”陈赓、罗登贤、廖承志等五人。国民党的法庭警卫森严，座无虚席，从上海各个地方赶来的工人挤满

■ 蔡元培
(1868—1940)

字鹤卿，号子民，浙江绍兴人。清光绪年间进士。1904年组织光复会，任会长，进行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次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总长。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1927年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1932年底与宋庆龄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1937年冬移居香港。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了法庭内外。然而，这是一场强词夺理、愚弄民众的走过场的“审判”。尽管法官和所谓的原告、证人都被被告和律师驳得哑口无言，根据租界法律应当予以释放，但是，法院还是判决由工部局巡捕房把他们移交给国民党当局。经同盟和何香凝的积极营救，廖承志于当晚被保释出狱，其余四人则于4月1日被押解南京，关押于军事监狱。



■ 1933年，宋庆龄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委员杨杏佛（右二）、胡愈之（左一）、林语堂（左二）及秘书黎沛华（中）合影

就在这出审判丑剧上演的第二天，宋庆龄怀着满腔的愤怒发表宣言，无情揭露国民党当局勾结帝国主义所犯下的无耻罪行：这场丑剧“正是中国政府与帝国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压迫中国人民的反帝抗日战士的鲜明例证”。她称赞被捕者“全都是中国人民应该为之骄傲的典型”，号召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

接着，宋庆龄又与蔡元培联名致电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司法行政部部长罗文干，要求将陈赓、罗登贤等四人由正式法庭审判，勿用军法刑讯。

4月4日晚，隆隆的火车疾驰在漆黑的沪宁铁路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与总干事杨杏佛、法律委员沈钧儒、外籍执行委员伊罗生以及义务法律顾问吴凯声等作为营救政治犯委员会推举的代表，星夜赶赴南京营救陈赓、罗登贤等四位革命者。

翌日凌晨，宋庆龄一行到达南京，下榻扬子饭店。孙夫人的到来令汪精卫、罗文干十分头疼，但也只能硬着头皮来到扬子饭店面见宋庆龄。宋庆龄当即代表同盟，书面提出了释放一切政治犯、废止滥刑、改善狱中待遇、严惩狱吏的不法行为等四项要求，并特别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剿共”，一致抗日。

当天晚上，宋庆龄和杨杏佛一行踏着浓重的夜幕来到了阴森恐怖的南京卫戍司令部的监狱，探望囚禁中的陈赓、罗登贤等四人。

为应付宋庆龄一行的探监，国民党当局已先行将陈赓、罗登贤等人换到了较好的牢房，还发放了新囚衣。尽管如此，仍掩盖不了国民党监狱的残酷和血腥。监狱



宋庆龄



■ 宋庆龄担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时使用的印章

中警卫森严，卫兵枪上的刺刀在幽暗的灯下闪着惨白的光，阴森恐怖的监狱中到处弥漫着霉臭的气味。

宋庆龄一行在武装军官和卫士的监视下，走进监狱漫长曲折的甬道，来到关押革命者的牢房。陈赓被单独关押在一间牢房里，他向宋庆龄等痛陈所受的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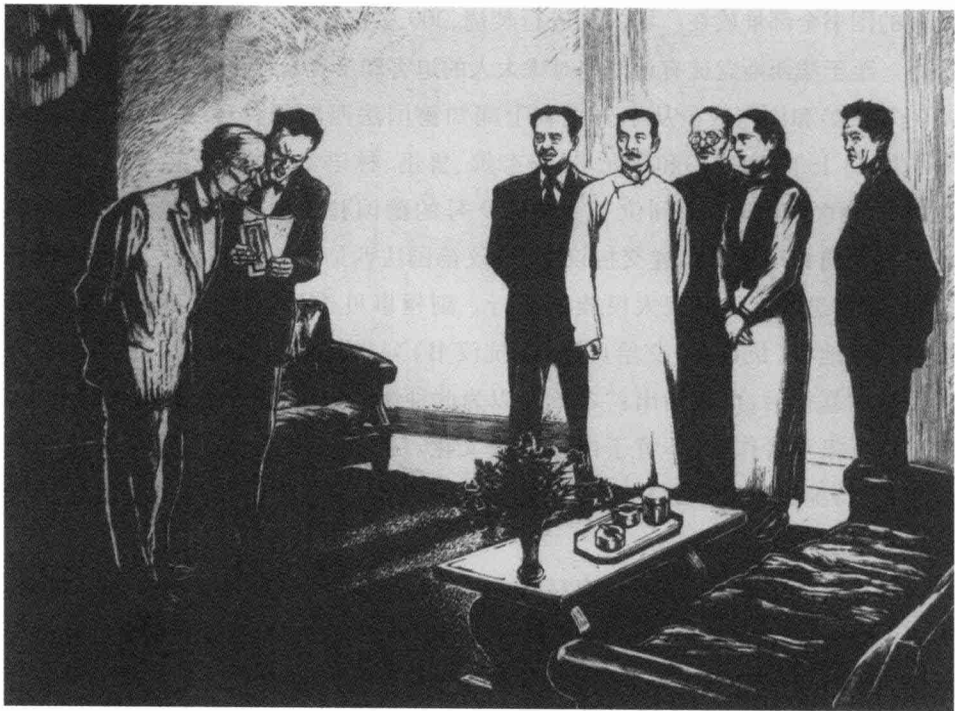
刑拷打和恶劣待遇，揭露监狱的黑暗状况。在昏暗的牢房中，宋庆龄趁机向陈赓传递了一张中共托交给他的字条。宋庆龄等随即探视了邻监的谭国辅，这位只有十几岁的勇敢的姑娘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同盟会著名活动家谭人凤的孙女，当时伪称陈赓的妹妹，化名陈藻英。她曾遭到英捕房和公安局的殴打，但她坚定地向大家表示她不怕。随后，宋庆龄等来到关押罗登贤和余文化的牢房，伤痕累累、血迹斑斑的罗登贤挺直地站立起来，坚定地对大家说：“我始终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始终要为无产阶级利益奋斗。我愿为这一斗争贡献我的生命，什么也不能动摇我。”

见到这些革命者在如此残酷的环境中受到非人的折磨和摧残后仍表现出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宋庆龄十分感动，更加深了她对国民党当局反动行径的愤慨。回沪后，她立即以同盟的名义再次致电汪精卫、罗文干，要求将陈赓、罗登贤等人即日移交正式法庭依法办理。为了营救陈赓，宋庆龄又一次赶到南京，当面斥责蒋介石：“陈赓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东江一役一直跟着你打仗，你打了败仗还是陈赓救了你一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现在你要杀他，简直是忘恩负义。你天天说的礼义廉耻哪里去了？”蒋介石被骂得俯首无言。不久，经宋庆龄和地下党营救，陈赓等终于逃出虎口。但是，罗登贤却未能逃离魔窟，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

紧接着，5月的上海又发生了女作家丁玲和哲学家潘梓年失踪的事件。不久，同盟收到署名蔡飞的一封信，信中报告丁、潘被捕及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左翼作家应修人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壮烈牺牲的经过。同盟立即将该信予以公开发表，强烈抗议特务杀害应修人的暴行。接着成立了“丁潘保障委员会”，积极营救丁玲、潘梓年。

抗议德国法西斯

5月，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还进行了一次对德国法西斯的特殊斗争。



■ 1933年5月13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人同往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抗议书,谴责德国法西斯对德国进步人士和犹太人的迫害

1932年7月,纳粹党在选举中一跃成为国会的第一大党。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登上了德国总理的宝座。希特勒法西斯政党一上台,就制造了耸人听闻的“国会纵火案”,向共产党开刀,着手解散其他党派,摧毁了所有其他政党。在确立法西斯一党专政的同时,又取消了其他各种民主自由权利,并进行残酷的种族和政治清洗,实施恐怖统治。

仅几个月的时间,希特勒法西斯政府就逮捕了数万工人、工人阶级领袖和知识分子,并用狂暴的手段进行野蛮的摧残:被捕者有的被挖掉了眼睛,有的被拔掉头发,烧毁手脚;有的被敲掉牙齿,敲碎头颅;有的被折断肢体……在纳粹集中营,人们在死亡的威迫下,被迫互相鞭打以至双方失去知觉。被杀害后的尸体则被抛入河中、湖中或丢弃在森林里。德国进步的学术与文化生活也同样遭到空前的摧残。伟大的科学家、作家如爱因斯坦、玛格纳斯·希尔什哈菲德、里昂·佛希特万格、托马斯·曼等都遭到了迫害和放逐。大艺术家马克思·里伯曼、凯绥·柯勒惠支、波卢诺·瓦尔特等被剥夺了任何工作的机会,受到迫害,作品都被糟蹋或焚毁。《世界论坛报》编辑奥西茨基被枪托敲掉了牙,小说家汉斯·鲍尔被迫吞下他自己的手稿。5月10日,柏林洪堡大学的图书馆被洗劫一空,法西斯党徒们将这所大学



所藏的图书全部堆放在广场中央进行焚烧,200多位作家的2万多册图书被付之一炬。至于法西斯党徒有计划地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反犹暴行更是骇人听闻。

宋庆龄和同盟成员从中外报刊上闻知德国法西斯的种种暴行,极为愤慨。5月13日上午,宋庆龄和蔡元培、杨杏佛、鲁迅、林语堂、史沫特莱、伊罗生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员来到位于黄浦路9号的德国驻上海领事馆。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向德国领事馆递交抗议书,抗议德国法西斯政府摧残民主自由和世界文明,迫害进步人民和犹太民族的暴行。副领事贝连出面接见宋庆龄等人,宋庆龄郑重地将《抗议书》交给贝连。《抗议书》列举德国法西斯所犯下的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后,严正指出:“本同盟以为此种惨无人道之行为,不特蹂躏人权,且压迫无辜学者作家,不啻于摧残德国文化。兹为人道起见,为社会文化之进步起见,特提出最严重之抗议。”贝连表示将《抗议书》代为传递给德国驻华公使陶德曼。

同一天,宋庆龄还发表《谴责对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民的迫害》一文,指出:为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为了努力协助保持人类和各种运动所得到的社会与文化的成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坚决地抗议德国法西斯的罪行。

尽管陶德曼把抗议书直接寄还给了宋庆龄,拒绝将《抗议书》转给德国法西斯政府,但通过各种媒体的传播,同盟这一举世瞩目的抗议活动仍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上海《申报》、《中国论坛》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等纷纷刊登了宋庆龄的文章、《抗议书》内容,报道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抗议活动。

居住在上海的犹太人对此深为感动。上海犹太人协会致函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表示感谢;上海犹太人报纸《以色列信使报》主编埃兹拉也特地致函宋庆龄表示感谢,他说:“亲爱的夫人:我冒昧地给您写这封信,是为了对你们代表身处纳粹德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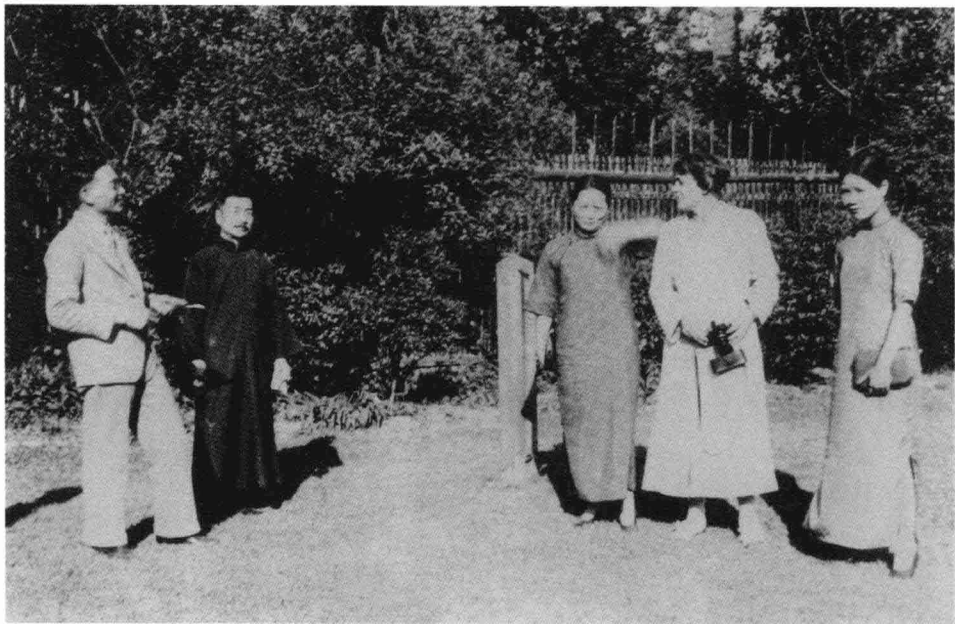
■ 国会纵火案

是德国纳粹党策划的焚烧柏林国会大厦,藉以陷害德国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力量的阴谋事件。1933年2月27日晚,希特勒亲信指使冲锋队员潜入国会大厦纵火。事后,希特勒立即宣称这是共产党发动革命的信号,并颁布紧急法令,在全国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进行野蛮镇压。德国共产党领袖恩斯特·台尔曼和流亡德国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被捕。之后,社会民主党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也被迫“自动”解散。德国由此进入了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最黑暗时期。



骇人恐怖统治下的被压迫民族所采取的行动表示感谢。”“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其谴责暴力和压迫的无畏方式充分显示了其存在,我们相信,整个文明世界会对您领导下所采取的正告侵略者‘你们是人’这一举动拍手称赞。”“我希望您勇敢的抗议能够唤醒德国冬眠的灵魂……”

令人鼓舞的是,宋庆龄对法西斯德国暴行的抗议也传到了德国,莱比锡的一份



■ 1933年,宋庆龄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委员史沫特莱(右二)、鲁迅(左二)、林语堂(左一)及秘书黎沛华(右一)合影

地下报纸刊登了宋庆龄谴责希特勒屠杀德国工人阶级和进步人士的抗议。1952年,宋庆龄赴维也纳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时,一位与会的西德青年兴奋地将有宋庆龄签名的照片寄给了妈妈。他的少年时光是在法西斯集中营与妈妈一起度过的。他妈妈得到当年那份莱比锡地下报纸后便一直珍藏着,并要他代表她向宋庆龄致敬。

面对威吓斗志弥坚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在白色恐怖下营救了大批革命者和反蒋爱国人士,同时还开展了抗议德国法西斯暴行、抗议顾祝同杀害《江声报》记者刘煜生、继续营救国际友好人士牛兰夫妇、调查监狱状况争取改善政治犯待遇等多项活动。这些活动声势浩大,使反动派为之恐慌。蒋介石因而对宋庆龄等同盟领导人怀恨在心,意欲除之而后快。

蒋介石虽然对宋庆龄恨之人骨,但是直接对宋庆龄下毒手还顾忌尚多,于是决定杀掉一个“适当”的人来对宋庆龄进行威吓。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一生以宣传科学和争取民主为己任。1931年6月,他曾随蒋介石赴江西实地调查“赤祸”,因客观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现



■ 1933年2月1日，宋庆龄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抗议顾祝同杀害《江声报》记者刘煜生举行的集会上发言

状和红军的真相，而遭到蒋介石的忌恨。1933年6月18日，当杨杏佛与其子小佛乘车从中央研究院外出时，突然遭到早已埋伏着的蓝衣社特务的袭击。杨杏佛身中数弹遇难，小佛因受父亲的掩护，仅腿部中了一弹而幸免于难。

宋庆龄闻知杨杏佛遇害，悲愤异常。和反动派的预料相反，宋庆龄并没有被吓倒，却在悲愤中，面对着死亡的威吓，更加坚毅地继续战斗。第二天她就杨杏佛被害发表声明指出：杨杏佛“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

6月20日下午，杨杏佛的成殓仪式在万国殡仪馆举行。当时，蓝衣社特务传出风声，扬言要在此时对同盟的其他成员下毒手，但宋庆龄等同盟领导并未被吓退，他们毅然来到万国殡仪馆吊唁。宋庆龄坚定地向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杨杏佛之死决不会影响运动的进展，相反地此事将激励同盟加倍努力工作。”

杨杏佛惨遭不幸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受到巨大影响，被迫解散。而宋庆龄仍然继续战斗，如夜幕中一颗闪耀的明星，以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精神的美，激励无数革命者勇往直前。



■ 1933年2月17日,宋庆龄在上海寓所会见并宴请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



17 一次成功的秘密会议

1933年9月28日,住在上海沪东汇山路85号的一家人家正在忙着筹备“婚事”。当送陪嫁的车停在门口后,“新郎”和他的“哥哥”陆续从车上搬下两只大樟木箱和一些杂物。“兄弟俩”打开箱子后,满意地看到了“新娘”的嫁妆——500只面包和大量汽水、罐头、水果。

原来,正在忙着办“喜事”的这一家人其实是一个临时组织的“家庭”,他们所忙的“喜事”实际上是即将在这里召开的“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反帝反战会议”(旧称“世界反帝国主义大同盟远东反帝非战会议”,简称“上海远东反战会议”),“新娘”的嫁妆是为大会所需而特购的。

白色恐怖下的紧张筹备

追溯“上海远东反战会议”召开的背景,还要从六年前说起。



■ 上海远东反战会议会址——今霍山路85号

1927年12月,“反对帝国主义及殖民压迫斗争大同盟”(简称“反帝大同盟”)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成立,推宋庆龄为名誉主席。宋庆龄是这一同盟的发起人之一。

1932年8月,“反帝大同盟”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举行“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成立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宋庆龄再次被推选为名誉主席。由于“李顿调查团”偏袒日本,1932年底,“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专门讨论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问题,决定派出该委员会副主席巴比塞率领一个代



■ 1933年8月18日,宋庆龄在秘书黎沛华的陪同下亲临码头迎接参加会议的外国代表

代表团,重新来调查日本侵略东北的罪证;同时决定要在日本东京召开远东反战会议,并委任宋庆龄为这次大会筹备委员会主席。

日本共产党囿于形势所迫,表示无法承办会议,于是远东反战会议的召开地点移往上海。

中共江苏省委经与宋庆龄商量决定:对外成立公开的“上海各界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及远东反战大会筹备委员会”,宋庆龄任主席,公开活动由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进行;具体工作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冯雪峰主持。

6月18日,“上海各界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及远东反战大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宋庆龄被推选担任筹备委员会主席。7月中旬,宋庆龄以筹备会主席名义,亲自签名发出给上海各团体的委托书,责成他们积极进行远东反战大会的筹备工作。

远东反战会议即将在上海召开的消息引起了国民党政权的极度不满,他们不仅公然命令各报不准刊载有关这次会议的新闻,而且指派蓝衣社特务进行暗中破坏和秘密绑架。在代表团即将来临的关键时刻,他们在8月16日、17日逮捕了一大批参加筹备工作的骨干,其中包括筹备会中共核心小组的张凌清和刘芝明。

8月18日上午,宋庆龄在秘书黎沛华的陪同下,毅然来到上海招商局中栈码



头,和二三百名工人、学生以及其他群众代表一起,欢迎国际代表团的到来。群众高举欢迎代表团的横幅,手挥小旗,燃放鞭炮,并散发了宋庆龄的声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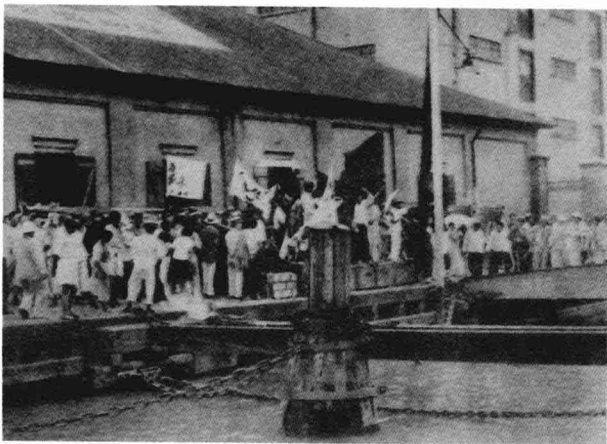
上午10点40分,代表团乘坐的法国客轮“安得莱朋”号停靠在招商局中栈码头,宋庆龄随即上船欢迎四位来自世界反战委员会的代表。四位代表分别是英国勋爵、工党议员、世界知名和平人士马莱,法国共产党领导人、法共机关报《人道报》主笔伐扬·古久烈,比利时社会党人马尔度,以及英国的哈弥尔敦。在群众的护送下,代表团顺利地住进了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

世界反战委员会代表团抵达上海后,当局加紧了对会议的破坏活动。从8月18日国际代表团抵沪至9月18日,参加反战大会筹备工作的群众有近50人被捕。上海反帝大同盟的负责人刘芝明被捕后,接替他职务的楼适夷也于9月16日下午5点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租界内的外籍侦探和国民党特务不仅对四名国际代表进行跟踪盯梢,甚至连宋庆龄的寓所也在严密的监控之下。

日本帝国主义也以这次会议是“共产党会议”为借口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当局施加压力,禁止远东反战会议在租界内举行。

于是,原定公开举行的会议只得转入地下进行。在宋庆龄及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下,会议筹备工作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紧锣密鼓地加紧进行。对外则宣称马莱等人“即将回国”、“放弃开会”、“计划完全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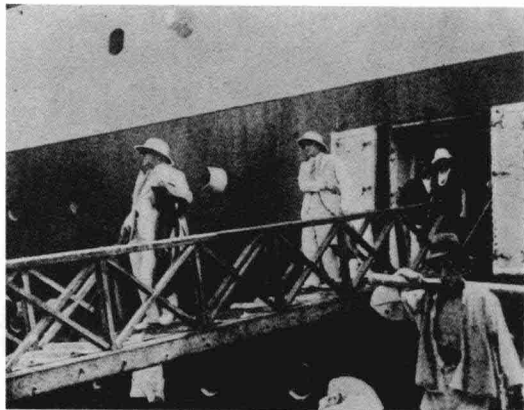
为了寻找一个安全的开会地点,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费尽了心机。经过多方努力和筹划,他们最终选定沪东汇山路85号这幢新建的三层红砖洋房。汇山路地处上海偏远地区,十分僻静,而85号毗邻公共租界巡捕房侦探头目的寓



所,选择它作为会场,看似唐突、鲁莽,实际上这是十分巧妙的安排,因为“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巡捕房绝对不会料到这么重要的会议会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召开。

中共江苏省委还特意在这幢房子里安排了“祖孙三代人”,并上演了一出筹办婚事的“喜剧”。他们借

口学校开运动会购买了500只面包和大量汽水、罐头、水果,并以车送“嫁妆”的形式秘密地运进了反战会议的会场。



■ 参加会议的外国代表正在登岸

在鹰犬鼻尖下的战斗

所有的一切都经过了精心的策划和周密的安排。

9月29日晚上,60名分散隐蔽各处的国内代表分批进入楼内隐蔽起来,他们在地板上坐着或者躺着,鸦雀无声地等待着。

9月30日凌晨1时,四名国际代表马莱、伐扬·古久烈、马尔度和哈弥尔敦乘坐著名作家夏衍从明星电影公司借来的汽车悄然来到这座楼房,他们脱掉皮鞋,悄无声息地上了楼。

拂晓时分,这里又来了一位身着黑色旗袍、端庄秀丽、神情凝重的中年妇女,她正是宋庆龄。宋庆龄的到来也并非一帆风顺,她一离开家门就被狡猾的特务盯上了,兜了好几个圈子才甩掉了特务的跟踪,及时赶到了会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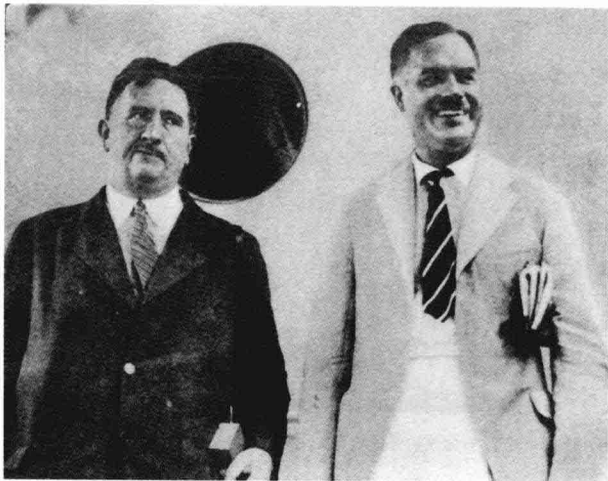
宋庆龄一到,会议即在这座小洋楼的四层阁里召开了。

会场外,一小队秘密纠察队员骑着自行车在紧张地来回巡逻。会场内,发言和讨论都在低声耳语中进行。四位国际代表和宋庆龄坐在木箱上,其余的代表均席地而坐。会场唯一的家具是一张供秘书用的小桌子。

9月的上海,暑气未消,天气并不凉爽,由于房间内人数众多,再加上不能开窗,屋内空气污浊、略显燥热,但与与会者的热情并未因此稍减,革命的激情压倒了一切。

大会推举宋庆龄、马莱、古久烈、马尔度及两名东北义勇军代表、一名工人代表、一名苏区代表、一名东北沦陷区代表共九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还推举了毛泽东、朱德、鲁迅、高尔基、罗曼·罗兰、巴比塞、伏罗希洛夫、季米特洛夫、片山潜、台尔曼等为名誉主席团成员。宋庆龄担任会议的执行主席,负责整个会议的进程。她还兼任翻译,帮忙把中国代表的发言翻译成英语和法语给外国代表们听。

大会首先由宋庆龄致开幕词,然后马莱报告了各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情形。随后,宋庆龄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报告,她指出:“我们在



■ 参加会议的英国代表马莱和比利时代表马尔度

进行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同时,必须为建立真正的中国政府而斗争。这样的政府只能由工人、农民自己来组织。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给中国劳动人民指示了出路。”“虽然出席这个会议的代表人数为了明显的理由不得 不受限制,可是这个较小的集会仍然充分地代表劳苦大众的利益,代表着他们抗议

日本以及其他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的屠杀战争。”

其他代表相继发言后,大会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法西斯蒂的决议及宣言》、《反对白色恐怖的决议》、《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红军的抗议书》以及《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苏区红军的五次“围剿”的抗议书》等文件和决议。会议最后成立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中国分会”(旧称“远东反帝反战同盟中国分盟”),宋庆龄被选为主席。

傍晚,会议圆满结束。宋庆龄考虑到与会代表的安全问题,一直等到所有人都散尽了才离开。

第二天,闻讯而来的敌人在阁楼里只发现了几个便桶,在附近街头又发现了庆祝会议胜利召开的标语和传单,直到这时他们才明白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次会议胜利召开的消息,通过上海的各大报纸传递给了人民,对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



■ 1933年,宋庆龄在上海留影



18 救国人狱

1937年的盛夏,酷热的苏州迎来了12位特殊的客人。他们携带简单的行李,出了火车站便直奔位于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向法官自请入狱,要求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12人中领头的就是宋庆龄。

“七君子”是谁?为什么爱国要服罪?话题还要从1935年讲起。

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1935年,日本为了巩固其在中国东北的统治,并进一步加紧对华侵略,不断在我华北挑起事端,逼迫南京政府签订“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使我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分丧失。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8月1日,在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停止内战,抗日救国。

《八一宣言》发表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宋庆龄便是这高潮的推动者之一。

1935年末,情绪激愤的北平爱国学生发起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运动爆发前,北平的学生们在斯诺的帮助下,给宋庆龄写过一封信,陈述他们的爱国热情和对时局的苦闷,向宋庆龄请教应该怎么办?宋庆龄接信后随即复函,赞扬北平学生的爱国精神,斥责蒋介石的卖国行为,并教导处在北国前线的青年:“你们要有所表示,你们要行动起来!”



■ 1936年10月22日,宋庆龄在鲁迅葬仪上发表演说

“一二·九”运动在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热潮,各地的爱国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宋庆龄和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人的号召和领导下,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章程》,宣布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是以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为宗旨。

宋庆龄因生病住院未到会。她被大会推选为执行委员。6月5日出院后,得知救国会不为当局承认,她立即致函救国会领袖,谴责国民党当局,明确表示充分支持救国会的纲领和宣言。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抗日救国的阵线已经扩大到全国各地各阶层。救国会做了大量抗日救国的宣传,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同时也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动嘴脸。救国会激起了各界人士的爱国热忱,甚至使国民党内部



宋慶齡

也发生了分裂,以蔡廷锴率领的十九路军为代表的爱国将士们纷纷宣布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奋起抗日。

国民党当局对此十分恐慌。9月中旬,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发布所谓“严禁藉名募捐”通令,称救国会为“非法团体”和“反动分子集团”,诬蔑救国会为支援绥远抗战而进行的募捐活动是借救国为名敛钱肥己的违法行为。10月18日,宋庆龄遂与马相伯、何香凝等联名发表启事,痛斥市党部诬蔑救国会,要求他们立即予以更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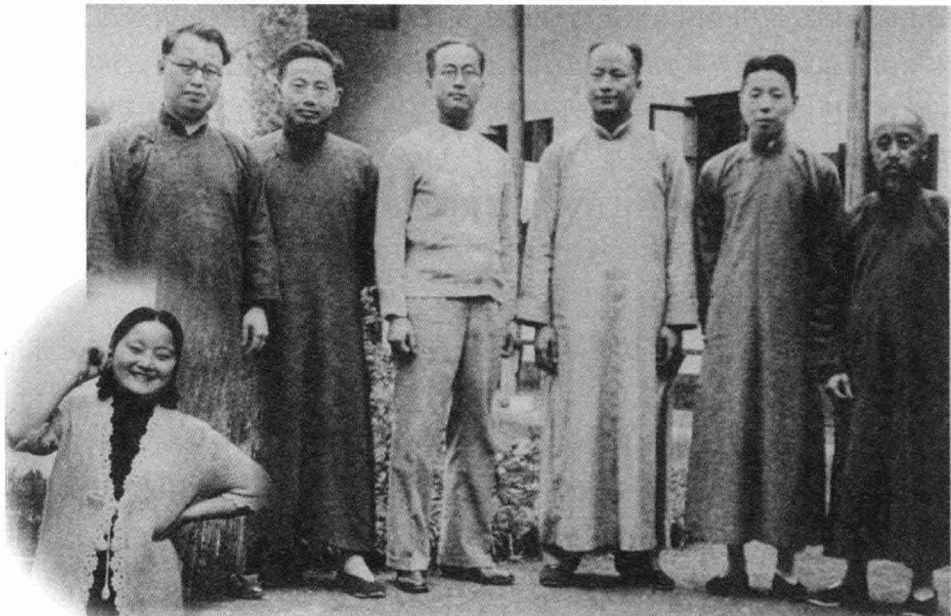
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宋庆龄与救国会一起操办了鲁迅的丧事。她在鲁迅葬仪上发表演说,号召大家继承鲁迅先生的精神,打倒帝国主义,完成民族解放,使鲁迅葬礼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新高潮。

同服爱国罪

救国会的抗日爱国举动使国民党当局恼怒,更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不容,他们向上海市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逮捕沈钧儒等人。

11月22日夜半,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公安局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法租界公董局巡捕房的协助下,将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七位救国会领袖逮捕入狱,史称“七君子”事件。





■ 出狱后的“七君子”（左起：史良、王造时、李公朴、邹韬奋、章乃器、沙千里、沈钧儒）

宋庆龄得知后非常气愤，立即组织营救。她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请其“主张公道”，迅电蒋介石释放“七君子”。

11月26日，宋庆龄又以救国会执行委员的名义发表《为沈钧儒等七人被捕声明》：“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经被捕了，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倒不了的。让日本军阀们当心些吧！他们虽可以指使七位领袖的被捕，但还有中国的四万万同胞在这里哩！”

在宋庆龄以及何香凝、马相伯等人的带动下，国内声援“七君子”的队伍不断壮大，包括冯玉祥、于右任、张学良等在内的国民党上层人士也纷纷加入营救“七君子”的行列。在国际方面，一些世界性的和平组织和国际知名人士也都给予极大的关注，致电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沈钧儒等人。

为了营救“七君子”，把受到威胁的抗日救亡运动进行下去，宋庆龄再次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主动提出各方把捐款和声援函电直接寄给她。她的寓所“上海莫利爱路29号”已经成为《救亡情报》的公开通讯地址。她还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把事实的真相告诉国外的朋友们，向全世界呼吁，寻求道义上的支援。

6月11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始审讯“七君子”，企图不经调查便草率定案。25日，宋庆龄领衔和何香凝等16人具状苏州高等法院，表示如果爱国有罪，则愿和沈等同服爱国罪。具状呈递后，宋庆龄等联名发表《为救国人狱运动向上海新闻界



宋庆龄

的书面谈话》，说明爱国入狱运动的由来、步骤和重大意义，号召扩大运动。同时，宋庆龄又和何香凝等联名发表《救国人狱宣言》，要求释放“七君子”，否则愿被一并收押。他们阐明：“我们认为救国人狱运动是有重大意义的，倒并不是仅仅为了营救七位先生。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和平合法的救国运动的方式，是最适合目前的需要的。”“现在我们宁愿牺牲自己，来促成团结抗日与救国自由。”而且“大家都起来公开参加救国工作，中国自然就有救了”，所以“我们相信，救国人狱运动是目前最适合的一种救国方式”。

等了十多天，江苏高等法院毫无动静。于是，宋庆龄等遵照诺言，准备赴苏州自请入狱。

7月的上海，酷日当空，闷热难耐。5日凌晨，宋庆龄忍受着胃病的痛苦，与胡愈之、胡子婴等一行12人各带简单行装，坐火车赴苏州。行前，她对关心她的病体而劝阻她的人说：“别人因救国而受罪，我这小小胃病算得了什么！为了争取民族解放，救国自由，什么力量都阻止不了我！”

为了避免被国民党特务发觉，宋庆龄等同行的几个人并没有汇合，而是各自前往上海火车站，分头上火车。火车到达苏州站后，宋庆龄率领胡愈之、胡子婴等一



■ 1937年8月，“七君子”在南京与马相伯、杜重远合影（前排左起：沙千里、史良、马相伯，后排左起：杜重远、章乃器、邹韬奋、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

行 12 人马不停蹄地赶往江苏高等法院。

法院院长得知孙夫人来了，慌了手脚，不敢出来。宋庆龄指责道：“我有事要找院长，他为什么不见？就是蒋委员长，我们要见也是可以的，他都要亲自出来，院长为什么不出来？”在宋庆龄等必须面见的坚持下，法院无可奈何地要求宋庆龄等推出代表同他们谈判。宋庆龄与胡愈之等被推为代表，同院长谈判。

上午 9 时许，院长终于带着首席检察官露面了。宋庆龄质问院长：“如果沈先生等人因为主张抗日救国要入狱，那我们十余人也应共同负责，一同坐牢；如果爱国无罪，则应同享自由，立即释放他们



■ 20 世纪 30 年代的宋庆龄

七位。”院长无言以对，搪塞说沈钧儒等人的案子正在审理中，困难很多，没办法立刻解决，对此深表遗憾，又推说苏州天气炎热，请孙夫人等早点回上海休息。宋庆龄严肃地打断了他：“我们来苏州不是乘凉的，我们来此的目的，非仅为了营救沈钧儒等七位先生，同时也为遵守法律并争取爱国无罪！”首席检察官不敢理论，竟径自退出，宋庆龄等人不依不饶，坚持要在院内彻夜守候，必须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双方相持良久，直至傍晚，院方终于表示，救国会以救国为目的，自然是无罪的，一旦宋庆龄等人提出证据，他们就立即开始侦查，并允许他们探视“七君子”。

宋庆龄等来到女牢探视时，同史良紧紧拥抱。史良不禁热泪盈眶。宋庆龄给



大家带去了水果和食品，并再三安慰和鼓励大家，她说：“民族危亡，爱国无罪，全中国人民都在支持你们，你们是一定能够获得自由的。”

次日，在上海，宋庆龄等人以16位发起人的名义致电林森、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孙科、戴传贤、居正、于右任等国民党党国要人，对江苏高等法院的傲慢无理态度表示愤慨，并表明自己的决心：“庆龄等及全国救亡运动中人，断不敢坐视沈等受困而可以独享自由。”要求他们迅速主持公道，勿失全国志士之心。

宋庆龄等人为救国要求入狱的消息迅速在苏州传开。效法宋庆龄等，姜源、程达、周尊辉等34人也于7月5日当日到苏州高等法院递呈状要求入狱同服爱国罪。许多大学教授、大学生、职员以至工商界人士，都纷纷效仿宋庆龄等人，要求同服爱国罪。救国会还在上海发起了一个万人参与的大型签名运动，各界群众纷起响应。至此，全国掀起了一个救国入狱运动的高潮。

由于这场运动本身的和平合法性，又是孙夫人宋庆龄发起的，国民党当局无可奈何，也不敢镇压，在各方进步舆论的压力之下，他们不敢贸然给“七君子”定罪。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由于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已经形成，国民党当局对于“七君子”的案件也难以再继续审理，终于在7月31日无条件释放七人。

爱国无罪由历史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宋庆龄所发起的救国入狱运动也成为了中国现代革命斗争史上的光辉篇章！

19 毛泽东来信

1936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致函宋庆龄，请她为受共产党委派与国民党谈判的潘汉年提供帮助。

拥护《抗日救国六大纲领》

1933年5月31日，日本逼迫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使中国政府在实际上承认了其对中国东北及热河的占领。10月，蒋介石向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但是，《塘沽协定》的签订，并没有遏制日本的侵略野心，他们继续向平津推进。10月2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信给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提出了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纲领呼吁立刻停止一切内战，一致对日作战；呼吁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号召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

为了发表六大纲领，共产国际派代表尤金·丹尼斯来华指导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尤金与宋庆龄多次长时间地共进午餐，共同探讨如何解决中国目前存在的危机，尤金十分钦佩宋庆龄对时局的看法。

1934年4月20日午夜，中共地下党组织召集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议，宋庆龄参加了会议，并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会长的身份，以《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为题，宣布了六大纲领。

不久，瑞金党中央指示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与宋庆龄接触，向她汇报江西苏

■《塘沽协定》

1933年3月，日本侵略军占领热河，并大举进攻长城各口，先后占领察哈尔省及河北省北部

大部分土地，进逼北平、天津。5月22日，在蒋介石、汪精卫授意下，时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的何应钦指派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为中方首席代表，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谈判。31日，中国代表同意了日方提出的停战协定草案，一字不改，正式签署了《塘沽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出日方规定的防线以外，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 董健吾与长子董云飞合影

基本纲领》，结成反日统一战线，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六大纲领的公布为中国共产党制定联蒋抗日的方针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区的困难形势，请求她在非共区内发起运动，以减轻被围攻的苏区的压力。是年夏，盛忠亮约请宋庆龄在上海法租界一公寓大楼中会谈了近五个小时，宋庆龄对苏区遭到的浩劫表示深切关怀，答应全力帮助中国共产党。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在宋庆龄的威望感召下，有 1779 位各界人士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上签名。6 月 20 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委会公开发表了六大纲领，并同时发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为对日作战宣言》，呼吁全国人民不分民族、宗教、党派，一致拥护《中国人民对日作战

委托董健吾赴陕北

1935 年，中国共产党顺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制定了反蒋抗日的方针，发表了《八一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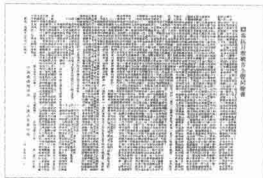
在形势的逼迫下，蒋介石同样也在考虑制定新的对日方针。共产国际七大的召开让蒋介石看到了未来可以联合的抗日力量，他开始酝酿联苏抗日的计划，希望能把共产党和红军纳入南京政府的架构之下，使之不再对其政权构成威胁。

1935 年底至 1936 年初，蒋介石通过各种渠道开始寻找与共产党接触的途径，宋庆龄便是其中之一。

1936 年 1 月，宋庆龄受宋子文之托，找到董健吾，委托他赴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要求与中

■ 《八一宣言》

即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发表的宣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又继续侵略华北，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1935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于 8 月 1 日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公布，通称《八一宣言》。宣言要求各界立即进行协商、谈判，召集各界的代表大会，讨论抗日救国的实际工作，并表示中国共产党愿作发起人。《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基本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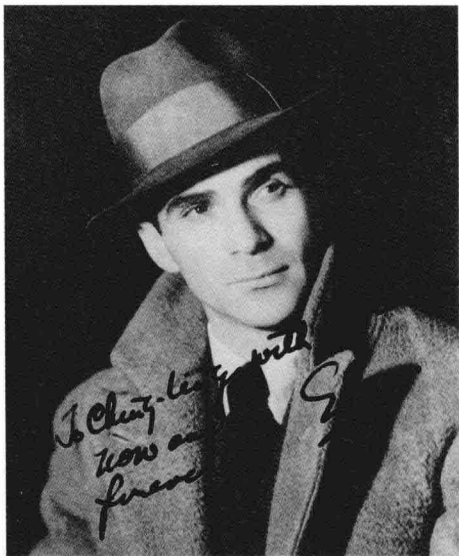
共谈判、重建国共合作关系的重要信息。董健吾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系学习，与宋子文是校友，公开身份是牧师，一度以传教为掩护参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为了给董健吾的行程提供方便，宋庆龄介绍他面见孔祥熙，谋得一“财政部调查员”的名义。

受宋庆龄之托，董健吾带着宋庆龄用以慰劳红军的一大包云南白药及宋庆龄电台的呼号密码出发了。2月底抵达瓦窑堡，向中共传递了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

3月，董健吾给南京政府带回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共同签署的关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函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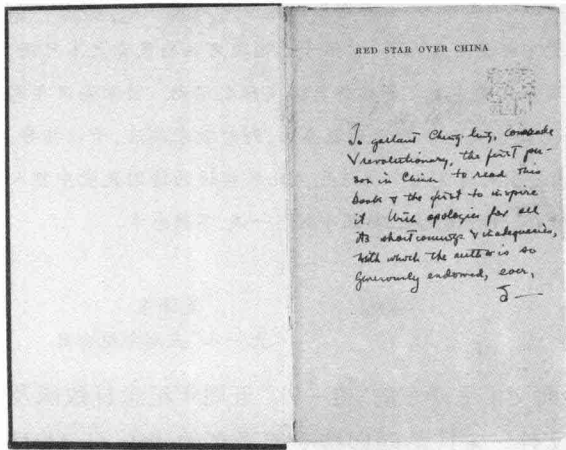
他给宋庆龄带回来的是中共中央赠给宋庆龄的礼物——三枚边区铸造的刻有镰刀斧头的银币和一套布币，以及苏区财政部长林伯渠写给宋庆龄的一封信。林伯渠在信中对宋庆龄送给红军的“珍贵的慰问品”表示万分感谢，同时转达了苏区民众和红军战士对宋庆龄的无限敬意，并恳请宋庆龄帮助苏区在海外华侨中筹募抗日基金。宋庆龄不负所托，日后在香港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为抗日根据地募集了大量医药用品。

不久，宋庆龄再次委托董健吾赴陕。这一次，她是请董健吾护送美国记者



■ 埃德加·斯诺赠宋庆龄的签名照

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学博士马海德去陕北实地考察边区的情况，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董健吾化名王牧师，将两位美国友人安全地护送至陕甘宁边区。斯诺日后撰写并出版了著名的《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使世人第一次真实地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业绩和抗日主张。马海德则留在边区，参加了中国革命。



■ 1937年，埃德加·斯诺赠宋庆龄的《红星照耀中国》



呼吁恢复“三大政策”



■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留影（此照由摄影者埃德加·斯诺赠宋庆龄）

根据形势变化，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反蒋抗日的方针，转而确立联蒋抗日的政策，从而把统战工作的重点从反蒋派力量转到国民党中枢力量上来。

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明确表示与国民党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实现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

9月18日，毛泽东给宋庆龄写了一封请求她给予帮助的信。全文如下：

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付（附）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顺问近安。

毛泽东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

10月，潘汉年在上海向宋庆龄面交了毛泽东的“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致函及《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等文件。宋庆龄随即接受毛泽东的请求，于11月10日发表文章呼吁：联合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

线；联合国内各党各派及社会各阶层人物，建立民族统一战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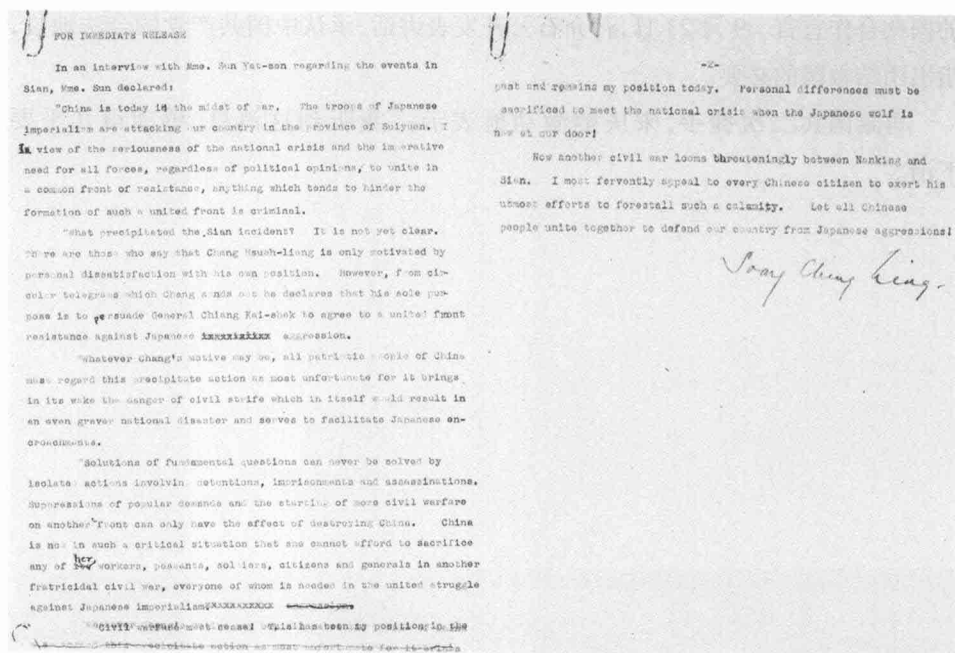
潘汉年当时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发动各实力派向蒋介石要求立即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此际，正值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于是他草拟了“恢复三大政策的提议”致宋庆龄、何香凝、孙科，并运动各实力派签字。宋庆龄、何香凝随即以自己的名义在国民党中央委中间开展了征集签名的活动。

就在宋庆龄征集提案签名的过程中，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杀蒋介石只会对日本最有利，认同这一严重后果后，宋庆龄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宋庆龄、何香凝修改了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要求“恢复总理三大政策”的提案。1937年2月12日，宋庆龄和何香凝一起将提案书直接面交正在上海治疗脊骨跌伤的蒋介石。是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请其转告潘汉年，嘱咐“三中全会孙夫人等左派不可太突出”，所作提案必须考虑到蒋介石能否采纳，“蒋不能采纳者则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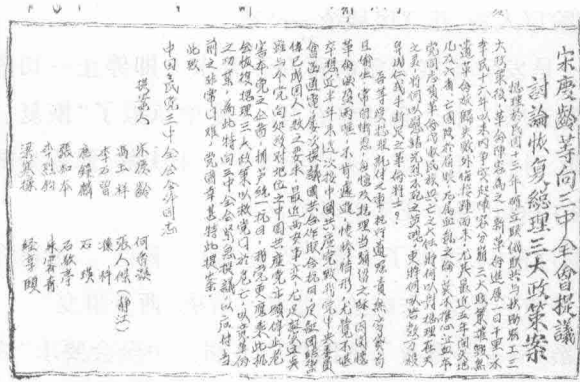
2月14日，宋庆龄亲赴南京，与何香凝一起继续做国民党中央人士的工作，呼吁恢复和扩大“三大政策”，把联俄改为联俄、法、英、美，联共改为联各党各派，扶助工农政策改为扶助工农、工商各行业之政策。

得知张闻天、毛泽东的来电内容后，宋庆龄没有在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宋庆龄



■ 1937年3月13日,延安《新中华报》刊登提案全文

她呼吁：“我们必须赶快建立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国国防。”“不要使我们自己在世界上处于孤立的地位，而要与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合作。”

宋庆龄的提案并未能被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接受，这次会议仍然表示要“根绝赤祸”，但会议首次提出抗日，并表示要和和平统一，与中国共产党可以进行谈判。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日军又大举进犯上海，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外敌当前，国共终于携手共御外侮。9月22日，国民党对外公布中国共产党的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公开发表讲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指出团结救国的必要。

再睹国共二次握手，宋庆龄激动地表示：“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

2月18日，她在上海莫利爱路寓所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在沪各外国报纸发表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公开信，并附上已向三中全会提出之原案全文。宋庆龄在公开信中主张结束训政时期、及早召集国民会议、集中人才、不拘党见、庶民众有实际上参加政府之机会。

20 一方特殊的白手绢

香港,1938年底一个寒冷的冬日,宋庆龄从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手中接过了一方丝质白手绢。这是一方特殊的手绢,上面有一封要求宋庆龄支援新四军的英文信,用打字机打在手绢上。

接过这方从上海辗转来到自己身边的丝绢,宋庆龄不禁回想起了离开上海时那惊险一幕……

转战香港

1937年11月12日,中国军队全部撤离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失败,上海失陷。上海租界地区成为日本侵略军包围中的孤岛,而住在孤岛的宋庆龄的安危则牵动了许多人的心。

在淞沪抗战激战之时的10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特地从延安拍来电报,请求宋庆龄撤离上海去香港。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收到电报后立即向宋庆龄作了转达。第二天,交通联络员李云去宋庆龄处时,宋庆龄对她说:“感谢毛先生和周先生的关心。我这里还有不少工作需要处理,我还不能一下子随便离开。稍缓些时间再走。”

11月,宋庆龄在上海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疾呼:“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



■ 1938年,宋庆龄在香港留影



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

上海沦陷后，毛泽东、周恩来再次发来电报，催促宋庆龄赶快离开上海去香港。

12月23日早晨，天气寒冷而阴沉，宋庆龄位于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的寓所却显得格外静谧安适。敞开炉门的壁炉里火焰明亮，宋庆龄与她的两位外国女友一边品味着咖啡，一边向她们交代自己走后请她们看管好莫利爱路寓所的任务。不一会儿，一位黄头发、蓝眼睛的外籍男士坐着一辆出租车来到宋宅，宋庆龄说笑着与女友告别后，便带着手里只提了一个小包袱的保姆李燕娥坐上了他的车。在附近监视的密探和日本特务们都没有察觉出今天有什么异常。看上去，那个外籍男士似乎是来接宋庆龄外出去参加活动的。

在急驶的出租车上，李燕娥坐在前座，而陪着宋庆龄一起坐在后座的便是那位外籍男士——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他于20世纪20年代来到上海，一直从事进步活动，曾经多次出色地完成过孙夫人交给他的架设秘密电台、运送武器、掩护爱国志士等任务。这一次，他正是应宋庆龄的要求前来充当掩护，护送她去码头登船的。

来到熙熙攘攘的公和祥码头，渡船正在把岸上的乘客一批批送上停泊在江边的大船，到处都是日伪警察、宪兵、特务在盘查、讯问。在刺骨的寒风中，宋庆龄用头巾捂住半个脸庞，安详地挽住艾黎的胳膊，谈笑风生，旁若无人地从那些瞪着凶狠目光的恶棍中间走过。敌特宪警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位从他们眼前悠闲而过的漂亮女性，正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宋庆龄和艾黎没有遭到任何盘问，安全地登上了开往香港的邮船。

同时登上这艘邮船的还有受命陪伴孙夫人去香港的中共联络员李云。船开后大约一小时，宋庆龄确认安全已有了保障，才派李燕娥给李云送去一张条子，说因为宋蔼龄也在船上，所以不便与她会面，抵港后可到寓所会面。

四天后，宋庆龄踏上了香港的土地。

创立保卫中国同盟

香港是毗邻华南战区的一个岛屿，暂由英国管辖，便于对外联络，又相对安全，还可以避免国民党政府的干涉或检查。来到香港后不久，宋庆龄就开始积极酝酿筹

■ 路易·艾黎
(1897—19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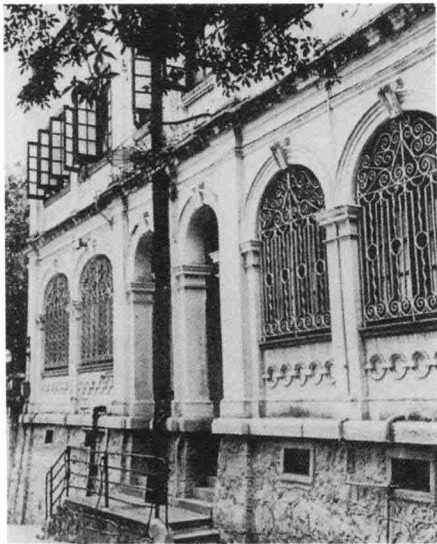
新西兰人。1927年来华。1933年结识宋庆龄。次年参加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建立联系。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参加并发起组织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以进行战



时的生产自救。20世纪40年代，在甘肃省山丹县创办了以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理论联系实际为办学宗旨的培黎工艺学校。新中国成立后，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各国人民友好事业。1982年85岁寿辰时，北京市政府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1985年，甘肃省政府授予他“荣誉公民”称号。1987年12月27日在北京病逝。

备成立一个沟通海内外,争取国际援助以支援抗战的组织。

1938年6月14日,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最初的办公地点就在香港干德道11号2A宋庆龄寓所的客厅,直到1939年春才搬到西摩道21号。宋庆龄除了亲自担任主席之外,还以政治家的宏大气魄团结了一大批中外著名人士参加或是支持“保盟”。他们中有印度民族革命领袖、后来担任印度总理的贾·尼赫鲁,有名满中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还有著名的黑人歌唱家保罗·罗宾逊,后者曾于1940年在纽约的一个露天音乐厅用汉语



■ 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西摩道21号的办公地点

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并灌制了唱片,将这首激昂的歌曲传遍了全世界。在国内,宋庆龄邀请了军界的冯玉祥将军、外交界的颜惠庆、政界的孙科以及亲弟弟、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等人作为保盟的发起人,宋庆龄还推举宋子文担任了保盟的会长。宋庆龄的特殊号召力为保盟赢得了各方的支持,中国红十字会国外后援会秘书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任名誉秘书,香港大学高级讲师诺曼·法朗士任名誉司库,香港华比银行副经理邓文钊任司库,廖梦醒任秘书。除了这几位只领取基本生活费的专职工作人员外,保盟还有很多不取报酬的志愿工作者。

在《保卫中国同盟宣言》中,保盟的领导者们向世界宣告:“保盟目标有二: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保盟所起的作用就像是一座桥梁,一方面让中国的国际朋友们知道中国战区和敌人占领地区人民的真正需要;另一方面把捐款、医疗物资和其他捐助物资送给真正和迫切需要的人们。

“哪里最需要帮助,就帮助哪里”

保盟成立后,根据宋庆龄倡导的“哪里最需要帮助,就帮助哪里”的原则,在抗日救亡的战线上开展了全方位的工作。由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日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所以宋庆龄在一视同仁地援助各个抗日战场的同时,



■ 1938年,宋庆龄与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部分成员在香港合影(左起:爱泼斯坦、邓文钊、廖梦醒、宋庆龄、克拉克、法明士、廖承志)

把援助的重点放在了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8年冬,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秘密地从汉口经上海来到香港。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代表叶挺将军向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求援的。他把交给宋庆龄的白丝绢缝在自己的衣服里,一路从皖南到上海,又从上海到香港。

宋庆龄接过沈其震如此珍藏的白丝绢后,仔细地阅读了丝绢上的文字。那是宋庆龄的朋友、美国进步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给她的信。1938年秋天,史沫特莱从武汉撤退到皖南,访问了新四军,并将新四军缺医少药的情况向外界作了报道。她还向军长叶挺建议,派人到香港去,向宋庆龄争取她所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支援。叶挺采纳了史沫特莱的建议,派沈其震赴港。于是,史沫特莱特地用打字机在这方白色丝绢上打了一封信,交沈其震带给宋庆龄。

读完信后,宋庆龄对沈其震说:“艾格妮丝的报道我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已经读过了,你们缺医少药的情况我是知道的。”并说:“抗日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保卫中国同盟已经在香港成立,国际上主持正义的一些团体和个人都在响应保卫中国同盟的号召,已经有不少捐募得来的医药器材和其他救济物资运到了香港,上海也成立了组织,建立了仓库,除了从香港带去一部分外,还可以从上海运去一



■ 1939年,宋庆龄与克拉克、法朗士等一起,前往香港码头检查支援物资的装运情况



■ 1938年底，史沫特莱在皖南新四军军部留影

些。”她还鼓励沈其震说：“我完全同意叶挺将军的看法，军医工作对鼓舞士气非常重要，军医工作做得好，胜利就有保证。”

这次会面之后，宋庆龄立即拨出一批手术器械和大量药品，还有其他食品、被服、文化用品等救济物资，从香港和上海运往皖南，支援新四军。当时有一种名叫“白浪多息尔”的最有效的消炎药，是世界上刚刚生产、国内还没有用过的最新产品，也从上海运到了新四军驻地。医疗条件的改善，大大加强了新四军军部和各支队的医疗工作，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在这之后，应沈其震来函要求，保盟又给新四军送去蚊帐用料6000码、奎宁20万片、炼乳200听、霍乱疫苗12万剂、消毒包2000个，还有不计其数的毛毯、寒衣。

据不完全统计，保盟在香港近四年的时间，约给前线送去各种医药救济物资120多吨，平均每月送出3吨左右。即便如此，40年后，宋庆龄在给沈其震的信中，却这样回首往事：

“抗日战争时期，曾为解放区的医药物资作过一些支援，那是微不足道的；而像你一样的干部却冒了生命危险为此而奔波。”

1940年3月的一天,在香港饭店的餐厅,人们窃窃私语,纷纷将视线投向餐厅的一角。那里坐着三位女士,正在平静地吃晚餐。不一会儿,好事的记者纷纷赶来。是什么样的三位女性会如此吸引人们的关注呢?没错,那三位端庄美丽的女性就是著名的宋氏三姐妹——宋蔼龄、宋庆龄和宋美龄。

这一次,正是由小妹宋美龄促成了三人的“团聚”。宋美龄于1940年2月来到香港,住在大姐宋蔼龄位于沙逊道的寓所。不久,在两姐妹的邀请下,宋庆龄也搬到了这里。在大姐家里,三姐妹一起闲聊、一起下厨,她们愉快地回忆童年往事,试穿彼此的衣服,就像是回到了许多年前,回到了上海的旧宅。

支持“伤兵之友”运动

此时的三姐妹一起在公众场合出现,主要是显示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团结抗战的决心,并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共同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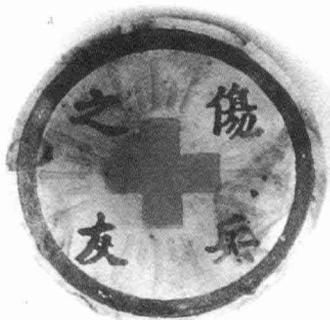
1940年3月28日,宋氏三姐妹一起出席了香港各爱国团体联席会议。会上,宋美龄向二姐宋庆龄在香港积极开展抗日救援活动表示了高度的敬意。她称赞二姐致力于国际宣传,使各国人士对我抗战建国、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踊跃捐助我国大量慰问品。她继而提出:前线将士们浴血奋战令人钦佩,而“伤兵之友”运动以慰问及服务伤兵将士为宗旨,意义尤为重大,她号召人们积极参加,大力推行这项运



■ 宋庆龄在重庆第五陆军医院慰劳将士



宋慶齡



■ 宋庆龄保存的“伤兵之友”证章

动。之后，宋庆龄起立致辞，对妹妹的爱国热忱表示了赞扬，并提议在香港也成立一个“伤兵之友”运动会，由宋蔼龄任会长。宋庆龄的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成，大家当即决定与会的七大团体各派一人，组成“伤兵之友”运动会的常务委员会。

宋庆龄积极响应宋美龄的倡议，领导“保卫中国同盟”，为“伤兵之友”运动在香港蓬勃开展贡献力量。由于“伤兵之友”运动会在香港募集

的所有捐款均需上缴重庆总社，所以该会的行政开支就显得捉襟见肘。于是保盟在用于救济的款项之外，又特地捐款 500 港元作为该会委员会的行政管理开支，这不啻为雪中送炭。除此之外，保盟还承担了审计“伤兵之友”运动所有账目的工作。4 月 8 日“伤兵之友”运动开幕式上，廖梦醒代表保盟，以“香港妇女团体征求伤兵之友运动委员会大同盟队”之名，请领了 100 份“伤兵之友”证章。5 月 15 日，保盟刊物《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 16 期登载了宋美龄专为该刊撰写的《伤兵之友运动》一文，并以《“伤兵之友”运动在香港——蒋夫人盛赞孙夫人》为题，详细报道了 3 月 28 日会议的内容，还介绍了成为“伤兵之友”的具体方法和奖励的形式。

在保盟等社会团体的层层推动之下，“伤兵之友”运动在香港开展得轰轰烈烈。

同赴重庆

宋氏三姐妹的香港团聚被敌人诬为宋氏家族弃国远避。3 月 30 日，投敌叛国的汪精卫在南京宣告成立伪政府。第二天，三姐妹联袂同机从香港飞抵正处在日军狂轰滥炸之下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

4 月 3 日，宋庆龄和蔼龄、美龄一起来到位于歌乐山的第一保育院，看望该院的 500 名难童。保育院的孩子们早早地聚集在广场上，欢迎三位“妈妈”的到来。宋庆龄对孩子们说：“今日得见小朋友在内地亦如此幸福，极为欣慰，汝等有好‘妈妈’，如蒋夫人，实为幸运，尤幸运者，为儿童保育院者无汪逆精卫之流断送汝等之前途。”孩子们自动高唱起“打倒汪精卫”的歌曲。接着，三位“妈妈”来到难童中间，她们拉起孩子们的小手，问寒问暖，孩子们则争先向“妈妈”们倾吐自己的遭遇。最后，三位“妈妈”和孩子们合影留念，宋庆龄还特地与一名在战争中失去双



■ 1940年4月5日,宋氏三姐妹在重庆视察公共防空洞



■ 1940年4月7日,宋氏三姐妹在重庆黄山蒋介石官邸与蒋介石合影

亲的难童单独合影,使他非常感动。第二天恰好是儿童节,宋庆龄又和宋蔼龄一起购买了500余份精美的糖果,作为儿童节的礼物赠给了保育院的孩子们。

4月5日,三姐妹来到了重庆郊外视察工业合作社所属的军毯厂和印刷厂。在参观之前,宋美龄特地叮嘱撤去“欢迎蒋夫人”的标语,换成了“欢迎孙夫人、孔夫人”的标语。在工厂里,宋庆龄详细询问了生产的情况和工人的情况,她尤其关心工人工资、工时和健康状况,当她得知工人工资较其他工厂更为优厚之后,欣慰地点了点头。其实抗战时期广泛开展的工业合作运动正是在宋庆龄的大力帮助下发起的,她还在香港创办了“工合”国际委员会,倾力支援战灾难民并帮助重建战时工业,所以宋庆龄在重庆以及之后在成都视察时,都特别注意工业合作运动的开展情况。

除了在各地视察之外,宋庆龄在重庆还和两位姐妹一起,向美国人民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说。4月18日这一天,三姐妹应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和国际广播电台的邀请,向美国发表广播演说,这次演说由美国NBC电台向全美转播。然而,当日清晨,数十架日军轰炸机在一大队战斗机的护航之下飞临重庆上空。它们轮番俯冲轰炸,投下一颗颗重磅炸弹。无数民房变成废墟,许多无辜的生命被残酷地夺去。

警报解除后不久,三姐妹就准时来到了电台。

7时45分,宋庆龄激动的声音通过电波传向了全美国。“亲爱的美国听众”,刚刚浓烟四起、哀鸿遍野的场景仍浮现在宋庆龄的眼前,挥之不去:“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表达我此时的心情,我们刚刚经历了又一次野蛮的大轰炸,美丽的山城已经变成了一所血腥的屠场,成千上万的和平居民损失了他们最后一点财产,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他们中许多人……仅仅是想生存下去,可是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连这点起码的权利也不想给予他们。”慢慢地,宋庆龄恢复了平静,她怀着自信告诉美国人民,她的同胞们正坚定不屈地进行着有效的抗战,而且坚信我们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她呼吁美国人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中国人民有力的援助,她告诉全世界,中国人民拿起武器,不仅是在争取自己自由,更是“为世界人类,为大家争取自由”!

三姐妹的演说震撼了美国人民的心灵,而三位夫人站在同一立场发出一致的呐喊也鼓舞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战到底的决心。

为阻止国民党内部妥协投降势力的抬头,宋庆龄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茶会上痛斥了叛国投敌的汪精卫,她说:“汪精卫之徒,不知羞耻,投靠敌人,妄组政



■ 1940年4月8日,宋氏三姐妹在重庆第五陆军医院慰问伤病员



■ 宋氏三姐妹在重庆

府,察其所为,无非毁弃三民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破坏国家统一,此种丧心病狂之徒,不久必然消灭。”

妹妹宋美龄邀请二姐长住重庆指导妇女工作。在重庆,虽然每天欢迎会、茶会、宴会几乎没有间断,但实际上,此时的宋庆龄并没有单独活动的自由。而且,香港还有很多工作等着她。所以,宋庆龄没有接受妹妹的邀请,还是决定返回香港。

1940年5月9日,三姐妹来到重庆一个月后,宋庆龄和宋蔼龄一同乘上飞机,返回香港。



爱国的“一碗饭”

1941年的夏天,香港的许多家酒店餐馆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些餐馆的门口和墙上张贴着许多爱国标语或是海报,人们手持一张标价为两元的餐券走入餐馆,坐下后却只是吃一碗简单的炒饭便离去,还显得十分高兴。要知道,在香港,宋庆龄一天的菜金不过两角而已。这些客人究竟为何如此大方呢?这就要从宋庆龄一手扶持的“工合”运动说起了。

成立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

1937年,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夫妇等外国友人目睹中国工业在日军炮火中损失惨重,决定发起“工合”运动,通过组织因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而失业的工人和难民进行生产自救,从事日用工业品和军需用品的生产,以支援抗日战争。11月,他们在上海成立中国“工合”设计委员会。艾黎为了从事“工合”事业,辞去了上海租界工部局工业科科长职务,到香港来寻求宋庆龄的帮助。宋庆龄看了艾黎带来的“工合”计划书后,表示完全赞同。通过宋庆龄的帮助,艾黎由宋子文安排来到了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1938年8月,艾黎在武汉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合”运动自此兴起。

在宋庆龄的带动下,宋家继宋子文之后,宋蔼龄和宋美龄也对“工合”运动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宋蔼龄的丈夫、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亲自出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理事长一职,宋美龄则担任名誉理事长。

不过,绰号“哈哈孔”的孔祥熙真正的兴趣并不在如何推动“工合”运动的开展,而是盘算



■ 路易·艾黎 1935年前后留影

22

爱国的「一碗饭」



■ 1939年，宋庆龄在香港与埃德加·斯诺讨论开展中国工业合作运动

着利用“工合”组织为自己牟取私利。孔祥熙上任后曾许诺调拨500万法币作为“工合”的经费，但实际上所给的经费却少得可怜，到后来甚至完全停拨。艾黎不无讽刺地对斯诺说：“我们没法

从‘圣人’那里再弄到半个铜板了，我破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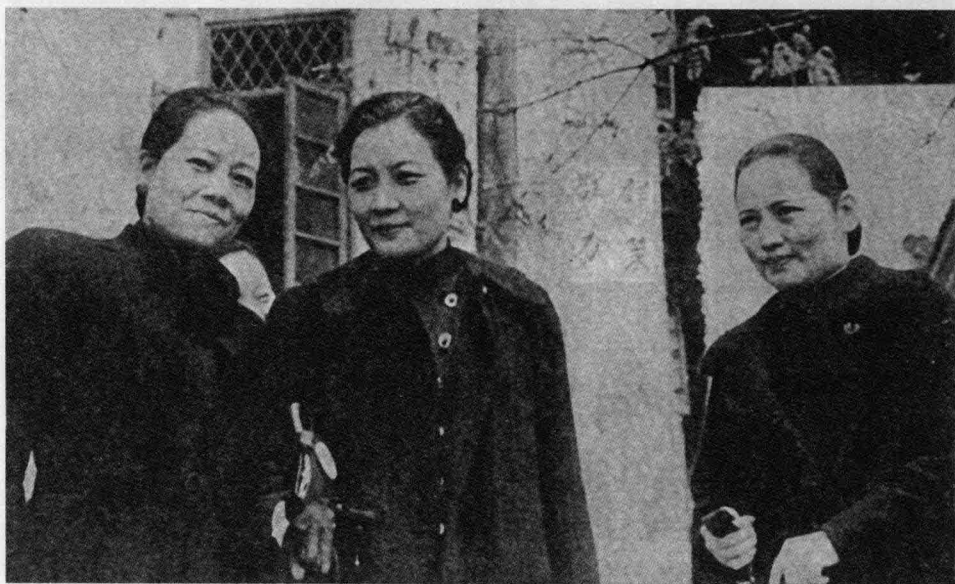
宋庆龄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作出了反应。1939年1月，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她亲任名誉主席，香港英国主教何明华任主席，香港注册会计师陈乙明任司库，中外著名人士宋子文、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钟秉铎、郑铁如、何东等20余人为委员。此后的三年间，这个组织连接起海外的“工合”推进机构与国内各地的合作社，为后者送去源源不断的捐款和物资。

发起“一碗饭运动”

1941年，日军频频发动对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西北地区的人民又遭遇洪水的侵袭，涌入大后方的难民与日俱增。为了募集更多的资金，进一步支援“工合”运动，7月，宋庆龄在香港发起了著名的“一碗饭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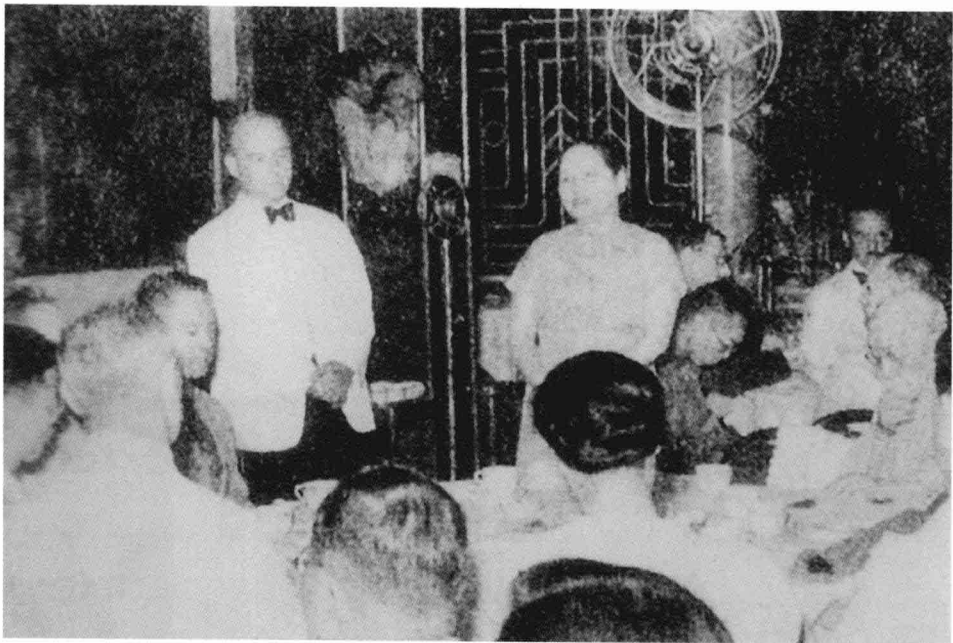
“一碗饭运动”最早由美国的援华会、赈济会等组织在美国发起，后来扩展到英国、加拿大、南美洲等许多国家。看到“一碗饭运动”在美、英推行以后成绩斐然，意义深远，宋庆龄于是决定在香港也发起同样的运动。

7月1日的晚上，香港湾仔庄士顿道179号英京大酒店门前灯火通明，车马云集，五楼的宴会厅此时已是宾客如云。香港各界名流荟萃一堂，他们中有英军驻港总司令贾乃锡中将、海军总司令景连城、香港医药总监司徒永觉及夫人、中国红十



■ 1942年,宋氏三姐妹视察成都“工合”组织

1942年,宋氏三姐妹视察成都“工合”组织。宋美龄、宋庆龄、宋霭龄三姐妹在抗战期间多次视察后方,支持抗战。此次视察成都“工合”组织,是她们在抗战期间的重要活动之一。照片中,三姐妹身着深色高领外套,神情严肃,正在交谈。背景为成都的街景,可见传统建筑。



■ 1941年7月1日，宋庆龄在香港“一碗饭运动”开幕式上讲话

字会战时总干事林可胜、“工合”技术顾问路易·艾黎，还有工商团体的领袖以及文化名人邹韬奋、陈翰笙等人。将在这里举行的，并非什么盛大的宴会，而正是“一碗饭运动”的开幕典礼。

8点整，典礼正式开始，由身穿一袭短袖旗袍的宋庆龄主持。其实这一天，宋庆龄身体有些不适，不过她还是坚持来到这里主持典礼。她操着浓重的上海口音，以富有感情的声音向大家说道：“一碗饭运动的目的，是用募捐经费来帮助中国的难民进行生产自救，用工业合作的办法来帮助中国的斗争……一碗饭运动不但是募了捐去救济被难的人们，并且是要节饮食，来表示牺牲的意思，这是我们做人的美德，无论中外，无论古今，都是值得赞扬的。”宋庆龄的讲话，不时被人们热烈的掌声所打断。香港总督罗富国虽然公务缠身没有能出席典礼，但还是特地委托著名律师罗文锦宣读了他的贺信，祝愿此次运动取得成功。

8月1日这一天，是“一碗饭运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当天出版的《华商报》在显要位置刊登了宋庆龄为“一碗饭运动”所作的亲笔题词：“日寇所至，骨肉流离，凡我同胞，其速互助。”在香港的大街小巷，目力所及之处，车站、码头、商场乃至电车上，到处可见“一碗饭运动”的宣传画或是标语口号。还有一支巡游队伍，簇拥着一个大碗的模型，高喊“多买一碗饭，多救一个难民”等口号在香港的闹市区穿梭游行，引得路人纷纷驻足观看。

多吃一碗饭,少受一份苦

香港的“一碗饭运动”继承了美国的做法,“一碗饭运动”委员会发售餐券1万张,每张2元,认购者可持券到指定餐室用餐。

“一碗饭运动”开展之初,商会提出每碗饭收回成本两毛,然而各大餐室都把这件事情看作义举,不但不收成本,反而竞相提高认捐碗数。丽山餐室业主温梓明是认捐炒饭的第一人,他一次认捐了500碗,并将其定名为“救国饭”。位于上环水坑口21号的乐仙酒家也不甘落后,认捐炒饭1000碗,不仅如此,该酒家司理庞永棠又以个人名义认捐了2000碗,使得他们的认捐总数达到3000碗,与英京酒家并列成为认捐最多的餐室。乐仙酒家还特别烹饪了一种由白米1斤、鲜虾肉4两、鸡肉4两、叉烧4两、鸡蛋6只调配而成的大型“爱国饭”,售价百元;对于捐款百元以上者,还以酒家珍藏多年的古碗盛饭,可谓别出心裁。

活动当天中午,官员富商、船员工友……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附近餐室,持券就餐。吃着意义非凡的救国饭,人们都备感自豪,甚至多买餐券,以表达爱国心意。活动第二天,恰逢周六,许多人更是结亲携友、举家共食,将此事视作光荣而永久的纪念。

客人们如此爱国,店员们也将参加“一碗饭运动”视为最有意义的事情。他们无不用心配料加工,以最优的服务接待来客。这天,英京酒家还发生了一件特殊的事情。一位衣衫褴褛的乞丐突然出现在英京酒家的二楼,手上拿着一张餐券,也许是初次进到如此豪华的所在,显得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服务员见状立刻将他引入座位,送上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炒饭。有人问经理高福申,难道他不介意要饭的也来吃饭?高福申正色道:“爱国不分贫富,凡来吃爱国饭的,我们一视同仁。”一位记者见证了这一幕,他不禁感慨:“在身份壁垒无比严格的香港,乞丐得坐高级酒楼用餐,不可不谓奇迹!”

正是宋庆龄的努力推动,使得这样的“奇迹”一再上演。“一碗饭运动”原



香港《华商报》对“一碗饭运动”的报道



■ 1942年,宋庆龄视察成都“工合”组织

运动中作出重大贡献的13家餐室赠送锦旗,红缎锦旗上绣有孙中山手迹“爱国模范”;向高福申、庞永棠和小祇园业主欧阳藻裳赠送了孙中山遗墨“努力前进”,作为特别奖品。当宋庆龄笑容可掬地为获奖餐室颁奖时,全场掌声雷动。

宋庆龄后来将“一碗饭运动”所得凑足25000元港币,全部捐给了“工合”,为内地的难民灾胞送去了他们最需要的“一碗饭”。

计划举行三天,可是三天之后,人们的爱国热情不减,许多人因为没有吃上爱国饭深感遗憾,在他们的再三要求下,运动一再延期,部分酒家甚至延期了30天。整个运动结束后,共计募集港币22144元,法币615元,取得巨大成功。

9月1日,在英京酒家举行了“一碗饭运动”的结束典礼,宋庆龄再次主持典礼。何香凝女士在典礼上发言,赞扬宋庆龄为此次运动作出的不懈努力。然后,由宋庆龄亲自为在此次运

1943年5月15日下午,重庆川东师范学校体育场上彩旗飘舞、鼓乐齐鸣,就连篱笆外四周的土坡上也挤满了人,大家聚集在球场四周,可谓盛况空前。突然间,原本嘈杂的人群突然安静了下来,原来宋庆龄缓步来到了场内,6000多名观众齐齐站起身来,向她致敬。

这里即将举行一场由宋庆龄出面发起的国际性足球义赛。它是宋庆龄在重庆恢复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后,为了救济灾民、难民举办的一场颇具规模的赈灾足球义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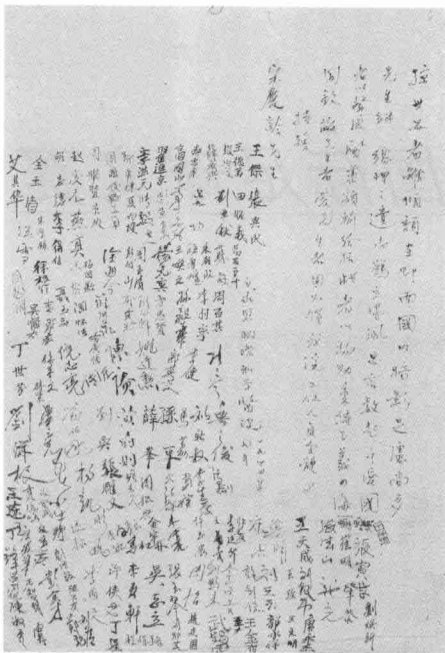
重建保盟

1941年11月底,宋庆龄已得到来自各方要她迅速撤离香港的请求,但她拒绝离开。12月6日,她还与姐姐宋蔼龄一起参加了在九龙半岛酒店举行的赈灾募款舞会。第二天凌晨,宋庆龄醒来时,发现战争已经突然降临——太平洋战争爆发,宋庆龄遭遇了日军发动的九龙闪电战。冒着生命危险,就在日军逼近九龙启德机场之前的几小时,宋庆龄才从弥漫的硝烟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香港飞赴重庆。

日军进攻香港时,保盟组织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名誉司库诺曼·法朗士在反抗侵略者的战斗中不幸牺牲,委员会的两名委员被关进集中营,还有一位委



■ 重庆宋庆龄故居



■ 1944年9月,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全体工人和休养人员联名致宋庆龄感谢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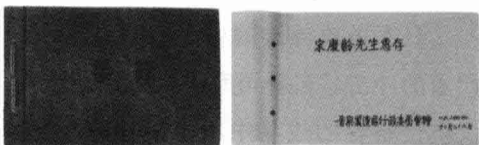
员被关进华人监狱,有九位委员被迫乔装躲藏起来。宋庆龄对滞留在香港的保盟成员的安危极为关心。她一方面积极与他们取得联系,另一方面则开始准备恢复保盟的工作。到1942年春、夏季,保盟中央委员会原来的一些成员,从沦陷的香港陆续来到重庆。

1942年8月中旬,宋庆龄在重庆重组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及办事机构,确定保盟迁渝之后的紧迫任务是与国际援华团体恢复联系,争取友好国家不断援助中国抗战。保盟重建后的办事处便设在两路口新村3号宋庆龄寓所内。宋庆龄继续担任委员会的主席,爱泼斯坦、王安娜、廖梦醒等人担任委员,知名人士贾·尼赫鲁、托马斯·曼、赛珍珠、冯玉祥、何

香凝、孙科、茅盾等人担任名誉委员,王安娜为驻重庆代表,马海德为驻延安代表。新的中央委员会又团结在宋庆龄周围开始工作。然而此时的保盟,所处的环境更加复杂,局面更加严峻,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开展工作也变得十分困难。国民党政府的社会局要求保盟登记,干涉保盟存款的使用,还要保盟报告款项的分配和用途。在他们处心积虑的干涉和破坏下,保盟总部工作人员与外国朋友和海外侨胞的联系很难公开进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的援助物资,由于当局的严密封锁很难运送出去,《新闻通讯》也很难继续出版。

然而,宋庆龄和保盟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不畏艰难,坚持着保盟的宗旨,广泛联系有关机构,开展形式多样的募捐活动,采取各种形式,继续支援着抗日根据地的军民。

1944年,在宋庆龄的亲自安排之下,通过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的帮助,保卫中国同盟把南洋华侨捐



■ 晋冀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赠宋庆龄的边区纸币票样册



■ 1942年，宋庆龄在重庆留影



献的一台大型 X 光机运送到延安。X 光机运抵延安后，周恩来亲自电谢保盟总部。接电后，宋庆龄高兴地说：“这架大型 X 光机是人口已达 9000 万的解放区的第一台和仅有的一台啊！”

赈济豫灾

1942 年的秋天和 1943 年的春天，河南发生特大水灾。久旱之后的大暴雨摧垮了黄河的堤岸，河南受灾极重，数百万人失踪，千万灾民流离失所，一时间哀鸿遍野、满目疮痍。获悉河南灾情，宋庆龄十分焦急，立即想方设法赈济灾民。

受宋庆龄委托，中苏文化协会秘书杭立武出面宴请了美国、英国和韩国的驻华大使。宴会上，宋庆龄郑重地向三国大使发出了举办国际足球义赛的邀请，并承诺参赛球队产生的一切费用将由中方承担。宋庆龄向来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声誉，此次义赛又是在战时增进国际间交流的好机会，各国大使当即接受了宋庆龄的邀请。

由于宋庆龄的积极推动和保盟的广泛宣传，重庆社会各界人士无不积极响应。重庆市长贺耀祖将军不仅授权市足球队积极参加义赛，还命令市政府军乐队到场演奏助兴。



很快,参加赈灾国际足球义赛的四支队伍组织了起来,包括由上海赴渝的足球队员和全国的一些足球名流组成的“沪星队”,由当地社会人士曹善齐、陈代云组织的“东平队”,由英国驻华使馆和英国军事代表团工作人员组成的“英联队”,由韩国在华青年组织的“韩青队”。

就在宋庆龄和保盟为筹办赈灾义赛而奔忙的时候,国民党政府竟然发来一个通知,说只有政府所属机构才可以募集赈灾捐款,宋庆龄对此不予理睬。

1943年5月15日下午3时,足球义赛在川东师范学校球场正式开幕。宋庆龄在英大使薛穆爵士陪同下,缓步行至球场中,6000余观众全部起立致敬,宋庆龄同四支参赛球队队员一一握手,以示感谢。

球赛休息时,四队队员列队于球场中央,宋庆龄含笑偕薛大使行至场中,再次同队员们一一握手,以示感谢。

为了感谢运动员对赈灾的支持,宋庆龄不仅以个人名义分别为四支球队制作了锦旗,还以个人名义特制了赠送给运动员们的铜质纪念章。

由于宋庆龄的号召,当日的门票不仅被抢购一空,还有更多的观众挤在球场的外围为义赛助势。于是筹委会决定在接下来的两天比赛中不再发售门票,而是在入场口设一捐款箱,观众入场时自觉捐献。其实当时的赛场,观众席不过是用长木板铺在架子上制成的,只有少数贵宾坐折叠椅,大多数观众并无座位。他们来这



■ 宋庆龄在“赈豫灾足球义赛”开幕式主席台上



宋庆龄



■ 宋庆龄以个人名义特制的义赛纪念章

里更多的是表示对宋庆龄和她的事业的热心支持，而不只是看球。

此次义赛共募得款项 12 万余元，宋庆龄立即将这笔捐款如数寄往设在陕西宝鸡的“豫灾赈济委员会”，由他们代为放赈。宝鸡的赈济委员会收到捐款后，立即致函宋庆龄表示感谢。

四个月后，宋庆龄再次收到赈济委员会的来信。来信向宋庆龄汇报了义赛捐款的用途：其中的 7.5 万余元交给了河南洛阳及巩县的“工合”组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救济灾民生产自救，其余的款项则帮助巩县的 200 名灾民搬迁到宝鸡。看到这封信，宋庆龄备感欣慰：辛苦募集的款项最终发挥了实效。几天后，在《新华日报》上出现了这样一行文字：“藉此机会，对曾帮忙致使此举（赈灾义赛）获得如许成功之各位热心人士，再致深切谢意！”——它出自人们敬爱的宋庆龄。

1949年4月4日,上海大新公司四楼书画部人头攒动,人们争相观赏悬挂在大厅四周的一幅幅书画作品。而大厅的一侧,情绪激昂的人们正在踊跃购买书画作品。

引起上海人民如此高昂兴致的,是著名漫画家张乐平在此举办的“三毛原作展览会”,以及同时推出的“三毛乐园会”活动,而活动的主办方正是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

“救救我们的战灾儿童”

日本的侵华战争使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儿童失去亲人,处境悲惨。1939年3月28日,宋庆龄焦急地向国际人士发出了“救救我们的战灾儿童”的呼吁,她说:“我们绝不能让战士们的子女成为‘迷失的一代’,必须把他们从由于饥饿而濒于死亡和由于无人照管而使肉体和精神上遭受摧残的恶果中拯救出来。”“请你们把对中国的同情心表现在帮助保存中国未来的有生力量行动中。”

在宋庆龄的呼吁下,爱国华侨和海外援华机构纷纷伸出援手,在大后方甚至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一座又一座孤儿院、保育院。著名的洛杉矶托儿所,就是通过她的呼吁,得到了美国洛杉矶爱国华侨和进步人士的热心捐助,在原来的中央托儿所的基础上,在延安的窑洞里建立的。



■ 延安洛杉矶托儿所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将保卫中国同盟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救助贫苦儿童是其主要工作之一。当时在上海各工厂区里有成千上万的儿童在贫苦中挣扎着,他们被愚昧所蒙蔽。宋庆龄看到这些无辜的儿童遭受着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摧残,忧心如焚,感到开辟多样性的儿童福利工作是当前迫切需要从事的工作。在宋庆龄的积极提倡和直接领导下,中国福利基金会成立了儿童工作组,经过努力,第一儿童福利站很快在沪西胶州路一所学校里建立起来了,紧接着又建立了第二和第三儿童福利站。

儿童福利站最重要的工作是扫盲。宋庆龄采用了陶行知开创的“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进行儿童识字教育工作。先由福利站的教师培训“小先生”,再由“小先生”带着小黑板到弄堂里、人行道上、棚户区去上课,使广大贫苦儿童能就近识字。通过组建“小先生”队伍,形成了儿童自己的集体,依靠他们逐步把成千的失学儿童组织到识字班里。到1949年5月,儿童福利站的“小先生”已有170人,开办了几百个识字班,到识字班学习的儿童近5000人。“小先生制”的推行,以少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取得了较好的扫盲成果。

儿童福利站还开展妇幼保健和公共卫生教育工作。每个福利站都有保健室,至少有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负责日常治疗和预防接种两项工作,还有一些热心的





■ 1947年，宋庆龄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福利站指导识字班的孩子读书（该男孩名叫吴方，后成为成都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的工程师）



■ 义卖展览会现场

医生自愿来站尽义务,免费为孩子和母亲进行简单的治疗。那时,贫苦儿童连吃饭都成问题,根本无钱就医,听说这里看病不要钱,每天有很多人来。虽然保健室只有十几平方米的面积,每周却有 1000 多病人上门求诊求药。福利站还设有营养站,将牛奶、猪油、维生素、大米、面粉等食品及营养品分配给营养不良、身体瘦弱的贫苦儿童。三所儿童福利站创办以来,热心为儿童服务,深受欢迎。许多儿童从这里得到从未得到过的益处,当时的报刊也载文赞誉儿童福利站“使贫苦儿童得救”。

宋庆龄认为仅仅向上海的贫苦儿童提供医疗和营养方面的服务是不够的,这些孩子还需要精神食粮。所以她建议创办一个儿童剧团,儿童剧团的任务是“通过歌咏、舞蹈与戏剧来教育千千万万的儿童和成人”。中国第一代的儿童戏剧队伍从此建立起来了。宋庆龄亲自指定该剧团排演的第一个剧目,是鲁迅翻译、董林肯改编的苏联优秀儿童剧《表》。这次演出宣告了儿童剧团的正式成立。演出的所有收入用以免费招待贫苦儿童。宋庆龄还为剧本《表》正式出版亲笔题词:“《表》是一出深刻而动人的儿童剧……它不仅对儿童有很大的教育作用,同时也给予从事儿童教育者一个明确的启示。”

救济“三毛”

涌入上海,上海街头的流浪儿童越来越多。宋庆龄深为这些儿童的命运担心。当时,漫画家张乐平创作的《三毛从军记》、《三毛流浪记》等作品,刻画了中国儿童遭受战争、贫穷、饥饿、疾病等种种苦难的悲惨生活。上海报界连载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流浪儿三毛可怜而可爱的形象家喻户晓,引起了人们对流浪儿的广泛同情。宋庆龄也非常喜欢“三毛”,她曾特地购买“三毛”画册赠送给外国小朋友。在和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商量后,宋庆龄决定,借“三毛”的影响,举办“三毛乐园会”和“三毛原作展览会”,尽可能多筹措资金来救济这些流浪儿童。当时定出的方案是:不论何人,只要愿意每月出三块银元救济一个“三毛”的,就是“三毛乐园会”的会员(按照当时物价,一个孩子每月的基本生活费用大概要三块银元);愿意每月出15块银元,救济五个“三毛”的,便是荣誉会员;凡是赠送衣物、食品、玩具的,便是会友。“三毛乐园会”的开办费,来自“三毛原作展览会”的收入。

中国福利基金会同张乐平联系,希望他举办“三毛原作展览会”,并在会上举行义卖,救济上海街头流浪儿童。张乐平一口答应。其时张乐平肺病未愈,常常吐血,但他仍拖着虚弱的病体,一鼓作气,仅几天时间,就拿出了构思方案。宋庆龄看了十分满意,即答复同意。当时还在嘉兴埋头作画的张乐平接到答复,立即赶到上海,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精心赶制了30多幅“三毛”水彩画供展出义卖,并特地为“三毛乐园会”设计了一枚别致的纪念徽章。张乐平还将所创作的《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等300多幅画的原稿全部拿出来展览。

3月底,宋庆龄安排借汇丰银行礼堂举行预展,邀请在沪的外国友人和各界名流前来参观,并亲自出席。张乐平后来追忆这唯一一次与宋庆龄的会面说:“那天,宋庆龄坐在我的旁边,她当时已50多岁,看上去却不过40岁的样子,衣着朴素,仪态大方,举止端庄。同外国朋友谈话,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同我讲话,却是一口地道的上海话。她很亲切地问我是什么地方人,家庭情况如何,怎么画起‘三毛’来的,等等,完全是亲切的家常式的谈话。外国朋友同我谈话,宋庆龄亲自翻译。开始我还有点拘束,看到她这样和蔼可亲,就很快自然起来。她一再向我表示感谢,说:‘这次你为流浪儿童做了件大好事,真太辛苦你了。’听了这些话,我非常感动。”



4月4日至9日,“三毛乐园会”和“三毛原作” ■ “三毛乐园会”纪念章



■ 供义卖的“三毛”水彩画

展览会”在大新公司四楼书画部正式举行,义卖活动也同时开展。由于宋庆龄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展览会吸引了上海各界人士踊跃参观,会场内人头攒动,盛况空前,30多幅画很快就被抢购一空。除了这些水彩画,会场上还卖掉了许多有张乐平亲笔签名的《三毛流浪记》画册和“三毛乐园”徽章。当天,就有40余人表示愿意加入“三毛乐园会”为会员或会友,出资救济“三毛”。

这次活动办得非常成功,许多人出于对“三毛”悲惨遭遇的同情,纷纷慷慨解囊,捐钱捐物,六天内共募得银元3206块。事后,宋庆龄还专门写信,向张乐平表示鼓励和感谢,赞扬他“为流浪儿童做了件大好事”。

25 “延安的朋友们都惦念着您”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个冬天,宋庆龄在上海靖江路45号(今桃江路45号)寓所迎来了陈友仁之子陈依范。他刚刚从延安回来,给宋庆龄带来了一封重要的英文信件。这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的周恩来写给宋庆龄的一封感谢信,感谢宋庆龄对解放区的支持和援助。信的开头就写道:

“我们回到延安已将一月。延安的朋友们都惦记着您,感谢您为解放区人民所做的工作。”

继续支援解放区医药卫生事业

1945年8月,在中国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作出了巨大牺牲,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年底,宋庆龄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将保卫中国同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并将组织从重庆迁到上海。她重新确定了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重点和基本方针,指出: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重点是帮助中国人民度过战后的困难时期。中国福利基金会在工作方针上则继承保卫中国同盟的传统,一方面让海外朋友们知道中国人民的真正需要;另一方面把捐款、医疗物资和其他捐助物资运送给真正和迫切需要的人们,使捐赠最有效地得到应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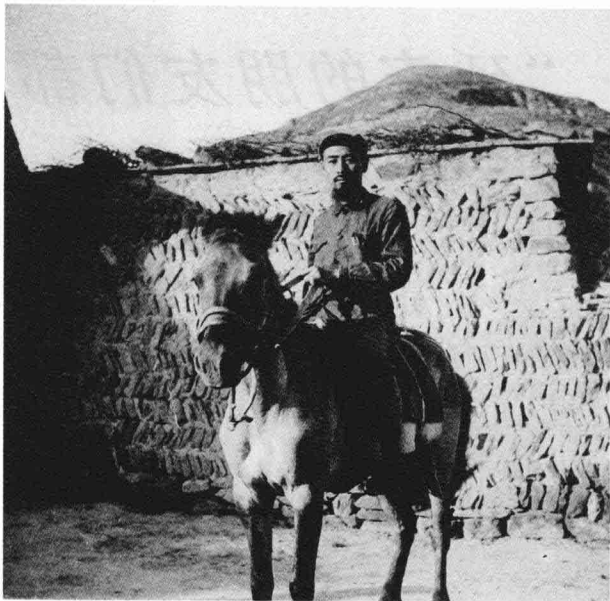
在战后严峻形势、复杂环境中,宋庆龄既要领导中国福利基金



■ 上海靖江路(今桃江路)45号宋庆龄寓所

25

「延安的朋友们都惦念着您」



■ 1936年，周恩来在陕北留影（此照由摄影者埃德加·斯诺赠宋庆龄）

会的组织运作，又要密切注视时局的发展，掌握和了解解放区的实际需要，全力以赴争取外援，用好外援，发挥中国福利基金会求援救助工作的真正作用。她每天都要撰写大量信函发向海内外朋友和友好团体，阐明“我们工作计划的新重点，是给人民以生活和建设的”机会”，说明“中国现在万分需要精神、物质和技术的支援，以度过战后这一段困苦的期间”，感谢他们对

中国人民的帮助和支持。为此，她分分秒秒的时间都被工作占满了。

为了将援助送给真正和迫切需要的人们，宋庆龄做了大量积极有效的争取工作。她曾设家宴，专门招待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专管药品和医疗器材的美国医生鲍锡克，向他介绍各解放区在抗日战争中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希望他能主持公道，多分配给解放区质量好的药品。

同时，宋庆龄还争取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许多工作人员同情与支援解放区军民。其中，医务官夏理逊两次带队把中国福利基金会捐购的大批医药物资运送到华北解放区，因沿途遭国民党反动派的刁难和折磨，加上极度劳累而不幸于1947年1月10日病逝于山东张秋。他在逝世前还在不停地呼叫：“快点呀，那些病人等待着药品救命呐！医生的眼睛都盼穿了……”

当时的上海处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之下，医药战备物资更是被严密封锁。为了保证物资能安全无损地运到解放区，宋庆龄经常到仓库亲自检查药品的包装，并委托可靠的专人押运物资。她一面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渠道源源不断地将物资秘密运送到解放区，一面通过国际友人，以国际红十字会的名义，冲破重重封锁和阻挠，将大批医药物资运到解放区。

1946年夏，宋庆龄用国外捐款，在菲律宾马尼拉向美军剩余物资处理机构购买了一所拥有250张床位的医院全套设备，共1217箱、重430吨。这批物资运抵上海后，分装了大约100多条船只。宋庆龄通过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行政院

救济总署的多方交涉,将这批物资分批从上海经镇江、扬州,沿运河线运送到苏北解放区的淮安城湖心寺,创建了苏北第四国际和平医院。她还给山东野战军送去数十箱磺胺药品,向苏北淮安运送了50箱西药。新四军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政治委员邓子恢亲笔写信,感谢孙夫人的宝贵援助:“蒙赠西药伍拾箱,已如数点收,隆情厚谊,至为铭感,特代全体指战员致谢。”

在宋庆龄及其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到1948年,8个解放区的国际和平医院由原来的4所发展为8所,还有42所分院以及数十个战地巡回医疗队,此外,还有6所白求恩医科学学校和许多短期医科培训班以及数家制药厂。

正如沈其震后来回忆所说,宋庆龄和中国福利基金会“秘密地为解放区筹集药品和物资,其数量之大,一时难以统计清楚。只记得,仅华东军区一次转移中,就用了500名民工搬运了一天多”。

呼吁组织联合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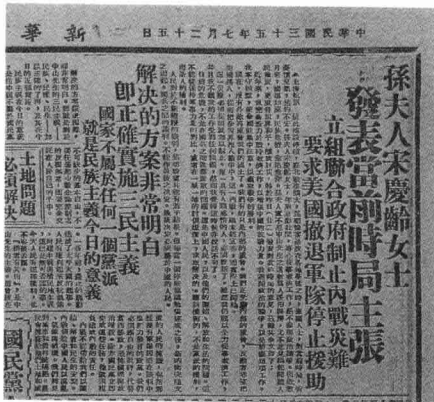
抗日战争胜利伊始,1945年8月2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接受国民政府主



■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若飞等在赫尔利及张治中的陪同下赴重庆谈判

25

「延安的朋友们都惦念着您」



■ 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刊登宋庆龄声明

席蒋介石邀请,同周恩来、王若飞等,从延安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10月10日,双方签订了《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在重庆,毛泽东多次会见了宋庆龄及其他民主人士,宋庆龄也在重庆寓所设宴招待抵渝参加和谈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毛泽东对宋庆龄给予解放区的援助表示感谢,尤其对宋庆龄忠诚不渝地信守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以及不顾个人安危、献身

国家民族的高贵品格,表示了由衷的敬意。宋庆龄感到毛泽东“不但是一党的领袖……他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

《双十协定》签署后,1945年12月,在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调停下,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在重庆再开和谈之门。

国共双方曾一度达成《停战协定》,并召开了由各派政治力量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然而《停战协定》墨迹未干,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派军队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7月,为推进中国民主事业而奋斗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闻一多相继遇害。

宋庆龄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

7月18日,宋庆龄在寓所会见前来拜会的周恩来后,于22日发表了掷地有声的《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她说:“最近几年来,我一直从事于战时救济工作,给中国的抗战增加一份力量。我避免参加政治方面的争论,以免影响工作。我的沉默是为了集中全部精力来争取战争的胜利。”“但是,现在我觉得有讲话的必要了。”她断然指出:“国共谈判是不能得到最后答案的。最后的答案必须由中国人民来决定。”并强烈呼吁:“联合政府应当立即组织起来。”“国民党必须通过联合政府、人民民主和土地改革来执行它的历史任务,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全面解放。”她还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最后她再次疾呼:

“我特向中国两大党的领袖们和其他党派的领袖们呼吁,立刻将联合政府组织起来。”

“我向美国朋友们呼吁,你们应当阻止所有的军事援助,并帮助一个属于中国



■ 1948年,宋庆龄在检查中国福利基金会运往解放区的医药物资



人民的政府，来推动这样一个运动。”

宋庆龄的声明得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一致拥护。在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发表谈话，赞成宋庆龄的声明，认为为了促进和平，美国应该放弃对中国的军事干涉，这是美国人民所欢迎的。美国共产党也发表宣言，要求美国政府撤回一切在中国领土上的美国军队。与此同时，美国一些议员和各大媒体纷纷发表谈话和评论，支持宋庆龄的意见，谴责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援助，主张撤退驻华美军。在中国，一些著名人士和进步团体也纷纷发表通电、声明或公开信，拥护宋庆龄的立场，要求把中国从内战、分裂、混乱、恐怖和穷困中拯救出来，建立民主统一的新中国。

一时间，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美国政府不得干涉中国内政的呼声遍及全国，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此起彼伏。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美国政府不得不从1946年8月开始，停止批准向中国出口作战用的军事装备许可证。9月29日，美国政府又发布一项指令，暂停向蒋介石政府交付计划中的一切军用物资。

然而，国民党政府仍然一意孤行，于11月15日在南京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致使政协解体。次日，周恩来愤然在南京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撕



Dec. 17, 1946

Dear Madam:

I have arrived at Yenan for nearly a month. Friends in Yenan have great regards for you and think for the work you have done for the people of the liberated areas.

Jack Chen who came here from Peiping has kept us informed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countries in Europe, especially that of England. Under the present situation when the revisionist imperialists are trying to dominate the world,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peoples is no less than that between Americans and Chinese peoples. I would like to urg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 work more in concert so as to isolate the reactionaries of America in that country who follow exactly the revisionist l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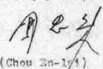
Under the present world situation, on the one hand, the great strength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resurgence of the new democratic countries, the resurgence of the British and French peopl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of colonies and semi-colonies, headed by China, the growing consciousness of the people in the former fascist countries and finally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America, and the mounting economic crisis which is bound to come before long in America—all these mark the new dawn toward peace and democracy.

On the other hand, the American imperialists and their collaborators in other countries, the reactionaries elsewhere, become more isolated day by day under the aforementioned situation. This is true, first of all, in China where Chiang Kai-shek's rule through five-month of serious civil war and the conviction of the one-party controlled National Assembly has now more isolated this man. If the civil war drags along and Chiang Kai-shek's armed forces are greatly subdued in a few or a year, it will be gradually more probable that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liberated areas be gradually in an equal position with those of Chiang Kai-shek's. Then, we will find that in China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increasing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democratic life and the wide-spread resistance of the people in new areas, and in addition, the economic international situation—all new tide of democratic movement will inevitably come. Therefore, if the Chinese people are united in the direction toward peace, democracy and independence, and pass through the difficult historic period, a future, bright and victorious, is bound to come.

We appreciate highly your efforts and wish, in particular, to share with you the difficulties you confronted in this difficult historic period. It is our belief that your efforts will not be in vain. The people not only in the liberated areas but in other parts of China as well feel proud of such a leader like you who serve the people unreservedly.

I do not recommend Jack Chen to you, hoping that you will spare time to discuss with him how to build connections with the progressive people and the younger associations in England and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extension of relief work.

Please accept my wife's and my respect and best regards for you.

Sincerely yours,

 (Chou En-lai)

■ 1946年12月17日,周恩来致宋庆龄函

毁政协决议,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关闭和谈之门的罪行,并宣布中共代表团即将撤回延安。

12月17日,周恩来通过陈依范向宋庆龄递交了他的亲笔感谢信:

“我们很敬佩您的努力,尤其愿分担您在这一历史困难时期所遭遇的困难。我们相信您的努力绝不会徒然的。不仅解放区,全中国人民都会感到骄傲,因为有你这样一个永远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者。”

25

「延安的朋友们都惦念着您」



26 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1949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在上海逸园饭店隆重举行庆祝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诞辰28周年。这是上海人民在赢得解放后迎来的第一个盛会。这一天,宋庆龄由邓颖超、廖梦醒陪同参加了大会,与出生入死的战友们相聚在这里。

和广大的上海人民一样,宋庆龄在历史转折的时刻,经历了黎明前的黑暗,迎来了人民的自由和胜利。

“我与我们的人民一样渴望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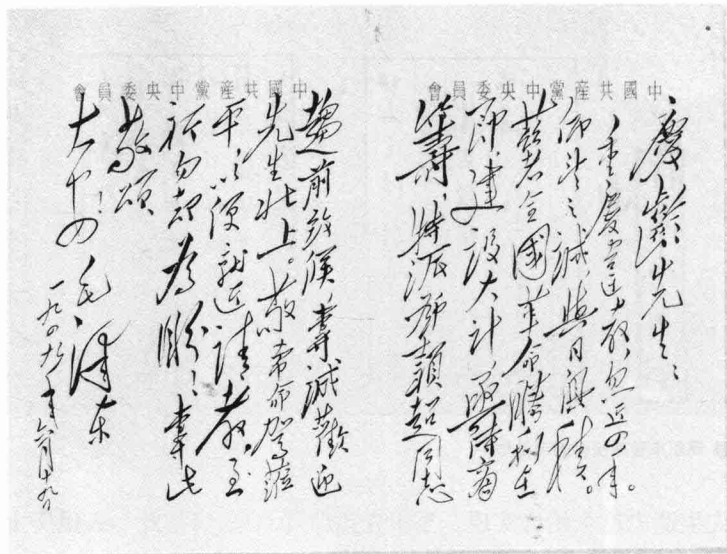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战略决战,接连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已是摇摇欲坠,朝不保夕。绝望之际,国民党企图借用宋庆龄的威望挽救这个濒危政府。他们大肆散布谣言,说孙夫人已收到国民政府的请求并打算接受。于是宋庆龄在1月10日签发《中国福利基金会声明》宣布:“关于她(宋庆龄)将在政府中就职或担任职责的一些传说,是毫无根据的。”



■ 上海林森中路1803号宋庆龄寓所(今淮海中路1843号宋庆龄故居)

1月21日,蒋介石以退为进,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22日,李宗仁宣布就任代总统职,同时派特使甘介侯持其亲笔函赴沪访宋庆龄等人。李宗仁希望宋庆龄等能帮助他与共产党谈判,企图借长江天险“划江而治”,他力邀宋庆龄“出为领导,共策进行”。

早在1946年7月22日,宋庆龄在蒋介石



■ 毛泽东致宋庆龄的亲笔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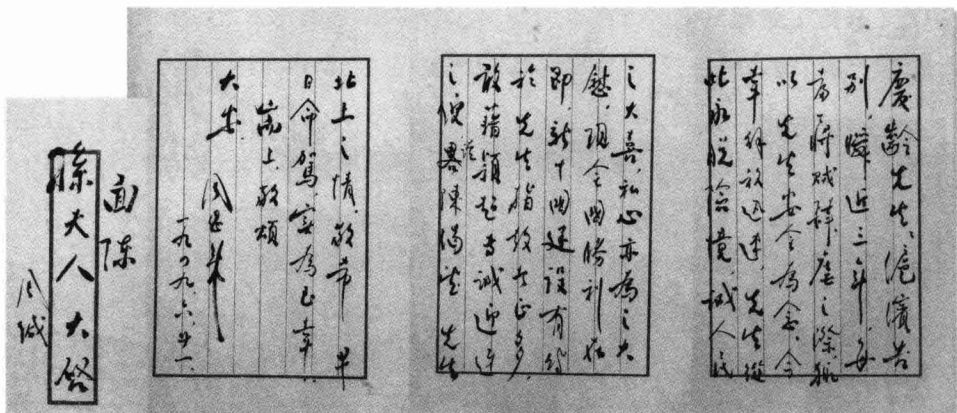
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后就发表过一个声明，呼吁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但是当时，国民党内很多人都嘲笑宋庆龄是“红色傀儡”，根本就不把她的话当回事。

两年过去了，形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李宗仁妄图与中共“划江而治”的计划，宋庆龄是不会助其实现的。甘介侯找上门来时，宋庆龄正在生病，但他仍然不依不饶地一天来好几次。出于礼貌，宋庆龄最终还是硬撑着病体从床上起来会见了，耐心地听完了他的叙述后，向他表示对李宗仁等的和平努力“非常同情”。宋庆龄事后颇为痛苦地向友人表示：“很自然，我与我们的人民一样，渴望和平。我们希望很快找到解决这一僵局的办法，因为它使我们的生活难以忍受，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身体上，更不用说我们大家都遇到的各种物质困难。我们中一些有远见的人曾经想努力避开这种结果（我两年前的声明可以作证）。但是历史正在选择一条破坏极大的、痛苦的道路。”不久，李宗仁亲自上门邀请宋庆龄“共策进行”，希望她能以个人身份北上，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他“谋求和平的诚意”。这一次，宋庆龄毫不客气地回绝了他。

与此同时，面对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宋庆龄则给予了积极回应。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中国共产党决定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的代表共赴北平，商讨筹建新中国的宏图大业。为此，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宋庆龄：“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



宋庆龄



■ 周恩来致宋庆龄的亲笔信

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的伟大事业，并对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为了尊重宋庆龄的意见、保证她的安全，毛泽东、周恩来特地嘱咐潘汉年：“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字里行间表达了中共领导人对宋庆龄无比的尊重和深挚的情感。

宋庆龄接到电报，十分欣喜，然而当时她身体欠佳，一时间实在难以北上。她致函毛泽东、周恩来，表示：“我非常抱歉，由于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着你们的事业。”她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充分信任和对人民革命事业的支持。

“我们终于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步步推进，国民党政府开始进行垂死挣扎。他们在上海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还胁迫或劫持许多不愿离开大陆的各界名人和党国要人去台湾。在上海解放前夕，宋庆龄迁进了她以后在上海一直居住的林森中路1803号。

在愈演愈烈的白色恐怖之下，宋庆龄虽然身处险境，仍时刻关心着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福利会以及儿童剧团的工作人员的安全。她秘密地为他们安排住处，让他们作好准备，迎接上海的解放。

5月27日，宋庆龄在林森中路1803号迎来了上海解放。

上海解放了，上海人民获得自由了，宋庆龄是多么兴奋啊！次日，她愉快地给友人写信表示：“感谢上苍，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 1961年5月11日,宋庆龄在上海寓所接待前来探望的毛泽东



史良来向她表示祝贺和慰问,她拉着史良的手激动地说:“解放了就好了。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它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

赵朴初来向她表示祝贺和慰问,她微笑着把一朵红玫瑰花插在他的西装衣领……

6月30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的陪同下,来到逸园饭店,参加在此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庆祝大会。宋庆龄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向中国共产党致敬》的祝词,因身体不适,由邓颖超代为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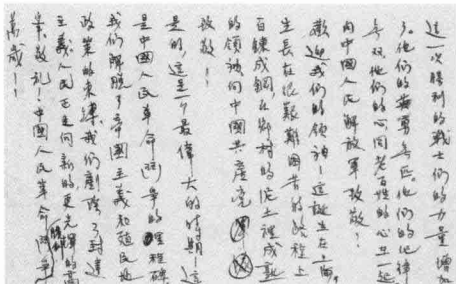
这是中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个最伟大的时期。我们的完全胜利已在眼前。向人民的胜利致敬!

这是我们祖国建设和前进的动力,我们的旗帜是“生产”,更多的生产。向人民的力量致敬!

这是我们祖国的新光明。自由诞生了。它的光辉照耀到反动势力所笼罩的每一个黑暗角落。向人民的自由致敬!

这是胜利的高潮,荡漾到每一个口岸。各国的人民运动风起云涌,把我们的力量和他们合在一起,加强这勇敢的战斗。向全世界民主斗争中的同志致敬!





■ 宋庆龄撰写的《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原稿

这一次胜利的战士们力量增加了。他们的英勇，无匹；他们的纪律，无双；他们的心，同老百姓的心在一起。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欢迎我们的领袖——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很艰难困苦的路程上百炼成钢、在乡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袖。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是的，这是一个最伟大的时期——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里程碑。我们解除了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政策的束缚。我们铲除了封建主义。人民正走向新的、更光辉的高峰。敬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胜利万岁！

向人民致敬！向中国共产党致敬！这充满深情的诗一般的祝词感染了在座的每一个人，全场顿时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其实，此时陪在宋庆龄身边的邓颖超是身负重托来到上海的。几天前，她到达上海的当天下午，就来到宋庆龄的寓所。在客厅里，她将两封意义非凡的来信交给了宋庆龄。

宋庆龄接过信，都是她熟悉的笔迹。第一封正是毛主席邀请宋庆龄北上的信，一行行遒劲豪放的字迹跃然纸上：“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第二封周恩来的信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宋庆龄读完两封来信，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北平是宋庆龄的伤心之地，失去孙中山的悲痛仍然刻骨铭心。经过邓颖超的殷殷劝慰，宋庆龄毅然作出决定，同意北上。

1949年8月26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以及上海军管会交际处长管易文的陪同下，从上海启程，乘火车前往北平。



27 在天安门城楼上

在开往北平的火车上，宋庆龄靠窗而坐，不知疲倦地遥望着窗外。她乘坐的是头等卧车，这是中共中央考虑到她病体难支，特嘱上海市委为她而备的。看着祖国大地一派繁荣的景象，宋庆龄早已忘记了连日的病痛，心中不由得感慨万千。她想到了孙中山的一句话——“行易知难”。眼前所证明了中国人民是会“行”的，在具备技术知识后，是能够克服任何困难的，也是会“知”的。中国人民正在努力克服艰难和障碍，中国正在迅速恢复建设。

两条革命洪流的汇合

1949年8月28日下午4时15分，宋庆龄的专列终于缓缓地驶进了古都北平的前门火车站。

这时候，火车站彩旗飘舞、人头攒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廖承志等50余人早已等候在站台上。细心的人们注意到，毛泽东身上穿着那件他平时不大穿、只有迎送知名人士时才穿的浅色衣服。

宋庆龄的专列刚一停稳，毛泽东便走上车厢，与宋庆龄握手，并说：“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宋庆龄高兴地说：“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向你们祝贺。”毛泽东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宋庆龄回答道：“祝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简称《共同纲领》。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共同纲领》包括序言和总纲、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7章，共60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施政纲领。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前，实际上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



贺中国共产党在你的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

宋庆龄在毛泽东陪同下走出车厢。欢迎的队伍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随后，她愉快地接过了洛杉矶儿童保育院的孩子们献上的鲜花，与何香凝、邓颖超、周恩来同车



■ 宋庆龄抵达北平火车站

前往寓所休息。当晚,毛泽东在中南海为她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

宋庆龄此次北来代表了中国革命中两条洪流的汇合——一条是由孙中山发起的,一条是由共产党领导的。

出席开国大典

9月21日,北平碧空如洗、气象万千。中南海怀仁堂里,600余位来自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内各民族、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地区以及海外华侨的代表济济一堂,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式。

宋庆龄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她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89人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她还当选了主席团的常务委员。在会上,宋庆龄与代表们一起表决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及国旗、国歌、首都所在地等重要决议,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好了准备。

21日,宋庆龄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今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



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宋庆龄、朱德、刘少奇等六人被选为副主席,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高悬着八盏大红宫灯,靠着城楼左右两边的石栏上,八面红旗迎风招展。天安门广场上汇集了从四面八方来的群众队伍。人们有的擎着红旗,有的提着红灯,到了正午,天安门广场已经成了人的海洋,红旗翻动,像海上的波浪。

下午3点整,天安门广场上爆发出一阵排山倒海的掌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和宋庆龄、朱德等其他副主席以及各位政府委员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主席台上,与群众见面了。30万人的目光一齐投向主席台。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主席用他那带着湖南口音的洪亮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顿时,广场上欢声雷动,群情激昂。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毛泽东按动电钮,新中国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场肃立,向国旗行注目礼。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28年的光辉历程。





■ 建国初期的宋庆龄



■ 宋庆龄出席开国大典

此时,遥望着摆放在天安门对面的孙中山巨幅遗像,宋庆龄心潮澎湃,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回忆像潮水般在她心里涌起来,许多牺牲了的同志,连年的伟大奋斗和艰苦的事迹,又在她的眼前出现。但是,另一个念头紧抓住她的心,她知道,这一次不会再回头了,不会再倒退了。这一次,孙中山一生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

在新生的北京,宋庆龄又相继出席了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以及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担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执行主席,当选中苏友好协会第一副会长。虽然日程紧张、工作繁忙,但宋庆龄始终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之中,她对北京的感觉也完全不同于她在1925年所经历的。

1925年的时候,这座历史的古城被反动势力所盘踞,也是孙中山不幸逝世的地方。然而,今天,这座城市变成了人民的讲坛,人民在这里发出了声震云霄的洪大的呼声。宋庆龄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她仿佛有了一种决心、一种力量,要为建设新中国全力以赴。

10月10日,宋庆龄带着为新中国献出一切力量的决心离开北京回到了上海,回到了她所熟悉的工作之中。

新中国建立后,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宋庆龄更加重视国际宣传,在1950年提出“我们认为国际宣传将是一件重要工作”,“让我们把中国的真实情况传达给全世界的人民”。

“创办一个像样的月刊”

新中国建立后面临着严峻的形势。虽然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西方一些国家不承认新中国,对新中国采取封锁、孤立、包围和敌视的政策,妄图扼杀新政权。在这种客观形势下,如何实现中国与不同制度国家间的友好交往,突破帝国主义的外交封锁,成为新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宋庆龄十分关注如何拓展对外宣传工作。她多次致函周恩来,要求允许中国福利会承担这方面的工作,“创办一个像样的月刊”来扩大对外宣传。

周恩来十分重视宋庆龄对



■ 建国初,宋庆龄在上海寓所



宋庆龄

把中国人民对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愿望传播得更广泛，并且加强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团结。

中国建设创刊十周年

周恩来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 周恩来为祝贺《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十周年的题词

经历和丰富经验，创办一本对外宣传刊物。他甚至对未来刊物的经费问题、人事问题，以及创办时间等问题都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意见，对此，宋庆龄表示完全同意。

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建议，1951年1月21日，宋庆龄在北京方巾巷寓所会见了刚从美国回国的陈翰笙、顾淑型夫妇，商谈办刊事宜，并委托陈翰笙去上海，与她最为信任的有国际宣传经验的金仲华一起，依靠中国福利会的力量筹办新刊物。宋庆龄还邀请正在美国的爱泼斯坦及夫人邱茉莉返回中国参加办刊，研究制定刊名和杂志方针、对象等重大问题。他们都是宋庆龄在抗战时期所办的《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的骨干。

6月，宋庆龄确定了新刊物的名称为《中国建设》。8月30日，她亲自在上海市常熟路157号中国福利会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国建设》筹备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了刊物的编辑方针、读者对象及报道内容，决定“这杂志的读者对象是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国家的进步人士和自由主义者以及同情或可能同情中国的人。它特别对那些真诚要求和平，但在政治上并不先进的自由职业者和科学、艺术工作者”。“重点报道中国社会、经济、文教、救济和福利方面的发展，以使国外最广泛的阶层了解中国建设的进展，以及人民为此所进行的努力。”为突出民间团体刊物的特色，更能为国外读者所接受，会议规定：“一般不刊载文件和政治报告的原文、理论、政治和军事文章。”还要求刊载的文章要做到内

未来工作的规划，虽然政务异常繁忙，但在宋庆龄来京参加建国一周年庆典时，他仍多次亲赴宋庆龄在北京方巾巷的寓所，与她进行商讨。周恩来向宋庆龄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一年了，应当向全世界更多地介绍新中国的情况。他同意宋庆龄对未来国际宣传工作的规划，建议她以她与各国人民建立友谊的长期

■ 金仲华
(1907—1968)

浙江桐乡人。早年致力于新文化运动。抗战时期加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



国同盟，并与邹韬奋编辑《抗日》三日刊和《全民抗战》三日刊。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新闻周报》、《文汇报》、《中国新闻》和《中国建设》等社社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等职。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容充实、文章通俗,并配以插图或照片。

这样,一本在新中国具有开创意义,影响重大的对外传播刊物《中国建设》应时而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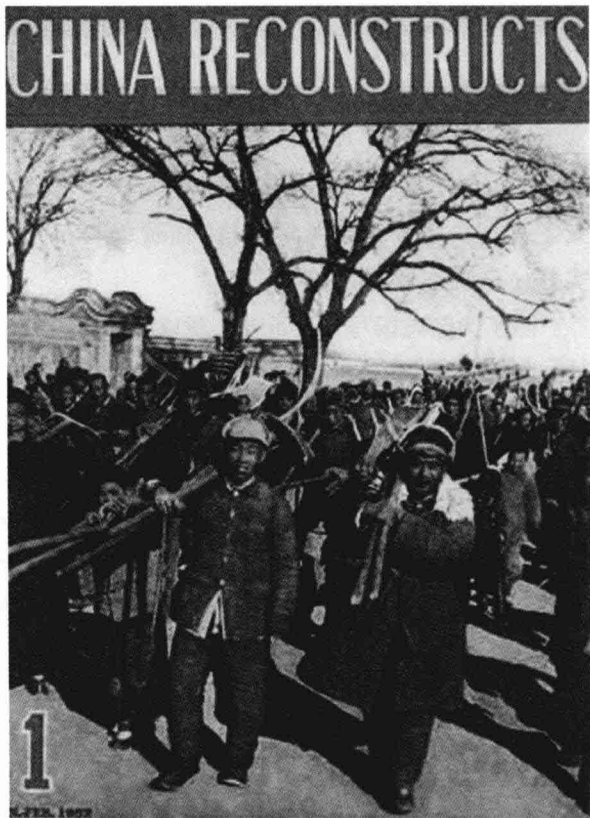
为《中国建设》撰稿

1952年元月,英文双月刊《中国建设》创刊号终于正式出版了。他们选择了当时正在进行的土改运动的画面作为封面,表现了翻身农民的喜悦形象。当第一本样刊送到宋庆龄手上时,她非常高兴,立即写信给金仲华,对他和陈翰笙以及所有工作人员为筹办杂志所作的努力,表示“最深的感谢”。在创刊号上,宋庆龄亲自撰文《福利工作和世界和平》。从此,真实报道新中国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就成了这本刊物的原则和方针。

宋庆龄十分关心杂志质量的提高,常常为杂志的编辑方针和具体稿件,以及设计、图片、印刷质量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她收到新的杂志后,总是仔细阅读并及时评述,提出改进的意见。

自《中国建设》创刊直到1981年她去世之前4个月,几十年间,宋庆龄亲自为刊物撰写了30多篇文章,涉及的题材范围十分广泛,反映了她的活动以及她对一系列国内、国际事务和问题的见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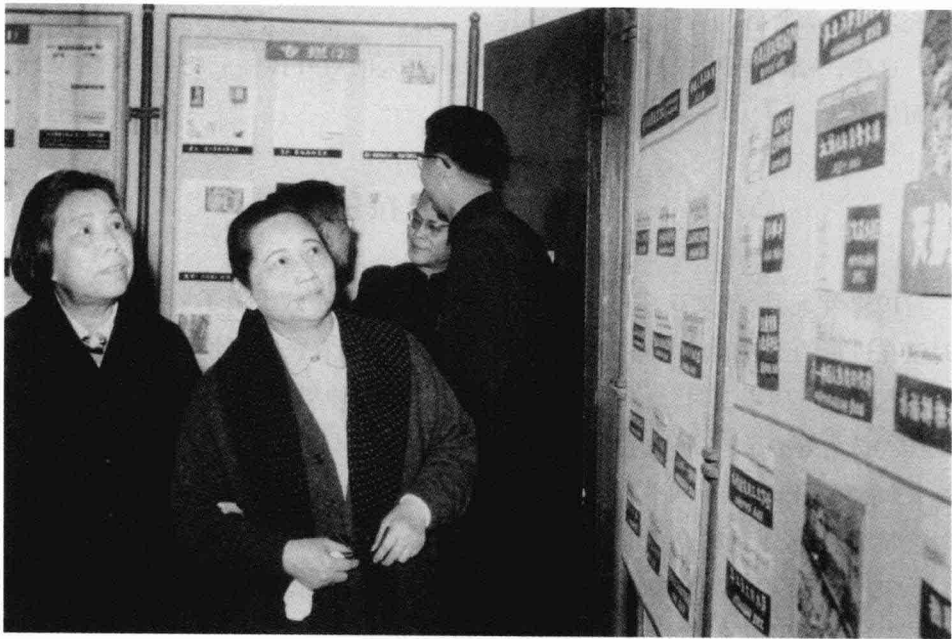
原《中国建设》杂志社总编室主任鲁平说:“她一写文章,这个杂志的销量就上去了。她的文风真是我们应该向她学习的,非常生动,深入浅出,一点都没有八股,而且她自己用英文写,她的英文又



■ 《中国建设》创刊号

28

把新中国介绍给世界人民



■ 1962年1月6日，邓颖超陪同宋庆龄参观《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十周年展览

是非常漂亮的英文。”但是，对于自己为《中国建设》写的稿子，宋庆龄总是非常谦虚。她听到有人说她的文章连一个逗号都不许编辑们改动，非常生气，说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她经常征求别人对她文章的意见，并且总是虚心接受。有一次她特地给编辑写信，称赞编辑部对她的文章的某些部分“改得确实好……现在读起来好多了”。

除了为杂志撰写大量重要文章以外，宋庆龄还给杂志的工作人员写了大量信件。每当节日、纪念刊或新语种版本出版时，或当她觉得哪一期刊物办得很出色时，或当她听到有关对刊物工作的好评时，她总要写信给杂志的工作人员表示祝贺，以资鼓励。编辑部给宋庆龄寄稿费，宋庆龄都不收。1958年11月间，她专门写信嘱咐编辑部：“不要给我寄稿费来。”1960年1月号的《中国建设》杂志，封面是一个梳羊角辫儿的可爱小姑娘怀抱一只雪白和平鸽的木刻画。宋庆龄看后，高兴地给编辑部写信说：“特别喜欢这个封面。”这些信件既反映出她对刊物的亲切关怀，也显示出她的原则性和高尚品质。

此外，每期杂志出版后，宋庆龄都要亲笔书写信封，给她在世界各地的几十位好友寄去杂志，并征求意见。这些幸运的收件人，无不把它视为珍贵友谊的象征。有的人把她亲笔写的信封作为“文物”保存起来，留作永久的纪念。

“志存高远 兼济天下”

陈一德教授在采访中，多次提到宋庆龄女士，说她是真正的“中国福利事业的奠基人”。



■ 197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北京寓所举行小型招待会，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



“《中国建设》将是最受欢迎的杂志”

《中国建设》正式发行后,就引来了一片赞扬之声,周恩来总理对第一期非常满意。宋庆龄得知后非常高兴,她预言:“《中国建设》将是最受欢迎的杂志。”

的确,《中国建设》代表着新中国的声音,在宋庆龄与周总理的关怀指导下成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曾经有英国工人冒着被老板开除的危险,在贴身内衣藏着英文版的《中国建设》杂志。当别人问他为什么爱看中国杂志,为什么那么想了解中国时,他回答说:“我尤其爱看《中国建设》,它帮助我了解了中国的许多事情。”

一本刊物在外国读者的心中有如此的分量,这不得不让人想起这本刊物艰辛的创办之路和几十年走过的不平凡历程。

《中国建设》创刊期间,条件十分简陋,最初编辑部虽设在北京,却连办公室都没有,所以创刊号的设计工作是由陈翰笙和李伯悌在中山公园的一条长凳上进行的。刊物的印刷、出版、推广、发行工作在上海,每当付印前夕,爱泼斯坦夫妇都不辞辛苦乘火车来回奔跑在京沪两地。这种情况,直到1953年全部工作并归北京以后才告结束。杂志社在北京东皇城根一座清朝的四合院里。春天,两棵丁香树盛开,香气满院,屋子里不断传出打字机的声音。休息时,大家在院子里做操、打球,





■ 《中国建设》1957年第1期封面

业余合唱队在丁香树下练歌，中午还可以吃到食堂师傅为大家做的美餐，俨然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大家都想把这本杂志办成受世界广大读者喜爱的刊物，每当杂志出版时，就好似自己的孩子呱呱坠地般喜悦。这个温馨的画面，被漫画家捕捉到并用夸张的艺术手法，生动地呈现在1957年1月为庆祝创刊五周年的封面上：杂志的创始人宋庆龄，手持橄榄枝坐在飞机上为世界和平奔忙，院内外记者们忙碌地采访的场景，宁静的杂志社小院呈现出沸腾的现实生活。一位外国记者曾经这样形容当时的编辑部：“一些洋人和留过学的半洋人在这座中国传统的院落里用西方人熟悉的语言来描述这片古老土地上的新变化。”

英文版《中国建设》自创刊以后，不断成长。1955年，由创刊时的双月刊改为月刊。从1960年起，陆续增出其他语种的版本：如西班牙文版、法文版、阿拉伯文版、俄文版、德文版、葡萄牙文版、中文版等，创办人宋庆龄都一一目睹了这些版本的诞生。

《中国建设》在宋庆龄的主持下，伴随着新中国一起成长，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1990年1月起，《中国建设》杂志更名为《今日中国》。它继续有效地体现宋庆龄确立的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与友谊的办刊宗旨，成为传播中国新变化的重要窗口。



29 掌上明珠

宋庆龄视少年儿童为“掌上明珠”，把少儿工作视为缔造未来的伟大事业。

1950年8月15日，中国福利基金会正式更名为中国福利会。这一名称是由宋庆龄亲自确定的。宋庆龄曾亲自解释了改为这一名称的主要原因：“由于‘研究机构’（Institute）这个字体现了我们组织的最终目的。这就是，我们要体现我们是从事母亲儿童文化福利工作的权威机构。”本着这一宗旨，中国福利会在妇幼保健卫生、儿童文化教育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实验性、示范性和科学研究工作。

创办新中国第一个少年宫

1960年1月27日，正值春节前夕，宋庆龄在金仲华副市长的陪同下来到了中



国福利会少年宫。当宋庆龄经过门厅时，一位佩戴“小伙伴服务队”标志的少先队员，看到进来的是敬爱的宋奶奶，立刻立正，敬了一个少先队队礼，随即指着镶嵌在墙上的一块大理石说：“上面镌刻的就是宋奶奶为我们少年宫的题词。我们小伙伴服务队就是按照宋奶奶的教导，‘学习为集体工作，为祖国做有益的事’。”宋庆龄满意地点点头，表示赞许。

正在少年宫大厅等候的孩子们，看到了日夜思念的宋奶奶，都笑着向宋庆龄围了上来。接着，宋庆龄饶有兴味地欣赏了小伙伴们的音乐和舞蹈节目。演出结束，宋庆龄显得格外高兴，带头为孩子们鼓掌，孩子们也使劲地鼓掌。宋庆龄向跳舞的孩子们招招手，示意他们过来。孩子们像小鸽子一样飞向宋庆龄的怀抱……

这座少年宫还是宋庆龄赠给孩子们的儿童节礼物呢！原来，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认为儿童的教育仅靠学校的课堂教育远远不够，必须更深入、广泛地开拓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工作。她说：“我们要通过这个事业为儿童文化工作开辟一条道



■ 1965年6月1日，宋庆龄在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和孩子们一起



路,在各地发展起来,一直到中国有了上千儿童文化宫为止。”

于是,在中国福利会1952年年会上,宋庆龄提出“利用原来的儿童福利站的人力物力和多年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筹办少年宫”。宋庆龄还亲自参与了宫址的选定。1953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宋庆龄把一幢巍峨壮丽的大理石宫殿送给了上海市的少年儿童,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以“少年宫”命名的校外教育机构。

从那以后,无论是上海还是北京的少年宫,都留下了宋庆龄的足迹,还有她慈祥的笑容。

1959年,当孩子们在欢度自己节日的时候,宋庆龄来到北京市少年宫,观看全国儿童画展。孩子们夹道欢迎宋奶奶,把鲜艳的红领巾献给了宋奶奶。宋庆龄戴上了红领巾,还向孩子们敬了一个队礼。她不断向孩子们挥手致意,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少年宫各科小组的活动室。宋庆龄来到工艺美术室,绒鸟小组的孩子们把自己制作的一幅“群鸡”送给她。宋庆龄看着那一只母鸡带领着一群活泼可爱的小绒鸡,高兴地笑了,握着孩子们的手夸赞道:“心灵手巧,做得真好。”

创办新中国第一个儿童剧团

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在解放前创办了一个儿童剧团,宋庆龄亲昵地称它为“我的剧团”,一直视它为掌上明珠。她曾经说:“我们办儿童剧团,要给孩子们精神食粮,让他们看到未来。”新中国成立后,儿童剧团宛如一株小树苗,在阳光雨露下茁壮成长。

有一次,宋庆龄来到剧团看望孩子们。在剧团院子里的草坪上,宋庆龄与小演



■ 1952年9月3日,中国福利会儿童剧团抵京后与欢迎者合影

员们围坐在一起,不时发出阵阵爽朗的笑声。这时,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她,新招收的团员分为演员队、管弦乐队、舞台美术队。宋庆龄说:“名师出高徒。一定要给剧团物色好老师,帮助孩子们学习文化知识,学习表演艺术。”当听说剧团建设上还有不少困难,有些规划尚未落实时,宋庆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说道:“儿童是我们未来生命的血液。有些事可以等一等,但儿童工作不能等。”

1952年的夏末,为了庆祝建国三周年,宋庆龄决定亲自带领儿童剧团到北京演出。9月1日,宋庆龄和剧团的孩子们同乘一列火车到北京去。宋庆龄来到孩子们的车厢,关切地询问他们演出的衣着服饰,高兴地听着他们的欢歌笑语。宋庆龄自己也笑得很开心,很满足。途中,服务员给宋庆龄端来一盘鲜美饱满的葡萄。她拿起一颗,刚送到嘴边,忽然问道:“孩子们有吗?”陪同人员如实回答:“没有。”宋庆龄马上把手里的那颗葡萄放回盘子里,叮嘱道:“送给孩子吃吧。”

10月22日晚,中南海怀仁堂灯火辉煌,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气氛。7时30分,宋庆龄陪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来到小礼堂。儿童剧团的小演员们演出了大头娃娃舞、少年队组舞,以及《我们都有一个志愿》、《兔子和猫》等儿童剧。演出结束后,谢幕的帷幕还没拉开,小演员们就迫不及待地从小幕布底下钻出来,对着台下一个劲地招着小手,毛泽东等人高兴得哈哈大笑,扭过头来对宋庆龄说:“这些娃子演得好哇!就让他们在这儿给北京的孩子们演几场吧。”后来,儿童剧团真的又在怀仁堂连演了四场,令首都少年儿童大饱眼福。

宋庆龄对儿童剧团在北京演出成功感到格外高兴,特地把孩子们接到自己家中做客。她亲切地招呼孩子们喝茶、吃点心,还把毛泽东送她的水果拿出来给大家吃。孩子们临走时,她又给大家分了糖果:“我把糖果放在桌子上了,怕你们不好意思拿,所以我中午就已经分好了,都用红纸绿纸包好了,一人一包,里面的糖是一样多的。”

儿童剧团回到上海不久,经宋庆龄多方活动,争取到了一幢房子作为剧团的新址。这幢房子是解放前英国人办的贵族子弟学校,房间宽敞明亮,设施比较齐全,这使剧团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大为改善。1956年,根据宋庆龄的指示,上海有关方面又把解放前专演外国片的金门大戏院改建成了儿童剧场。1957年4月,儿童剧团正式改名为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

创办新中国第一份儿童读物

1950年,宋庆龄还亲自创办了《儿童时代》半月刊。她在这本新中国最早的儿童刊物之一的创刊号题词中指出:“《儿童时代》的刊行,便是给儿童指示正确的道



路,启发他们的思想,使他们走向光明灿烂的境地。”几十年中,宋庆龄给《儿童时代》写了十篇文章、四幅题词,字字句句都凝聚着宋庆龄对小朋友们深厚的爱。

宋庆龄希望新中国的小朋友热爱新社会,热爱党,热爱人民。在国庆十周年时,她教导孩子们要懂得幸福是从哪里来的:“不要忘记无数革命先辈怎么为了祖国人民解放事业流血牺牲……让革命传统在你们的幼小心灵中生根。”

宋庆龄多次教育孩子们要勤奋学习,学好建设祖国的真本领。《儿童时代》经过十年浩劫重新复刊时,宋庆龄满怀希望地写道:“你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学习……没有现代的科学技术,没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就等于赤手空拳去打仗,那是要吃败仗的,是搞不成四个现代化的。”

宋庆龄还十分关怀小朋友的健康,她在文章中常常说:“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们将来参加劳动,管理复杂的机器,飞上天空,漂洋过海,攀登高山,深入沙漠,就要有健康的身体。要有健康的身体,就要从小锻炼,养成卫生习惯。”

宋庆龄对小朋友慈爱祖母般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她要小朋友们“听爸爸妈妈的话,尊敬老师”。她要小朋友们“保护眼睛,积极参加远足、爬山活动,培养对美术、文学的兴趣,听优美的音乐……做一个有文化修养和文明行为的孩子”。

小朋友们都把宋奶奶的话牢记在心。许许多多小朋友读着《儿童时代》,和《儿童时代》一起成长。不少小朋友长大了,还不忘《儿童时代》这个好朋友。有个



当教师的青年考上大学,离开了他工作的小学时还给学生订了《儿童时代》,还把自己小时候读《儿童时代》的经验告诉小朋友们;有个《儿童时代》的



■ 宋庆龄生前发表在《儿童时代》上的最后一篇文章

小读者现在当了司机,一直怀念《儿童时代》给他的帮助,他每次开车经过《儿童时代》社门口,总要故意把车开慢一些,看上一眼,心里也高兴。

就在宋庆龄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1981年5月,《儿童时代》1981年第11期刊登了她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愿小树苗健康成长》:

可爱的孩子们,每当我想到你们,我的眼前就浮现出那些充满生机的小树苗。你们像小树苗一样。柔软的枝条,嫩绿的叶子,在肥沃的土地上扎根,在绚丽的阳光下成长。你们睁着惊奇的眼睛观察着:这个世界多么的新鲜,多么有趣,多么灿烂!



30 10万卢布的汇款单

1951年9月5日,宋庆龄收到了一张10万卢布的奖金汇款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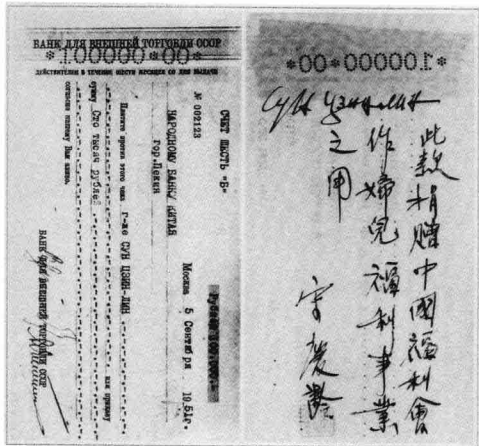
当时,这是一笔巨款。1951年9月,一个中央直属机关干部的最高月工资为35.1万元(1955年币制改革后1元相当于原来的1万元),折合成苏联货币约为52卢布,他必须工作160年才能得到10万卢布。

在得知自己获得巨额奖金的那一刻,宋庆龄就决定把这笔巨款全额捐献出来,“捐赠中国福利会作妇女儿童福利事业之用”。

荣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

为了表彰宋庆龄在维护与巩固世界和平的斗争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1951年4月,“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决定授予她“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宋庆龄所得10万卢布汇款正是这笔奖金。

9月18日,宋庆龄接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典礼在北京隆重举行。



授奖主席台上,天蓝色的幕布正中悬着巨大的绿底白色和平鸽绘画。当宋庆龄由爱伦堡、聂鲁达和刘少奇、李济深、周恩来、董必武、黄炎培、郭沫若等人陪同走上主席台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苏联作家爱伦堡和智利诗人聂鲁达是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之托专程前来为宋庆龄授奖的委员会委员。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爱伦堡和聂鲁达亲自把刻有斯大林像的金质奖章和奖状授予

■ “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汇款单和宋庆龄在汇款单后的批示



■ 宋庆龄在“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授奖典礼上



■ 宋庆龄荣获的“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证书和证章

宋庆龄。宋庆龄随即致答词，她充满感情地说：“这个光荣是属于中国人民的。”“我是以中国人民的一个代表来接受这个奖金的。”“我是以人类四分之一的代表来接受这个奖金的，他们从经验中知道必须坚决地和全世界的和平战士们团结在一起。”她的答词一再引起全场热烈的鼓掌。郭沫若继起宣布：“宋庆龄先生决定将奖金 10 万卢布全部献出作发展中国儿童和妇女的福利事业之用。”

创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按照宋庆龄的意愿，1952 年 9 月 18 日，中国福利会在上海长寿路 170 号创办了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1956 年 10 月，保健院迁至徐家汇衡山路 910 号。这是一所集医疗、保健、科研、教学为一体的市级妇幼保健专科医院。在门诊大楼的墙壁上，镶嵌着一块纪念石，上面刻着这样一段文字：“中国福利会宋庆龄主席于一九



■ 1952年9月,宋庆龄赴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看望产妇和婴儿

五一年九月十八日接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并以全部奖金创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特立石纪念 一九五二年三月八日”。妇幼保健院以“国际和平”冠名,正是为了继承与发扬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基金会在革命战争年代援建国际和平医院的崇高精神。它的全心全意为人民、为妇女儿童服务的宗旨,是与国际和平医院的优良传统一脉相承的。

宋庆龄曾多次到这所医院视察,探望在那里就诊的病人。门诊室、病房、婴儿室、检验室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宋庆龄甚至亲自到医院的厨房去检查卫生状况。按照宋庆龄和周恩来为中国福利会制定的“实验性、示范性,加强科学研究”的工作方针,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不仅为妇女儿童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还承担着妇幼保健方面的科研和成果推广的任务。1955年夏天,宋庆龄到保健医院视察时,特别关心了当时“无痛分娩法”的推行,还亲自到病房向产妇了解情况。宋庆龄经常督促医护人员努力学习业务,并为他们创造进修的机会,希望他们能以第一流的水平为病人服务。

在宋庆龄的关怀之下,医院的设施设备和医疗水平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到今天,保健院已经成为有着370张床位,年均分娩数约6000人,年均门诊量50多万



人次的大型妇幼保健专科医院。

心系妇女解放事业

创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只是宋庆龄关心妇女儿童的一个例子。其实，妇女的解放、儿童的福利是宋庆龄毕生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担任了全国妇联的名誉主席，她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妇女解放运动中，并从政府的角度为把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尽力创造条件。宋庆龄特别关注实现和保护妇女的特殊权益。

宋庆龄一方面通过中国福利会致力于妇女儿童的医药卫生和福利文化事业；另一方面，她通过亲自的视察和走访，关注着妇女权益的保障。

她不论走到哪里，都要特别询问妇女的状况。她来到工厂、农村、街道，与女工、农妇促膝长谈，询问她们是否与男子同工同酬，劳动妇女的特殊生理需要是否得到照顾，托儿所和幼儿园办得怎样……她还谆谆教导广大妇女，祖国的四个现代化需要妇女，而妇女也需要四个现代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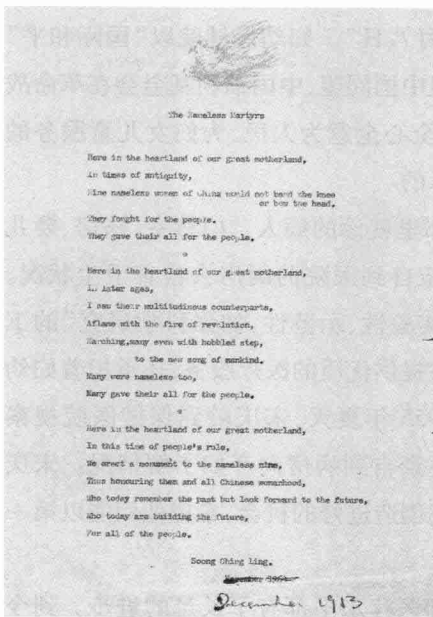
1953年底，在武昌风景秀丽的东湖边上，宋庆龄瞻仰了九女墩。传说清咸丰年间，武昌城里有九个太平军女战士英勇不屈，惨遭清军杀害。乡人敬慕她们的忠

烈，将她们的遗体埋葬于此。宋庆龄心生感慨，挥笔写下一首《无名烈士——为九女墩题》。后来，这首诗由何香凝亲笔书写后刻在了石碑之上。

在这里，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心，
在过去很久的日子里，
九个无名的中国妇女，不肯屈膝，不肯低头。

她们反抗，为了人民，
她们献出一切，为了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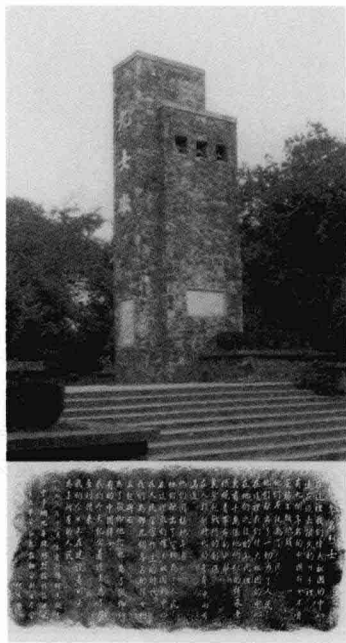
在这里，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心，
在她们之后的年代里，
更有千千万万像她们似的继承者，



燃烧着革命的火焰，
裹扎起战斗的创伤，
在人类新时代的歌声中向前迈进。
许多人献出了一切，为了人民。

在这里，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心，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
我们为那九个无名的妇女树立起碑石，
为了敬仰她们，也为了敬仰所有的中国妇女。
我们今天纪念过去，但也展望未来；
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着明天，
为了所有的人民。

这首诗正是宋庆龄内心世界的反映，表达了她对革命、妇女地位和人类进步的深切关怀。其实，宋庆龄为妇女解放贡献了毕生精力，她为中国妇女争取权利、获得解放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她的伟大业绩不也正像是一座丰碑吗？正像她自己在诗中所写的：“她们反抗，为了人民，她们献出一切，为了人民。”



■ 湖北九女墩及《无名烈士》碑文



31 “最最好的姐姐”

1956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首次来华访问，回国时，接受宋庆龄的建议，取道仰光而非香港离境。在昆明，在即将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的时刻，他亲笔给宋庆龄写了一封充满深情的英文告别信。信中说：“回国之前，如果不跟我最最好的姐姐作一次专门的告别，我就无法离开这么好的国家和这么好的人民。”

像苏加诺这样对宋庆龄充满感情的国际友人还有很多很多……

致力世界和平运动

宋庆龄是一位杰出的国际政治活动家。在20世纪20至40年代，曾积极参与世界反帝反殖民主义制度的斗争，营救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抗议德国法西斯暴行，主张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后，她继续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主张世界各国和平共处，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卓越贡献。



■ 1952年12月13日，宋庆龄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上发表演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冷战又起，世界和平仍然受到威胁。1950年3月，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发表了著名的关于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的《斯德哥尔摩宣言》，号召全世界一切正直善良的人民在和平宣言上签名。宋庆龄随即响应号召，与周恩来、郭沫若共同领导中国人民开展了规模浩大的签名运动。6月8日，她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中国人民签名拥护世界和平》一文，向苏联人民介绍了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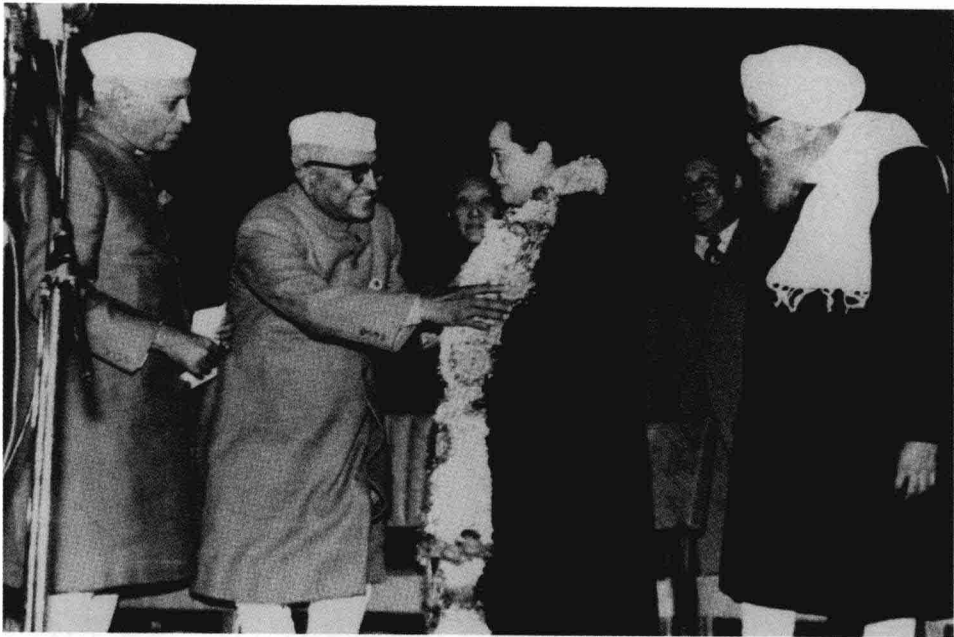
■ 1950年，宋庆龄与周恩来、郭沫若在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中签名

人民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的高涨。

1952年，宋庆龄、郭沫若、彭真、李四光、茅盾等联名发起组织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召开的大规模的国际会议，来自亚洲、大洋洲、北美、中美、南美37个国家的400名代表汇聚到了北京。宋庆龄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团出席会议，并致开幕词。她说：“和平是一个迫切的实际问题”，在极其紧要关头举行这次和平会议是一个伟大的“具有史诗意义的事件”。大会一致决定成立一个常设的联络机构，即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联络委员会，宋庆龄任联络委员会主席。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刚刚结束，宋庆龄就着手准备赴奥地利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1952年12月，宋庆龄率团到达维也纳。参加会议的有80多个国家约2000位代表。会议选出了两名执行主席，一名是宋庆龄，另一名是约里奥·居里教授——著名的法国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居里夫人的女婿。

12月13日上午，宋庆龄身着东方女装，雅致大方，神态镇静安详，显得秀丽端庄。当执行主席宣布“欢迎宋庆龄先生发言”的时候，全体代表起立鼓掌，热情欢呼。宋庆龄微笑着点头答谢。然后，她从容地戴上黑边眼镜，发表了以《人民能够



■ 1955年12月16日，宋庆龄在新德里机场受到印度总理尼赫鲁（左二）的欢迎

扭转局势》为题的讲演。她说：“各国人民有力量扭转事态的进程，恢复人们对和平的未来的信心。”

宋庆龄清楚地看到人民在维护世界和平斗争中的地位，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所以在建国初期，宋庆龄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反对侵略、维护和平的事业中去。她准确地把握时代脉搏，不断地向国外传播这样的信息：和平、进步、正义，这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呼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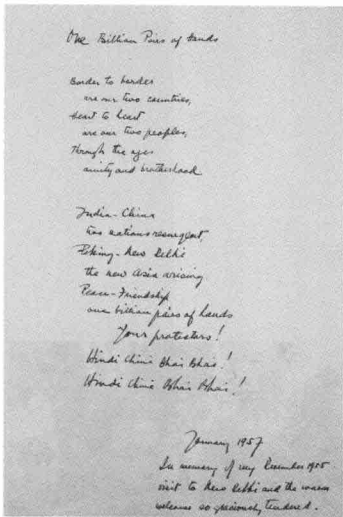
架设沟通桥梁

为了使国际社会正确了解新中国，消除种种敌视和误解，宋庆龄在邻近的亚洲国家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外交工作。

1955年12月，宋庆龄作为新中国的重要领导人，首次应邀出国访问。她访问的第一站是邻邦印度。宋庆龄与印度总理尼赫鲁早于1927年在莫斯科一家旅馆匆匆见过一面。1939年，尼赫鲁作为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来华访问时，宋庆龄原本打算从香港乘飞机到重庆去见他，但由于尼赫鲁因战局紧迫匆忙回国而未果。1948年印度独立，尼赫鲁任第一任总理。不久，他再度向宋庆龄传达了希望会面的意愿，并盛赞宋庆龄是“一盏指路明灯”。1954年10月，尼赫鲁首次访问新中国



■ 1964年2月26日,宋庆龄、周恩来、陈毅在科伦坡机场受到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等的欢迎



■ 宋庆龄为纪念 1955 年 12 月访问印度所作诗——《一千万双手》

时，宋庆龄特地邀请了尼赫鲁和她的女儿英迪拉到家里共进午餐。一年之后，在新德里机场，印度人民对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来访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尼赫鲁的带领下，代表着印度人最隆重礼节的鲜花环，一环又一环地接连挂在了宋庆龄的脖子上，以至于身边的侍卫都担心宋庆龄承受不了这重量。当天新德里各报都在头版刊登了宋庆龄应邀到印度访问的消息，并发表评论表示欢迎，各报还刊登了她的小传和照片。

在欢迎会上，尼赫鲁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宋庆龄表示热烈的欢迎和崇高的敬意。他说：“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不论中国和世界受到什么样的风暴袭击，她的信念从不动摇，她始终为和平呼吁。”据一位感觉灵敏的观察者说，尼赫鲁致词时的“那种声调是他对欧洲来宾致欢迎词时从未出现过的”。

在印度总理官邸，每天清晨，尼赫鲁都陪同宋庆龄散步，边走边亲切交谈两国 30 年来的变迁，共同展望未来的美好前景。散步完毕后，尼赫鲁又与宋庆龄一起吃早饭。尼赫鲁的女儿和女婿也陪同就餐，气氛很融洽。宋庆龄看到，尼赫鲁家的书架上还放着她的照片，更感到中印人民亲如一家。

在结束访问的前一天，也就是 1956 年 1 月 1 日，宋庆龄在全印广播电台向印度人民发表了告别广播演说。她深情地说：“虽然我在你们国家访问的时间很短，但我已经认识了许多你们古代的文化、你们现代的文明以及你们在国家复兴工作上的成就。你们人民的天才、勇敢、勤劳、智慧，使我得到很深的印象。”并指出“印度和中国是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不能推卸我们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

继访印之后，宋庆龄随即又访问了缅甸、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前后将近两个月，受到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

在宋庆龄的外事访问活动中，1957 年访问苏联是最特殊的一次。这一次，她是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



■ 宋庆龄出访缅甸时使用的手提包



■ 1957年11月16日,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上签字(前排左起:邓小平、毛泽东、宋庆龄、乌兰夫)

的身份,随同毛泽东出国访问的。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中国代表团访苏除了向苏联祝贺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之外,还担负着一个重要使命——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宋庆龄虽然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但她仍然亲历会议,并出席毛泽东签署《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的签字仪式。

通过对各个国家的访问活动,宋庆龄架设了中国人民通往世界各国的友谊桥梁。

广结友谊纽带

为积极发展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推进和平外交事业,宋庆龄经常会见来访的各国代表团,保持与国际友好人士的联系。在宋庆龄接待过的外国来宾中,有国家元首和军政要员,还有各种团体、进步机构的代表,也有国际友好人士、老朋友及普通的劳动者。

1956年9月,印尼总统苏加诺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来访,宋庆龄尽地主之谊,在北京和上海寓所分别举行家宴,招待苏加诺总统。在上海,宋庆龄还邀请苏加诺参观了由她领导的中国福利会创办的新中国第一个少年宫——中国福利会少年宫。



■ 宋庆龄将一对象征和平的白鸽赠给苏加诺

苏加诺总统还特地参观了上海孙中山故居。他仔细观看了孙中山先生的会客厅、餐厅、书房、卧室和花园。在书房的墙壁上挂着一张宋庆龄年轻时代的照片。苏加诺看到后就笑着说：“1926年我就看到过这张照片，而且也收藏过这张照片。可是，当我被荷兰帝国主义者逮捕时，照片便遗失了。”宋庆龄的秘书说：“宋庆龄先生准备送一张这样的照片给你。”苏加诺连声道谢。晚上，在上海住所，宋庆龄宴请苏加诺总统。宴会后，宋庆龄陪同苏加诺在花园里散步，并将一对象征和平的白鸽赠送给了他。

苏加诺总统在结束访问离开中国之前，难抑心中的感激之情，特地亲笔给宋庆龄写了那封充满感情的感谢信。信中一再称呼宋庆龄是他“最最亲爱的姐姐”、“最最好的姐姐”，并激动地表示：“谢谢您，姐姐，谢谢您为我所做的一切，谢谢您的仁慈。愿上帝保佑您，永远！”

除了接待外国政府首脑，宋庆龄还经常在北京和上海的寓所会见各国民间的客人，并且乐于同一些老朋友重叙旧谊。她请他们来家里吃饭时，总会准备他们喜爱的食物，餐桌上插上他们喜爱的花。尽管她日常需要关注许多大事，但她总能以她的幽默和机智使大家谈笑风生。

宋庆龄还十分关心她的老朋友们。

她不会忘记给20世纪60年代到北京定居的美国友人斯特朗送生日小礼物。

她不会忘记给由她介绍赴延安访问，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

苏加诺总统还特地参观了上海孙中山故居。他仔细观看了孙中山先生的会客厅、餐厅、书房、卧室和花园。在书房的墙壁上挂着一张宋庆龄年轻时代的照片。苏加诺看到后就笑着说：“1926年我就看到过这张照片，而且也收藏过这张照片。可是，当我被荷兰帝国主义者逮捕时，照片便遗失了。”宋庆龄的秘书说：“宋庆龄先生准备送一张这样的照片给你。”苏加诺连声道谢。晚上，在上海住所，宋庆龄宴请苏加诺总统。宴会后，宋庆龄陪同苏加诺在花园里散步，并将一对象征和平的白鸽赠送给了他。



■ 伏罗希洛夫赠给宋庆龄的风景油画

国籍的马海德祝寿。

她不会忘记给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继续为发展中国大西北落后地区的文化事业而竭尽全力的路易·艾黎祝寿。

她不会忘记每年向她最为信赖的挚友爱泼斯坦祝贺新年。

她不会忘记与返回德国定居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时期的得力助手王安娜保持通讯联系。

她不会忘记在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埃德加·斯诺病重的时候向他表示她最真切的慰问。

她不会忘记……

继承孙中山“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遗志，宋庆龄坚定地相信团结起来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在宋庆龄看来，各国人民尽管肤色、习惯、信仰或政见不同，但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共同的利益迟早会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她用她的真情去团结各方，包括尼赫鲁、苏加诺在内的各国领袖，包括斯特朗、斯诺在内的各国人民均对她充满了敬意和爱意。许多人因为宋庆龄的关系，从此爱上了中国，甚至终身为中国人民的事业竭尽心力，并且同她一样成为中外人民友谊的桥梁和纽带。宋庆龄的影响甚至延续到这些国际友人的下一代身上，许多人至今仍在为中国的建设和外交事业发挥着积极作用。



■ 1979年9月26日，宋庆龄在北京寓所设家宴为马海德祝寿



32 大江南北的足迹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经济发展刚刚起步,百废待兴。宋庆龄作为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其他领导人一样,奔走在全国各个省份,考察工作,对当地百姓嘘寒问暖,鼓励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加砖添瓦。她劳碌的身影成为百姓心中暖暖的明灯,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田。

东北之行

1950年10月,我国东北大地已临近严冬,寒风刺骨,雪花飞舞。一江之隔的朝鲜炮火纷飞,硝烟弥漫,美国政府不顾世界民意,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支援朝鲜人民与侵略者展开较量。宋庆龄与中央人民政府



秘书长林伯渠等人抵达东北后不久,即驱车前往东北边防军某部三连驻地。这个连队曾立下赫赫战功,现在他们驻扎在鸭绿江畔,准备随时赴朝作战。清冽的早晨,宋庆龄来到了连队。她走进伙房,关心战士们吃得饱不饱;她跨入战士宿舍,看战士们穿得暖不暖。



她与年轻的战士们坐在一起,询问他们有什么要求。尽管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战士们仍然用微笑回答:“我们要保家卫国。”看到战士们高昂的士气、坚定的决心,宋庆龄放心了。在回程途中,宋庆龄无限感慨地对同行者说:“我们建国不久,就能把遭受敌人蹂躏的破烂摊子很快地恢复和整顿,还能抗美援朝,这样的事应当大大宣传,我们的宣传太不够了。”

■ 1951年11月,宋庆龄在北戴河与抗美援朝志愿军战斗英雄交谈

随后,宋庆龄一行先后视察了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4个村子。她走进农户庄院,和农民们亲切交谈,与农民们合影留念。欣欣向荣的农村生活让她感受到了土地改革的巨大作用,她感叹这一切都源于人民开始当家作主,成为了新中国的主人。

东北三省不仅是粮食大省,还是重工业发展的基地。在这次视察中,各大工业厂矿也都留下了宋庆龄的足迹。在鞍山钢铁厂,汗流浃背的炼钢工人把巨大的熔炉炉门打开,一道绚烂的光芒喷射而出,钢水从巨大的炉中倾泻而下,散发硕大无比的火花。这一场景深深地震撼了宋庆龄,她说:“我心里不由想到‘这是中国的生命力’。”冒着纷飞的大雪,宋庆龄不顾劳累和寒冷坚持要去秦皇岛码头。她兴致勃勃地登上舰船,凭靠船舷,眺望远方,感慨地说,这里正是孙中山《建国大纲》中的北方大港。

宋庆龄冒着严寒,走遍了东北三省,行程4260公里,先后访问了54个地区和工程。蓬勃发展的东北三省给宋庆龄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她回京后挥笔写下《新中国向前迈进——东北旅行印象记》,激情满怀地为新中国开国第一年的成就和美好前景鼓舞欢呼:东北证明了新中国确实是在朝着它光辉的未来,向前迈进。



走进云南

1955年底,在出访东南亚四国的前夕及之后,宋庆龄两次到达中国西南的一个省份——云南。为什么宋庆龄会在繁忙的国务出访中两度考察云南呢?众所周知,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当地的经济还是十分落后,交通条件极为不便。如何保障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如何使少数民族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成为中央领导人十分关注的问题。宋庆龄不畏旅途劳苦,进工厂、下山寨,送去了中央政府对云南人民的关怀。

她首先选择了云南纸烟厂作为了解的窗口。在厂长陪同下,宋庆龄对工厂的生产、管理等各方面情况作了详细的了解和全面的视察。“大重九”香烟是云南纸烟厂的著名品牌。厂领导邀请宋庆龄品尝了“大重九”牌香烟,她频频点头,说:“云南有着发展烟草工业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有充足的优质卷烟原料,应该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优质卷烟,为国家、为人民创造更多的财富,让云南烟草走遍天下!”

在云南视察的六天中,宋庆龄的足迹遍及工厂、街道和少数民族山寨,她深刻地感受到,由于交通不畅导致的各种弊病阻碍了云南的发展。大批云南特产运不出去,而省内群众急需的工业品、药品又运不进来,教育、科技和文化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 1955年11月29日,宋庆龄视察云南晋宁县上蒜农业生产合作社,访问少数民族家庭

为了听取更多的建议,尽快解决云南交通问题,宋庆龄在出访东南亚之后,又一次来到云南进行视察。回到北京后,宋庆龄立刻向中央提交了《视察云南省工作的报告》。1956年2月2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份报告。报告除对云南工农业、文教卫生、少数民族等问题提出了多项意见外,以大量的篇幅,迫切地提出了要



■ 1955年12月,宋庆龄在云南省昆明市珠玑街视察街道工作



抓紧时间修通内地与云南省之间铁路的建设问题。

今天,云南已建设起通达祖国各地的公路铁路网,宋庆龄为之追求的目标得到了实现。

视察上海

建国后由于公务关系,宋庆龄需要花大量时间在北京处理政务,但她仍十分关注家乡上海的工农业发展,期盼着上海能够走在祖国建设的前列。

1958年10月17日,上海国棉十七厂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中午,在工厂食堂,纺织女工围坐在这位客人身旁,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共进午餐。这位客人是谁呢,原来是来厂里视察的宋庆龄。吃完饭,宋庆龄在大家的簇拥下到车间去参观,工人们的新创造和新发明让她特别欣喜。黄宝妹是纺织厂的生产能手,全国劳动模范,她的车间,宋庆龄点名要参观。见到黄宝妹时,宋庆龄紧紧地握着她的手,祝贺她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工人们自编自演的影片《黄



宝妹》让宋庆龄看得很入迷，她对工人们说：“我在厂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工人们在世界纺织史上创造了奇迹，你们不仅是生产能手，又是文化的主人；是诗人，是演员。事实证明：劳动人民最聪明、最能干，我希望你们鼓起更大干劲，创造更大奇迹。”一番话说得工人们热血沸腾。

由于长期颠沛艰苦的生活，宋庆龄当时的身体状况很差，疾病几乎折磨得她坐卧不安。但宋庆龄全然不顾身体的不适，依然关心着人们的生产生活。这不，刚刚视察完国棉十七厂，还没有怎么休息，她又踏上了视察上海郊区的道路。

一路上，从四面八方闻讯赶来的农民们，都要邀请宋庆龄到路边的农家做客，热情的人们挤满整座小屋，把欢笑声和掌声献给了敬爱的宋庆龄。宋庆龄亲切地说：“我知道你们生产干劲很大，很辛苦，特地跑来看看，一则表示慰问，再则是向农民们学习。”宋庆龄谦虚的态度再一次赢得了人们的掌声。

庄稼地里，棉花正到了采摘季节，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女学生们正在那里帮助农民采收棉花。宋庆龄看到这一场景，不由地卷起了袖子，跟她们说：“一起来个比赛好吗？”她把丰收的棉花一捧捧采摘进大大的棉花包中，动作娴熟优美，学生们都惊讶极了。

有着“社会主义大街”之称的张庙一条街是吴淞新工业区的重点街区，路旁的瓷器商店、皮具商店和画廊鳞次栉比，非常热闹。宋庆龄在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曹荻秋和市妇联副主任沈粹缜的陪同下来到了这里，街上的工人热情地欢迎她到家里坐坐。



■ 1958年10月18日，宋庆龄在上海郊区视察工作，亲自到棉田采摘棉花，并与参加劳动的学生和农民合影留念



■ 1955年5月27日,宋庆龄到上海工人住宅区曹杨新村视察,访问工人家庭

宋庆龄看到工人们其乐融融的生活,高兴地表示人民的生活水平真是大大地提高了。工业区里到处绿意盎然,清新静谧,“这里很像一个疗养区”,宋庆龄的评价让工人们充满了信心,表示要把工业区建设得更好。

随后,宋庆龄来到黄浦江边。冷风卷着江水拍打着堤岸,海军舰艇随波摇曳,全体官兵列队迎候贵客的到来。宋庆龄走上舰艇,看到士兵们熟练地操作着舰上的各种先进设备,赞叹不已。海军战士们围坐在宋庆龄身边,把自己在生活和学习上的进步告诉心目中仰慕已久的宋庆龄先生。宋庆龄挥笔写下了“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题字,勉励海军战士为保卫祖国,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作出更大贡献,战士们以标准的军礼表示一定谨记自己的使命。

许多年过去了,那个在田间、街道、工厂、码头穿梭的美丽身影似乎才刚刚离去,那亲切、淡定的笑容仍旧感染着我们。这就是宋庆龄,一位把人民的冷暖记挂在心间的人。

33 “我的钱够用了”

1973年7月30日，周恩来根据宋庆龄经济拮据的情况，指示：宋庆龄每月300元活动经费8月起月月照发不存，已存款可取用。当秘书杜述周将周总理上述指示报告宋庆龄后，宋庆龄说：“请你报告总理，我的钱够用了。现在请客由管理局付了，那笔钱我退掉。”

“八卦衣”

身为新中国的国家领导，宋庆龄拿的是国家一级工资：579.50元，当时被定为一级的只有党内的毛泽东和党外的宋庆龄，后来毛泽东又主动降低了自己的工资，宋庆龄就成为唯一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工资待遇的人。从当时的物价水平来看，宋庆龄的工资是相当高的。但是从实际生活开销来看，她的钱袋又常常很紧，



■ 1956年10月，宋庆龄和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张闻天在北京中南海



■ 宋庆龄加边放宽后继续穿的香云纱旗袍

有时还会出现赤字,需要预支工资来填补。偶尔周转不过来时,她还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借过钱。有一次,宋庆龄的秘书张珏把工资从上海汇到北京后,就替宋庆龄垫付过家用。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宋庆龄的生活是十分节俭的,日常居家,她总穿着宽松的中西便装和布鞋,其中有很多都是保姆做的。20世纪50年代以后,宋庆龄就很少做新衣服了,随着年纪渐大,体形发生了变化,原来的衣服显得小了,她就在左右两边的接缝处对称地加上一条料子,继续穿。刘少奇主席的夫人王光美,就曾亲眼看见宋庆龄穿着一件接条的黑色绣花旗袍参加活动,但是由于缝接精细,熨烫平整,一般人是很难看出这点奥秘的。

宋庆龄患有风湿性关节炎,经常感到腿疼,特别是她习惯凌晨起来办公,天气寒冷,很容易受凉。为了保护身体,宋庆龄因陋就简,找来三种不同颜色的旧毛线,拼织成了一副毛线护腿。工作之余,她还和保姆一起,用26块碎布拼成了一件棉背心。她很喜欢这件背心,经常穿在身上,护背保暖,还风趣地称之为“八卦衣”。宋庆龄用的手绢,往往是已经有了破洞还继续在用,甚至到了晚年,人们还看到她在继续使用解放前定做的绣着SCL字母的手绢。在宋庆龄的卧室里,使用的家具都很陈旧,往往还不配套。有一个自她结婚时就用的梳妆镜,镜面两边的水银都脱落了。工作人员曾劝她换一个,她说:“中间那镜面不是还好吗?”一直用到她去世。书桌旁的一个造型古老的落地灯,灯罩用破了,她便和保姆找来一块旧窗帘布,重新缝制了一个布灯罩,继续使用下去。甚至连竹篾编的字纸篓,因使用年头过久,边口都散开了,她仍在用着,舍不得丢掉。

生活既然如此勤俭,她又为什么会常常出现财政赤字呢?

原来宋庆龄的支出不只包括她自己的开销,还有上海与北京两处保姆的工资,抚养中风瘫痪的警卫员的两个女儿的费用,招待中外友人和赠送礼品的支出……这些只是固定的支出,宋庆龄对身边工作人员、朋友、亲人生活上的资助这类频繁的支出更是无法统计。宋庆龄非常细心,身边的人无论是婚丧、生子、生病住院、老家盖房打井等等,她总要送些钱和礼物表示关心。



■ 1979年，宋庆龄在北京寓所与身边工作人员合影（前排右一为警卫秘书杜述周，右三为秘书张珏；后排右一为保姆顾金凤，右四为保姆钟兴宝）

北京寓所的采购员张友 1959 年结婚时没钱操办婚事，宋庆龄出钱在自己家里为他们办了两桌酒，还作为证婚人送了新人四句话：“团结互助，共同前进。友爱甜蜜，白头到老。”张友的孩子出生后，宋庆龄又送给他们小孩衣物；张友的老父亲病故时，宋庆龄特意让秘书带着司机赶去慰问，还送去了 30 元钱；张友的儿子在四川上大学时回京度寒假，带了一些四川红橘请“妈妈太太”品尝，宋庆龄收下了橘子，还一定要给孩子 10 元钱。1973 年，宋庆龄听说另一位工作人员小杨的家里遭到了洪灾，房屋倒塌时，她又立即拿出 150 元支援小杨家修补房屋。类似这样的事情，宋庆龄身边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能列举很多。

5 万元存款

虽然宋庆龄常常人不敷出，但她从不利用自己的特权，化公为私。她每天看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和《参考消息》，都是由她自己掏钱订阅的。

对于摄影师为自己拍摄的照片，她总要先洗小样，然后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拿着放大镜一张张仔细挑选，选定后才按要求尺寸放大。尽管摄影师每次都告诉她，这是用公家的相机和胶卷拍摄的，但她仍坚持自己付费。

1963 年 1 月，她要在上海寓所会见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于是嘱咐上海的生活管理员周和康为她在友谊商店买了一些绸缎料子，准备作为礼物赠送给班



■ 1965年1月31日,宋庆龄在上海寓所与身边工作人员及工作人员的孩子合影(前排左一为保姆钟兴宝;后排右一为生活管理员周和康,左二为保姆李燕娥)

达拉奈克夫人。到了2月份,她在审核账目时突然发现,这一笔送给班达拉奈克夫人的礼品开支293元没有列入她的日常开支费用账内,于是,她马上把周和康找来,问道:“周同志,上次送给锡兰总理的礼品,是我私人送的,尚留下几块绸缎,也是我今后送人用的。这些费用由我开支,当时向你交代得清清楚楚,你为什么没有列入费用开支?”周和康怀着紧张不安的心情说:“首长说的完全是事实。可是秘书对我说,这些礼品费用,按照规定,可以由公家报销,所以,就没有列入家用开支账内。”她立即神情严肃地说:“这样做是错误的,一个人做事要论理、论法,公就是公,私就是私。这样公私不分,就是贪污行为。如果不要我自己付钱,除了送给锡兰总理的礼品外,留在家中的几块绸缎,请你全部拿去,退还给友谊商店。”周和康立即表示一定遵照指示办理,她的脸上这才露出了宽慰的笑容。

1975年,党中央出于对宋庆龄生活的关心,批准给她3万元的生活补贴。当时秘书杜述周写信向她报告了此事。宋庆龄立即给杜述周写了一封短信,表示谢绝这笔补助。信是这样写的:



■ 宋庆龄与杜述周

杜同志：

你的信收到了。请代向中央负责同志谢谢他们的好意，但我决不接受的。我的工资五百九十九元已超过别人的工资多倍了。“文化大革命”时，我就有些感觉，因此退还一些钱了。这次有几个人，需要帮助付医院等账，因此，超过了我的预算，否则是完全够用的。请不要代收补助费了。谢谢。

宋

1975. 11. 19

拒绝补助使宋庆龄在经济上陷入了困窘的境地。有时候，她不得不托人变卖一些自己珍藏的私人物品和孙中山先生的遗物。有一次，她委托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李家炽帮她处理掉一些物品，包括十几件翡翠摆设和一些孙中山穿过的皮袍。李家炽请示了上级之后，找了旧货商店的人前来估价，结果大失所望。原来那些翡翠都是假的，实际上是玻璃涂了颜色，而皮袍由于年代过久，有些发脆、有些毛皮脱落，都没有什么价值了，最后所有的东西加起来只值 2000 多元。但是李家炽等人考虑到这些东西虽然是假的，却是孙中山的遗物，在宋庆龄家里摆了几

十年,即使没有商业价值,也具有文物价值。最后决定,这些东西不能轻易卖掉,由机关出钱垫付,东西暂放仓库保存,等将来再讲。

得知宋庆龄经济困难后,1979年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给上海市委书记彭冲写了一封信,决定由国家财政拨给宋庆龄5万元人民币,这件事情交给李家焯办理。李家焯领了钱去看宋庆龄,她说:“谢谢!钱我不管,由你去保管。给我刻个私章,用‘林泰’的名字(宋庆龄的化名)来刻。今后我如果需要用钱,会有人带着我的信去你处。”于是李家焯专门去刻了章,5万元的拨款单则交由市委办公厅财务科存进附近银行。

一直到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去世,这笔钱也没有用完,“林泰”这个章用的次数不多,只有几笔开销,总共花了1万多元。



34 “不要伤害无辜”

1966年,宋庆龄73岁。这一年的5月,以《五一六通知》发布为标志,“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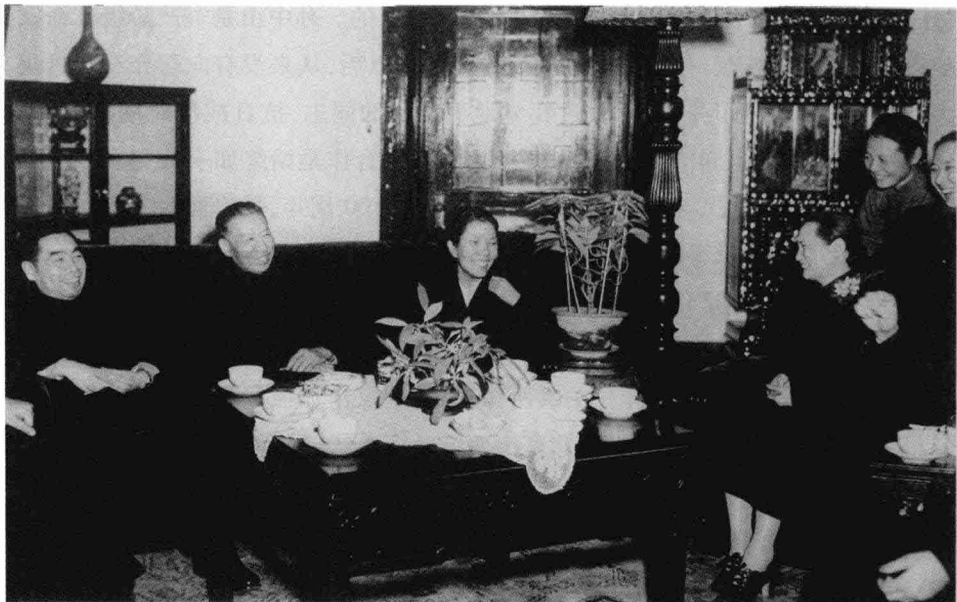
在还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是一场浩大的政治劫难的时候,宋庆龄以及她身边的许多无辜者已经受到了伤害,她对来向她解释“文化大革命”的江青发出了“不要伤害无辜”的警告。

遭受冲击和伤害

1966年8月19日,席卷全国的“破四旧”运动开始,持续10年之久的狂风暴雨降临了。

在上海,宋庆龄主持的中国福利会处于停顿状态。《儿童时代》杂志不再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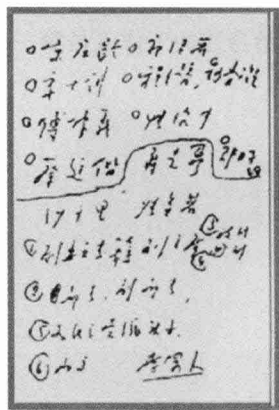
■ 1950年12月,周恩来、刘少奇、蔡畅、沈粹缜、曾宪植在北京方巾巷宋庆龄寓所作客

了,她也接不到一份中国福利会下属的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儿童艺术剧院和其他单位的报告。这些单位的领导,当时正处于不断增加的压力之下或受到了攻击。

在北京,宋庆龄在后海北沿寓所中,痛苦地忍受着围墙外红卫兵喧闹的口号声。充满“革命”热情的小将们反复喊的只有一句话:强烈要求宋奶奶不要再留那种资产阶级的发型,穿那种资产阶级的服饰。他们甚至要突破警卫,冲进寓所去张贴大字报。留发髻怎么就是“四旧”呢?而且留发髻是妈妈的遗嘱,我们三姐妹均终身留着发髻,宋庆龄对小将们的热情只能苦叹“不懂事”。

8月30日,为了保护一些为新中国建立作出过巨大贡献的爱国民主人士,周恩来总理亲自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并经毛泽东批准,宋庆龄位列名单之首。然而,两天后,北京街上却出现了要求撤销宋庆龄这位非党人士的国家副主席职务的大字报。

9月1日,大字报出现的当天,周恩来向首都红卫兵发表讲话。他严厉告诫红卫兵:“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



■ 周恩来开列的《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 100 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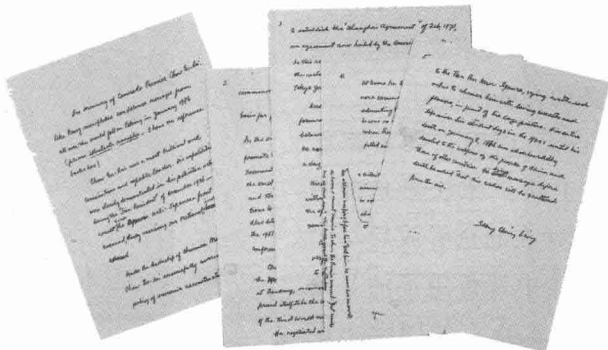
随后，周恩来不仅亲赴宋庆龄寓所探视她，还发出加强保护宋庆龄的指示，命令北京卫戍区一师、公安部八局、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服务处各单位派人进驻宋庆龄住地，制止了红卫兵的冲击。

然而，伤害并没有就此停止。

虽然周恩来曾派人到宋庆龄住地，向工作人员传达他的指示：不出去参加运动；不参加群众造反派；安心工作，为宋庆龄副主席服务好。但仍有部分工作人员违反指示，参加了造反派，对宋庆龄的服务也不尽心尽力。这些人称宋庆龄是资产阶级，她听后气得胃痛。她的老秘书黎沛华和新来的秘书刘一庸也因“出身不好”，受到造反派的斥责，不敢再陪她共用午餐，不久便都回上海去了。宋庆龄寓所所铺的地毯，也被诬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卷了起来；院内的许多匾额被摘；室内挂的名画也被取下，改挂毛泽东语录。周总理得知后，立即派邓颖超去找造反派的有关人员谈话，并调整了警卫人员。

更令宋庆龄痛苦不堪的是，1967 年 2 月，她父母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墓地遭造反派砸毁，墓盖、墓碑、石栏等物被拆毁。墓地遭破坏的照片从上海寄到北京时，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看到她精神上支持不住而痛哭起来。这次，又是周恩来亲

自出面才使问题及时得以解决。周总理给上海市革委会挂了长途电话，上海有关部门根据他的指示，立刻重新修缮了宋氏墓地，并在竣工后拍了照片寄给宋庆龄。宋庆龄对周恩来在困难时刻为她做的这件事，表示非常感激，永生不忘。



一再的伤害和打击使宋庆龄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她不再从二楼卧室到楼下餐厅用餐,她的钢琴不再传出那令人心驰神往的音符,她最喜爱的鸽子也险些被她下令杀掉……

帮助无辜受害者

“文革”开始后不久,毛泽东曾派江青往访宋庆龄,向她解释“文化大革命”。宋庆龄对江青说:“对红卫兵的行动应该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宋庆龄的正直和善良反而引起了江青的嫉恨。当秘书把1966年11月刚出版的《宋庆龄选集》放在江青面前的桌子上时,江青看到封面周恩来的题字,疯了似地将书扔到地板上,并用双脚践踏。她一边用劲踩,一边说:“总理真是!还给她题字!”同时咒骂宋庆龄,给她扣了许多大帽子。

“文革”中,身处困境的宋庆龄不仅无畏地提出不同意见,而且不怕被牵累,向那些遭受冲击和迫害的无辜者伸出了援手。

1966年11月,国家主席刘少奇已被扣上“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骇人罪名,宋庆龄仍然派秘书将新出版的《宋庆龄选集》送给刘少奇。信封上是她亲笔写的:“敬爱的刘少奇、王光美同志收。”选集的扉页上还写着“请刘少奇、王光美同志审阅指正”。1967年新年,她和往常一样,照旧给刘少奇的几个孩子送去贺年卡、日记本和糖果,仍签上“宋妈妈”三个字。王光美收到礼物后感动得热泪盈眶。1967年下半年,刘少奇和王光美



■ 宋庆龄在北京方巾巷寓所接待王光美和她的孩子们



我从1930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作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他在中国各地创立了工业合作社，帮助我们培养年轻的一代。为了这项工作，他甚至牺牲了好职业。当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当中外对共产党人进行迫害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人的避难所。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他在中国境内地不怕任何艰苦的生活条件，为中国人民工作着。解放以后，他又积极投入文化革命运动，写了很多的书和文章。为世界和平委员会工作。同时他

为我们讲演和辩论。解放前和解放时我都了解他。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战士。我极愿相信他。他如向苏维埃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使。

宋庆龄
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日

■ 宋庆龄为路易·艾黎写的证明书

都失去了自由，他们的四个尚未成年的子女，也在1967年9月13日被赶出中南海。孩子们千方百计打听父母的下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写信向宋妈妈求助。宋庆龄接信后立即予以帮助，将这封信连同自己的亲笔信一起寄给了毛泽东。她又写了一封信，鼓励孩子们振奋精神、好好工作和学习，并让秘书

带上一些慰问品和《中国建设》杂志去看望孩子们。几年之后，孩子们被获准去监狱探望母亲。当王光美听到孩子们悄悄告诉她宋妈妈对他们爱护照顾时，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

民主战士邹韬奋的夫人、时任中国福利会托儿所所长的沈粹缜也受到很大的冲击。当时宋庆龄对她非常关心，几乎三天两头给她写一封信，每信必问她好不好，有没有遭批斗，一再关照她要保护身体，回信要讲真情，有什么困难只管说。为了更好地保护沈粹缜，宋庆龄建议她搬到自己母亲生前的住所去住，那幢房子属于私人产业，解放后由上海市政府修缮后交还给宋庆龄。宋庆龄当时还以为那里可以当作一个小小的避风港。沈粹缜在征求邓颖超同志意见后，刚搬进去住了一个多月，又被造反派以“与资产阶级权威划不清界线”以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为名，勒令搬了出来。

孙中山的老部下叶恭绰在“文革”中也处境困难。宋庆龄知道后，立刻派秘书到叶家送去200元钱，叶恭绰深受感动，老泪纵横，说：“孙夫人的心意我领了，但钱我不能收，因为孙夫人是靠工资生活的。”但叶恭绰却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死后能埋在中山陵旁，在九泉之下也能见到孙先生，他请秘书将这个意见转告孙夫人。后来宋庆龄给叶恭绰写信，同意他的请求。1968年叶恭绰病逝后，他的骨灰运到中山陵旁的仰止亭埋葬，实现了他生前的夙愿。

1968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路易·艾黎居然也遭到无端怀疑面临迫害，宋庆龄闻讯后立刻为他写了那份在粉碎“四人帮”后十分著名的“证明书”，让秘书译成中文后，及时送给路易·艾黎。在“证明书”中，宋庆龄列举了艾黎为中国人民解



■ 1956年,宋庆龄手持孙中山著《建国大纲》留影



放和进步事业奋斗几十年的功绩,明确表示:“解放前和解放时我都了解他。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这封“证明书”及时地保护了路易·艾黎免遭“四人帮”的毒手。

许多年后,路易·艾黎回忆起往事,留给我们这样一句话:宋庆龄就像一朵永不凋谢的花朵,永远给人们以鼓舞。

捍卫孙中山的革命旗帜

“文革”初起,孙中山竟然被江青一伙污蔑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祖宗”和“牛鬼蛇神”。他们妄图拿走国庆节时摆放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孙中山像。在南京,位于新街口广场的孙中山铜像居然被一些红卫兵贴上“破四旧”的大字报,限令24小时内拆除,幸靠南京市委保护而得以转往中山陵保存下来。1966年9月1日,周恩来在保护宋庆龄的讲话中,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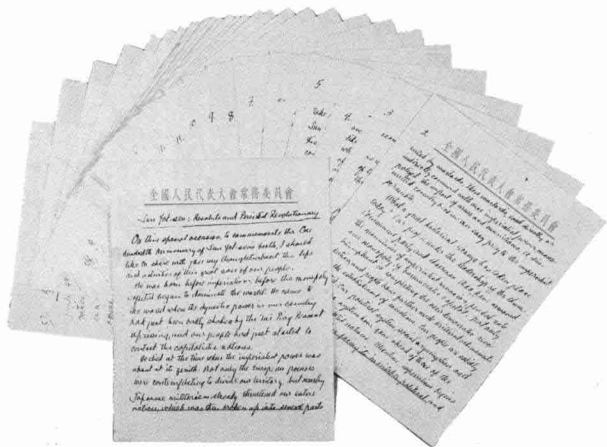
这一年,恰逢孙中山诞辰100周年。11月12日,宋庆龄出席了首都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的万人集会,并发表题为《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的长篇演讲。

在演说中,她非常简洁而又详尽地叙述了孙中山一生的业绩和他与时俱进的步伐。她把孙中山的一生概括为“一个顽强的革命者的一生”,是一位“坚定不移的、



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她介绍孙中山对工农大众苦难的深切同情,为此决心要为他们的幸福和利益去奋斗,百折不回、愈挫愈奋;介绍他在斗争中与列宁领导的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结下的友谊和合作;介绍孙中山忘我奋斗的牺牲精神和优秀品德……



■ 宋庆龄《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原稿

谈到孙中山留给中华民族的遗产时,她说:“孙中山的遗训就是他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而这笔遗产是毛泽东早就肯定了的。进而,宋庆龄指出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在当今仍有着深刻的意义:孙中山一生致力于推动革命。这一点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孙中山还有另一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为了使自己在政治上适应当前革命任务的需要,他坚持不懈地进行自我教育。他不停地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探索……宋庆龄论述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那一代革命者的探索,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功绩:“他们的目标导向我们的目标。”

对于孙中山晚年不断地修正观点,不断地与时俱进,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制定了三大政策等,宋庆龄认为这“显得更加光荣”。

宋庆龄最后满怀深情地总结道:“他(孙中山)的名字和他的精神仍然活在我们心中。我们为他40年的忘我斗争而感到骄傲。”

宋庆龄还写道:“孙中山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坚定性和坚韧性经常鼓舞着我们。”

这篇1万多字的演讲是宋庆龄作过的最长的纪念孙中山的演讲。她在这篇呕心沥血的力作中,热情歌颂了孙中山伟大的革命的一生。

面对“文革”逆流,宋庆龄以她自己的方式作出了反击。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以她特有的方式,对同志、亲友给予关怀、帮助和保护。她坚持真理,伸张正义,为革命与建设事业保存了力量。

34
「不要伤害无辜」



35

金色的余晖

1976年的金秋,天空的“乌云”散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83岁的宋庆龄由衷地欢呼:“我将以无可比拟的欢乐来庆祝这个节日!”

在之后直至逝世的四年多时间里,宋庆龄尽管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但她以顽强的生命力、坚韧的意志力和旺盛的战斗力的忘我地工作着。宋庆龄以她的睿智和坦然,让她生命的最后岁月焕发出了灿烂的人性光辉。

最后的追求

1981年5月15日晨,王光美驱车匆匆赶赴北京后海的宋庆龄寓所探望病重的宋庆龄。这绝非是一次普通的礼节性探望,记忆将王光美带回到了1957年4月……



当年,刘少奇和王光美正在上海进行重要的外事活动,活动期间专程前去宋庆龄住所探望了宋庆龄。谈话间,刘少奇向宋庆龄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并说:“孙中山先生很有才华和魄力,献身革命几十年如一日,之所以没有成功,就因为没有一个好的党。我们共产党吸取了他的教训,注重建设一个好的党。我们现在号召整风,就是要把我们的党的建设好。有一个好的党,才能领导全国人民富强起来。”宋庆龄兴奋地说:

■ 1980年6月28日,全国妇联举行茶话会,宋庆龄与王光美互致问候

“党中央采取这个态度很好，我相信党一定会越来越好。”并郑重而恳切地提出希望参加中国共产党。刘少奇当即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情，我将转报党中央和毛主席。”不久，刘少奇就向宋庆龄转达了党中央研究的意见：“党中央认真地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宋庆龄点了点头表示理解。

事实上，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时，作为孙中山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忠实继承者和捍卫者，宋庆龄就公开表示她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不久，她为抗议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而出走海外。1929年，她在巴黎与廖仲恺的女儿廖梦醒会面，当廖梦醒告诉宋庆龄她已与一名共产党员订婚后，宋庆龄关心地问廖梦醒本人是不是共产党员。尚未入党的廖梦醒如实相告，宋庆龄以为廖梦醒瞒她，便笑着说：“当共产党是件好事，你何必否认。”宋庆龄后来高兴地写信告诉杨杏佛，廖承志也成为共产党员了，而廖梦醒则回国与一个共产党青年结了婚。她还意味深长地说：“有趣的是，南京政府官员的后代已有半数投入共产主义的怀抱。”

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时期，宋庆龄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和特殊影响，营救了众多



■ 1950年，宋庆龄在北京与刘少奇、王光美合影



■ 1980年元旦,宋庆龄和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举行的茶话会上

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宋庆龄坚信“只有共产党能团结全国人民把中国搞好。社会主义就是新三民主义的发展”。

中共中央虽然没有从组织上吸收宋庆龄入党,但一直把她作为党的领导同志看待。党的重要的会议邀请她参加,重要的文件专呈她审阅,重要的决策也征求她的意见。同样,宋庆龄从党的事业出发,服从当时大局的要求,表现了一位伟大共产主义战士对党的深厚情感和伟大胸怀。

面对临终的宋庆龄,王光美觉得自己有义务帮她向党中央转达她要求入党的意愿。趁宋庆龄神志清醒时,王光美对宋庆龄说:“毛主席、刘少奇和周总理都对你有很高的评价,我昨天去拜访过总书记胡耀邦,他也一样。记得你曾提出要求入党,不知现在是否还是这样想法?”宋庆龄点头表示肯定。王光美又接连重复了三遍,宋庆龄都明确表示肯定。王光美随即电告胡耀邦。胡耀邦当即表示:“我这就处理此事。”

王光美走后,邓颖超和彭真代表党和政府前来探望宋庆龄,他们告诉她党几十年来都把她作为同志对待,现在正在考虑她的入党请求。宋庆龄睁开眼睛看着他们,轻声答复道:“好。”

当天下午,邓小平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一致通过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员。下午6时许,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从中南海的会议室直接驱车前往宋庆龄寓所,报告这一喜讯。廖承志到宋庆龄床前握着她的手激动地说:“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党中央已经庄严决定接收您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宋庆龄点了点头,但说不出话来,她仍在发高烧。第二天上午,邓小平前去看望宋庆龄,祝贺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望着邓小平,微笑着,点点头。她由衷地感谢党和同志们。

宋庆龄肖像

宋庆龄女士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领袖，也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她的一生是为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而奋斗的一生。她是中国妇女运动的杰出领袖，也是中国人民的楷模。她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 1980年3月8日，宋庆龄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70周年联欢会并致词



最后的关爱

在1981年第11期的《儿童时代》杂志上,刊登了宋庆龄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这是慈祥的宋奶奶送给孩子们的儿童节礼物——《愿小树苗健康成长》。在文章中她深情地写道:“可爱的孩子们,每当我想到你们,我的眼前就浮现出那些充满生机的小树苗……狂风暴雨、病虫害、环境污染,都会危害小树的成长……你们就需要认真学习,接受教育,增强抵抗力和提高辨别力。”“我想象着葱绿的大地和鲜艳的红领巾将把祖国点缀得更加美丽多姿,更加欣欣向荣。愿你们和小树苗一起成长……为创造更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超过前人的巨大贡献。”

“文革”结束后,宋庆龄为“百花园中的一朵小红花”——《儿童时代》的复刊而欢欣鼓舞,为重建儿童艺术剧院而呕心沥血,为繁荣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而摇旗呐喊。

此时的宋庆龄已是耄耋老人,病魔正不断侵蚀着她的健康,而关爱儿童、缔造未来的事业却是她焕发青春的灵丹妙药。在生命的最后4年,她25次为儿童写作或谈到少儿工作,6次为妇女写作,也常常联系到儿童。



宋庆龄自己没有儿女,但她把全国的少年儿童都视作自己的儿女。孩子们回报她的,也是无限的爱戴和崇敬。她病重期间,许多孩子把用先烈的鲜血和自己的心血染红的红领巾寄给慈祥的祖母,祝愿她健康长寿。河南等地的一群少先队员把1分、2分的零用钱凑在一起,寄来了19元3角3分作为宋奶奶的营养费。不少曾在宋奶奶的关心下“死里逃生”或“培育成才”的孩子写来了满怀赤诚的慰问信。

1981年5月14日,病重的宋庆龄在病榻上托着一块木板致函祝贺“六一”国际儿童节报告会:“我不能参加这次大会,但我关怀热爱儿童和少年的心和你们一起跳动。”这篇为“六一”国际儿童节所作的文章是宋庆龄最后的绝笔。当晚,宋庆龄的病情突然加重。次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开始发布关于宋庆龄的病情公告。15天后,宋庆龄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但是,她充满慈爱和关怀的心将永远和全国的少年儿童在一起。

最后的身影

1981年5月8日下午,200多位中外人士齐聚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向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名誉会长宋庆龄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典礼。宋庆龄身披博士礼服,手持中文讲稿,即席用流利的



■ 宋庆龄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证书



■ 宋庆龄在典礼上发表讲话

英语发表了近 20 分钟的讲话。她说：“我接受这一学位，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把它看作是你们对中国人民的尊敬和友谊的象征，看成是你们对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我们人民共和国的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的敬慕和友好的象征。同时，我也是把它看作是把中、加两国人民联结在一起的悠久而牢固的友谊的象征。”“无论是在孙中山领导的反对帝制的革命中，还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中国人民都得到了酷爱正义的欧裔加拿大人的帮助。他们最杰出的代表、最崇高的象征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她特别指出：“中国坚信，她能够完成不断进步的任务。这种任务集中体现在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上。为达此目的，我们同样需要和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之所以要授予宋庆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与宋庆龄长期从事保卫世界和平、增进各国友谊的国际活动是分不开的。

在漫长的黑暗年代里，孙中山“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言引领着宋庆龄为自由和民主而战斗。而当新中国的光明来临后，宋庆龄又跟随时代的步伐，将她的视野拓展向更为广阔的空间，致力于保卫世界和平，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她常年保持着与众多国际友好人士的个人联系。一封问候的信函，一餐普通的家宴，一张精美的贺卡，一本英文的中国菜谱，一包“甜甜嘴、暖暖心”的点心，联

结着世界各地众多著名的或普通的、官方的或民间的,但都共同关注着或热爱着中国的各界人士。

宋庆龄在长期的国际活动中,为反对侵略战争,为一切被压迫、被奴役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增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为争取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赢得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当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决定授予宋庆龄名誉法学博士消息传来的时候,宋庆龄正发着高烧。她原打算不出席授赠典礼,考虑到接受这一学位有益于增进中加两国人民的友谊,她最终还是决定出席。

宋庆龄对授赠典礼十分重视,不仅亲自构思发言稿,还亲自安排赠送加拿大客人礼物一事,并向工作人员口授具体程序安排,嘱咐典礼要突出加方的地位。为预防临时突变,宋庆龄还事先亲自录好了在授赠典礼上的讲话。

宋庆龄的健康状况并不适宜参加这样的大型活动,但在会见维多利亚大学校长时,在授赠典礼的全程中,她展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个雍容大度、完全健康的形象。尤其在现场讲话时,她既未采用事先录制好的讲话录音,也未接受由她先读几句,然后由翻译译读全文的建议。

典礼结束后,宋庆龄非常疲惫,但她仍不忘嘱咐工作人员保存好博士服、博



■ 宋庆龄在名誉博士证书上签字



士帽。

不久,宋庆龄的这篇讲话以《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为题在《中国建设》杂志上向海外公开发表。而这个标题正是出自半个多世纪前,她的丈夫、她的导师、她的战友——孙中山先生去世前一天签署的政治遗嘱。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宋庆龄无视病情,坚持发表现场讲话的原因和动力。

宋庆龄留给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最后的形象仍然是一个美丽的形象。

最后的情谊

初到宋庆龄陵园的人们大多会诧异,墓地西侧与宋庆龄墓对称位置上安葬的李燕娥是什么人?她为什么能安葬在这里?她的墓怎么会与国家名誉主席同样的规格?

李燕娥,1911年农历十月初十日出生于广东香山县,是孙中山先生的同乡。1927年,16岁的李燕娥由孙中山的亲戚介绍来到上海莫利爱路29号寓所当女佣,伴随宋庆龄走过了大半个中国的山山水水,度过了50多个春秋的风风雨雨。宋庆龄曾说:“李姐虽然没有文化,但是非分得很清楚,是位坚强高尚的女性。”李燕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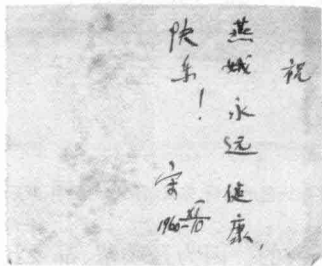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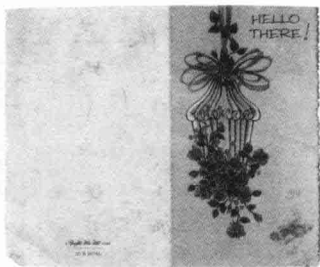
虽然没什么文化，却有一片赤诚的忠心；她虽然没什么学问，却有一双警惕的眼睛。她不受利诱，识破特务阴谋，终其一生，对宋庆龄和她的事业忠心耿耿。宋庆龄对她也不以仆佣视之，而是亲切地称她为“李姐”。

1979年4月，李燕娥被确诊罹患癌症。闻听此讯，宋庆龄十分难过。她立即指示秘书安排李燕娥住院治疗，“每天她的费用由我自己付。请最好的大夫给她治疗，因为她是我的老战友”，并要求随时报告情况。几天后，在听取了病情报告后，又立即指示让李燕娥转赴北京治疗。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李燕娥及时施行了手术。当得知癌症并未扩散时，宋庆龄甚感宽慰。在给友人的信函中还以此为例，告诫“有病必须及时治疗，不要拖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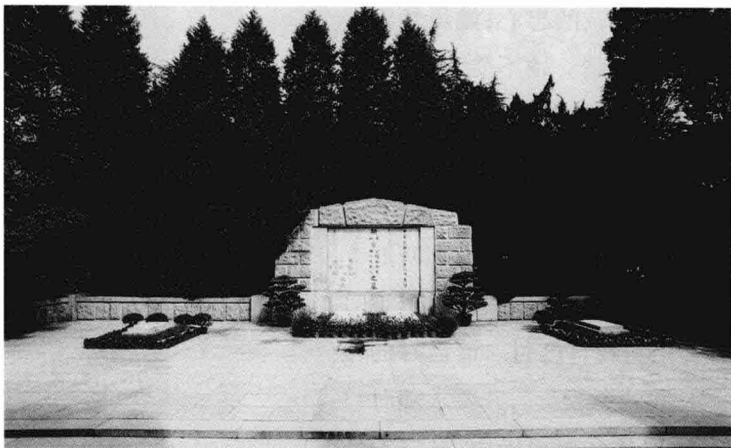
然而，到了第二年的3月，宋庆龄不得不再次派人接李燕娥来京，因为李姐的病复发了。宋庆龄在处理完每天繁忙的公私事务之外，还要强忍凄楚，不顾疲劳地去安慰李姐，尽力减轻她的痛苦，期盼她会“绝处逢生，渡过磨难”。随着李姐病情的不断加重，宋庆龄还特别聘请了两个保姆，轮流照顾李燕娥。这段时间，宋庆龄在私人通讯中几乎每次都要叙述“亲爱的李姐”的病情并表达她的哀伤之情：“可怜的李妈（我称她李姐）正被癌症煎熬着……五十多年来她一直是我的一位最忠实的益友，我要不惜一切地救她。”“她的腹部和腿部都浮肿，已不能走一步路，拿不住任何食品，通宵睡不好觉，只能白天打一个盹，活得好痛苦！”

1981年2月5日，宋庆龄得知李燕娥病逝的消息后，因悲痛万分而病倒了。追悼会上宋庆龄送的花圈上写着“悼念李燕娥同志”。“同志”这个称呼一直是宋庆龄最为珍视的，她与李姐间早已不只是私人的情分，而是战友的情谊了。

对李姐的后事，宋庆龄非常关心。她在关于丧事安排文件上作了批示：“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的坟的边头，要立她的碑。我以后也要葬在那里。记得我家在那里有八穴地。”不久，沈粹缜来京探望，宋庆龄和她面对李姐的骨灰盒，向她述说起李姐往日对自己的种种好处。她一再叮嘱沈粹缜“要为李姐立碑，写上‘李燕娥女士之墓 宋庆龄立’”，并亲切地抚摸着李姐的骨灰盒，把脸贴在骨灰盒上亲了又亲，滴滴眼泪洒在了骨灰盒上。



■ 宋庆龄赠给李燕娥的生日贺卡



■ 宋氏墓地全景，宋庆龄父母墓居中，其东侧为宋庆龄墓，西侧为李燕娥墓

之后，沈粹缜带着宋氏墓地的图纸，来京向宋庆龄汇报上海李燕娥骨灰安葬的方案。宋庆龄戴上眼镜，细细地观看图纸。她指着图纸说：“李姐的骨灰葬在左边，平行的右边

是我的。因为是小辈，都要比父母的墓穴低一些。”说着说着，她不禁又回忆起了李姐。

4月初，沈粹缜再次专程来京，带来了在上海万国公墓宋氏墓地举行李燕娥骨灰安葬仪式的照片。宋庆龄看后，连声赞扬上海的同志工作效率高。几个月来压在她心头的一块大石头终于可以落地了。

在她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宋庆龄一直没有亲人相伴左右，因此她也就把和她朝夕相处的工作人员当作了她的亲人。她与工作人员的深情并不仅仅是一个李燕娥，对其他人也是如此。谁有个头疼脑热的，她必定会让他休息治疗，并派人探望；谁家有个天灾人祸的，她必定会解囊相助；她会为工作人员添置寒衣；她会为工作人员置办婚宴；她会为工作人员的子女和警卫战士购置文具，鼓励他们认真学习，努力工作；逢年过节，她会给工作人员送上礼物……她始终无微不至地关怀着身边的工作人员，而这些她都是从自己的工资中开支，周转不过来的时候，她甚至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借钱。

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还一再叮嘱看护她的人要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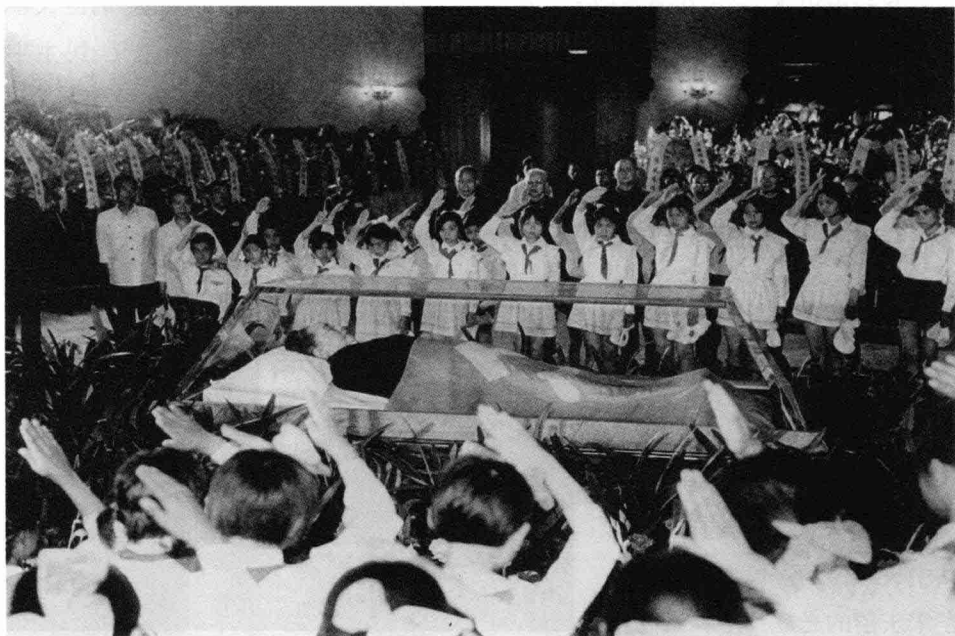
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宋庆龄与世长辞。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名忠诚的战士，国家失去了一位卓越的领导人，中华民族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女儿，孩子们失去了他们永远慈爱的宋奶奶。

36 大地的女儿

宋庆龄逝世的当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立即通过新闻媒体向全世界沉痛宣告了这一噩耗,决定为宋庆龄同志举行国葬,以表达我国各族人民的沉痛悼念。

举国同哀

从5月31日至6月2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12万多人来到人民大会堂吊唁大厅,瞻仰宋庆龄的遗容,缅怀她一生的光辉业绩。一位当年曾为孙中山先生题写过挽联的耄耋老人,托人带来了他悼念宋庆龄的挽词:“昔年挽孙公,此日悼孙媪,中外八方同,记录荣哀好。媪名泰岱高,媪志日星洁,不失赤子心,永



■ 少年儿童向慈爱的宋奶奶告别



■ 邓小平致悼词

的灵车，挥泪送别这位毕生追求真理的中华女杰。

6月3日下午4时，宋庆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追悼大会会场庄严肃穆。宋庆龄的巨幅遗像悬挂在主席台正中，遗像下面安放她的骨灰盒，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周围摆放着鲜花和松柏。解放军礼兵持枪肃立，守护在遗像两旁。黑底白字的“宋庆龄同志追悼大会”的巨大横幅高悬在主席台上方，主席台对面的巨幅横标上写着“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宋庆龄同志永垂不朽！”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政协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敬献的花圈摆放在宋庆龄遗像的两侧和大礼堂周围，一楼大厅里摆放着一些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各国驻华使节以及一些国家的社会团体、友好人士送来的花圈。宋庆龄亲属献的花圈摆放在宋庆龄遗像前。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了追悼大会，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悼词高度评价了宋庆龄的光辉一生和崇高精神：“宋庆龄同志鞠躬尽瘁，七

宝儿童节。”

6月2日下午6时30分，夕阳西下，从人民大会堂传出的哀乐声回荡在长安街上空，宋庆龄的遗体将移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人们默默地聚集在大道两旁，有刚下班的职工、刚放学的学生、怀抱着幼儿的父母、搀扶着老人的年轻人……近百万人自动组成的厚厚的人墙绵延十多公里，目送着缓缓行进的



■ 宋庆龄追悼大会会场



劉春明 北京 養鴿人與鴿
北京和平門外西便門外大街，劉春明與鴿子，養鴿人與鴿



■ 胡耀邦主持追悼大会

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威武不屈,富贵不淫,高风亮节,永垂千古。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跟随历史的脚步不断前进,从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

6月4日清晨,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彭真、胡耀邦、王震等到北京机场为宋庆龄送灵。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陈慕华等护送宋庆龄的骨灰乘专机移送上海安葬。上海是宋庆龄的出生地,也是她长期生活和战斗的地方。此时的上海虹桥机场,上海市党、政、军领导和各界群众、解放军战士、少先队员胸佩白花,心情沉重地迎候这位上海的优秀女儿回归故土。

8时50分,专机徐徐降落。随着舱门轻轻地开启,乐队奏起了庄严肃穆的葬礼进行曲,人们肃立默哀,少先队员和解放军战士举手致敬。六名人民解放军礼兵,两名为前导,一名捧着用鲜红的党旗覆盖着的宋庆龄的骨灰盒,一名捧着宋庆龄的遗像,后面两名抬着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联名敬献的花圈,稳步走下舷梯,走向灵车。凝望着这一幕,人们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在护灵车队驶往宋庆龄父母的安葬地——上海市万国公墓宋氏墓地的途中,来自工厂、农村、部队、机关、学校的近万名群众,自发地默默聚集在路边,为宋庆龄送行。

9时25分,护灵车队驶进了用苍松翠柏扎起牌楼的万国公墓大门。整修过的宋氏墓地四周环绕着苍翠的龙柏和冬青。宋庆龄的遗像安放矗立在她的墓穴后,墓穴周围摆放着她生前喜爱的兰花、杜鹃花和郁金香草,两侧摆列着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政协和全国妇



■ 宋庆龄灵车从上海虹桥机场驶向万国公墓

联、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对外友协、上海市党政军领导机关、上海市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中国福利会献的花圈，宋庆龄亲属献的花圈放在墓穴的前面。解放军礼兵守立在墓穴两侧。

9时50分，葬礼开始。乐队奏哀乐，参加葬礼的人们全体肃立默哀。当解放军礼兵将宋庆龄的骨灰盒安放进雪白的大理石椁中时，人群中响起抑制不住的啜泣声，少先队员们眼看着无限关爱他们健康成长的慈祥祖母将永远长眠地下，更是放声恸哭。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陈慕华和上海市领导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等缓步绕墓一周，把一枝枝宋庆龄生前喜爱的衬着松柏的黄色香石竹花轻轻放在她的墓上。宋庆龄的亲属孙穗英、孙穗华来到墓前，向祖母的遗像深深鞠躬致哀，她们把手中的黄花捧到面前，亲吻一下，再恭恭敬敬地放在墓上。宋庆龄的国际友人耿丽淑、柯如思互相搀扶着上前献花，久久不忍离去。宋庆龄的挚友廖梦醒，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恭恭敬敬地献上鲜花，并深深地行了三个鞠躬礼……42枝鲜花，代表了全上海人民、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对这位伟人的无限景仰、热爱和悼念。从此，宋庆龄长眠在了她父母的身边，长眠在了与她风雨同舟、生死与共50多年的“李姐”的身边，长眠在了以诞生了这样一位伟人而骄傲的上海人民的心中。

魂归故土是宋庆龄的心愿。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生前在万国公墓购置了22穴



■ 党和政府在上海万国公墓举行宋庆龄骨灰安葬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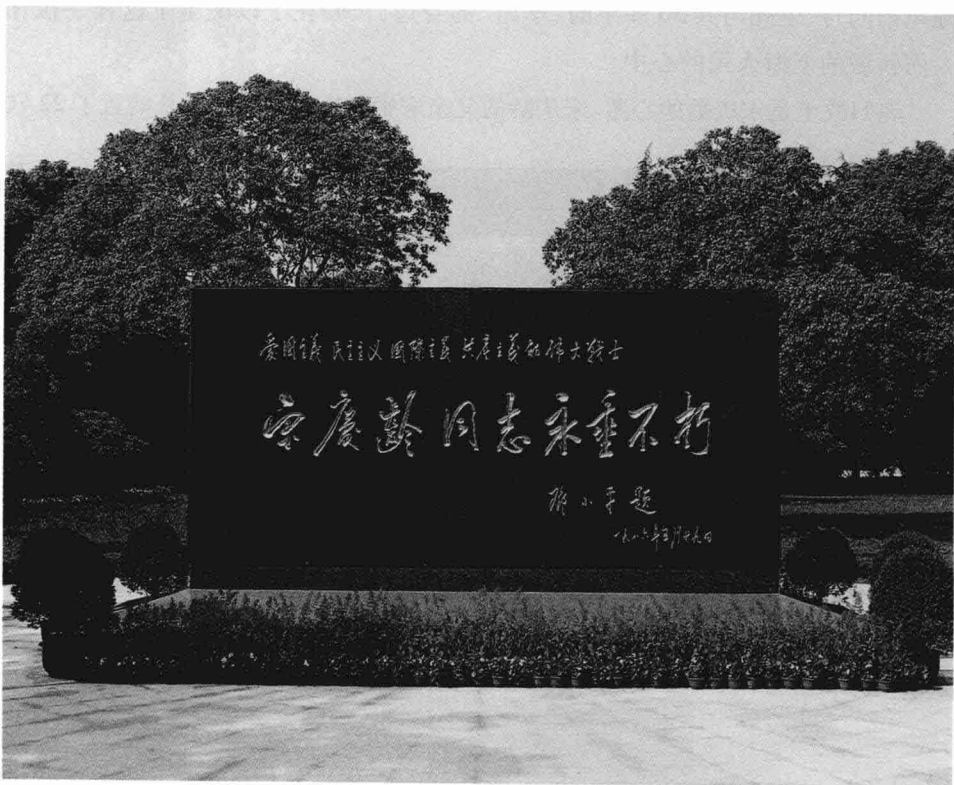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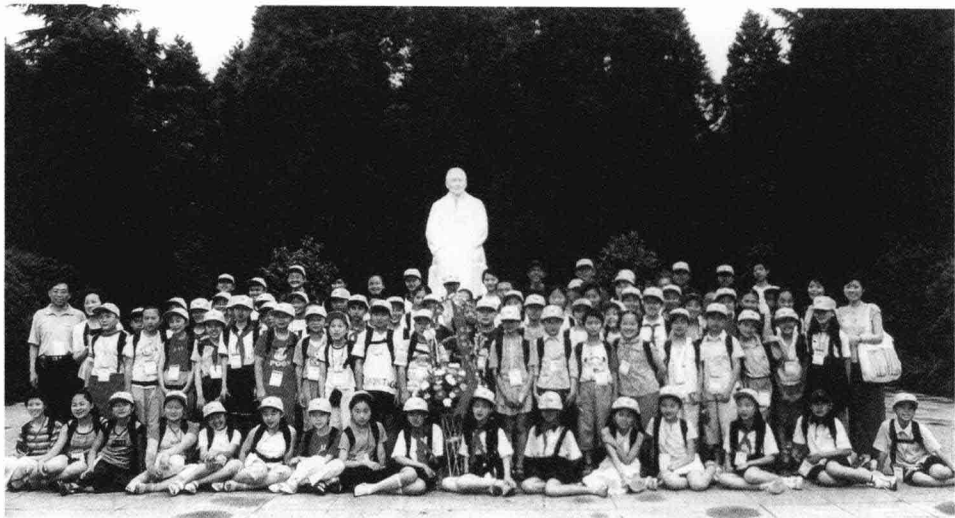
墓地，他与宋庆龄的母亲倪珪贞去世后均安葬在此，故称宋氏墓地。宋庆龄曾在审定李燕娥墓设计图纸时说：“李姐的骨灰葬在左边，平行的右边是我的。因为是小辈，都要比父母的墓穴低一些。”她也曾在李燕娥入葬万国公墓后，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死后，将长眠在我忠诚的同伴身边。在那里，朋友们会比在高耸的紫金山更容易找到。紫金山是只为真正伟大的人物服务的。”在宋庆龄看来，孙中山的功勋和荣耀只属于孙中山，她不应去分享；也许她觉得，生前既已未能承欢在父母膝下，身后自当永远陪伴在父母身边。

宋庆龄以她的卓越功勋、她的不朽精神、她的崇高品格、她的独特魅力感召着世界各地不同年龄、不同地位、不同国籍、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党派的人们纷至沓来。自1981年至今，前来参观瞻仰的海内外各界人士累计已达约600万人次。

宋庆龄的墓地上，常年不断，日复一日，有敬仰者送的鲜花、花篮和花圈……


综观宋庆龄的一生，她有充满激情的原则，她有捍卫旗帜的意志。她不顾家族反对，毅然同孙中山和他的革命事业结合。她在孙中山逝世后的滚滚逆流中，宣





■ 每年,数以万计的少年儿童来到宋庆龄陵园祭扫参观

判了国民党政治上的死刑,日趋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了一起。她有牺牲自我的忠诚,她有献身理想的勇气。她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一句“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感天动地。当战友们纷纷蒙难,自己身处险境时,她依然勇往直前,勇敢地去保卫那些勇敢的革命者。她有超越政治的智慧,她有洞悉潮流的远见。她竭力促成和维护了国共合作,使国家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之后她继续为完成中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而奋斗,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欢欣鼓舞。她有追求和平的信念,她有缔造未来的仁爱。她在世界范围内积极开展和平运动,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解放争取到了广泛的国际支持和援助。她为妇女和儿童的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贡献了卓有成效的示范性和实验性的范例。在宋庆龄的身上融合了东西方文化最优秀的内涵,汇集了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情怀。而令上海人民尤为感到骄傲的是,她就是这个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英雄城市的女儿,就是这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走向伟大民族复兴的大地的女儿!



编写这本书的念想已有许久,应是从担任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领导职务开始,以后愈发强烈。没有细想过其萌生的原因,也许是责任的驱使,也许是人生的感悟,也许是年少时读书的深刻记忆——也许都有。但我想更重要的是,因工作原因在对孙中山、宋庆龄两位伟人的研究思考中,由内心的崇敬所产生的强大震撼。我以为,感受人物的伟大并不是把人物神化,血肉情义人皆有之。从父母姐弟到家庭生活,从婚丧嫁娶到喜怒哀乐,这些常人的生活轨迹伟人也有,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然而,当我们用人性的目光去细细体察,就能感受到从平凡中脱俗出来的伟大。触摸伟人的生活轨迹,用真实的故事让人近距离地感知伟人,从中不难领悟和理解“伟大出自平凡”的真谛。就像突如其来的汶川地震,让我们读懂了寄寓在平凡里的人性关爱,源于责任感的惊人意志,让我们在催人泪下的感动中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当然,伟人并不是普通人,这是因为除了常人情感之外,他们的精神境界在时代风雨的磨砺和洗礼中已经超然于平凡。他们为民族的崛起,把生死置之度外,百折不挠,毕生奋斗。孙中山直至临终,仍然竭尽全力呼喊着:“和平,奋斗,救中国。”宋庆龄在生命最美好的时光义无反顾终身“嫁给了革命”。这些都是常人难以做到的。时代所处的环境和人物内在的精神力量造就了伟人的不朽业绩。孙中山一生处在中华民族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历史阶段,尽管他的

一生屡遭失败,但他愈挫愈奋的斗志,正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坚强品格的经典写照。宋庆龄一生追随革命,把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安危与自己紧紧相连,被称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女性。他们是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脊梁,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取之不竭的精神动力。

斗转星移,伟人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然而,当今人们对伟人的怀念是否依然?伟人当年的一腔热血是否还在后人的血脉里涌动?伟人的形象是否在当代青少年的记忆中渐行渐远?时代的拷问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一种责任:应当把我们的内心感知告诉人们,把我们从伟人那里汲取的精神力量传承给当代的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注入精神动力。我们的作为可能微不足道,但我们不能因此忘却责任,更不能辜负责任。

虽然这是一本容量不大的作品,但我深知其编写的难度,且随着工作的深入,这种感觉与日俱增。一个创作经验不多的群体,凭借有限的知识,通过择取生活片段,去串联伟人完整的人生线索,用尚属稚嫩的笔触准确还原当年的史实,这很难。何况我们面对的大部分受众是一个思维敏捷、视野开阔的青少年群体,为此,我们的确底气不足。好在国内不少知名的专家学者给了许多关键性的指导,长期从事孙中山宋庆龄研究的盛永华、张磊、沈渭滨教授担任本书的顾问并亲自审稿。尤其是长期分管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炜同志,欣然命笔为本书写序。胡炜同志素来热心助人,对孙中山、宋庆龄文物事业及其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也十分关心,平时扶持甚多,他的相助更使我备受鼓舞。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沈晓明副市长及教育、出版部门的领导也给了极大支持。毫无疑问,这本书的问世是集体力量的结晶。

得遂我当初的念想,作为编者,藉此向所有给予热情帮助的人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跋

陈永华